

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胡適

徐炳昶先生從西安來信（見本期），其中有一段是希望獨立評論的幾個朋友聯合起來出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他特別問起我「近來的意見若何」。我想，我的意見雖然不能代表獨立評論同人的全體，也未見得有多大的價值，然而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都應該赤裸裸的說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我在前年（一九三一）十一月曾主張政府當局應該接受日本政府在國聯提出的五個基本原則，開始交涉。

我在去年（一九三二）六月曾公開作文主張政府應該表示願意依據上述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

（本刊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我當時說，「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到了今年日本拒絕國聯調解並且退出國聯之後，我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對日交涉無論取何

種方式，必須不違背國聯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大會上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原則。在日本沒有表示承認這些原則之前，中國對自己的人民，對世界，都有不同日本進行交涉的義務。（本刊四十四期，「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這是徐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知道的。至於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這不是說凡主戰的都是昧着良心的，這只是要說，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

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我讀了董時進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四月三日至四日的大公報），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筆鋒與辯才，但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可以「徼倖三次四次乃至於許多次」。我決不能像董先生那樣信仰「大車

駱駝和人」的運輸；更不信他說的「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我絕對不信他說「我們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樹皮都沒有，他們不吃也成，到餓死也不會騷動，更不會同兵士爭糧餉」；如果真是這樣，這樣一到餓死也不會騷動」的百姓裏決不會產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拚命爲國家作戰的武士！

我的良心絕不能容許我學董時進先生說這樣的話：

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董先生在本刊這一期裏有一篇「中國的廢話階級」，

勸我們大家不要說廢話。他有他的廢話的定義。但依我的愚見，凡不負責任的高調，都是廢話。孔子曾說：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凡立一說，建一議，必須先把此說此議萬一實行時可以發生的種種結果都一一想像出來，必須自己對於這種種結果準備負責任。這才是立言無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負責任的廢話。

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爲政論是爲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爲「無所苟」的政論。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說夢話，盲人騎瞎馬，可以博取道旁無知小兒的拍手歡呼，然而不是誠心的爲社會國家設計。

「作戰」不過是兩個字，然而我們很少人充分想過這兩個字包涵的意義。最近出版的東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有一

篇多馬舍夫斯基的「未來戰爭的研究」，約有四萬多字，詳述「吾人所可見之將來戰爭，爲大量之軍隊，在物質方面有豐厚之供給，交戰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一切之方法，直至一方完全疲盡爲止」。作者告訴我們：當上次歐洲大戰開始時，德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至十七日共計十七日之中，鐵路方面共開行一萬二千列車，共運送三百二十萬人，九十萬匹馬，而無一次意外及不幸事件發生。他又告訴我們歐戰各國汽車運輸的統計：到歐戰終了之日，

汽車 十一萬五千輛，

機師 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人，

工匠 二萬七百六十二人，

辦公職員 十六萬五千人，

官員 二千六百五十七人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年之中，共耗用了

汽油 二，四一一，五三一立脫

油 一五九，八三五立脫

水電石 一八，八六四基羅加倫

擦輪油 一六，七九九基羅加倫

他又告訴我們「空間防禦」的種種方面：他說：

一國空防組織，必多設偵察之點，使其聲息相通。……於各偵察點上當設置收音機，可於數十里外聽得敵機之聲響，同時且能預測其距離及速度。在法國專理此事之人員，平時大約有一千五百人，戰時則增至二千人。

他又說：

法國之施用及準備上述各項（偵察，防禦，空軍）方法者，即達十五萬人，而猶不敢謂其全國之各大城鎮皆有完全之保障。

這不過是摘鈔那篇長文中的幾個例子。我們讀了這種統計，至少可以稍稍想像「戰爭」的意義是個什麼樣子，至少可以不至於隨便說出「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那樣的夢話。

董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一篇是對本刊四十三期「熱河失守以後」而發的。他說：我們千萬不要相信暫時忍耐以後勵精圖治收復失地的話。這和懶人所說「今朝多睡一刻，明朝早點起來」，是同一口吻。大約從前割台灣琉球的時候，也曾經有人說過同樣的話。

我可以根據歷史的事實，告訴董先生：從前中法之戰和中

其責任呢？

日之戰都有像徐先生董先生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清議」極力主戰，「全國一致的主張」，使政府「無所躲閃」。當時只有一兩個立言無所苟的先知者，如郭嵩燾之流，大膽出來反對主戰之論。郭嵩燾在中法戰時上疏說：

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恃其強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郭侍郎奏

議卷十二，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這種話是當日的「清議」所不容的，正如今日我們的話或為徐先生董先生乃至無數「清議」家所不容一樣。然而失安南，失朝鮮，割台灣，割遼東半島，以至造成今日的局面，當日主持清議的名流又何嘗想像得到，又何嘗準備負

郭嵩燾在四五十年前曾有這樣很感慨的話：
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訥，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凡事皆可言也！
： 唐宋之言官雖囂，尚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文集卷十，致曾沅甫）

這是對當日的「廢話階級」下的針砭。我們談政治的人，在今日讀這種忠告，應該作什麼感想？

一九三三，四，十一。

中國的廢話階級

董時進

中國提倡教育的結果造成了一些廢話階級；說是造成了高等游民還不甚恰當。教育愈發達，廢話階級愈膨脹，同時廢話也就充塞了人間。

中國社會不是有閑階級和勞動階級形成的，乃是廢話階級和廢力階級形成的，因為中國社會整個是有閑的社會，毋論舖子的夥友，街上的車夫，鄉下的幾萬萬農民，實

際都是很有閒的。他們因為有閒，所以多數是下沒效果的廢力，另外一般人有閒就專說沒意識的廢話。

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他們可算是廢話階級的舌人。天天充滿報紙的，大都是他們的廢話——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等等——他們的目的，無非為出風頭，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訐仇敵，或為其他私圖。所說出的話儘管表面滿漂亮，——多數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見而知其是空虛的，所以不但不能動人，反而使人肉麻。讀者大約還記得，在榆關失守的時候，某部長曾經表示他要去投義勇軍，最近某要人又說他願意去前線替兵士燒飯。這些是多麼好聽的話，但是他們去了沒有？要人們說話，言行不相顧，大概都是如此。頂奇怪的是一些紙報，偏要給他們大登而特登，好像他們發現了破天荒的新理，真得了興國的大計。這是許多人說他們不願看報的大原因。

他們不但好說廢話，並且喜歡召集會議，大規模的製造廢話。近幾年各種會議不知開了多少，試問那一個會議不是以廢話始廢話終，那一個會議曾經發生實際的影響，那一個會議曾經解決了什麼問題。會議既不能達到這種目的，就完全失去會議的意義，作用，和召開的理由，然而

一直到如今，這類廢話會議還是很普通的把戲。許多會議開完之後，還要將一些毫無意識的廢話，大本印刷保存，真是廢上加廢。

將廢話再用文字發表，是廢話階級的得意的工作。近幾年來，形於文字的廢話數量增加竟非常迅速，這確不是教育文化發達的現象，實在是社會上一大病徵，是廢話階級的大罪過。為發表廢話所費去的紙張，已經成了中國漏卮的大宗。即就民國二十年說，那年輸入的各種紙張，價值竟超過四千五百萬兩銀子，其中報紙佔了一千三百餘萬，油光紙佔了約八百萬。紙的進口和幾年前米的進口價額差不多，但是還很少人注意。米是為的維持生活；紙呢，並不是用去供給了什麼腦筋的食料，最大部分是耗在傳佈廢話！

在中國稍識幾個字的人，都染了一種著作狂和出版狂。乳臭未脫，已是著作等身三五文人，一時高興，即可組織學社，發行刊物，甚至於開辦書店印刷所，大批製造。所以現在出版品充滿市上，令人眼花。單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新產生的定期刊物，真如雨後春筍，不知多少。隨便在一個小書攤上，便可找出數十種，到一個圖書館，可以看見擺滿書架。他們題目往往是很時髦，而內容大抵

是千篇一律，簡直是說了等於沒說，因為說的都是不關痛癢的廢話。

大本小本的書籍，近幾年也出版不少，有時書名很堂皇，目錄也頗動人，然而內容却蕪雜幼稚不堪。有的是東竊西抄，有的是堆積陳腐統計，有的是無病呻吟，強不知以爲知。這些「書籍」是絕對的糟踏報張與人工，白費讀者的時間與目力，絕對不能給讀者以新智識或新思想。我們一看就知道，許多著書的人自己并未明白他的題目，自己也不知道他說的什麼；許多連文字也不通，並且滿篇是錯落。還有許多翻譯的書籍，譯書的人原文不會看懂，著者的原意不能體會，字句又繁冗而不能達意，草率成書，難怪一般無經驗的讀者要驚嘆高深。

我們應該趕緊覺悟到說廢話的害人和無聊。除非你真有好主張，好見地，最好莫發言。除非你發見了有價值的新理，新思想，或新見解，最好少作文。至少總要你的話在社會上有發生一點好影響的可能，或者能糾正社會上的錯誤，或者能替社會指出一個好的方向，使社會可以前進

。不然即是廢話，說廢話便是耽誤別人的時間，妨害社會的進步。

談論時事的刊物，恐怕要數中國最多，但是價值之低與銷路之窄，恐怕也以中國爲第一。這是在物質上以及大家的精神時間上，都很不經濟的。我以爲我們所需要的，是少數有價值的刊物，內容必須經過嚴格的選擇，編製印刷必須精良，銷路必須寬廣，言論必須公開，不必個個人自立門戶，發行刊物。我們更希望已經成立的報紙雜誌，厲行縮減篇幅，少登廢話，稍減價錢。這樣對於作者，讀者，發行者，都是很有利益的。

同時我們又還缺少一種刊物，即是討論人生問題的刊物。我們現有的刊物，絕對的忽略了人生的問題。我們需要建設性的關於人生的撰述，將良好的人格，以及高尚人物的生活方法，處世經驗，和他們的人生觀等，多多揭示出來，作後進的模範，與借鑑。我們希望一般作者及出版家向此方面努力。

作者也會說過不少廢話，願與讀者一同懺悔！

冷口觀察所感

枕濤

懷着滿腔的熱情，一嚮來的希望，我同了二十幾位青年朋友，走上黃砂的路途，「到前方去！」沒有負什麼使命，更沒有遊山玩水的心情，「到前方去」只爲了想看一看我們民族爭鬥的掙扎的苦況。於自己，是想把幾月來鬱悶的思想，求一個痛快的「廓清」。因此，我們多數的同行者都是嚴肅地到了冷口以外。

我們老是在後方讀報的人，每天每天在報紙的第一版上看見幾個特大的標題，在心裏喚起的想像，是一片血肉模糊的爭鬥的幻景，這自然是在「抵抗」了以後的話，但、同時也想到我們自己的單薄的軍隊，竄敗的武器，在日軍兇暴的迫壓之下，總有些就心。情報歸來，僥倖聽到了「退敵若干里」，「奪回要塞」，「俘獲多少」，又高興着我們究竟不是弱者。自從山海關失陷以後，我們沈重的心情，就在望真正抵抗一回的結果來掃除這種抑鬱。自己不能捐了鎗，持着刀到前方去殺敵的人，要想一點痛快，至低限度，在我想，總得加入一部分爭鬥的工作。自然，我們也作一點後方可能作的事。不過，消息傳來，抵抗了

不見反攻，損失了不見補充，不到前方去，也許不會感覺到怎樣的疑惑吧？我們政府的宣傳，慰勞，視察，通通都動了員，我們興奮了，有了希望了；讓我們去看看前方爭戰的情形！到了最前方，停留不到一個鐘頭，我們的熱情，我們的希望，天知道，在那兒去了？

勞了許多軍事長官的駕，護送我們，陪伴我們，他們確實有着熱烈的抗日精神，而且都有着嚴整的計劃。後方預備兵操練的純熟，長官訓練的勤憤，和他們與民同居的協洽，不錯，每件每件都使我們安慰，滿意。我們會見每一個軍官或士兵，問及他們抗日的情形，慰勞他們的辛苦，從每一個回答裡，我們非常滿意的聽到這樣的話：「這是我們的職分」。試問中華民國二十年以來，殺人爭地，刮民搜財的大小千百次內戰的軍人，那一個有這樣一回的光榮，敢來驕傲地說這樣一句話？在他們口頭，心上，充滿着一種熱烈的情緒，但當他們說這一句話的時候，一點不矜驕，而我們聽者都如觸了電似的，使我們肅然。在這一類的談話中，我們知道我們民族爭鬥的最終決勝還是在

我們這邊。

但是，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生活情形，問一問戰爭準備，立刻使我們感到成千成萬的熱憤的將士，他們的前途命運的悲慘。爲抗日，爲弱小的民族而爭鬥，在他們想來犧牲原是應當的，而且是樂意的。爲什麼說他們的命運是悲慘呢？這自然大有原因在。

後方預備兵的生活，是好了許多倍的。他們在開平，遷安一帶，多半住的民房，有少數是有坑可睡的，大多數是在一間屋裏鋪下草，上面蓋一張蓆子，是他們的臥榻。每日三餐，整日受着訓練，上課，下操。星期日是一個不下操而自己清潔的日子。前線的，白日因爲要避日本的飛機，早上五點鐘吃了冷饅頭（這饅頭是在冷口內十多里地的地方作好了又送到前線去的），就一直伏起來，在暗地裏放放鎗炮，直到下午六點鐘又才吃東西。晚間和拂曉是頂緊張的時候。深夜或者持了大刀，懷着手擲彈前去偷襲敵方的營。在敵方防得嚴的時候，襲營的結果總要丟去幾個人。作工事也得在下午五鐘，飛機不能再來的時候出動去作。這是一般的生活情形，是最近戰爭不烈的時候的抵抗狀態，是在冷口外二十餘里地的馬道溝一帶與敵相持的戰情。

戰事中的生活，本是頂苦頂苦的，也用不着薄薄的溫情去慨嘆。只是，前方一位師長說得好，「燈要他燃得亮，燃得久，油總要添才得成」。這種生活，在中國軍人本是常事，不過，雖然簡單，要他維持下去，還望他進一步有能力反攻，收復失地，則後方的補充，軍實的接濟，糧餉的籌劃，指揮全國抗戰的計劃，都是急于眉睫，缺一不可的。而後方政府究竟怎樣呢？

我們只聽見前後方軍政當局的高呼「抵抗」，前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陸續地傷亡，和民衆要求抗日的熱忱。所謂接濟，補充的計劃，我們在幾位軍官口裏聽見的只是一種被壓抑着的感喟。在下級的士兵，大部分的是要求痛快犧牲。他們知道犧牲至少可以得點英雄的美名，要不早點了結，日子延長下去，連煮飯的柴火都弄到非取材於當地的百姓不可的時候，恐怕那時人怨沸騰，抗日的軍隊翻成了殃民的軍隊。那時的情形，真不敢想下去！

我們以爲政府當局既然決定了長期抵抗的國策，那抗日作戰的計劃，應當明確的整個的規劃出來，如何的調動大軍去增援，充足的加添接濟，使在前線的不空犧牲，不白費光陰與血肉，那抵抗才是真的，具有意義的。

附記

枕濤君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研究生，此次隨着燕京送鋼盔的慰勞隊到冷口前方視察回來，得到不少的

感想。我們以爲他這樣視察所得的感想，也許不是中央要人的視察所能得到的，所以要求他寫了出來，在此發表。
(永)

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潘 菽

近來汪敬熙先生在本刊上（第四十號）對於「中國心理學的將來」有所指示，這自然是我國心理學界所要感謝的。其中有許多話作者都表示充分的同情。但有幾點頗有商量的餘地。汪先生說的話不免要被人引作依據的。假如他的話說得不十分完滿，那便要在中國心理學的將來發生多少流弊。

汪先生告訴我們說，現在心理學上有兩條不通的路，兩條有希望的路。第一條不通的路「是教育心理學家測驗之路。」我個人對於測驗是毫無研究的，也沒有什麼興趣。但我覺得要一筆抹殺測驗却不能這樣容易。汪先生所以說測驗之路不通，一是因爲「美國教育心理學所做的種種測驗頗招美國學術界的非議；心理家中有人也給這些人一些嚴刻的批評，」二是因爲「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大多數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的徒弟。這些學生往往是「青出於

藍，而「淡」於于藍，比先生還差些」。從第一個理由講，不知道汪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種測驗。假如是指的智力測驗，那麼汪先生的話確是合乎事實的。我個人對於智力測驗也很懷疑，並非因爲別的，而是因爲我到現在還沒有明白所謂智力到底是什麼東西。但假如汪先生的話是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一切測驗而言，那便和事實完全不符了。譬如就學力測驗而講罷，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人對於學力測驗根本否定其價值。有許多教育測驗的對象是很確定的。牠們的能成立我認爲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只在方法上的益求精密。所以汪先生的話是足以引起誤會的。汪先所釘的「此路不通」的牌示地位有些擺錯了。測驗的研究雖然不見得是心理學上的康莊大道，但假如有人要走這條路也是有路可走的。

的確，從前我們曾有一些「無常識的利用統計方法的

研究，多麼可笑。」但這只能算是初學的時候的一種幼稚病，並不能因此就斷定「將來」。又假如真的像汪先生所說，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往往是青出於藍而淡於藍。但這至多不過是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的差錯，並不能因此就歸罪於測驗的本身。我們從外國回來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試問有幾人？我們能因此說數學物理學等之路不通嗎？

現在關於種種測驗的研究須要加以嚴密的批評，這是我們和汪先生完全同意的。但那種籠統抹殺的方法我們認為不大妥當。有許多教育心理學中的測驗事實上是做得通的，並且有實用上的價值。但我以為一切測驗都是一「應用心理學」上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都是一種技術或方法，和心理學本身並無多大關係。任何測驗方法上的進步並不就構成心理學上的進步。不過這和說牠是一條不通的路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汪先生所指示的第二條不通之路是指白鼠的迷津學習的研究。的確，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許多問題都已有入做過了。不過一定要說這方面已無路可走，我以為這至少是一種近乎武斷的話。白鼠的迷津學習的本身原來沒有很多可以研究。但我們有時可以應用迷津學習的方法去解決其

他的問題。譬如近來拉胥黎 (Lashley) 應用白鼠的迷津學習的方法以研究大腦的功用便是大家知道的一個例子。迷津學習的本身亦許已糖汁完全榨乾了。但我們很難說以後不再會有什麼問題的研究須要應用到迷津的學習。況且心理學上一件最缺乏的事情，就是一種試驗很少有第二個人去把牠照同樣方法重做一遍以校正前人的結果。科學的研究是很須要反覆證明的。心理學上缺乏反覆的證明這亦許就是心理學還未能成為正確的科學的一個主要的理由。所以假如有人有時間和興趣去覆做任何白鼠的迷津學習的問題，用極精密的方法，因此可以得到更正確可靠的結果，或否認前人的結果，那正也應該是我們所歡迎不暇的。為什麼一定要說此路不通呢？在這裏我們所須要的批評也應該是個別的而不是籠統的。個別的講來，的確有許多關於白鼠迷津學習的研究差不多毫無意義。但要說這方面已是「絕徑」一條，不可以再去請教了，那也未免是太橫掃一切而含有錯誤的暗示的。

其次是汪先生所指示的兩條有希望的路，他說「中國心理學可走的路途可分理論的及實用的研究兩方面說。」在理論的方面也有兩條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動物生態學的方法或實驗方法去詳細記載人或其他動物自受胎起至老

死亡之行爲的發展。在兒童心理學及動物心理學均有充分做這種研究的機會。這種紀載是心理學所必須的基礎。二是利用生理學的知識和方法去做行爲之實驗的分析」。在實用一方面，汪先生說「中國心理學也有一條極有希望的路可走。這條路就是工業心理的研究。」不錯，這些話我們都完全同意。但我們希望汪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說，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有希望的路吧！什麼是有希望的路，我們必須走了一下以後才能大約知道。沒有走以前或甚至於沒有別的路也不知道以前要斷定那一條是有希望的，那一條是沒有希望的，那只能是一種主觀的武斷。科學上有許多極重要的發見都是無意中碰着的。這就是說，我們所認為尋常的路往往可以成爲極有希望的路。反之一個科學家可以對於某項問題的研究花了很多的工夫而絲毫得不到原來所期望的結果。這就是說，我們起初認爲有希望的科學的研究之路往往結果證明牠是一條充滿荆棘難於涉足的路。所以要說那條路有希望，那條沒有希望，除了有充分的結果可以證明外，不過是主觀的和個人的意見，很難靠得住，至於要依此判定「將來」那就更屬毫無是處。現在心理學上有幾條新闢的路，由牠們已有的結果證明，是很有希望的，這是一些也不錯的。但我們絕對不能因此說此外

就沒有其他同樣有希望或甚至更有希望的路。我們更不能說，因爲這幾條路已證明爲很有希望，便應該大家都走向這條路。科學是一種探險的事業。假如有一個人要想走一條大家所忽視的路，那正是一種「好精神」，我們所應該加以鼓勵的。所以要在任何科學的領域內如像很確定的對着新進的人說「此路不通」「請走此路」是無益而有害的。這不是促進將來的希望，簡直是摧殘將來的希望。汪先生雖然並沒有明白的說，除了所指示的兩條（或三條）可走的路外就沒有其他可走的路，但語氣之間不免使讀者感覺到這樣的暗示。所以當我們補充了我們的意見以後，讓我們希望汪先生原來沒有這樣的意思。

至於汪先生所說其他的話我也覺得並不都是心理學之罪。因爲牠們也可以同樣的應用到現在中國其他的科學上去。譬如，國家可以說是對得住科學了，科學對得住國家嗎？除了三四例外，這個問題是可以問的。又現在心理學以外，中國其他種科學的研究有那幾種可以說是直接有用的呢？除了幾個例外，各種科學在中國還未曾弄得十分像樣。心理學至多也不過是其中的一例。不過其他的科學都已有確定的成規可循，而心理學却很少確定的成規可循。所不同者如此而已。

然而，無論那一種科學，在其方法上和理論上都時時須要加以嚴正的批評。汪先生的評論雖然欠公允正確，但

可以大大的促起現在中國心理學界的反省。這種反省是我們現在所極其需要而極其有益的。

漫遊散記

(十七)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完)

魯南山

我于六月十九日離開苦竹。因為和方太太周旋，等護送的獾兵同走，一直到九點多鐘方纔出發。送我的二十個獾兵服裝和普通的獾一樣。槍至少有四種：英國的舊來福，日本的九子，德國的老毛瑟，成都兵工廠的五響。此外還雜着有前膛土槍。槍既然是新舊不一，人也是長短不齊。而且並沒有官長統率。二十個人前前後後的走着。我剛拿出指南針來看方向，大家就圍上來看稀罕。好容易把他們攆開了，他們又在前面挡住了我的視線。走不到一里，遇見一羣水鳥，有一個兵竟拿出槍來打着頑兒！這樣走着，一點鐘走不到四里。我沒有法子，再三的叫他們回去，但是言語不大很通，他們只是搖着頭，對我呆笑。如是走了三里，我實在受不了了，只好把送我的那個徒手獾兵叫來，厲聲的責備他道，「你太太叫人送我原是爲好。

現在他們耽擱我的公事。叫他們回去，又不聽話。以後你太太知道了一定要處分他們的。你快點對他們說我不要他們送了。他們再不聽話，我只好回頭見你太太去」。這位徒手的獾兵却很懂事，看見我生氣，很是惶恐。「他們因爲太太吩咐要送五里，所以不敢回去。既然委員不要他們同走，我叫他們早點回去就是了」。于是他用獾話對他們咕噥了半天。這班獾兵纔對我行一個禮，亂哄哄的向苦竹跑去。

把士兵送走了，我纔加緊的工作。幸虧從苦竹到波羅塘一共不過十公里，路又是很平。雖然沿途耽擱也就早早的到了。我的從人看見我帶了兩個獾兵來做鄉導，大家都很高興。尤其是波羅塘的那位鄉約。他拍着手道，「這一來可沒有事了！委員昨天你的管事的一定要我派人送你過山。李子樹的夷家多麼可怕。我們如何敢負這樣大的責任？現在方太太派了人帶路，你只要大胆放心去罷！」話雖

如此說，我因為天氣還早，想到附近山上看看，他仍舊是極力的攔阻我，說「白天大路上不要緊。天要晚了，又到山上，是不妥當的。還是小心點的好」。

波羅塘原是大路上的一站，正在魯南山的坡脚下。我所住的店也還整齊，但是村子裏的房屋三分之二以上是破爛的。據鄉約說從前因爲是在大路上出山的口子，生意很好。自從宣統末年鬧改土歸流，羅裸造反，地方遭了大害——破爛的房子都是那時候燒的——現在只賸了三十家子。

二十日的絕早我從波羅塘起身過魯南山到岔河。我仍然照平日的辦法：一個人帶一個獾導，一個會理的差人，一個擋東西的苦力，上前先走；留一個鄉導，一個差人護送行李。往日我的從人知道路不遠，不必着忙。等我起了身，他們纔慢慢的收拾起來。總要到上午方趕上我。那一天路又比較的遠；雖然說有獾護送，大家都有戒心，所以我走了不多時他們已經趕到我前面去。一出波羅塘就上大坡。從坡脚到山頂一共約爲十三公里。其中可分爲五段：第一段長四千二百公尺，上高五百四十五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十三；第二段很平，長三千六百五十公尺，上高纔一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二·七；第三段長一千六百

公尺，上高三百十五公尺，坡度爲百分之二十，是各段中最陡的一段——李子樹的村子就是這段的終點；第四段從李子樹向東，長一千五百公尺，上高一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六，比較的平；第五段上到魯南山頂，長一千八百五十公尺，上高二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十一。五段之中，第一，第三，第五這三段因爲坡度很陡，不但沒有田地，而且沒有樹木。第二和第四段比較的平，坡上，有點土可以耕種。李子樹的村子正在這二段之間。這兩段都種過鴉片烟。六月裏天氣烟已經收了，但是鴛粟的莖子還都留在地裏。民國三年是禁烟最嚴厲的時期。尤其是在雲南，凡種烟的無論多少都是要槍斃的。李子樹是獾地方所以纔敢犯禁。

從波羅塘到魯南山頂地質極其有興趣。因爲路很遠，又不放心，工作不能十分精細。走了將近十公里，上到第三段的陡坡，纔不過十一點多鐘。做鄉導的那個獾向路右指道，「這就是李子樹！」村子離路邊不過幾十公尺，我們悄悄的走過去，並沒有看見人。我心裏暗想道，「走過李子樹，沒有驚動一個獾，大概今天可以沒有意外了！」正想着的時候，對面來了一位裹着頭被着氈的獾，當路站着，用漢話問道，「你們來有甚麼事的？」指儀器的

夫子不等我開口，就回答他道，「我們是來查鴉片煙的！」——他因為上坡的時候看見地裏有鴛粟莖子，所以給他開頑笑。他忘記了在獼猴地方頑笑是開不得的。我一聽這話，就知道要出亂子，連忙的分辯道，「你不要聽他胡說。他是給你說笑話的。我是北京來的委員到東川去看銅鑛的」。他聽了這話，也不理會，立刻向李子樹村子裏走去。我知道事情不妥，趕緊的上坡，但是路既然不好走，又還要測量，不能走得很快。等到上到魯南山頂，已經有二十幾個獼猴攔路站着，在李子樹遇見的那一個也在其中，大概他們從村子裏走小道先上山來等着我們的。

第一次遇見我們的那一個獼猴指着指東西的夫子說道，「他說是來查鴉片煙的」，一個年紀最大的向我問道，「你們究竟是來做甚麼的？」我看他們雖然有二十多人，手裏却沒有任何的武器，心裏就安了大半。「我是到東川去看銅鑛去的。這個夫子他看見山坡上有烟莖子，所以和那一位說笑話。請你們不要理他。」「你們不是一齊的嗎？他的話怎麼和你說的兩樣？」我拿出護照來道，「我有雲南都督府的護照。上面說得很清楚，我是來查鑛的。與鴉片烟沒有關係，」他搖頭道，「我們夷家不認得字」。我只好向我的鄉導說道，「我來查鑛，你太太是知道的。」

你拿夷家話對他們說說。他果然用獼猴話向他們咕嚕，但是說了半天，沒有結果。二十多人仍舊把大路攔着，不讓我過去。

我從昆明出發的時候，一個軍界的朋友借了我一支「盒子礮」。我沿路從沒有用着牠，但是常常把牠帶在身邊，寸步不離。爲首的那個獼猴指着我那支槍道，「十響毛瑟，頂好的槍。你肯送給我，我們放你過去」。我心裏很躊躇。論起來一支槍不算甚麼。拿牠做買路錢總算是便宜。但是他們沒有武器，我有牠還有抵抗的希望。把牠送了出去，他們有槍，我是徒手，豈不是更危險嗎？安見得他們不是要先繳我的槍再要我的性命呢？如此一想就決心不給，「一支槍不要緊。送給你們本來是可以的。不過我這支槍是向雲南都督府領來的。回到省城還得繳回去。送了你們，我就交不了差，所以對不住不能送你」。他們交頭接耳說了半天的話，拿手指指槍，拿眼睛看看我，依然不放我走。

我只好對着我的獼猴鄉導說道，「你太太原是怕他們麻煩，所以纔叫你送我。現在他們要我的槍不放我走，你怎麼不想法子。要是我走不了，我只好回到苦竹去，見你太太。那時看你怎樣交差！」他滿頭流着汗，面色都變了

悄悄對我說道，「委員，你走遠點，到那邊山頭上去看看。等我一個人慢慢的對他們講」。我依着他的話，離開大路向南幾百公尺，走上一個小山。索性把一架經緯儀拿了出來測量四圍的高山。我所在的地方出海面已經有三千公尺，所以望得很遠。向西不但看見從會理來的大道，而且會理西北的龍爪山也看得很清楚。東面雖然看不見江底，江的深谷却已經在望；谷兩傍都是三千公尺以上大山，南北橫亘着。我東西眺望不知不覺忘却了處境的危險。但是半點，一點鐘以後，還不見獾獾鄉導來到。向北一望，二十幾個人仍然在原地方站着，心裏未免發慌。只好故作鎮定拿着顯微鏡東張西望。又歇了半點多鐘，方纔看見嶺上的人慢慢的散了。獾獾鄉導飛跑上來。見了我拍着胸脯道，「都被我趕走了！我們太太吩咐了話，他們敢！」

我連忙的收拾儀器預備下山。又照了一個相把我自己和那位鄉導都照在裏面。剛下去不到一公里，看見會理的差人，被一個騎馬帶槍的人攔在前面。我心裏想，「這一次恐怕逃不過了，」因為那個人指的是一桿長槍。走到面前方纔知道，他是趕街子回來的。看見差人指着照相匣子要求我給他開開眼界。並沒有甚麼惡意。我又敷衍他好幾分鐘，方纔踉踉跄跄的向山下跑。山東坡的路，因為多年

不修，沿路橫着大石塊，比西坡還要難走。從山頂到坡腳河邊十公里路，共下降七百多公尺，天已經完全昏黑。順着河向下還有兩公里半纔到岔河村子，而路沿河邊走，來往要過幾道水。黑地裏很是危險。正在沒有辦法，忽聽見有人喊叫，而且看見燈光。我們同時答應，不一時燈光來到，是我的從人派人拉了馬打着燈來接。騎上馬兩個人扶着安全過了幾道水，將近九點纔走到宿處。我那當差的早已經急壞了。問起他來方知道行李過魯南山的時候也遇見獾獾。因為護送的人解釋，沒有絲毫的困難。足見得我的麻煩是夫子要冒充查鴉片煙惹出來的。我當差的又說，「今日岔河趕街子，我數一數街上有三十多桿槍。若不得上街的人沒有一個徒手的！」

過了岔河，我又走入雲南省境。從此只有在威寧曲靖兩處在獾獾的家裏過了兩宿，無甚可記。一直到民國十九年到貴州大定纔再和他們接觸。據岔河的人說，祿土司年輕的時候也很好胡鬧。晚年却很守規矩。自氏太太是個無用人，所以爲人害死。這位方太太却大不同。來到苦竹沒有三個月已經槍斃了十六個人，所以人家很怕她。

我于民國四年回到北京，把方太太交給我的呈子，送了上去，請部裏轉呈。那知道部裏的長官把原呈發還，說

不是本部所管，不必多事。同年夏天，通安土州有人來說會理縣長又與苦竹土司衝突，已經請兵去進攻。以後結果我沒有打聽。不過近來披沙已經設了新縣，恐怕方太太是尙在人間也不能再做女士皇帝了。我現在把她的原呈附在下面來做本文的結束：

世襲苦竹土千戶職婦祿方氏報爲瀝陳衷情，敬叩

大總統宏恩電鑒，賞還疆域，淑慝攸分事。竊職氏夫祿繩祖承授祖德宗演，歷功昭著，傳襲會理縣屬沿邊四署：披砂，者保，苦竹，通安。各設頭目家丁，遵理舊制憲書，伏苓貢馬，約束夷衆，管轄生番。自前清雍正康熙初年，始祖祿魯姐率衆投誠，招撫番蠻，鎮靖烏蒙東川等府夷虜有功，世世罔替，襲裔數代，無異繼職。至氏夫繩祖稟請接銜任事。迭奉大旨札調，自備兵餉，辦理寧遠府屬涼山乾象營，石板溝，昭覺縣各寨夷蠻，猖獗忒甚，出沒無常。氏夫督軍剿賊，折兵千餘，費糧餉去拾餘萬，均由自墊。蒙 軍督大憲隆恩知遇，奏陞副將，仍令威鎮邊陲。不料驟辦三年，因染潮濕痰瘵，於光緒三十一年回籍歿亡。遺留一女，僅存嫡庶，撫鞠孤女。選議威寧家族稻田場抱子承祧，稟懇就職

，懾服夷衆。陡遭寧遠陳守廷緒，會理州牧王香余叵測濫政，仗權壓治。將氏嫡庶及祿禎祥拘留甯獄，勒繳鈴記，家私抄沒，并將孤女天祥改名劉齡。廬田墳墓，掘骨拋屍，數代靈牌宗祠燬化。派委曹永錫率兵役霸收租潤，縱兵姦淫夷女，酷虐佃戶，蹂踐不堪。家丁槩行驅逐，土署家資，盡被抄掠侵蝕。可憐一家之患而延萬戶。且又逼氏再醮馬燦奎。如氏不允，守牧定要治罪。氏本堅篤忠貞，矢誓不二，惟死無憾，遂絕奸念。氏嫡庶只以朝夕涕泣，諒無生期。幸值

大總統命令，五族共和成立，則荷 川蜀隆遇，解釋祿禎祥并氏嫡庶孤女回籍，恢復舊業。氏即聘員演說四涼山敬教新學，各守本分，稍有歸化氣象。是年舊曆二月十四日，慘遭奸人弊竇，附合逆奴弑嫡。氏接兇耗，星夜兼程數百里，聚團平亂，辦獲十餘逆正罪，以清九原冤魂。迺蒙 會理縣蕭知事清慎廉明。查氏彈壓夷虜有方，秋毫無犯，悉氏甘苦備嘗，詳請四署給還，准氏繼職撫孤，抱子承祧，禪祀宜續。况夷人各認有主，歷服世職撫馭，若以威脅，斷不服輸。惟有匍匐俯懇

大總統鏡察昭雪，憫氏撫孤勞瘁，電令川督賞還職，婦全幅疆域，致免李代桃窺而禍桑樹。不但衆夷民咸慕來享來王，暨氏生生世世頂祝千秋不朽矣。特

爲樓訴，伏乞

大總統臺前，賞准昭察原宥瞻依之至。須至報者。

西安通信

徐炳昶

孟真先生如握：

我現在又來到西安十來天了。這一次西來所見的，無非是飢民，飢民，再有的還是飢民！但是我現在仍是毫無

十五年以後，西北可以恢復漢唐的境況，我們全國，也可以恢復漢唐時代的興隆！如果我們老而不死，自己的眼睛也還許可以看得見！

動搖的，極堅確的相信；如果我們中國還想著生存，萬不可忽視這一片極可敬，極可愛的西北！如果我們自稱爲知識階級的人，還有若干知識，就應該大批的來到西北一同受飢！如果我山東的人民，還不是想在小朝廷苟安求活的賤徒，總不致于吝嗇肯來西北同受飢，並且堅苦工作的人及其家庭的最小生活費！（每月百元上下）我堅確的相信：如果我國此時對於關陝，不聞不問，無論怎麼樣掙扎，早晚要蹈南宋的覆轍！如果所謂士大夫階級裏面，有些人還能洗面革心，懺悔從前止圖享受，不肯好好工作的鉅大罪孽，來到西北堅苦的工作，五年以後，可以把西北的現狀弄得清清楚楚；精確設計，再加上相當的投資，再遲

近來我們獨立評論的社員，像先生——準社員，像在下——對於戰事的意見怎麼樣？熱河失陷，主張不戰的先生們，是不是要振振有辭？實在事後想起，從前張學良的軍隊不能開到熱河，中央的軍隊不能開到河北，像那樣的情形，寧可以說，失敗是意中事。如果這樣的現象，能隨湯玉麟以俱去，或者更可以說，這樣的失敗是我國的轉機。叔永先生已經早放棄不戰的主張，在君先生也是主張抵抗的健將。胡老博士近來的意見若何？我想無論什麼人，在這樣情形之下，態度萬不容有疑義了吧！如果大家全無疑義了，我希望大家聯合起來，出一個宣言。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連右派都主張堅決的戰爭，那國論可

定于一致，對於戰事，不無良好的影響。我對於軍事最高當局的心，總有點懷疑。全國一致的主張，或者可以使他無所躲閃。還有一件，是馮玉祥將軍的出處。老實說起，現在有一個要緊點，是非委之于馮將軍，萬作不好；另外一個更要緊點，是非全國投降馮將軍，萬無其他辦法。第一點，就是今日以後的戰事，大部分一定是濠溝戰，器械恐怕用大刀的時候要很多。可是這兩種戰術是馮將軍極擅長的。第二點，就是現在無論什麼人，如果離了東南

的大都會就不能生活，他就不配談什麼抵抗！全國人士個個全像馮將軍堅苦卓絕，中國立時就有辦法。所以現在我雖然知道馮將軍也有很多的短處，可是總抱著「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感想。我現在所最怕的，不是平津的失守，不是中國北部大平原的擾亂，却是中國同日本作一種上海那一類停戰協定，甘心帖服的作強盜的壓寨夫人，讓強盜安適的布置我們的東四省！

孟真先生既為宋江的同鄉，當不我這話為荒謬吧！

清華週刊

第三九卷

第四期

目要

郭子儀與寒山子	賓詞之數量限制	賓詞數量限制說之批評	蘇聯工人的情況	亞里斯多德的革命觀	亞原子序數	癩菓車(戲劇)	「落日頌」(書評)	「中國文化之發達」(書評)	蕭伯納(Bernard Shaw)著	吳長綺譯	陶希聖分角	武譯五八學	作露薇一角元大	張露薇一角元大	軟雲期卷清	錢偉長每全	長綺譯每全	之之	社址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明雜誌

第二卷
第七期要目

日本竟欲與全世界為鄰	許孝炎	意大利民族英雄瑪志尼傳	郭垣
亞洲門羅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	凌雲	生產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吳家鎮
美國銀行風潮的檢討	因銘	世界論壇二則	林士
英國自由主義的展望	馬青野	途上(短篇小說)	潘兆鵬
疲憊了的法蘭西	向金聲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北平沙灘楊本賢廣告部

華藝半月刊

第七期日期

二十四夜	克復以後	脚病	期待	無聊？惆悵	考試日記
------	------	----	----	-------	------

飛靈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

北平：訊通
院學法學大平北

然，我們差不得想加入那人類的愚駱隊裡去了。」但她又說，「這樣的社會侮辱，這樣的成爲無價值的嘲罵的目的物，這樣的瀕于失敗的境地，尙比良心上的譴責爲容易担任。假使我們因爲畏懼侮辱的緣故，對於我們縮短戰爭的工作，有一分的怠懈，我們良心上的譴責，是要比任何外來的嘲罵爲難受的。」（見女士所著『和平與麪包』）雖是這樣說，但這個精神上的創傷，加在一個奔走戰地的辛勞身體之上，她終于不得不病了，并且一病二年，差不多成爲一個廢人。但病愈之後，她又不斷的在糧食與和平的方面努力，爲戰後的人類謀求一點生機，爲全世界保留一點光明。

女士不但有實行的才能，并且還有著作的天才。但著書立說却並不是女士的本願。她早歲即感到享樂式的文化的空洞與虛僞。在好爾廳成立之前，她曾有這樣幾句的記載，「我此刻的大部份時間，是彷彿于道德的巨洋之中。我緊握着那個在現實世界生活的願望，拒絕了他那泡影般的智識與藝術的返光。」（見女士所著『二十年的好爾廳』）然而她又終不能不著書，并且著了八九種書，這豈不更足以表示她的內心的壓迫？在這些著作中，尤足以感動與啓發我們的，則有『二十年的好爾廳』，『又二十年的

好爾廳』，『戰時的和平與麵包』，『民治與社會倫理』，以及『和平的新理想』諸書。在他們中間，我們找不出一句虛空的，或是不負責任的說話。我們但覺得有一個偉大的心，不住的在喚醒我們的沉睡着的理智與同情，使我們不得不醒！

古人說的，立德，立言，立功，是謂三不朽。亞丹女士可謂是三者俱備，尤其是在德行的一方面，女士的博愛精神，和救世行爲，真能使她成爲一個超人。我們現在引她的幾句回憶的說話，作爲她的人格在立德方面的代表。「我記得我小時的那個古怪的，異常的責任心，那個對於世間疾苦的責任心。我常常做惡夢。有時夢見全世界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而在我的肩上却負着製造一個車輪的責任。我似乎明白，除非先把那個車輪做好，再先使他轉動，全世界的事是無從做起的。我獨自沉思，究竟應該怎樣下手呢？我感到我實行力量的不够。」（見女士所作『二十年的好爾廳』）她做這個夢的時候，還不會滿七歲。

一九三一年，她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得拉（Butler）一同獲得了那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她在美國也受到了許多表彰她的功德的獎金，她是美國人所公認的第一個女偉人。但這個榮譽之于她的人格，不過如雲彩之于日光。日

光正無需那一點浮雲來顯揚他的光華，雖然那點彩雲也未嘗不可以反映出日光的偉大與美麗。

女士今年七十二歲了。在她七十歲生辰時，她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給她的祝辭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你的心到徧了人類的中間，你能了解那分離與聯合各等人類

鄉下目前最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董時進

鄉下人大概是種地的，所以鄉下最需要的教育是實用的農業教育——教鄉下人如何耕田種地，如何養豬養牛，如何改良他們的生產方法。這是近來吾國朝野一致的主張。但是我細審鄉下的情形，和鄉下人的需要，使我不能不另作主張。

常聽人說，中國農民的耕種方法窳敗拙劣，須得教他們改良。其實說這種話的人，不但無所根據，而且多半自己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試問他那裏窳敗，怎樣才不是拙劣，他一定瞠目不能對。我不敢說中國的農法一定很好，但是我敢說，就他們所有的資源和環境講（土地資本，地方狀況等），總算作得不壞，恐怕教任何國家的農民，處到同樣的境地，也未必能多超過他們的生產。

種種勢力。……你不但以麵包與工作給予萬千個人，你還以那更可貴的美麗，快樂，與了解，錫予那受了創傷的人類。這樣，你把那醫治與創造的勢力，（從人心中）釋放出來，使人們能獲得一點應付生命的痛苦與厄難的力量。」

但是鄉下另有困難問題，另有需要改革補救的地方。

鄉下是暗無天日的活地獄，是純粹的中古社會，到處人吃人，一個剝削一個，一個壓迫一個。稍說厲害一點，鄉下幾乎無一人不是土豪，大土豪欺服小土豪，小土豪欺服更小的土豪，最沒出息的，也會在自己家裏婦女兒童中間充土豪，或在雞狗牛馬身上使用權威。世上壓迫與被壓迫的兩極端，都是在鄉下。世上最可憐的莫過於鄉下的弱者，最兇惡的莫過於鄉下的強者。他們可以橫行無忌，為所欲為，而弱者則什麼殘酷難堪的壓迫凌辱，也得忍受。婦女是人類中之弱者，鄉下的婦女，許多是過的地獄的生活。在未出嫁之時，父母以生她為恨事，很輕賤她，既出嫁之後，她便是一家的奴隸，尤其是丈夫和婆婆的洩氣筒。我

們在城市覺得摩登婦女太自由，太浪漫，誰知道鄉下婦女仍舊是在過非人的生活。最可恨可嘆的是，每一個婦女，一到當了婆婆的時候，便要將她們所受過的罪一一的再加到她們的同類的身上，以為非此不足以表示她們有出息。這都是因為她們沒有智識的緣故。所以鄉下亟需要一種教育來改變這些傳統的惡觀念，惡風氣，使鄉下人知道這樣的欺負人，和受人負服，都是不對的。這層要能作到，那就真能減少他們的痛苦，增進他們的幸福，那比教他們生齊黃金還重要些。

鄉下人不僅自相壓迫，他們全體又是受外界的壓迫與剝削的。整個鄉下便是一個愚昧的，牛馬式的社會。農民們祇知道種地和吃飯，正好像牛馬祇知道耕田和吃草，蜜蜂心知採花和釀蜜。不錯，他們都是些生產者，但是牛馬，蜜蜂，也是一些生產者。他們的生產就和牛馬蜜蜂一樣，都是給別人做了，別人要多少，就得給多少，甚至於要他們的性命，也不能不給。他們一年到底活動的範圍就是吃飯種地，此外什麼也不知，什麼也不幹。他們一世，就是這樣過去。如果我們不願鄉下人永遠做牛馬或蜜蜂，那末，最好是給他們一種做人的教育。

再說教育本應該是一種為社會服務的工具，但是中國

的教育竟變成侵掠人的武器，這本是極不對的。而這種武器又祇是少數人所獨有，於是危險就更大了。鄉下人缺乏這武器，所以處處吃虧，祇好任人剝削與壓迫。為全體鄉下人的利益計，須得給他們一種調皮教育，使他們得到人應有而向為士大夫所獨佔的武器，藉此使他們可以抵抗外界的惡勢力。

但是鄉下也並非不要農業教育，不過不宜限於職業式的農業教育。鄉下人所需要的農業教育主要目的不是教他們怎樣作農，是要教他們知道農。因為他們本是做農的人，做總算會，最不會的是知。（所謂士大夫之流，最不會的是做，所以應該叫他們做，並且使其由做而得到真知。但是鄉下人不是這樣。）農業是鄉下的好教材，最容易使鄉下人領悟，並感覺興趣。我們很可以用農業上的現象和問題去教育鄉下人，不但使他們知道他們一天所幹的是什麼，並且可以藉此教他們數學，論理學，經濟學，和各種科學的知識。同時也可以訓練他們的腦筋，開通他們的思想，增加他們解決問題，辨別事理的能力。這些是真正的教育，特別是農民所需要的教育。

總之，我們要知道鄉下人是和所謂士大夫階級正相反的。他們有了用手的能力，用腦的能力太缺乏，生產的本

不壞，做人的資格太不够。所以他們所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們用腦的本領和做人的資格的教育。分解的說，我們應該使鄉下人看見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是什麼時代；使他們了解人生的意義，明白國家，社會，政治，是如何構成；使他們能够重視現代文明的價

值，不以爲一切是中國的舊東西好。鄉下人的舊頭腦，必須得改成新頭腦，牛馬式古代式的鄉下人，必須得改成現代的國民。他們所最需要的教育是最能達到這種目的的教育。

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通信)

林紀東

編輯先生：

立法院着手起草憲法以後，在各報遍登廣告，殷勤的

毛病很大呢？理由是這樣的：

徵求國民的意見。我爲這種態度所感名，想借獨立評論一席之地，討論憲法草案裏的一個問題。

第一：我們知道，大凡一種主義的實用性都附有嚴切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在環境需要的時候，他固然應運而

據三月七日大公報南京電，「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三次

生，但一旦時過境遷，就有增綴減縮或根本廢棄的必要了

會議決：一，領土：採用概括主義；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

。取譬不遠，即就三民主義本身而論，在與中會同盟會時

決，不得有任何變更。二，國體：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

代都只有個民族主義，以後感于環境的需要，纔跟着有民

和國。三，主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四，旗

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發生。這可見他的相對性爲何如了。至

色：中華民國之旗定爲紅地左角上青天白日。」在以上各

于憲法，雖則未必是什麼「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東西，然

條規定中，我覺得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大體上都還可以

而他終竟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其受制于時間性的程度，遠

成立，惟有第二條毛病很大，深有商榷的餘地。現在把我

視一種主義爲不同。所以我們以爲以具有嚴切底時間條件

的意見，寫在下邊，希望立法委員諸君加以注意。

的政治主義，附在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之中，這種立法政

策，是很可懷疑的。因為不改則方柄圓鑿，于時勢為不適；如果隨時更改，那又使憲法的尊嚴大生問題。何況即以目前而論，三民主義是否一無疵陷，也還很有爭議呢？

民主義，豈不仍然是一黨專政？憲政於何有？我最後要向立法諸君三致意：在中國這樣法治未昌的國家，憲法固要力求其剛性，然而這原不過是指精神上的

第二：據建國大綱規定，建國之程序，分為(一)軍

注重而言，並不是說，到處亂來，硬板板地，不應剛者亦

政(二)訓政(三)憲政三期，直到第三期方始公布憲法

剛之，使與環境不相適。以我國內憂外迫紛至沓來的艱難

，可見憲法是憲政時期的產物，而憲政時期已經用不着保

環境，我們固不敢對於憲法多所責望。但最低限度，亦要

姆的國民黨，來行一黨專政，而將實行多黨政治。既然實

求不添害處；如果反因此引起爭端，那我們又何貴有此憲

行多黨政治，則一黨有一黨的主義，一黨有一黨的政策，

法？

勢不能以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強使同之。在憲法裏規定三

林紀東(一九三三，四，一三，朝陽大學)

獨立評論 第一期至第廿五期 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 甲種 (布裝) 二元 郵費一角
- 乙種 (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 丙種 (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皆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報」每月一元
 「體育」每月一元
 「學園」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社會」每月一元
 「經濟」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
 「社論」每月一元
 「新聞」每月一元
 「副刊」每月一元
 「週刊」每月一元

我們還有別的路麼

詠霓

研究一個問題，最怕是被幾個空名詞所拘住，弄得離問題的實際愈趨愈遠。做一件事，最吃虧的是兩個不同辦法之中，定不下取舍，始終徘徊歧途，弄得一步不能進行，連目前可做能做的事，都忘懷了。譬如學者們儘管討論理論科學重要呢還是應用科學重要呢，狠可愈說愈遠，各不相下，討論到毫無結果。到不如認定目前可做應做的題目，認真去研究，其結果於理論及實用多少都可以有些成績。

我以為論政治也是一樣，主戰呢還是主和呢，做政論的人如果專從原則上著想，嚴分壁壘，各持主張，狠可以引經據史，爭到無窮，終也不能使對方信服，反可以引起自己內部的紛爭。當政權的如果也只從空言上著想，左顧右忌，只覺得這條路也不好，那條路又危險，弄得一步不走，坐以待斃，從古亡國皆是如此。

中國被日本逼到這步田地，侵略到一天深一天，在他們是決心非把中國弄到完全屈服或是完全崩潰，不肯罷手的手。在我們呢還是主和主戰徘徊歧途，甚至還有因主

張的不同釀成國內自行分裂的可能。但是子細想想，主戰罷，中國的飛機大礮種種必需的武器，究竟能否立刻齊備，而且勝過於準備三十年的敵人。即使當局如何決心，士卒如何勇敢，能否真個單用武力奪回東四省，驅逐敵人出境。這是物質問題，事實問題，無可如何的。主和呢，叫我們承認失地，再把全國送給日本做一個附庸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肯的。即使日本將中國全國都武力佔據了，我們還不肯簽字承認，何況他們也還不能。所以絕對的戰——武力戰爭收回失地——或絕對的和——簽字承認屈服——這二條路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不可能，空說是白說的。

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果真沒有別的路麼？我們除宣戰與屈服之外究竟沒有別法，只有一事不辦，束手待死麼？我以為這是大家應該用心想想，並且應該督促政府速速進行的。從戰的方面講，我們固然不能正式宣戰，也不容易專靠武力收回失地，但未失的土地應該如何保守勿失，這是不能不急設法的。固然嚴格的說，能戰方能守，但是究竟攻勢的戰與守勢的戰，多少是有些不同的。而且敵人打

到我們的領土，我們不論勝敗，終要拚命抵抗，愈多守一地愈好，愈多守一天愈好。淞滬的戰事，長城的戰事，我們奮勇抗敵的將士決不是白犧牲的，他們的犧牲已引起世界的同情而值得全國國民的感激。即使終于敗退，但是他們的壯烈的抵抗對於國事前途及外交形勢已有了極大的益處。無論何人——連敵人在內——決不會稱贊像守熱河的軍隊的不戰而走望風而逃。但是使我們感覺不安的是政府對於未失土地的防守似乎還缺少完整的計畫與準備，只知道敵來抵抗，而沒有預先準備下抵抗的設備和供給。例如九一八以後一年又半，熱河還毫無防禦工程，連壕溝都沒有挖好。等到熱河已危急了，極粗淺的人也應該想到長城各口的重要，但也一些沒有做防禦工事，等到敵人到了纔臨時去設法。我們只聽見古北口被敵人奪去了被敵人炸毀堵塞，何以不聽見我們去炸毀或堵塞他們的來路。前車之覆便是來車之鑒，前事之不忘可爲後事之師。現在日本人再進一步的侵略的形勢是很顯然的。我們知道日本人將規取平津，我們便應該積極布置平津的防守。我們知道日本人將侵略察哈爾，我們便應該積極布置察哈爾的防守。我們在自己領土內而且在離敵還甚遠的地方築敵台，安高射砲，準備抵抗，這決不是對敵挑釁，也決不是給他什麼威

脅，這是我們最低自衛的權利。我們即使明知軍器不足訓練不足，但終也不肯將我們的疆土輕輕的白丟，即使失敗也要使敵人出相當的代價，費相當的時間。防禦工程對於守勢的戰事是極重要的。工程建築得愈堅固，我們的犧牲愈小，他們的代價愈大。但是堅固的工事臨時往往不及，是必須預先建築的。不但平津及察哈爾，退一步想，保定滄州石家莊都應該先有準備，以防他併吞整個的華北。山東江蘇浙江等沿海沿江地方也應該先有準備，以防他海軍的登陸。明知勝敗利鈍沒有把握，但保守疆土是政府最大的天職，必須盡其力之所及，積極做去。我們應取的態度是始終不好戰爭不尚武力，對於一切國際的紛爭只準備以公理來解決。但同時更堅決的表明對於自己的國土一寸不能放鬆，步步爲營，處處抵抗，失了一線，還有一線，使敵人知道我們中國人還是人，不能專以武力叫我們屈服。

從和的方面講，兩國相爭總有一天要講和，和是不必諱言的，問題只在如何能得到光榮的和平。當軍人的必須時時刻刻，做抵抗的準備，即使和約已經簽字了，還應該準備隨時可以犧牲，萬不可以聽見一點交涉的謠言便說灰心。當外交官或做政治領袖的必須時時刻刻想如何能渡過

這個難關，以保全國家，利養民生。政治是隨時變化不能做刻板文章的。一個國家遇到國勢嚴重關頭，如何應付，總有好幾條不同的途徑，而且各個途徑又總各有他的利弊，利取其重，害取其輕，權衡輕重，決定一個方針而努力爲之，這便是政治家的責任。在這個決定之中，國家的利益是唯一的標準，一時之毀譽，一身之進退，都是不足計較的，尤其不可含有對內政爭的作用。這次中日爭鬥，全世界皆承認日本的不是，中國外交官的努力是很值得我們贊許的。但有二個形勢是很顯然的，一是歐美各國自身的經濟困難和彼此間的紛糾不清，聯合以實力制裁日本一時不易做到，雖然道義的制裁已使日本陷于孤立的危險。二是世界各國對於中國自身的情形很多懷疑，以爲組織不健全，政治不安定，因此而有愛莫能助之感。有這種感想存在，積極幫助更不容易了。所以如此僵持下去，中國在國際法上是極勝利的，沒有問題，但是在事實上是疆土日促，民生日苦，政治弱點日益暴露，政府力量日益薄弱，而實力的外援終是不易得的。在這種形勢中，我們的出路很顯明的是在利用國際地位的優勢，嚴整國內的組織，促成對日問題的一個解決——至少一個暫時的段落。在幣原提出五項原則之時，在錦州未陷落以前，在國聯調查團未來以

前，在日本未承認滿洲國以前，都還有機會可以交涉。甚至在日本未退出國聯以前，也還有一線講話的希望。但是中國的政策似乎只坐穩了法理上的優勢，而從不敢求事實上的解決。日本也是一樣，狼有好幾次機會，應該適可而止，而始終不肯求一個外交上的解決。所以中日兩國的態度似乎都是只以政府的面子爲重，要求對方完全屈服，絕不想一想對方的地位，謀一個大家過得去的出路。日本因爲貫徹他的強硬到底的政策，所以弄得與全世界各國爲敵，與一切條約及國際法爲敵，與一切人類向上的企圖——如國際聯盟等——爲敵，只落得退步到原始野蠻的狀態，不顧信義，不顧一切，只靠武力侵略，這不容說是極危險的，一定要失敗的。在我們一方面究竟是一個弱國，公理上無論如何勝利，事實上恐怕會弄到不能立國。所以弄到亞洲兩大國共滅共亡的僵局，實不能不怪二年以來兩國當局的蠻幹僵持，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能力。事情是已僵到極點了，一切機會都已過去，日本態度如不變更，中國也只有堅持到底，準備把華北甚至沿海沿江的地方都給日本佔領，看看他們這種師出無名的野蠻舉動在二十世紀究竟行得通否。

真的，中國果實在這一會亡了國在世界歷史中倒是很

有意思的，就是從此証明我們又回到古代相斫相殺的野蠻時代，一切近代文化的進步通通推翻了。事實上這是一切進化公律所決不容許的。中國人恰爲這人類文化而奮鬥也算意外的光榮。不過仁者存心終是要與人爲善，大政治家的責任終是要解決問題，恢復和平，而決不是存心要將事情弄僵。我們在絕不屈服決心抵抗之中，還是要常常想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所以我們抵抗的決心必須從抵

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

蔣廷黻

抗的準備上來証明，大可不必發十八次不接見日本代表的宣言來掩飾。現在真正國民（除了幾個有作用的政客）的心理所感覺不安與不滿的是軍事方面對於抵抗終像還沒有用足他們所能用的全力，而政治方面對於交涉的態度又似太近乎不敢而非真個不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是不錯的；不抵抗又不交涉那便大錯了。

「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這是明朝遺臣夏允彝在明亡後的第二年所說的話。他所說的「寇」就是流寇李自成；所說的「東夷」就是滿清。我們都知道，終久明朝先亡於流寇，而滿清入北京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爲崇禎帝發喪，第二件事就是肅清中原的流寇。

則過之。現在的日本，用不着說，論基本勢力之雄厚，野心之大，軍器之精，都遠過於三百年前的滿清。倘若現在士大夫階級不覺悟，仍舊的像明末的士大夫一樣，逞意氣，尙虛浮，知有黨派而不知有國家，那末，共產黨大可入南京而日本兵或英美兵又將繼之而爲國民黨，爲中華民國發喪！

現在的局勢與明末的局勢何等相像！現在共產黨勢力蔓延之廣幾等於明末的流寇，而有組織，有計畫，有主義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當然的步驟。日本將佔中國多少的省份專看日本軍人的意志和國際的形勢，不是看我們抵抗與否。時至今日，我們還靠大刀隊來對大炮與飛機，這不是中古迷信嗎？時至今日，我們還靠幾百個宣傳

質所創造的民氣來對付一個經過五六十年的訓練和組織的民族，這不是國粹八股，黨八股，洋八股合而爲一嗎？我們的面子要到這等程度至於不承認羊不能抗豺狼虎豹。這樣的不自量力只能有一個結果：「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以武力收復失地這條路，我看是走不通，是死路。熱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線之望；熱河失守以後，這一線之望都沒有了。愈集中精力來抗日，未失的疆土愈要糜爛。我們不要唱高調唱到日本人或英美人來替我們發喪的日子。

我們惟一的出路在於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黨的肅清。

共黨在西洋各國的運動都從城市的勞工下手。他們知道農民是最守舊的，最不易受煽動的。他們知道農民所望的不是任何主義——共產主義在內——的實現，是土地的享有。平均地權，或耕者有其地——這種口號可用以號召農民，至於土地國有，則農民莫明其妙了。蘇俄現在最感困難的就是土地公有制的實行。工業商業的國有和國營，蘇俄已經作到了；土地國有，農業公營，蘇俄現在還差得遠。換句話說，蘇俄至今還不能完全在鄉村行共產主義。

鄉人之難共產化於此可見。中國農民與他國農民不同嗎？天下最守舊的，最不相信主義的，莫過於中國的農民。最老實的，最勤儉的，最容易治的，亦莫過於中國的農民。但是共黨在中國的努力全集於鄉民。他們現在的勢力亦全在鄉下。中央政府，以數省的兵力財力，費兩年的功夫，尙不能從共禍之中救出江西的農民。這豈不是天下的怪事？這又是個中國謎！

農民所要的不外治安，輕賦，及土地。中國鄉村有共黨不是因爲農民有特殊心理，是因爲官軍和官吏有特殊心理。共禍，我敢大膽的說，大部份是官軍和官吏造的。打了兩年還未打清是因爲官軍和官吏一面剿共匪，一面造共黨。我們要整理未失的疆土不必舍近求遠。第一，我們要作到兵不擾民。江西農民樂與共黨合作而不願與官軍合作就表示我們沒有作到這個初步之初步。第二，我們要作到官不欺民。新收復的區域尤其不是官吏發財的地方。這兩件事的責任完全在當局的身上。

兵不擾民，官不欺民，則農民的治安和輕賦的希望就達到了。土地問題固較複雜。我們先要看清這個問題不是個法律問題，學理問題，是個迫不及待的政治問題。去年蔣介石氏曾說過：剿匪的工作七分是政治，三分是軍事。

這七分政治根本是一個問題：官軍是爲紳土地主收復產業而戰呢，還是爲消滅反抗政府的蘇維埃而戰呢？如是因爲第二個原故，官軍的出戰是名正言順的；一國之內當然不能有兩個不相統屬的政府。農民對蘇維埃的政權，亦斷不至擁護，如此政權沒有經濟的利益。不幸以往官軍是與紳土地主合作的；政府曾未大膽的宣告農民蘇維埃的土地分配是政府所要承認的，維持的。政府只與蘇維埃政權爲敵，不與農民爲敵。這是釜底抽薪之法，政府未曾實行的。

蘇俄革命以後，白黨的反攻最有成功可能的是田尼肯（Denikin）。其最後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不直截的承認革命的土地分配。

這個土地問題不僅發生於匪區，不過匪區更加急迫。其實這個問題是全國皆有的，耕者有其地是當代的一個大潮流。我們平素研究國際事情的人注視了各種政治的大變動，如希特勒的執政，莫索立尼的演說，某國的廢君主爲民主等等。大戰以後歐洲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少有人注意了。其實鄉村的改革也是戰後的一種大事業。普魯士，捷克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布加利亞，及俄國都會用政治的力量來平均地權，不過程度有不同，方式有不

同而已。

革命最徹底的當然是蘇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列寧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對德的戰爭，第二道就宣布土地是農民的。地主保了生命已算了不得；土地的代價簡直談不到。

普魯士的辦法是強迫大地主將土地分爲小塊出賣。波蘭一九二〇年的土地法說：「惟獨耕者及其後嗣可以有地。」

捷克斯拉夫一九二〇年的土地法的基本原則完全與波蘭相同。

匈牙利在戰前完全是大地主的國家。戰敗以後，受了短期的布爾雪維克的統治，大地主們決定以毒攻毒，那就是說，把田產賤價的出賣與農民。

羅馬尼亞與蘇俄既近，且其北部原是俄國的土地。故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受了蘇俄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北部的土地改革完全學俄國：農民收沒了大地主的土地而瓜分之。南部由政府收沒土地，給了舊地主很低的價值，而分配於農民。到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政府收沒的土地達四千萬畝之多。

戰前布加利亞的土地分配不若羅馬尼亞那樣的不平均

，但戰後農民黨當權的時候，也大行土地所有權的改革：舊皇室的土地，教堂的土地，以及地主的土地過七十五英畝者概收沒分給貧民。

這些歐洲東部的國家既與蘇俄接近，而大半又同是斯拉夫族的。現在這些國內僅有少數共產黨員，絕無所謂共禍。原故固不一，但最要緊的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農

民已經得到了土地，共產的宣傳無用武之地了。

前不久報傳汪精衛氏復職以後，組織了一個鄉村經濟委員會。我希望這個委員會不是會而不議，議而不辦的。

農村經濟有轉機的日子就是共產潮流降退的日子。

我們前面有這條路：走與不走在乎我們。

二十二年四月十七

察哈爾的現狀

(一)

唐尊

察哈爾省之政況，知者極少，半由於言論不得自由，

半由於忍痛而不欲言。言論不得自由，在中國為普遍現象

；忍痛而不欲言，在察省有特殊情形。無知民衆欲言勢有

不可，知識階級言出禍必隨身。紳商或有表示，當局則橫

加干涉，即令集會他省，每舉輒多不成。在外學生，上焉

者忙於讀書；其次則漠不關心。呼籲無效，要求不靈，吾

民即忍，豈能長此容忍。見於外患者，熱河豈非殷鑒！證

諸內亂者，共黨為其適例！此皆我樸實良民，痛當局之不

恤人言，是以出此；豈其別具心肝，有所樂而必如彼哉？

近且多倫告警，恐我察民之或將然也，故不自量其膚淺，

大聲急呼：一以述我察人之痛苦，冀即加以改善，一以指

陳利弊，便有司之採取；庶於國破家亡之際，可免袖手旁觀之咎乎？

治內區域之今昔

今之察省，為舊察哈爾特別區中之達里岡庄牧場，錫林郭勒盟，及興和道之東六縣，與舊屬河北省之口北道十縣所合成。至舊日察哈爾特別區興和道之西四縣——豐鎮、涼城、興和、陶林——則於民十七年後季劃歸綏遠。現在察省境內，成熟縣分，祇有口北十縣。興和道之東六縣，直不過較大之土堡柵欄，俗人所稱為口外之地也。至若錫林郭勒盟，達里岡庄牧場，人煙稀少，俗仍牧業。

口北地位與邊防之關係

口北十縣與晉屬雁北十三縣，地居內外長城之間，形勢天塹。昔在明清，宣化大同皆爲重鎮。雖局勢與今不同，然以蒙民知識未啓，風教不同；邊疆有事，必其定爲我用，恐無確實把握。徵之往事，無可諱言。然則口北雁北，仍爲國防之重鎮，開發內外蒙之後備，與昔無以異也。惟是明之初葉，宣大駐軍，憑長城設防，力不能外征，僅足以苟安。時或將非其人，寇每內犯。也先瓦剌之侵，英宗土木之變，其適例也。迨及明季，事又遜前，藩將怯弱，吏治貪污，置國防於不顧，惟民膏是吮。內則結納閹豎，爲祿位之固；外則殺戮人民，冒捷報之賞。卒之閻王北犯，欲由潼關而不得，終經雁門宣大以成功，長趨直入，勢如破竹，未始非防務未充，民心未結使然也。迨及清初，武功之大，除平定三藩，幾全力注意於新蒙，觀康雍乾三帝之親征，可以瞭然。惟其策略，重在安邊以制外，故其軍政吏治，頗稱清明。証之遺諺——交了銀子糧，賽如自在王——亦可見當日人民之熙熙樂生也。終清之世，其安如此，未或稍替；故在清世，力足以經營內外蒙新疆者，非徒無因也。惟是駐外——內外蒙新疆——大臣將軍，類皆旗人，不學無術，昧於治體；加以親貴用事，保薦私人；視新蒙爲羅掘之地，罔存衛國之心。是以回民屢變，乃成

新疆建省之議；蒙民騷動，亦勞御駕親征之舉。究以羈縻有方，版圖未爲大虧；所差者，吏非其人，內外蒙新疆人民之程度，迄今未躋於內地之列耳！然方之明世，對於內外蒙新疆，政治措置，成績所獲，良多多矣！究其原因，即在於先安邊境——口北雁北——也。降及民初，熱屬經棚，蒙民變起，宣府駐軍，往征即平，其時民亦未嘗輸送，兵則自能衛國，晏然不驚。其後外蒙獨立，爰又出征，雖則失敗，民不生心；內蒙相安，外難再侵，未始非清世治績所遺也。自此之後，外蒙携貳，不受干與；聽俄煽惑，倡言獨立。新疆則有挾於項城，擅作威福，術盡羅掘之能，毫無建設之實。當此之時，中央對於新蒙，已有鞭長莫及之慨矣！及徐樹錚有屯軍西北之議，適外蒙正爲內向之際。於是宣化練兵，龍烟採鉄；事雖出於爭權，要爲國防至計。然以段吳不合而起內訌，國防重地形成割據——口北爲直隸省之口北，雁北爲山西省之雁北——各不相謀，時復牽掣。經營新蒙，不特失其資助，即內蒙特別區域，徒使匪勢坐大，鴉片充斥；尙何政治可言，直一西北魔窟。而外蒙則任俄人處置，新疆僅由楊某擅專，統一既破，國防不靈，小徐之計畫休矣！及馮氏勢成，步武小徐，清河孔家莊（屬今察省萬全縣）有飛機場之設，平綏沿線

，皆駐重兵，張垣建署，通蒙築路（平綏沿線至張家口由此向外蒙各處）是時內地之經營外蒙者，有大進展；卒以規模略具，惹起內亂。認以爲是者，既無實力之援；指以爲非者，謂有近俄之嫌。於是羣起攻之，分贓了事。內政如此，外交失策，赤俄抵隙，進佔庫倫。沒收我財產，殺戮我人民，內外之關係斷絕，一任俄人憑陵，喪權辱國，言之痛心。迨北伐成功，全國混一，政府意在鞏固中央，國都南遷；對於西北邊防，無暇顧及。山西以北伐之功，既據河北，復以軍事之勢，口北割察；事雖內蒙設省，對外蒙毫無經營之心，而口北割察，於內政實有過問之意。此局一成，口北頓異；向之視爲邊防後備者，今則直成內爭之區。西勝則西者據之，東勝則東者有之。視同征服之地，待如虜掠之民，國防之計畫不施，人民之骨髓是敲。以致家家破產，人人思亂。其在無事之時，邊政如此，固非治世之象；況在今日，外蒙則赤化已深，日人又攻察甚急。設有不幸，不入於俄，則入於日。是時河北更危，隴北定失，而西北之屏藩將盡撤矣！

居民之複雜及其風俗

察省治內區域，既係舊隸河北省之口北道，與原名察哈爾特別區之一部所合成，已見前述。故其居民，約略分

之，已成兩部。而又以特別情形，有他省人民或宗教不同，雜居其間者，爲數亦不在少。茲爲便利起見，特分地述之：口北十縣，率多土著之民，風尚勤儉，恒心自守；尤以蔚縣陽原二縣爲最。其習尚虛浮奢逸者，則首爲張垣，次即涿鹿。蓋以張垣於民三開埠後，爲津平蒙俄貨物會萃之地，八方人等聚集之區，互通風氣，習俗愈雜，服裝妖艷，娼寮充斥。當昔繁盛之時，（民十六前）固爲商埠之地所不免，自今肅條之後，風氣既成則難除。落得空存皮壳，華而不實，直如枯疢莫治而已！至如涿鹿，僅以縣城之內，有旗族數家；繁文縟節，本其所尚，婚喪大禮，每事闊綽，觀感既熟，土著效尤，降及今日，此風未革。至若特別區之一部，極北牧場，純爲蒙人；業既未變，俗亦仍舊。稍南錫林郭勒盟，則漢蒙雜處，少見幕帳，俗近漢族。再南六縣，已近張垣，則多漢族；縱有蒙人，完全同化。此外尚有一部回民，散居於張垣宣化兩地；多清軍官千把總之後裔，意必屢勸回亂之內向而有功者。其人强悍有爲，多經商新蒙之間，或業駱駝脚戶，往來沙漠中。自民十五以後，屢經戰事，駝被軍用，虧本折業者不少；改作屠戶飯館以及入伍者，比比皆是也。

政况

當清之時，口北十縣，爲宣化府治。而多倫張家口獨石口亦屬之。卽俗所謂內三廳也。其劃歸綏遠之豐鎮興和陶林三縣，在昔亦爲宣化府管轄所及之區，而稱爲外三廳者也。宣府上隸於直隸總督，而直隸總督爲畿輔重臣，則是今之察哈爾省，在昔無異直轄於中央也。迨至民二，裁府留縣；惟於十縣之上，設道尹鎮守使各一員，直屬於直隸省長之下。而內外六廳，及北部之錫林郭勒盟，與達里岡崖牧場，則稱爲察哈爾特別區，都統一人領之。其下則有興和道尹，多倫鎮守使隸屬焉。卽昔所稱爲興和道者是也。自是之後，察稱特區，政權另樹；雖其意爲設省之備，引而近之，而不知權分力小，反而外之也。况歷任都統，多爲武人，昏庸無謀，以爲太平。對外無發展之策，內爭有染指之心。坐令外蒙獨立，無計可爲，內蒙土匪，一任橫行。行旅裹足，商賈退畏；是則經營外蒙，官既不爲，人民縱爲，亦不易言矣！故內蒙則草昧如故，外蒙則離附無常，以言國防，有何憑恃？迨小徐屯軍，有意經營，旋以內訌，事即中阻；既無成效之可言，而中國官憲之設於外蒙者，從此盡撤矣！馮氏勢成，步武小徐，數年之間，頗有進展，已詳前論。而復以近俄之嫌，羣起環攻；既倒其人，復拋其計，以視日人之政黨迭代，而計畫不變者

，良可痛矣！至後察綏雁北口北，奉軍駐防，一切政權，自亦由彼。視該區如征服之異族，時加蹂躪。稅捐則額外徵收，每藉端勒索。以視前此之僅失於對外發展者，又加甚焉。而察綏雁北口北之農村破產，亦從此時爲基兆矣！

北伐之後，閭軍駐防，縣政人選，中央與山西參半。時方注意於黨務之爭權，與民隱無關也。而所收編之直魯軍，約十數萬，則亦散駐於口北矣！其中尤以宣化爲最多。所用餉項，就地供應，房屋用器，咸佔民有。如此年餘，該軍始行南下，而吾民之困頓已深矣！

際此時會，劃省已成，機關設備，上而省政府，下至各廳院，莫不應有盡有，亦如他省。然察省十六縣之負擔，從此更重。吾常以察哈爾設省，比之內地各省，亦如窮人與富人賭關，縱能支持一時，不露破綻，但若長此如是，則恐行不得也。後此中原變起，雖非戰事之區，而征歛頻繁，人民痛苦，較前更甚。是時奉軍舉足輕重，安據察省；惠政未見及民，機關必須多設。計於原有之外，於省則有公安管理處。財廳之下則有清理官產總處，各縣復有分處，設專員焉。縣區公安，本兼行政警察事務，而於公安局外，既有行政區之分，復有助理員之設，縣屬每區莫

不如是。再加稅捐分卡，自衛隊，則已併此而五矣！以不足二千戶之編氓，組爲五十村之一區，而其機關有五，其意何居？而暫設駢枝之機關，尙不在內也。倘此輩官員，盡屬善良，薪俸之外，別無苛求，一省負擔，則已增重。况又額外徵收，藉端勒索，民衆財力，其何能給？况又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就如民政廳長，對於縣長簡拔，自有專責；而某氏蒞任以來，所放縣長，祇有一人。其餘則爲華北最高長官所放者，長官愛弟所放者，某太太所放者，及某姨太太所放者。包苴一入，便門大開；但亦無能久任者。多則年餘，少僅數月；蓋以增賄以攘者多也。此吾聞之該廳長友人所談，非敢妄言也。民政如此，他政亦然。銓叙如此，而欲以吏治成績，責之某氏，某氏不受也。

察省法院，最高者爲高等法院，其次即地方法院，民刑兼理，設署張垣。其下各縣，則縣署兼理司法也。法官任用，亦如前述民政之濫；兩者相較，其害尤甚。蓋以司法不特易取民錢，且亦易枉民命。茲舉親所見聞者二事，以見司法之一斑。

某縣民武某愚人也，家有山地數畝，被人盜賣於該村小學校。武氏婦即托其近親顧某代訴縣府。但縣府以事涉學校，未便擅專；而教育局則以賄賂所動，爲被告庇護，

被告迄未到案，然縣府竟宣告判決，原告敗訴。而其判決，則於原地畝毫無涉及，僅以與此相近之又一地，罪其補稅。則是訴訟標的尙未認清，無怪其判由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此究屬縣府兼理司法，未嫻訴訟，猶可原也。迨及上訴，被告不到案如故，而開庭審訊，不作筆錄；惟至退庭，使當事人畫押白紙，而後補作。此中弊竇，不問可知。卒之原告敗訴到底；地契發還；雖該地之權利不享，地賦仍須照繳。是則盡義務，則契爲有效；享權利，則契爲無效，吾不知何說焉。

某縣西門外新房子，王某，有姪子一人，年十五；夜間與一僱工某，在院外草房住宿。一晚，有逃兵一人，携槍入。喚醒二人，謂願將槍換取些微現錢，以給盤費。王姪年幼無知，未誠事體；僱工心懷叵測，遂允留置。予銅元二百，兵即出走。去尙未遠，當即被其長官捉獲。追究其槍，則一一直告。遂復至該房，將槍尋得。除王姪僱工爲重犯外，併王某亦帶至軍部，認爲匪人，毒打百般，死而復甦，終以未與知其事，開釋。而逃兵則執行槍決。僱工與王姪，各判徒刑有差。然按刑律，王姪爲未成年，不應有罪，而判徒刑二年有奇，或以軍法然耶？去歲七月，幸逢大赦，此項罪犯，概應六折。則是王某之姪，

按其期限已經超過六月矣。是時友人郭某，適爲該縣承審，謂已詳報上峯，不日當可開釋。數月之後，未見開釋，

而郭亦以事他適。迄至此時（二十二年三月），恐又逾八個月矣！（未完）

亞丹女士 (Miss Jane Addams)

衡 哲

一位救世者的人格

亞丹女士與居里夫人一樣，同是當代女界的第一流人物，但她們致力的方向和情形，却又很不相同。居里夫人是一位科學家，故小小的一個試驗室即是她的全個的世界。亞丹女士是一位社會實行家，故整個的現實世界不過是她的試驗室。因此，亞丹女士的一生就比較的難寫了。況且她的事業與功績，在空間與時長上，都占着一個極大極重要的地位，寥寥數千字的記述，是絕對不能表達她的生平

的。

但在那無量功業的背後，却有一個一貫的動機，那便是亞丹女士的悲天憫人的博愛精神。這精神是她五十餘年來一切偉大事業的原動力，是她生命的精華，也是她對於人類的最大貢獻。我們對於亞丹女士的成功，固然有無量的欽佩；但更值得我們的崇拜的，却是她的精神，她的偉大的人格。她一生的努力，即使都歸失敗，而這個人格的

存在，即足以使她不朽。故我願在此處，用十足的熱情與敬意，把這位悲天憫世的偉大人格，介紹于國內的青年。

亞丹女士名叫建痕(Jane)，于一八六〇年的九月六日，生于美國中部依利諾州的賽達維爾城(Cedarville, Illinois)。她的父親是一位開拓西部的創業者(Pioneer)，有識見，有材能，有高超的人品。女士在嬰兒時即失去慈母，故她的依戀與崇拜的對象便集在她的父親一個人的身上。她在很小的時候，背脊有病，致使她的頭部常常偏傾在一個肩上。因爲這點殘疾，又加上她的強烈的同情心，與多思多慮的天性，故她的身體自小便不甚強健。十七歲時，她進了一個初級大學。卒業之後，她原想學醫，以爲救世之用。不幸背脊病復發，臥床半年，又因她的天性與醫學不甚相近，病愈之後，便把學醫的念頭打消了。後來她得到了她父親的一點遺產，便到歐洲去漫游。但她的漫游與別人不同。普通人到了一個新地方，大概不是游樂，

即是觀光。她的眼光却專射在各個城市的貧民窟上，這使她對於人間疾病與飢餓的痛苦，得到一個更為深刻的了解與同情。有一位深知她的人曾說過，「這位女子對於所有人類的了解與同情，在現代的人物中，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的。」這真是說着她的人格의 深處了。

但她所有的，並不僅僅是一個海樣深的同情心，她還有一個天樣高的理想，與一個地樣平易的實行手段。她比如一位良醫，對於社會的種種疾病——痛苦與罪惡——不但有精細的解剖與判斷，並且還能為那些病症想出最好的方案。不但如此，她還能自己製藥，自己親手調理，自己給病人吞服。服藥之後，她還要給那些病人作很內行的看護，直到他們恢復了康健，方算盡了她的責任。這是一個心與腦與手腕三方的偉大合作，決非單單具有熱情，理想，或是實行能力之一者能希望做到的。

這個心，手，腦，三方合作的第一個成績，是亞丹女士的社會事業。而這些事業的具體表記，乃是她和她的同志斯太女士（Miss Ellen Starr）一八八九年在芝加哥所發起的好爾廳（Hull House）。牠是她四十餘年來，為掃除階級、國際，與種族間的隔膜與不平等而努力的大本營。她七歲的時候，曾立過一個誓，說，待她長大之後，她將

在貧民的陋屋中間，造一個大房子，她自己便這樣的在他們中間居住。好爾廳的成立，即是成就她的這個願望；因為牠的目的，是在揉和那社會的上層與下層，使富的遇着窮的，智的遇着愚的，美國的土著遇着歐洲的移民。象徵的說來，即是把一個大房子，置在許多卑陋小屋的中間。她相信，這不但于下層階級有益，于上層也是有社會教育的價值的。她說，「社會各級的倚賴是相互的，故社會的關係也都是相互的。」這個主張是好爾廳在精神上的基礎。

好爾廳的精神，既是建立在揉和那不同幸運的兩個階級之上，故牠的表現方向，也就很自然的集中在歐洲各國來美的移民身上，因為他們乃是一切不幸者的代表。他們帶來的，是愚闇與飢餓，疾病與罪惡。而好爾廳却能使疾病的得到醫治，飢寒的得到飽暖，黑暗中有了陽光，傷心的得了安慰。而年老的，孤單的，殘廢的，犯罪的，心中流血的，對生命絕望的，各種各類的不幸人們，都在這個救助所中，獲得了身心兩方的安慰與光明。他們猶如一片大沙漠，這個救助所便如一條大河，流行所過之處，一一得到了蘇活，一一得到了滋潤，一一得到了一個新生命。

亞丹女士的第二個大成績，是她對於世界和平的運動

，而那個運動的具體表記，乃是瑞士日內瓦城的「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和平是人人所能說的，但女士的和平主張却與一般口頭禪不同。第一，普通人大抵以戰爭爲人類的天性，是一件積極的事，而和平乃是一個消極的主張。女士的意見却正與此相反。她相信，人類的所以戰爭，乃是由于彼此的猜疑與恐懼，正是一個十分消極的心理狀況。欲求這個狀況的消滅，必須有一個積極的代替。這即是說，必和平主張有了積極性，方能希望消滅戰爭。在女士的心目中，這個積極性乃是人類的互通需要，俾一切的生命能得到養育。她說，「熱心和平運動者所以灰心失敗之故，乃是由于他們缺少一個積極的動力，那個救助經濟上及社會上的需要的動力」。第二，她不相信和平是可以放空言獲得的，她說，「和平不是一句空言，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教條，」所以必須有人能去實行這個理想，方有成功的希望。第三，她相信，這個以養育人類爲基本的和平主張的實行，乃是婦女們的天職與特權。因爲自原始時代以來，婦女們的努力焦點，即是在謀人類的保存，而這個工作又是與戰爭不能並存的。因此，她又主張，婦女們應該擔負這個和平運動的大責任。

這三個原則即是亞丹女士的新和平主義的基本條件。而她自己對於這些原則的實行與成績，則有她在大戰期中，爲求「世界上大部份人民的生存」，而對於糧食的奔走；有她在好爾廳的融和各國民族的四十餘年的努力；有一九一二年，她的參加羅斯福的進步黨的組織；有上面所說的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有在歐美各城召集的許多國際婦女大會；有許多以她爲精神領袖的婦女和平運動——兩年前，從美國西部遊行到美京華盛頓的「和平隊」，那個要求美政府在軍縮會議實行軍縮主張的大運動，即是一例。此外所謂她的婦女運動，國際主義，以及其他一切活動的表現，也都是可以上溯到這個共同的淵泉的。

爲了她的和平的主張，尤其是在美國參加歐洲大戰的時候，她受到了社會上的，尤其是報界中人的，無限的誤解與侮辱。有一次，她照着她的預定的計劃，到一個地方去演說，但她的一位老朋友竟不敢給她做主席，因爲那樣一來，那位朋友將不免受到同情于她的主張的嫌疑。對於這樣的打擊，亞丹女士真不能不感到孤寂了。她說，「我深刻的感到社會上對於我的誤解與毀謗，差不多自悲自憐了，這是人性所能墮落的最低的一個坑。」她又說，「羣衆的力量是那樣的，我們不但抵抗不住，并且覺得不自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這一次的華府會議

我們是右派嗎？

經濟封鎖與日本

漫游散記（十八）

金沙江

察哈爾的現狀（一一）

我們最多祇有兩條路

對胡適之先生的答辯

蔣廷黻

叔永

永修譯

丁文江

唐尊

董時進

每期定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獨立評論

第四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寄售及代售處

北平：北平圖書公司、東亞書局、新華書店、京山書社、文齋（代定）、泉山書社、文齋（代定）、泉山書社

天津：市立圖書館、神州國光社、立遠書局、康登教育社、立遠書局、康登教育社

南京：中央書局、花牌樓書店（代定）、正中書局、樓山書局（代定）、正中央書局

上海：現代書局（總代售代定）、亞東圖書公司、新中國書店、東圖書局、新月書店、光華書局

西安：西華書局、西北文化書局、甘肅書報社（代定）、胡正興

開封：華新報社、統一派報所

安慶：安徽立圖書社

濟南：中華書局、春記書社、東方書社（代定）、遠東書局

廣州：神州國光社、南華書局、廣州書局、現代書局

重慶：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漢口：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油城：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成都：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蘇州：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杭州：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徐州：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濟南：開明書店、文化書局、友誼書局、現代書局、新時

開明書店

甘肅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濟南書報社

現代書局

振華書局

友誼書局

會文書局

這一次的華府會議

蔣廷黻

自九一八事件以來，國人屢有提議請美國根據一九二二年的九國條約召集第二次的華府會議者。現在世界各國的代表又將集於華府。在英美最有聲望的宋子文氏也放洋了。究竟這一次的華府會議是會有利於我們如上一次的華府會議嗎？

這個問題可分爲三個問題回答。第一，一九二一年冬季的華府會議有利於我們者究竟是什麼？第二，當時的國際形勢及會議形勢有什麼特別使我們能得相當便宜呢？第三，現在的形勢與當時的形勢比較又如何？

第一次的華府會議幫助我們收復已失的權利是有限制的。我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有二種：一種是對普遍國際的，一種是單對日本的。對普遍國際的包括關稅自主，法權自主（即領判權的取消），外國駐華軍隊的撤退，外國在華所設郵局的取消，及租借地如旅大，威海，廣州灣的退還等項。實際我國代表所要求的就是「取消不平等的條約」，不過他們沒有用這個標語就是了。除郵局外，其他各項均是成敗參有的。關稅我們略可提高；領判權呢，會

議以爲時機過早；駐軍的撤退，會議以爲應斟酌時地辦理；租借地除威海外別無具體的結果。單對日本的就是民國條約的取消。我們所得到的是山東的收回及日本放棄二十一條的第五組的正式聲明。至於旅大問題，南滿，安奉，吉長諸鐵路問題，土地商租權的問題，及漢冶萍問題，日本在上一次的華府會議絲毫沒有讓步。總而言之，第一次的華府會議可說是我們收復失權的初步，離完成還差得遠。這也是不足怪的：八十餘年的失土及失權的歷史那能一筆勾銷？

上次的華府會議雖然不能完全挽回已往，却曾努力于保障將來：至少是條約上的保障。九國條約一則曰，列強共同尊重中國政治的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再則曰，列強須給中國充分的機會來完成她的統一和建設強有力的政府；三則曰，列強各國不得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有任何優越權利。這個條約西人都稱爲列強自制的律令（Self-denying ordinance）；此約在遠東問題歷史上的重要簡直不可言喻。牠可以說是關於遠東的國際大憲章。

所以把兩方面合起來看——挽回已往及保障將來——上次的華府會議可說是有利於我們的；在保障將來方面遠勝於挽回已往方面。

當時的形勢有三點特別。第一是美國國際地位的優越。歐戰期中，美國的富力和兵力有了一日千里的長進。戰後美國實有左右世界大勢的能力。上次的會議一方面討論海軍限制的問題，一方面討論遠東問題。是時美國並無限制海軍的必要。美國人民的負擔遠在他國人民之下，而富力又在他國人民之上。如美國要與別國爭競，她很可以超過海上霸主的英國。別國如要與她競爭，必至破產。由美國提出海軍限制，是她所犧牲者多，別國所犧牲者少，甚至談不到犧牲。是以美國有所施於人。在外交上，有所施於人然後可以有所求於人。因此美國所提對於遠東問題的處置能得着別國的贊同。去年史汀生曾說過：如九國條約不能維持，全華府會議的成績，海軍的限制在內，均將被推翻。海軍的限制與九國條約可說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

當時形勢的第二點特別是歐洲各國都為歐洲的問題所困，無餘力在中國發展。同時她們都以為中國是世界的惟一最容易受宰割的大肥肉。在這種狀況之下，她們何樂

不贊成大家不下手的政策呢？日本適得其反。日本除中國外別無問題；她的國力全集中於中國。並且日本的資本和工業遠不及英美。不用政治的侵略，專靠經濟的競爭，日本未見得能維持她在遠東的地位。何況她的目的不僅在維持，而在發展？美國當時固有餘力在中國發展，但美國只須通商的機會均等；政治的侵略是無須的，且是不經濟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一倡之，歐洲自然和之。這個「列強自制的律令」於是產生了。實在呢，九國條約與其說是列強的自制，不如說是歐美聯合制裁日本。

第三點特別是大英帝國外交的改變。英國在中國有通商的機會均等也就够了，用不着政治的侵略。關於這一點英美的立場完全相同。門戶開放主義是英國的素志。英國最講帝國主義於內閣總理沙侯（Lord Salisbury）尙以門戶開放主義為上策，利益範圍與瓜分為下策。在歐戰以前，反對門戶開放主義的就是日俄兩國。戰前兩國都是英國的與國；那全是為防德。戰後，德國敗了，俄國革命了！短期內，這兩國均不能危害英國。蘇俄固尙能以世界革命來動搖英國，但這種危險不是聯日所能防止的。所以在華府會議，英日同盟就宣告壽終正寢了。同時在歐戰期內，日本的進步頗足使加拿大及澳大利亞寒心。美國禁止日

本移民；英屬自治領土也禁止日本移民。在巴黎和會，日本提出民族平等的時候，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知道這個提議是指她們的移民禁律的。這兩國自治領對日所處的地理地位又完全與美國相同。戰後，自治領在大英帝國內的重要遠過於戰前；她們的意志，親美反日的意志，英國政府不能不尊重。

因爲有了以上三種戰後的特殊情形，上次的華府會議才能得着成績。現在的國際形勢與一九二一年的形勢又怎樣呢？

上文所舉的三種形勢基本尚存在。美國的勢力仍舊是列強中比較的最雄厚的。歐洲各國仍舊爲歐洲的問題所困而希望遠東沒有巨大的變化，希望美國出力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大英帝國仍舊對中國只圖通商機會均等，對美國力圖親善。然而近十來年世界上發生了一個大變動：上次華府會議的時候正是世界經濟上進的時候，這一次則是世界經濟最黑暗的時候。會議快將開始，美國竟放棄金本位。美國現在失業的人民在千萬以上。去年美國的國際貿易不過一九二九年國際貿易百分之三十。這類的數目字我不必多提：全世界的經濟恐慌是當代最重要的事實。

所以這次的華府會議是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會議。所

討論的問題分爲三大項：戰債，各國幣制的整理，及國際貿易的提倡。三種問題均嚴重，均複雜。歐洲各國所欠美國的戰債的原本約計美金 10,000,000,000 元。其中英國所欠的佔 4,600,000,000 元；法國所欠的佔 3,000,000,000 元；意大利所欠的佔 1,600,000,000 元。原先歐洲各國希望能拿德國給她們的賠款來還她們欠美國的戰債。去年德國賠款已由各國決定實際上取消；於是英法意諸國感覺無法還美國。而戰債問題一日不解決，國際經濟一日不能復常態。各國的幣制均已放棄金本位；國際匯兌因之紛亂，國際貿易因之加添阻碍。並且各國均求本國貨幣的匯兌率的降低，以圖推銷貨物於國外。國際貿易近年大爲各國關稅所阻；長此下去，各國均會到我國閉關時代的經濟。這是世界經濟恐慌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次的華府會議，美國所能施於人者是戰債的減少或取消。美國大概會拿戰債來交換幣制的整理和關稅的減少。如美國想更進一步，拿戰債的減少或取消來交換英法關於遠東問題的合作，這就要看合作的範圍如何了。如果這種合作需要重大的犧牲，英法必以爲要價太高，交易難成。同時我們要知道：美國如能拿戰債換得各國金幣的穩

定及關稅的減少，美國的經濟恢復就有了希望：這是美國切身的問題，她決不願因遠東問題而犧牲經濟恢復的希望。這是與上次華府會議的大不同點：上次美國甘願爲遠東問題而犧牲海軍的充分發展。所以這次會議的形勢不如上次會議的形勢之有利於我們。

但是上次華府會議有利於我們的三種形勢依然存在，不過因爲經濟恐慌的原故不能成爲動力。這次的會議如能得到關於經濟問題的了解，遠東問題的解決亦必能有進展。總之，這次的會議關於經濟問題已經是預備會議，且

我們是右派嗎？

？

叔永

其成敗頗難逆料；關於遠東問題充其量不過是預備之預備而已。

同時中國也爲經濟恐慌所困。中國的經濟不振也是世界的經濟不振原因之一。我們如在會議中提出具體的經濟振興計畫，比較容易得到列強的協助。最後之最後，這遠東問題解決之是否有利於我們還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我們絕不可因遠東問題而忽視這次會議的重要。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徐炳昶先生近來由西安寫了一封信給孟真先生，主張大家起來，聯合一致，出一個主戰的宣言。他說，「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連右派都堅決地主張戰爭，那

表的宣言，有甚麼關係，則又要看徐先生所說的「右派」兩個字的意義而定。因此，我們——至少是作者個人——以爲有略爲說明的必要。

國論可定於一致，對於戰爭，不無良好的影響」，（見獨立評論第四十六期）。徐先生這個話，可以說有兩層意思。一是徐先生自己希望我們大家起來，發表一個主戰的宣言。一是徐先生告訴我們，國人——或者應該說獨立評論的讀者——對於我們的批評，而這個批評，對於徐先生所要發

「左派」，「右派」，是近來政論家拿來代表政治主張的兩個相對的名詞。要引經據典，把這兩個名詞的分野和含義，一一指明出來，那是太繁重不易做的事體。不過就普通常用的意義說，「左派」是指世界主義的，社會革命的，激急改進的，而「右派」則是指民族主義的，少數專

制的，維持現況的各等分子。至於誰是激烈，誰是溫和，却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別，因為右派的分子，也不少採取激烈的手段以推行他們的政策的，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和日本目前的青年軍人專制便是。又反對政府或維持政府，也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別，因為這要看政府當局的屬於某派。如在意大利，日本，反對政府的為左派，而在俄國，則反對政府的必屬於右派。這些都是人人心中應有的普通常識，但因為要說明右派兩個字的意義，不能不在此處提到一下。

在徐先生的通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謂「右派」，至少有以下兩個含義。一是右派的人是根本不主張戰爭的。所以只要右派也出來主張，國內主戰的言論便可「定於一致」。二是右派是與政府表同情的，而我們軍事最高當局的決心，又始終有一點使徐先生懷疑。所以只要右派也出來主戰，那政府當局就可以「無所躲閃」。這兩層意思——即不主張戰爭與表同情於政局——拿來和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左右派分別對照，已經覺得不能成為右派的特殊徵誌了，至於獨立評論，是否對於戰爭與政府有徐先生所想象的主張，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老實說，獨立評論，自來對於任何問題，就不會有過

完全一致的主張。牠的信條，只是「根據自己的智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牠的主張，只是「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見獨立評論第一期「引言」）。所以在一年來獨立評論的文章裏面，雖然談到了不少的當前問題，却不會單純地討論一個甚麼主義。這樣的一個態度，我們相信不配成一個甚麼派系。我們自己期望做到「獨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個「獨立派」。

可是，徐先生的說話當然可以代表一般讀者對於我們的一種空泛的印象與擬議。那嗎，我們要追問這種印象與擬議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就對日方面說，獨立評論有兩個狠惹人注目的所在：一是對於一二八事件後上海協定的態度，一是對於黎頓報告書的態度。獨立評論的誕生，正在上海協定成立之後。當時全國輿論沸騰，痛責政府的失策，只有獨立評論的論說，對於政府多少有幾分贊許之詞。（參觀獨立評論第一期「上海戰事的結束」。）黎頓報告書發表的時候，全國的輿論正在遲回審慎，或極力吹求以表示我們外交政策的強硬，而獨立評論竟毫不遲疑的發表了贊成稱許的文章，引為解決中日問題的一條出路。（參觀第二十一期「一個代

表世界的公論的報告」第二十二期「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和第二十三期「自殺」等篇。）這些無所顧忌，直率坦白的言論，其用意不過是要指出一個中日問題解決的外交途徑，但因此引起獨立評論主張妥協的誤會，也許是免不了的。

可是獨立評論的交涉論是不應該引起這種誤解的。交涉必定有一個目標，獨立評論主張交涉的目標，是「取消滿洲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見本刊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這個目標，在黎頓報告書發表的前後，未嘗沒有幾分達到的希望。可是半年以來，敵人對於黎頓報告書的回答是甚麼？東三省佔領之後，繼以熱河的侵奪；熱河侵奪之不已，繼以長城以內的蠶食。這與我們所標榜的「取消滿洲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的原則，愈走愈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獨立評論也會很明白的主張此時沒有交涉的可能。（本刊四十四期「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不過我們這班人的理智上的訓練至今還不容許我們輕易高談武力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罷了。

其次，對於政府，獨立評論曾經發表過擁護政府的言論（參觀本刊第四期「監察院與汪精衛」及第五期「我們要有政府」等文），徐先生以爲獨立評論對於政局表同情，是無庸致疑的了。不過讀者若能深察一下，便覺所謂擁護政府的言論，都是在兩個條件下發表的：一是有政府勝於無政府，一是我們至今還相信改善政府總比推倒政權爲更經濟的辦法。故與其說本刊表同情於政府，無寧說本刊表同情於政府的艱難地位，這和政府的政策，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中國日下還够不上談甚麼左右派之爭，說我們是那一派，本來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我們覺得眼前國內言論界的說話，似乎只有一個標準，那便是：論事必須激昂慷慨，不管事情的能否實行，論人必須隱善揚惡，斥責怒罵，不然你便是落伍的右派。獨立評論的同人既不會高唱激昂的論調，又不會專做責人無已的文章，如果因此得着右派的嫌疑，我們也無法推辭的。

二十二，四，二十四。

經濟封鎖與日本

日本牧野輝智作 永修譯

這是一篇日本人對經濟封鎖的觀察，載在日本雜誌

「文藝春秋」的四月特別號。在這種自己安慰自己的，

論調裏，也可以窺見他們對於經濟封鎖的顧慮。

由我國（日本，以下倣此）對聯盟關係極端惡化的結果，近日經濟封鎖問題，頗縈一般人的念慮。但我們對於這問題的觀察，應該分作兩個觀點來研究：第一，「經濟封鎖」是否果能實行？第二，假定能够實行的話，那麼我國又是怎樣？

現在先研究第一問題。關於這一點，據多數識者的意見，都以爲聯盟無論怎樣努力想把「經濟封鎖」來制裁我國，其結果是不能實行的，就是作者箇人也大概和這一派的見解表同情，因爲日內瓦的對日勸告案，雖然以四十二對一的情勢通過了，但所謂四十二國，其大多數國家，對於「經濟封鎖」云云，是既沒有利害關係，亦毫無實力的，就中只有英（屬地在內）法兩國，最有關係，而聯盟加入國中，尤其是英國的態度，最具有重要性，其餘各國，可說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究竟所謂經濟封鎖的內容怎樣？這是我們不可不知道的。經濟封鎖的主要內容，第一是斷絕貿易，其次是斷絕金融上的往來。但金融的斷絕，其重要性較之貿易上的斷交差得多。就我國的貿易關係看，最和我有深切關係的，是美國。因爲我國輸出入貿易的百分之三五，是對美貿易，其次是對華貿易，不過在滿洲已經獨立了的現在，若僅就對中國本部的貿易言，那他的重要性，也就差得多了，何況年來因排斥日貨，及其他種種關係，對華貿易已經大不如前。所以就今日的現狀看，次於對美貿易的，毋寧認爲對印度貿易；去年我國的對印貿易額，實佔我全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一。由這樣關係看起來，可知所謂經濟封鎖的實現問題，其實即是對美和對英的關係問題，而兩國的態度怎樣，也即是這問題的成行怎樣了。

美國雖然不是聯盟國，但對這次聯盟的勸告決議案，是表示贊成的，並且這種態度，雖然胡佛已退，羅斯福登台，但總也不會有什麼變更，不過關於實行經濟封鎖一件事，還是不易置信的事實罷了；因爲實行經濟封鎖，在美

國自身，也是要受非常的打擊的。不但這樣，此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緊要問題。即：要實行對日經濟封鎖，當備有不辭對日戰爭的決心啊！

日美間的貿易關係，不但美國是日本的一個最大主顧，日本也是美國的一重要顧客。她的對外貿易中，加拿大是第一個對手國，其次是英國，又其次就是日本了。在今日這樣貿易蕭條，經濟疲弊的狀態中，就使風平浪靜，已經無由振拔，何況要她把一個重要的顧客日本失去，這於美國未免太痛苦了些罷。就日本說，生絲對美銷路斷絕，固然是日本的苦痛，但美國亦未嘗不痛，美國的絲織業，在該國中，實佔着重要工業的位置，此中從業人員，達三十萬人之多，一旦這個工業受打擊，美國的經濟界，能够不受影響嗎？又我國重要的輸入品是棉花，就中的六萬萬餘斤，是由美國輸入來的，這項數額，佔美國棉花輸出總額的十分之二以上，現在美國農村不況的重要原因，是由棉花價格暴跌來的，在這時候，要他再放棄二成的棉花輸出，而實行對日經濟封鎖，能够嗎？此外如木材，小麥，鐵材機器等，亦都是美國對日輸出的重要品。總之這類的數額愈多，美國所要受的苦痛，亦是愈大的。

其次說到日印貿易，我國和印度的貿易關係，是輸入

棉花，而輸出棉製品和其他物品的。自印度看來，她的對日貿易，實居於她對英本國貿易的次要位置。所以一旦經濟封鎖，日本固然要受打擊，印度亦是要受同樣打擊的。不寧維是，就輸出入狀況觀，印度對日本，實是一個輸入國，所以他所受的打擊，還恐怕要比日本大。英國對日本的貿易，也是這樣，她亦是一個日本的輸入國，所以由日英貿易關係斷絕，所受到的打擊，不能不說英國要比日本還利害。其餘英屬濠洲亦是一樣。由這種關係看來，英美兩國，既然不容易實行所謂經濟封鎖，那麼這問題的大勢，就不問可知了。所以作者對於嚴格的封鎖之實行，是以爲不可能的。

然而我國却不可以經濟封鎖不能實行，而晏然不置意。我們要時時刻刻，以如果受各國經濟封鎖時，應如何對付爲念慮。就作者的豫想，以爲經濟封鎖，就使能够實行，那也不過是一種極緩慢的惡性的排貨，或關稅壁壘等方法。這種意義的經濟壓迫，那實際就是金融上的問題了；而這種手段亦可以說現在已經有幾分在實行了。我國現在無論對英對美或對法，都無法募集外債，至於期限到臨的債款，亦無法換借，只有拿現金去清還，如最近到期的興業銀行外債，便是一個顯例。這種意義的經濟封鎖，此去

恐怕還要更加利害，這是我們不可不覺悟的，而同時恐怕還有和這個相并行的緩慢的經濟封鎖（毋寧說是經濟的壓迫）的實現的可能性。

我國關於食糧問題，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眼前米穀等類，很可以不必靠外國輸入，小麥雖是我國的重要輸入品，但輸入的一半，是拿來做麵粉再輸出去的。假如把麵粉的輸出停止，那麼小麥的輸入需要量，也就減少了，至其不足分量，大約可由內地小麥產額的受戟刺而增補之。總之，所謂食糧問題，我國無論如何，是受不到外國威脅的，這一點是我們比較別國（如英國等）差堪自慰的地方。

其次，棉花的輸入，一旦停止，我們的紡織業，固然

漫 游 散 記 (十八)

金沙江

江的南岸——武定元謀

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揚子江的上游的是徐霞客。他的江源攷說的最明白：「發于兩者（指崑崙之南）曰犁牛石，

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

要受一大威脅，但我國輸入棉花，是用來製造棉織品，然後再輸出去的，所以如果把這方面停止了，那麼就不輸入棉花，大約衣料亦不至於缺乏。所最感苦痛的，只有煤油這件東西。就我國每年的煤油消費量計，國產品不過十分之二，剩下十分之八，都是靠外國輸入的。所以如果一旦煤油輸入，全然杜絕，那倒是於我國重要軍需品上，以及軍艦動力上有很大的打擊。此外鐵材等等，雖然一旦斷絕，不能不感相當的苦痛，不過這種情形，或者反足以刺戟內地的製鐵業，而令斯業更確立牠的基礎的。

綜上以觀，可知經濟封鎖，於我國固然苦痛，但並不是絕對難堪的事情；而這種苦痛的副產物，或者反使我們內地各項產業基礎的更加鞏固！

丁文江

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他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十二月一日到元謀的官莊。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可惜從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他的游記殘缺，他對於金沙江的直接觀察，已經沒有記錄存在。他的朋友季夢良聽見跟徐霞客同走的顯僕說：「至

武定留憩于獅子山，遍閱名勝。乃至元謀，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

獅子山在武定城西四公里，高出武定城四百公尺。廟在山頂下六十公尺。廟門口有一個大牌坊：外面題的是「乾坤雙柱」，裏面是「此中有真意」。廟修得很整齊。大殿的扁額是「大雄寶殿」，裏面是供的佛像。大殿後面，比大殿高一層的是後殿。後殿的題額是「帝王衣鉢」。中間有三個像，當中是建文帝，兩邊兩個像不知姓名。左邊一間供着馮灌，史仲彬，葉希賢，程亨，嚴震五個人的牌位，左邊一間供的是沐晟，焦雲，楊應能，程濟，郭節，黃直。大殿前面右邊一株茶花，左邊兩株柏樹都說是建文手植。廟附近的一個泉也說是建文發見的。出了廟門上山，半路上有個破敗的閣子，這叫做「朱君閣」。閣子下面是玉玄關。閣前面石頭上刻着「雲重石門」四個字。再上又有一個小閣，也供着建文的牌位。西南幾省，關於建文的神話很多。可惜徐霞客的遊記對於這一部分殘缺，不知道當日是否已經如此。

從武定到金沙江大路是走石臘他，向東經馬頭山到元謀馬街，再向北到金江驛過江。我因爲要到瓊州，所以于五月十日從石臘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經過楊家

村西的大嶺，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從峯頂向北，已經望見金沙江。江水出海面不過一千一百公尺，比我在的高峯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比從泰山頂上看汶河還要高二百公尺，而江面離我所在的地方不過二十多公里。從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從峯頂北望，只看見一條條的深溝狹谷，兩邊的峭壁，如刀切斧削的一般。加之岩石全是紅綠色的砂岩。與遠望見的紅黃色的江水，兩相映照，真是奇觀！

我從瓊州往鷄冠山到苴密，要經過洋鐵坡的大嶺。高度爲二千八百公尺，而離江面不過五六公里。向北的坡度爲百分之二十四。從洋鐵坡向西下到苴密的平原，不到十公里，高度相差一千五百公尺。平均坡度百分之十五。所以路極其難走。加之越向下走，溫度越高：下到山根，早上十點鐘，寒暑表已經高到攝氏三十二度以上！比瓊州要高十六度。

苴密平原南與馬街元謀相通，北到金江驛，坡度也是很平。從金江起到馬街以南十五公里止，共長三十多公里，寬半公里至十公里。從馬街到金江驛二十公里，高度相差不過一百公尺，坡度不過二百分之一！金沙江深谷邊上忽然有如此的一個平川，是地理上極可注意的一件事。

平川中間的水叫做龍川河，發源于楚雄以南的南安州。水源距馬街一百公里，而高度相差不過七百公尺，平均坡度不過千分之七。從南安向南就到紅河的支流的發源地。這種支流與龍川河之間的分水嶺高度很低。現在的龍川河的水量很小，不能沖出如直隸平川這樣的寬谷。足見得在地質史上直隸平川不是龍川河所獨有的谷。我的意見是從川邊來的鴉礮江，與龍川河，紅河本來是從北向南的一條大江。以後鴉礮江的水被自東向西推進的揚子江搶了去了。于是鴉礮，龍川，紅河就變成功三條不相通的江。

一到了直隸平原，溫度太高了，工作就發生困難。我在平原裏幾天溫度的紀錄如左：

地點	年	月	日	時	間	溫	度
水井田	三	五	十六	下午二時		三五	八度
直隸	三	五	十六	下午九時		三一	〇度
直隸	三	五	十七	上午六時		二六	一度
普墩	三	五	十七	下午三時三十分		三九	〇度
怕地	三	五	十七	下午八時		三三	四度
怕地	三	五	十八	上午六時		二七	〇度
直隸	三	五	十八	下午六時		三二	六度
直隸	三	五	十九	上午六時		二六	四度

海螺	三	五	十九	下午六時		三六	〇度
海螺	三	五	二十	上午六時		二七	五度
金江	三	五	二十	下午六時		三七	五度

看上面的紀錄，下午的溫度比人的體溫還要高。不要說工作，躺在床上都煩悶的難受。只有五點鐘起來，六點出發，勉強做工到十點。一過十點，只好休息。休息也是很不容易。在直隸，是住在學堂，怕地是住在廟裏的。到了海螺和金江都是住在鄉下人家裏。在海螺還好。在金江這一家，院子裏是一大堆糞。太陽一晒，臭不可當。尤其可怕的是蒼蠅。我生平走遍天下，沒有看見那一處的蒼蠅如直隸平原裏那樣的多。我要想看看書，書上，頭上，手上，眼鏡上都是蒼蠅。開上飯來，立刻碗上盤子上聚得烏黑的一堆。沒有法子只好趕快躲到行床上帳子裏去。直等到太陽落了，纔敢鑽了出來。一看放在棹子上的幾本書，幾張畫圖紙，都變成深棕色的；原來蒼蠅給我舖上了密密的一層糞點！等到晚上九點鐘，溫度依然在三十度以上，要想睡覺也很不容易。

氣候雖然如此不良，土地却是異常的肥美，所以人烟很是稠密。馬街直隸都是平原裏的大村落；住戶都在一千以上。元謀的縣治原在馬街的東南。自從杜文秀亂後縣城

殘破了，縣衙門就移到馬街。一般的人就把馬街的名字來替代元謀。我到直甯的那一天，正逢趕街子。六點鐘街上還有一千多人未散。我從直甯到怕地繞道到馬街去見元謀縣長。他極力誇說他這一縣的富庶。怕地在直甯南十公里。西面一公里是以前有名的銅鑛，我去的時候已經衰歇。

直甯平原不但現在農業很繁盛。有史以前大概就是「好地方」。因為民國十六年美國人奈爾生曾在馬街的北面同東面發見了新石器的痕跡。據奈氏給我的信說時代與河南的仰韶時代相當，是新石器時代的最上部。因為他雖然沒有發見得彩色陶器（仰韶時代的特點），所得的石器可以和仰韶石器比較。其中有半月式的石刀，中間有兩個小孔，尤其與仰韶的相同。

天氣如此酷熱，洗澡又發生問題。在雲南省內，因為氣候很溫和大部分人沒有洗澡的習慣。笑話雲南人的說他們一生一世只洗三次澡；生出來一次，結婚一次，死的時候一次。這話雖然是過分，但是民國三年我在昆明就沒有找着浴室。外州縣也從來借不着浴室。熱得受不了只好借他們的脚盆，仿照廣東法子來「冲涼」。只有從直甯向怕地，路上經過魯墩，村子西面有個溫泉。雖毫無設備，而且經過許多有皮膚病的人洗過，水很不乾淨，我遇見着如獲

至寶，不客氣的脫去衣服，痛洗一頓。到了金江那一晚尤其酷熱。太陽一落，我就跑到金沙江邊上脫去衣服浸在江水裏。我的廚子，馬夫，僕役，都極力攔阻，說是要生病的。我不理會他們。不多時一村子的人老少都走到江邊來看稀罕。「江水裏怎麼可以洗澡？不怕受涼罷？」直等到我回寓睡覺了，還聽得房主人在那裏議論：「委員真自在！當着許多人，脫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話。」

金沙江在金江驛這一段江身很窄，水流很急。我用單簡的方法測量的結果：

江寬 二〇〇公尺

江深 二至二，三公尺

水流速度 每秒五公尺

江水流速 每秒二，〇〇〇立方公尺

所以江面雖不寬，水也不很深，而因為速度很高，所以流量也比較的大。我測量的時候是五月二十日。那時候夏雨沒有下，是比較的小水時期。照最近的研究，揚子江下游的水量平均為每秒六萬立方公尺。如此則我所量的數目，纔不過下游平均數的三十分之一。

察哈爾的現狀

(二)

唐尊

財政

察省財政，比之往昔，更加不同。在未設省之先，除印花稅局，烟酒稅局，按縣設置外（烟酒稅局在此先俾官化張家口有），普通徵收機關，只於沿路各站由官設辦。各縣集鎮，皆由民商標包；凡所得價，約有半數入官，半數用之地方。今則一省財政，概由省府財廳總理。稅局之設，下及農村，誅求之苛，徧諸細物。稽查則汲汲防漏稅勝於防盜，商民則惴惴慮過犯勝於營業。是以咸有戒心，尚多倒閉，市面蕭條，非偶然也。至其徵收機關之設置系統，就其性質，約別爲三。茲以便利，分述如下：

甲，各縣政府 縣府所收解省之款：一爲買賣田房契稅，一則田賦丁銀是也。所解數目，有案可核。姑置不論。茲所欲言，乃就其關係於民者也。田房契稅，近以金融停滯，農村破產，賣者雖多，而買者無幾，料其所入，當亦不多。田賦丁銀，每年繳納，向分兩忙。折銀標準，在昔低於時價三分之一，而今則超過時價一倍矣。是則應交五斗之糧者，已成一石；該納五錢之銀者，必費一兩。

名雖原額，實已多徵。以地本瘠磽之察省又遭連年旱災，國府無免稅之令，財廳有催欠之文。此項催欠，百元之中，縣長可抽四十；其餘六十，始行解省。是以利欲薰心者，則糠粃必竭，從此升官發財。而天良不昧者，稍事因循，必予撤職以懲。不幸國難緊逼，財廳藉口下令各縣，謂于四月之前，必將本年度上下兩忙，一齊繳足，庶便軍用。倘有故違，定依軍法從事。如此作去，簡直開始預徵之兆。四川預徵，雖已五六十年，並無大故，而羣魔得從容爭其狗骨者，地勢然也。至如察省各已困敝不堪，呻吟抑鬱，若再預徵，是速國家之不幸也！

乙，各縣地方稅捐局及縣以下各區分卡。縣局分卡所徵得款，直接解交財廳；其應徵項目，名色很多。茲爲便利，分述如下：

1. 烟酒 烟酒稅收昔有專局，今併合一處徵收。烟類所包計有西烟（山陝烟），捲烟，烟葉等目。如就地種烟，則按畝抽捐，平均每畝元餘。收穫之後，躉賣自須報稅，亦如各種烟之批發；零售尚須繳納公賣牌照等費，始得

自行銷售。究其稅率，就按當街設攤，本賣無幾，每月亦需五元。至如坐賈大商，更勿問矣。酒類除公賣牌照與烟類相同外，若為燒鍋，則尚有所謂厘金課程之目。二者分四季交納，每期約須百元，而額外敲索不在其內。

2 鹽，硝，碱 鹽硝與碱，在察省本皆土產，販賣不特報稅，且需運票。稅率將及十分之一，零售公賣牌照，亦如烟酒。

3 牲畜 牲畜稅收約有三項：一曰買賣稅，二曰屠宰稅，三曰執照捐。買賣稅率，按價計算。不分驢馬豬羊，約皆值百抽三。屠宰稅率，定有詳章：計牛一頭，徵洋四元。馬騾駝驢，均收一元。豬為每口陸角。羊則一隻四毛。執照捐項，豬羊除外，騾馬每頭各四角，駝牛三角，驢為二角。

4 米粟 米粟一類內含豆麵麸糠等項。凡有交易，務須報稅，不論零整，概按價值核算，值百抽二·五。其尤可怪者，即某縣某人，家居甲村，乙村有地，租與某丙。迨秋收後，丙自交租，非同買賣，而某卡長必使按照交易納稅。吾則云：交易二字，於此未妥，曷如名為「挪地稅」之為愈也！某卡長默然。

5 木料 木料一項，係指各種木質原料，凡已成器，

不在此內。計其稅率，概按價額值百抽三。

6 油類 係指煤油，香油，檳麻油，麻油，豆油等。

7 麵 係指燒酒所用缸麵，及作醋所用之醋麵等。

8 山乾水貨 此項包含水菓，乾菜，水菜等物。與上二宗皆按價額值百抽二。

9 煤 煤之稅率，概不按照價額抽稅。以該地煤產豐饒，價值不多。則咸以一千一百斤為準，納洋一角一分；按之百分比，約亦值百三四。業運煤者多係極貧之民，稅捐及彼，固不應有，而收稅人員，每多藉此留難，其苦更甚。

10 車捐 車捐一項，內含大車，汽車，轎車，馬車，人力車，腳踏車等。察省貧瘠向無民有汽車，官僚所乘，是又不出捐之車也。馬車張垣僅有，有捐無捐，未可一定。其主要納捐者，則是大車轎車與人力車也。大車轎車，皆按套數（一牲口拉者為一套，餘類推），一套一元五毛。每加一套，增稅陸角，而車牌證價在外焉。其餘人力車與腳踏車，約而計之，亦各元餘。

11 營業稅 中央原定營業稅章，除燒鍋糧行，僅領營業證，不納稅捐外。其餘只少數飯館業，娼妓業，影戲園等，稅率為千分之十以上，而其他一切營業，則皆千分之

二。至其徵收限度概以月入二百元以上者爲合格，不足二百元之小生意，不在被徵之列也。中央此制，意固至善；然今察省，稅率既增於原定四倍，限度復降至八十元以上。營業證雖未增加，而有所謂資本註冊金者，官方則縱其私人，暗中勒索。核之稅章，曷會有此？官方既不追究，而商人頗有吃其苦者。

12 印花 印花在昔，本有專局，今亦歸之稅局辦理。

按其性質，本與郵票相同，任人購買貼用，即有偷漏，罰章具在，意至周備也。而乃計不出此，強令購買；即無所用，每月亦必迫購若干。奉行此事，非祇地方稅局，即其他公安行政機關，亦不時派送。如有不遵，動輒拘押；終必購買，始能了事。蓋銷票若干，內有幾成抽頭也。

此外如泥水（內包石灰，洋灰，磚瓦等）麻繩，糖類，柴草，雞蛋類，各稅，尙未知其稅率，姑不論。

丙，財廳以下清理官產總處及各縣清理官產處 清

理官產，於情於理，在察省本不應有，於邊防亦須顧及。蓋以口外六縣，具爲新闢之區，從事寬大，募墾尙且不易，遽加摧殘，發展更無所冀也。口北十縣，地本不肥，畝額稅收，本已相符；即有羨餘，是乃力田之果，國家應有嘉獎，何可驟奪所有，以爲黑田也。况多荒棄廢地，總值

亦無幾多；若認官產價領，徒增吾民之憤恨耳。矧於前此當局，清理已有數次；若再施以勘查；寧非吹毛求疵？而財廳不此之計，乃派專員各縣清理。彼以官旗營產，下手既無所得，何妨搜索民產，所入定可加多。於是察省窩地（房院地基），謂無糧串（田賦交糧票），即指以爲官地；契紙所載僅有房院，地基應再價領。是則察省民衆，有房皆官，無地不黑；價領則每畝六百，何從領起；租賃則無錢交付，官不我許；直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於是據有祖籍之國民竟在中國領土無立足之地；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羣起抗爭，方始作罷，亦可見該廳長之剝削察民，無所不用其極矣！嗣後雖有明示，決不涉及民產；然以藉口勘查，浮收究屬不少也。今則外患日亟，藉口軍費，官產清理，又急待進行矣！

以上所述，皆係一省收入，月約四五十萬元。其支出項目：除月供華北長官三十萬元外，其餘用途，則非吾人所知。省垣政費，月約二十餘萬，其款來源，另在各稅附捐項下。故附捐之多，幾又等於正稅半額。而此二十萬之政費，用於地方者，僅月二萬元之中等教育費，及年三千元之大學獎金而已！各縣政費，乃就附捐中之一小部分，作爲的款；而小學教育，除賴少許學田租金外，其大部分

，尚須農民直接負擔，於此無與也。

軍政

察省軍政中心在張垣宣化。張垣爲通蒙要道，宣化則塞北重鎮。清時張垣設有統領，宣化則有五營府兵，是皆就地所練，軍心甚固。民元以後，譚慶林威鎮內蒙者，率卽此部也。迨直奉二次戰後，地方軍從此零落，國防軍未能樹起；加之內戰頻仍，動輒牽涉西北，地介兩大（閻張），拉鋸式之戰禍更多。及至打出結果，敗者滾蛋，勝者駐防。紳董欲結其歡心，減其騷擾，是以去者敬送，來者歡迎。而彼則毫無心肝，絕不客氣；去必報以飽搶，來則藉以洩憤。故於每一交替之時，家家住兵，戶有丘八。蹂躪踐踏，一任所爲。即便時局略定，抓車拉馬，需糧索草，不一而足。甚至藉詞勒索，携械搶劫，時有所聞。至如出入無時，逾越圍圍，交易不公，爭吵鬥毆，更無論矣。所以如此，固由於軍紀不良，而佔居民房，過於散渙，門禁難嚴，便於微行，亦大因也。張垣姑且勿論，而宣化木有營房六所；其三爲清時所建，餘三則徐樹錚練兵所築也。屋宇宏敞，約容萬人。至如舊鎮署，道署，大倉，各廟，俱爲公所，並宜住兵。乃於王瑞華鎮宣時，除將徐氏所築三營折毀外，其餘道署倉廟之門窗，俱行燒燬。反謂如此

房屋，不堪居住，飭令修補，地方無力，卒遂其佔居民房之欲焉。自此之後，每軍如是。至有數家民房，七八年未見收回。今又熱河陷落，察省吃緊，以滿目瘡痍之地，爲敗軍退將之所；以血盡皮乾之民，供一方軍需之索；吾不知其究能支持幾時也！

交通

察省境內，平綏所經，以言交通，大致便利。在昔獨立經營，贏餘向西展築；自後抵作押款，原狀幾難維持。試查機車之缺乏，枕木之腐朽，車皮之破碎，固已可見一斑。究其所以，固由於路政本身有所未盡，然而國際商業衰落，內政窳敗，未始不爲大因也。其由於路政本身者，來往客車遵章駛行，運貨無賄則置之不顧。包苴縱入，撥予車柙；及至裝妥，不與運走；蓋以車首（司機）尙未措油也。故每就擱曠月，半年不等。致使商不能因時趨利，貨或至霉爛腐朽，折本虧錢，破家蕩產者，職此故也。包苴行矣，車首肯矣，即小至搖旗掛鈞者，亦必買通；否則，從事阻撓，或行毀貨，在所不惜也。向在南口，眼見香油一車，業已掛妥；而車首以未鑿所欲，故於駛行之始，猛一閃蕩；油桶盡裂，滴注於地。該商面色灰白，計無所施；呆若木雞，悽慘欲哭。又於昌平車站，載有棉花一車，

行至半途，火燄忽發，該商發覺，鳴笛止車，而車首不顧也。迨及火勢將大，始行停駛；然已損失將半矣！似此貪污穢濁，暴殄天物，固屬可恨；而其以國家之車輛作犧牲，乘客生命同兒戲，不知罪應何律耶？其由於國際商業者：中俄決裂，外蒙不通，西北商業，頓形衰落；事雖路政不好，實亦無貨可運。入款不豐，發展無力，意中事也。加之內政窳敗，動輒挪借，軍運隨便，任意阻隔。不特貨車無緣暢行，即客車亦時常悞點。至如沿路稅卡，種種留

我們最多祇有兩條路

董時進

對胡適之先生的答辯

我沒料到我的那篇「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大公報四月三日至四日）竟惹怒了胡適之先生，使他在四十六號的獨立評論上以徐炳昶先生的一個通信作引子，將我痛申斥了一頓——我說「申斥」，因為他是「真很生氣」的申斥，並未據理切實的辯駁。我誠惶誠恐的向他老人家告罪，同時要敬謹的致一個簡短的答辯。

讓我先說說我那篇文章的大意：大家都說中國是無組織非現代的國家，絕不能和日本打，我想這無組織非現代

難，更無論矣。平張之間，本通汽車，在民十三，國民軍所修也。自後失修，任其傾敗，間有一段不能行走，則就近民人爲之代築。究其所用，僅在販運鴉片，於察省於國防無與也。近因熱河陷落，軍事吃緊，方始飭令沿路村民，按段修築。以上所述，火車汽車，東西交通之大略。境內南北，除延慶，龍關，赤城三縣，山多路狹，不便通車，只宜高脚（驢騾駝馱子）外，其餘各地，咸有大車之便。餘如郵務，電報，電話，大致尙足應用。（未完）

的國家，雖有許多短處，也有一些長處，所以我說何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去同她一拼。我沒說我們可以打勝，但是我反對不戰先降。我說即使打敗，也要給日本一點創傷，鯁她一下，並且也給我們的子孫留下悲壯的遺痛，好教他們臥薪嘗膽，以圖規復。我說反正不禦外便要起內戰，何如一致爲國犧牲。我那篇文章大約有四千字，胡先生從中間挑出幾句話，抓住幾個字，把我形容成一個好無良心無常識的人。胡先生是斷章取義，這是我首先要訴冤的。

我不願意聽中國絕對不能和日本打，失地絕對不能收復一類的話，因此我的文中說，國際事情很複雜，變化很多，我們對於戰事，雖可以揣測，然而絕不能算到數學的準確。我引了上海和喜峯口的戰事作例證說：誰想到十九路軍可以支持那樣久，宋部提起大刀，儘能將用飛機大砲的日本兵砍死那麼多？我又說：即使十九路和二十九路軍是做倖勝的，但是既然倖勝了兩次，誰能說絕不可以倖倖三三四次乃至於許多次。這些話我不承認是背乎理智的。當然我並非說單用大刀就可以戰勝日本，說「夢話」也不至於如此，十九路軍和二十九路軍也不是單用大刀作戰。誰也知道武器的重要；我的文中說，中國比日本所差的，祇是武器，（至少最主要的祇是武器）但武器是可以買，可以造的。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榨他們的錢來買，拉他們的夫來造。這幾句話最遭胡先生的指摘，他說他的良心絕不容許他這樣說，他說他讀了很生氣。

他問我所說的「我們」是誰，「他們」又是誰。他說，如果這叫做戰，他情願亡國，也不肯主戰。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胡先生是真實的生氣，所以我不但不恨他，反而覺得他天真爛漫的可愛。要是看見那翻話，（而沒了解真意）還不生氣，那真是沒良心了。不過他誤會了我的意思，大致他

不會將前後文看明白，將全篇的意思認清楚。我可以答復胡先生，我所說的「我們」，指的是國家，「他們」是百姓，不過都是泛指的，也可以當作一些不定代名詞看。胡先生問我是否「我們」的一個，又是否「他們」的一個。我可以答都是，而尤其是「他們」的一個，因為我也是老百姓之一。打起仗來，政府要我們出錢出力，只要有，總得出。

我的那番話，或者可以說是一些傷心話，或憤慨話，但絕非喪心話。看一般軍閥打起內戰來，不是慣會榨錢拉夫，趕百姓上前線去死嗎？爲何外侮來了便以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來推諉？反正教他們不括錢不拉夫是不成的，何不教他們將括的錢拉的夫拿去抗日？有一家小報轉登了我的文章，編輯的按語說那些話是一字一淚，這話雖未免太過，然而那位先生到能看出我的真意。何以胡先生竟不能？

我的文中又一段說：不要以爲後方接濟當真絕無辦法，我們姑不提我們的鐵路和汽車，並且有的是大車駱駝和人。後方運輸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這幾句話——特爲是「單用人挑抬也儘够」的話——又給胡先生從字面上抓住，道，他決不至於說出「那樣的夢話」。他並且從東北月刊的

一篇文章上舉出歐戰各國汽車運輸的統計數字來嚇服人。（有汽車十一萬五千輛！）我趕快聲明，我並非說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是好辦法，乃是不得已的辦法。本來全篇所講的都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為我原是說的「拚」，我們受人欺服過甚，無路可走，祇好一拚老命。我們搜索家屋，還有一些大車駱駝和人，就憑這些東西，也祇好去一拚。我以為這是民族不亡應有的精神，不能說是夢話。再說國內現在還有約五萬輛汽車，其中屬於本國人的想必不下三四萬，既是農民的車馬和身體都可以徵發，富人的自用汽車為何不可以徵發？

我認為中國要救亡惟有靠自己，靠國際局勢來維持終不經久。（在歐洲或者可以）我們對於國聯的帮助可以希望，而不必期待，可以利用，而不可倚賴。我以為拚命一戰，且促使國聯帮助的好法，世界斷沒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會代出死力的。我很佩服蕭伯納，他說我們不應期待他人幫助，應效法愛爾蘭人的精神，那末日本就須對每一居民派一携槍之兵士去監視，這就要够她忙了。中國現時應該提倡的是愛爾蘭精神，不是哀矜忍耐慎重。有這種精

神，國亡了還可以恢復，否則這次不全亡，下回也得亡。但是我並非說，決定國家大計不應該謹慎，不過謹慎要有限度。過於謹慎，畏首畏尾，反致貽誤。前年瀋陽事變，假使駐軍魯莽一點，多放幾槍，這事件或不致弄到現在的糟。假使十九路軍再謹慎一些而不抵抗，恐怕此次日人早已在天津挑釁。我們大胆一點他們到許有幾分顧忌，我們謹慎正合他們的希望。如不省悟，恐怕他們要利用我們的老成來亡我們的國了。

最後歸到本題，我以為我們最多只有兩條路，戰與和，胡先生既不主張戰，又不主張交涉，不知還有第三條路是什麼。我不相信國聯或列強能為我們規復失地，因為東亞情形和歐洲絕不相同。我認為不戰不和的結果不外兩個：一，日人佔了四省，各自經營，不管你承認與否。這樣我們暫時不致再失地方，但難免引起內戰。二，日人更進逼，迫我屈服為止，結果不但要多犧牲生命財產，恐怕還要多失土地。這是愚見，不知胡先生有什麼高見。

四月十九日

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

胡適

對於新疆亂事的一個緊急提議

丁道衡

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

陳序經

察哈爾的現狀(三)

唐尊

答潘菽先生「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汪敬熙

第四十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出版)

獨立評論

每 期 定 價	四 分。預	定 全 年 五	十 期，連	郵 費 一 元	六 角；半	年 九 角。	國 外 全 年	加 郵 費 一	元 六 角。	郵 票 代 洋	九 五 折。
------------------	----------	------------------	----------	------------------	----------	--------------	------------------	------------------	--------------	------------------	--------------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局	東亞圖書局	文叢書局	新月書店	志遠書店	民智書局	神州國光社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上海	東亞書局	新中國書店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西安	大華書局	天一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武州	甘肅書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局	存記報社	濟南	中華書局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開明書店	文化書局	漢口	東方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油頭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甘一學社	廈門	覺民書報社	代定	太原	新華書報社	代定	山東	新華書報社	代定	蕪湖	新華書報社	代定	蘇州	現代書局	文叢書局	徐州	振華書局	會文書局	常州	海豐書局	三友書店	南通	新川書店	永昌公司	上海	吉昇昌書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

胡適

前不多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其中有

我的名字。我因爲實在沒有研究過農村問題，又因爲不久就要出國了，所以決定辭去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委員。可是政府的好意却也使我在這幾天之內想想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委員會快要在南京開會了，我想向各位委員，並且向政府，提出一個門外漢的意見，供他們的考慮。

我的意見是這樣。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在現時的狀態之下，積極救濟決不如消極救濟的功效之大。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我要貢獻給政府的一個原則。

積極的救濟如農民借貸，如合作運動，如改良農產和改良農業技術，這都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但此種積極事業必須假定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有錢，第二要有人才。有多少錢，才可以辦多少事；有了錢而沒有相當訓練的人才，也往往靡費擾民而無功。所以此種積極政策的可能範圍必須受財力與人才的限制；在這種無錢又無人的狀況之

下，積極救濟的可能範圍是很有有限的。

反過來看看，究竟全國農村爲什麼大都陷入了破產的狀態呢？這裏面的因子很複雜；有許多因子是由於世界的變遷，國際的關係，不是我們自己輕易管顧得住的（如西洋婦女剪髮盛行，而我國的髮網業衰落；如中俄商業斷絕，而洋庄茶業破產；如世界經濟蕭條，而我國蠶絲皮貨都大衰落。）但絕大多數的農村所以破產，農民所以困窮，都還是由於國內政治的不良，剝削太苛，搜括太苦，負擔太重。此種政治的原因，都是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除的。解除人民的苦痛，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消極的救濟。

現時內地農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剝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絲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這種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依我的愚見，此時在絕大多數的內地省分，第一急務是努力推行消極的救濟。最容易的是裁減官吏與機關；其次是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如強制徵工築路一類的虐政。其次是努力裁兵。在實行裁兵之前，應該趕緊停止近日各省抽提壯丁編作保衛團的新政。今日的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而無用。已有的兵不能剿匪，不能衛國，不能保護人民，即使再添一倍兩倍的保衛團，只奪取民時民力，只增加人民的苦痛，決不可提倡。

這三件事，「裁官，省事，裁兵」都是今日救濟農村的最先急務。因為這三件事是減輕捐稅的先決條件。現在各省人民的捐稅實在遠超過他們的納稅能力了。四川的租稅已預徵到三十四年後，每兩錢糧券已加到十七八元了。江浙的錢糧每兩也加到十元了。苛捐雜稅之多，已是古今中外的得未曾有。（「古今中外」四個字是我考慮過才用的！）至於烟畝捐之野蠻，逼歛之奇慘，更是人間的地獄變相。（參看本刊第廿八，廿九，三十期「鄉居雜記」及「關中見聞紀要」等篇。）救濟農村必須趕緊努力做到減輕正稅和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而減輕捐稅必須從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

裁官，停止建設，裁兵，減除捐稅，這都是消極無為

的救濟。讀者莫笑這種主張太消極了。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大患正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裏榨出油水來建設一個現代式的大排場。骨髓有限而排場無窮，所以越走越近全國破產的死路了！

此時所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古代哲人提倡無為，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為，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為。所以說：「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以說：「不為物先，不為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物質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為的政治。

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為的政治哲學。歐美國家有富厚的財力，有濟濟跼跼的專門人才，有精密強固的政治組織，所以能用政府的工具來做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我們只是貧兒，豈可以妄想模倣富家的大排場？我們只是嬰孩，豈可以妄想做精壯

力士的事業？我們此時只能努力撫養這嬰孩使他長大，教練這貧兒使他掙節積蓄，養成一點可以有爲的富力。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

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爲政治的摩登說法。警察權只是維持人民的治安，別的積極事業都可以不管；人民只要有了治安，自然會去發展種種積極的事業。斯賓塞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提倡此種消極的政治主張，自然是背時。但這種思想在今日一切落後的中國，我們認爲是十分值得我們的政治家注意考慮的。

試看中國境內的幾處租界發達的歷史，那一處不是先從努力做到警察權下手？租界的政府只是一個工部局，俗名爲巡捕房，他的唯一作用只是維持公共治安。治安維持住了，一切公用事業，一切商業工業，一切建設，自然有人來發展，自然有法子發展。決沒有一個政府不能做到維持治安，而能發展建設事業的！

再看看中國歷史上，統一帝國的成立全靠漢朝四百年立下了一個基礎，而漢朝四百年的基礎又全靠開國六七十年的無爲政治。漢書食貨志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醢（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自然不是可以有爲的時勢。所以魯國的儒生對叔孫通說：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

所以當時哲人陸賈也主張無爲的政治。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爲的政治。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爲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二〇二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二〇二—一九三），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一九三），……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爲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爲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

，孟康說，年長大者。）誦於文辭，謹厚長者，即

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

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爲，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爲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裏明明說出他的無爲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爲，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曹參的尊重蓋公，實行黃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識的試行無爲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爲政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

勸農商，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一七九——一三五）。史記（四九）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從曹參到竇太后死時，五六十年中，無爲的政治已發生了絕大的效果，做到了全國的太平與繁榮。司馬遷在呂后本紀後面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宴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

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齟齬，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爲，有這樣大成效：

對於新疆亂事的一個緊急提議

丁道衡

至今上（武帝）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二〇二——一三〇）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萬萬爲百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攢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吏不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耻辱焉。（史記三十）

有了這六七年的無爲政治做底子，所以漢武帝可以有幾十年的大有爲。這一段漢初的無爲政治的故事也許可以供我們今日的政治家開會議做紀念週完時的一點有趣味的讀物罷？

（附記）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這也是我所謂無爲政策之一種。

新疆的亂事醞釀已久了，今天才爆發出來，實是意中

事。據各方所傳消息，纏民同甘肅一部分回人因爲新省當

局金樹仁的壓迫虐殺的結果，舉戈反抗，亂事越來越大。據最近的消息，北路由哈密以至迪化，南路由阿克蘇以至喀什附近，都有纏回騷擾的舉動，據地殺官，攻城略寨，充分表現反抗的精神，就此看來，新疆已有二分之一的地方是在混亂中。

最近亂事的起因是爲哈密回王沙親王的去世，回民想藉此機會脫離回王的統治，減輕自身的担負，呈請「改土歸流」。不想省政府派去的委員大人們竟認爲是升官發財的美差，盡量的榨取纏民的脂膏，并要沒收他們的田地，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縲頭同胞覺得們「求榮反辱」的苦瓜，於是民變，反戈，圍剿，沒收，升官，發財，領餉，送枝（纏民的軍火皆係奪取官兵的槍枝），以至於不可收拾，都一幕一幕的演過去。

當纏民呈請「改土歸流」，省政府若果不允許，不致弄出亂事；允許了，派去的委員不是個愛財不愛命的人，也不致弄出亂事；民變了，省政府若果善於安撫，也不致弄出亂事；省政府無辦法了，中央若果早派員查辦，民怨不深，也不致弄出亂事；但是所有可以挽回的機會都放棄了，坐待星星之火變成燎原，新疆的亂事，怎得不擴大！

及今警報傳來，似應採取斷然決然的處置，免去紆徐

觀望的政策；然而政府前有金樹仁馬騏就近處理的命令，近又有派大員數人前往宣慰的擬議，雖積極的關心西陲，而舉棋不定的情形，已顯露無餘了。一着之差，影響全局，在政府自應熟思遠慮，籌劃萬全，但今事態業已急轉直下，爲中國計，爲西陲計，不得不採取敏捷有效辦法，萬萬不可以此次新疆事變，視同四川二劉貴州猶王的爭鬥，徐徐云爾。今就所知，擬提議如下，願與政府及國人商榷：

（一）此次亂事，無論背景如何，纏民既已申稱反動目標僅在金樹仁一人，就以往事實觀之，此次事件的擴大，金氏實負全責，罪無可逃，中央應明令停職查辦，以息民怨。金氏停職後就省委中擇一負有時望的委員暫代主席職務，從事撫綏。

（二）通令各行政區行政長官撫各放人民，善良的給以獎勵，強悍的加以勸導，凡參與騷動的概不追究；并予各長官召集民團，購置軍火，制止反動之權。現爲纏回佔據的地方，若纏回申明願受中央招撫的，不得進剿，靜候中央派員處理。

（三）中央用纏蒙漢等文字發表安撫宣言，告誡纏回不得輕聽人言盲從妄動，凡有不平的均由中央處理，中央

對於纏回一視同仁，合理的要求無不容納，背叛的行爲決不寬恕。

(四)此次戰爭，據傳馬仲英部長部下亦曾參加，馬氏爲中央所委師長，不得中央命令何能派人參加，雖因同教關係，激於義憤，實屬不合。今金氏既去，民患已除，應由政府明令退回原防，以免事態愈形糾紛。

(五)中央速派大員隨帶少數衛隊，急赴新疆改組政

軍等事，宣撫人民、綏和各族，並令陝甘寧軍事長官，於必要時，得派軍隊護送前往。

以上五項，著者認爲處理新疆亂事敏捷有力的辦法，若能辦到這五件事，著者相信不過半年新疆仍要恢復以前熙熙攘攘的情形，此次亂事未始不可說是改革新疆開發西北的前鋒了。至於宣撫善後等等問題，亦稍有所見，且待下次再談。

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

陳序經

近來有些人，而特別是前年（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成立的亞洲文化協會的人們，把東西文化之差異來分做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

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的意義，在亞洲文化協會於民國二十年所出版的半年報告書裡所載亞洲文化協會第一次大會的主席的開會詞裡，及亞洲文化協會的使命一文裡，說得很詳細。我現在且把主席開會詞裡幾段話錄之於后：

他們（西洋人）自己誇耀自己的文化，實際上他們的文化的本質，只是物質的侵略。他們的文化，簡

直是物的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在現在的世界裡，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這是多麼可痛而又可惜的事。

歐羅巴的文化是世界上大多數民衆呻吟痛苦的文化，是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是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亞細亞的文化，是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是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的文化，是人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

原來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沒有物的文化。因

爲惟有人，纔能有文化。人固然依賴於物以創造文化，但是物的本身上，決沒有變成文化的可能性。一塊很美麗而可以有用的雲石，藏於大山之中，沒有經過人工的磨礪，而成了一件東西，像一間大廈的柱，或是別的用途，決不能叫做文化。一株生在森林裡的菓樹，沒有用過人工來培養，決不能叫做文化。連了能飛，能走，能叫喊，能動作的禽獸，也創造不出文化來。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簡直就是不通。

但是要是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那麼中國人的文化，固是人的文化，難道歐洲人的文化，就不是人的文化嗎？中國人從來就有夏夷之分，以爲華夏纔有文化，蠻夷是沒有文化的。沒有文化的人，是近於禽獸。二千年前的孟子，既已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來像劉鑑泉先生，也說西人乃習染於野獸。所以亞洲文化協會諸君，也許有了這種見解，以爲亞洲乃人文之邦，而西洋乃獸物之邦。然而孟夫子的時代，既想不到有西洋，他簡直是把「禽獸」兩字，來加上名滿宇內，學流天下的楊子墨子的身上。這樣說來，我們兩千年前之祖宗，大半就是禽獸，那麼我們二千年來所傳下的文化，也是物的文化了。至於劉先生以爲西洋文化是動物文化，而東方文化是植物文

化，不但是說東西文化都是物的文化，而且在進化的程序上看去，動物的文化，就比了植物的文化高了一級。儒家的健將荀子，豈不是說過嗎？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我已說過，物本身沒有能變出文化，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就不能成立。就使「動物文化」，「植物文化」，這些名詞，而有成立的可能，那麼像荀子所說的有生又有知的動物的文化，豈不是勝過有生無知的植物的文化嗎？那麼西洋的文化，又豈不是勝過東洋的文化嗎？

上面的話似近於戲謔。但是從字面上看去，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已是一種戲謔。自然的，我們承認人物文化的意義，還有別的重要意義，不過把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來區別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是容易使人因詞害意，望文生義的錯誤。所以這裡所說的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至少在字面上是不妥當的。

若說物的文化，不外是物質的文化，那麼我們就要問，物質的文化，是不是人的文化呢？飲食是充饑渴，衣服是蔽寒冷，宮室是禦風雨，以及一切的物質的用具，都

是物質文化。這些文化無一不是由人創造。由人創造，就是人的文化了。何況人類一旦離了這些物質文化，像食物，像衣服等等，不是餓死，就要冷死。人之於物質既不能須臾離開，物的文化，正是人的恩物。有之則生，無之則滅。今把物的文化，來做人的對方仇敵，豈非愚昧之至。

其實人的本身，就是物質。沒有了組成人的物質，那裡還能有人，竟說什麼人的文化？若說所謂人的文化，就是人道；而人道之對方，就是物質，人道是包括了一切的道德的美性，如仁義，禮樂等，但是專說人道，而不講物質，物質固不會進步，人道也是講不來。管子豈不是說過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管子固然是偏於物的方面，而不大得孔夫子的贊同，然試問孟夫子之所謂制民必自經界始，以及他的重農主張，豈不是把人道和物質來混爲一談呢？

可是他們又說：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人的文化是干道的文化。這麼一來，簡直是愈弄愈糟了！近年以來，國人因外患日亟，於是異口同聲的以爲西洋文化，不外是霸道文化，而東方文化乃王道文化。殊不知所謂王道，霸道，無非乃政治上的一種策略，而所謂政治，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方面之一方面。今把王道霸道來表示全部的文化，

其籠統淺薄之見，孰甚於此？何況東方文化裏，既不只是王道而沒有霸道，而西方文化裏，也不只是霸道而沒有王道。

何以見得中國不只是有王道呢？原來所謂霸道，大概是指着征伐，而征伐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並非希奇的事。自我們的開國元勳，直到現代，試問霸道政策之實行，指何可勝屈。呂氏春秋曾說：

兵之所自來者久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

又說、

黃帝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五帝固是如此，三王又何獨不然？夏禹綏服，湯武用兵，以直到春秋之五霸，以開口就說王道的孔子，也免不了要嘆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降及戰國，七雄相爭，那是更鬧得不得了。秦皇統一天下，人人知道不是王道。漢高，光武，一般的開國人主，中興君王，所

用之道，難道不是霸道嗎？三國之世，六朝之時，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那一代不是用了霸道？那幾個君主是不用過殘酷的干戈？在明朝的末葉，在清時的太平天國的時代，我們的皇朝人物，還要借西方的機械槍礮和霸道所養成的臣民，來征伐所謂皇朝之叛亂，而衛扶王道於危傾。這樣看起來，中國不但只有霸道，中國之王道，還借霸道以維持。所謂「逆取順守」，「攘夷尊王」，豈不是顯白的證明上面所說之不誣嗎？

反過來看，一部歐洲歷史，雖有了不少的你征我伐的事情，然而雅典人的正義主張，斯多亞的世界觀念，羅馬法家的自然平等的法律，基督教的博愛信條，以至近代的哲學家，像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以及近來的民族自決，救兵運動，種種的主張和動作，難道就是霸道的主張和運動嗎？

我們的見解是，要是亞細亞人強盛起來了，那麼亞細亞人的霸道的施行，恐怕還要甚過西洋人。亞細亞文化協會諸君，未嘗不見及這點，所以協會開會時，除了弱小民族像中國，高麗，印度等外，日本不但不邀之入，而且反被謾罵，見於言詞。年餘以來，日人的霸道氣餒，有加無已，始而佔領東三省，繼而擾亂黃歌浦濱，再而侵犯熱河

，今且進而窺伺平津。試問諸君所謂亞細亞文化乃王道文化之說，豈非矛盾錯誤之甚？藉曰，雖然從前到現在受過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影響很深的日本，今日乃步到西洋之後塵，不能稱為亞細亞固有的文化，那麼諸君之所謂亞細亞文化者，固非亞細亞之文化，乃是中國印度之弱者的文化。就把日本算做例外，試問三保太監之征服南洋諸國，元代軍馬之犯歐西，又豈不是霸道嗎？元帝之西征，歐洲教皇之勢力，尙未崩墜，我們一讀當時教皇所遣來中國之使者的遊記，只覺得歐洲人心目中之中國的文化，太都不外是霸道文化，而反乎歐洲之王道文化。在東西溝通艱難的十三世紀的歐洲人，尙能見到這一點真詮，乃在中外交通後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智識界，尙不及十三世紀歐人之觀察，豈不令我們自覺羞愧嗎？

從物質文化的霸道和人的文化的王道，他們又分出歐洲文化為物質侵略文化，亞洲文化為解放文化，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受外人的侵略的痛苦，凡是中國人都這樣感覺，固很自然的，然而要免除這種痛苦，絕非盲目的自尊自大和感情的空言的抵抗侵略，所能濟事。歐人日人固自恃其物質優越的能力來侵略中國，然而中國之有槍階級之侵略民衆，何嘗不是物質的侵略？事實上，歐人之侵略中國

，並不只是物質的侵略，還有其他的侵略。於此可知歐洲人的文化，並不只是物的文化。

歐洲人之對外，兩百餘年來，雖有了不少的侵略的形跡。然而歐洲各國之對內，却有不少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宗教上的解放，而特別從政治上的解放，無一不是歐洲近代文化史上的特點。至於中國，所謂對外既不見得有所解放，而對內呢，却無時無處不在壓迫之中。中國人之於歐洲民族，在歷史上固以蠻夷相視，其對於亞洲之各種民族，也並不見得是當作平等民族看。春秋和傳統的「內夏外夷」，既不是解放思想，「德以治中國，刑以威四夷」的信條，更不是對外解放，而乃對外壓迫的表示。若說近百年來之放異龍江以北之土地，東南海之大小島嶼，以及高麗之放棄，安南之割讓，和最近來東三省之喪失，乃是解放之明徵，那就是未免過於滑稽，而且背乎協會諸君的本旨。

再從對內方面來說，恐怕有史以至今日的中國，都不見得做過甚麼驚人的解放。書經周書裏多士一篇所載的事實，就可知所謂以王道治天下的聖人的周公，沒有法子去用王道來感化一般臣民，而唯一的辦法，也不外是壓迫他們遷到洛邑。孔子之尊君屈民，商君之愚民，秦始皇之徙

天下之有智識有財富的人們於咸陽，也不外是行周公的故策。這些的政策，難道就是解放政策嗎？此後一朝一代，幾經滄桑，然思想上的束縛，禮教的固執，專制政治之形成及發達，無一非違背解放之真諦。我們所謂亞洲文化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究竟是指着那一件事呢？

他們所謂物與人的文化的觀念，既是錯誤，他們對於文化的發展史上的觀察，也是錯誤。他們說：現在的世界，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難道過去的世界是沒有他們所說的物的文化嗎？他們又說：歐羅巴的文化，是最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這也是錯解了。歐洲的現代文化史，歐洲的物質文化的發展的速度，雖是最近百餘年來的事，然而近代歐洲文化之興起，却是好幾百年的事。此外又如他們說亞細亞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我們也有了這種感想，不過過去的歷史和光榮，是亞洲過去的人所做的歷史，所得的光榮，你們生在千數百年後的，不自努力振作去顯出你們的能力和光榮，不但是太過自暴自棄，弄到樣樣都不如人，試問還有甚麼面目來對着你們的祖宗？說起祖宗的光榮，豈不是愈顯得自己的醜拙呢？

我們老實的感覺到這一派的人們，對於文化這兩個字

的認識上，太過糊塗。他們憑着一種感情的作用，去號召所謂亞洲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希望能夠反抗歐洲文化之壓迫，這種熱忱是很可嘉的。無奈他們錯誤了文化的根本觀念，以及發展的途徑，和目前的趨勢，於是想喚起所謂東方之優美特質，來抵抗西方的文化的趨入。殊不知東方之所以衰敗到這個田地，就是因為東方人不忍放棄他們所謂祖宗數千年來傳下那些特性特質。現在再來重張旗鼓，把這些三百年來屢試無效而反受害的法寶，去和歐洲的文化挑戰，豈不是不死不休呢？

他們只知道日本是可惡的。然而他們却忘記了六十年前的日本，同樣的受過西洋文化的征服。他們又忘記了今天的日本，不但四百兆衆的中國，沒奈何他，就是目前情況的西洋各國之於日本，也是沒奈何他。然而這是甚麼緣故呢？大約稍能留意過這問題的人，決不會不明白的。

察哈爾的現狀

建設與實業

察省屬縣既少，經濟見絀，現狀尙難維持，發展如何爲力；以言建設寧非空語。縱以必需，偶有一二工事，可

平心來說，這一派的人們之反對西洋文化，和歌頌亞洲的固有文化，他們好像是偏於復古的路上。然而他們看得歐洲的文化只是物的文化，霸道文化，而東方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王道文化；他一方面想把這些東方的優點，去救濟調和西方的物狂，一方面並沒有反對西洋人的吾物而東，所以骨子裏，還是走在折衷的路上。

而且把東西文化分爲王霸文化的論調，不只是亞洲文化協會諸君的獨有的論調，國人自從甲午戰後，無時不希望能夠利用西方之機械，槍礮，武備，兵法來衛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王道，所以王霸互用之說，也是一種有了相當的歷史，和一般普通人所主張的學說。但是根本上這種學說既不能免於錯誤，則這種論調和學說的實施，終不外是一種夢想罷。

(三)

唐尊

由該管機關辦理；籌謀計畫，直接交由包商，嚴加督責，亦至便也。何事另設一廳，長川領薪，無所事事，以重吾民之困？省垣各公家機關，不過數間平房，幾條土路；即

有新築舊修，各該機關，不乏總務雜務，稍具常識，已優爲之，何勞煩此建廳大員耶？即使煩之，彼固不肯，且亦不屑也。遑論農田水利，根本未嘗慮及。修路濬河，每事尙賴商民也。省垣如此，縣城亦然。時人謂打倒非空談所可能，我則云：建設更非空設機關所能實現也。

政治上軌道，實業無從發展，農事方興，催糧正急，索車要馬，時有所聞。水利未興，旱災固所難免；即年逢大有，亦殺賤傷農。小米一斗（小斗），貴時可值一元五六，衰則不過二毛有餘。變化如此，安得不困。商販則既苦稅捐，路局又多所留難，國家根本無調濟誠心。歲歉則任其餓死，豐收則亦聽其腐朽。此關於農事者一也。察北地帶，不屬牧民，牛馬與羊向爲大宗。有司時加剝削，土匪每搶罄群。即令安全保有，入口（張家口）則苦於稅大，殺而供食，皮毛亦無所容。牛羊乳酪，更無論矣。此關於牧畜者二也。農牧破產，購買無力，俄蒙不通，交易斷絕。坐賈苦於稅局而倒閉，行販又困於路卡而絕跡。有無不能互易，金融因而停滯。此關於商業者三也。宣化東南，煤產極富，路政窳敗，既不能暢爲運銷，稅捐過重，亦防害營業進步。城北鐵鑛，蔓延連至龍關，鐵質成數；百分含七五。段氏一度開採，此後無人問津。貨棄於地，

自爲可惜，影響工業，亦爲至鉅。此關於鑛業者四也。察省原料現有者爲五穀皮毛，將來者爲煤礦鐵產；工業振興，端即賴此。而鐵鑛之開，渺無音信，五穀皮毛，重爲民困；經營有心，力每不足，坐棄大利，徒喚奈何。此又關於工業者五也。察省實業，原無幾多，即此數種，已受羈勒；而欲民不破產，市不蕭條，不可得也。

教育

察省文化本不甚盛，蓋有歷史遠因；其在明世，乜先瓦刺等部，不時內侵；民人則忙於防守，國家亦重在戰備。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是以有明一代，無可足云。迨及清世，蒙人內附，地方安謐，朝廷開科取士，父兄亦教子應考。舉業之外，直不知學問爲何物。卒之每縣所成，舉人三五，秀才十餘，黠綴昇平，奉承孔祀。進士及第，則幾若鳳毛，學問經濟，僅魏果敏（象樞）一人而已！光緒末年，立憲議起，宣化府學，人才濟濟，稍長者送入優級師範，年少者派往日本學習。時才匝年，戊戌變起，優級則僅獲卒業，留日者薄言旋歸。究以風氣已開，非力可抑，從政者大有人在，辦學者亦自此發跡。宣化中學（今改稱察哈爾省立第二中學），即此中人所手創也。過此以往，皆爲現代教育所鎔成，人數較前爲增，志趣自

亦多途，計所從事，教育爲多；而以政治窳敗，未得各盡所能，功罪未便判別，願視將來之努力爲何如耳！凡此所述，僅就口北立論，口外六縣，猶未足以語此也。文化之低，亦可想見。上略綜昔日學風之衍變，下分叙現在教育之本身。

甲，兩級小學

口北各縣，高小數目，多者七八，其次五六，最少三四；而女校每縣約僅一所。口外六縣，至多一二，或則竟無。其於初級，大縣四五百，次約一二百，再次則百餘；而口外六縣，爲數寥寥，甚至有村學究設教其地者。察省小學經費之來源，除少數學田租金外，如有不足，鄉村則概由農民攤派，城區則稅項附加補足。如此何異苛捐雜稅？而財廳猶趁火打劫，竟認學田爲禁樹，責成官產，必欲勒索變賣，以遂其發財大慾。若非我教界團結反對，幾爲彼輩侵蝕矣！

乙，中等學校

察省中等學校，現有兩種：一爲縣立，一爲省立。縣立者，有縣款或募款之分，省立則全爲教廳直轄。蔚縣懷來二縣有縣立初中，其餘各縣，皆爲鄉村師範；而口外六縣，甚或並此亦無。縣立初中，以方在創始，姑置不論。

茲僅就鄉村師範，申述一二；鄉村師範，在昔稱爲單級師範，例皆結束一班，始能再招。每次人數，肄業年限，概視初級小學需要師資之緩急以爲定。所需急，則額多期短；否則數少而年長。蓋以款額有限，正如原水作原湯也。然則此項學校，就其性質，實一初小師資之速成班也。此在昔日，固所應有；但就現在，似非必需。每思初小教育，不能突進，其病根或即在此。雖有二三勤苦自勵之士，慘淡經營，卒於初級小學無補者，未始非以不得已之捷徑，而誤認爲長此不變之正途所致也。欲謀改善，舍招考新生，提高程度，教職學識，務使充實外，其道莫由。省立中等學校，除農專與塞北中學，具有特性外，其餘則一如他省。計有男師二，男中二，男職二，女師二，總共八校；張垣宣化，每類各一。學員數目，以中學爲最，平均約計，每校三百。其次男師，校約二百。次則男職，校亦百餘。最少者則爲女師，每校僅約數十人耳！

丙，就學外省之中學專門大學生

中等學生，就學外省，在昔可謂絕無，近今增至百十餘人。大部肄業於北平，在天津者僅爲少數。此等學生，出外就學，有特別情形者，間有一二；而多數則爲本省取額太少所致。專門學生計僅漢陽兵工廠二人，中央軍校七

八人，東北商船學校二人，天津高工三四人，北平藝專五人，與警官三四人耳。大學學生，以私立學校爲最多，民大二十餘人，中大十餘人，朝大約二十人，燕大三四人，都計所習，半爲社會科學也。至於國立者，北洋約十餘人，北平工院三人，交大三，法學院五六人，女大三四人，農醫二院各一人，北大十五人，師大約二十人，清華僅一人。按上所述，察省專門與大學學生，總計不過百五六十人。口北十縣，約占百分之八九，而口外六縣，則僅一分也。此輩學生，多係農家子弟，故尙勤儉樸實，雖有虛浮，實不多見。此殆察省將來之希望乎？

丁，教育廳

設省既成，教廳亦立，郭氏貴賤任是職，時僅年餘，計畫從未着手，爲功爲罪未可遽評。迨後高氏繼長，復兼省委，權力之大，數倍郭氏；倘欲爲善，所志何患不行？詎意彼輩，本其整個政策，蹂躪剝削，即此清白教育，亦不問能否勝任，一味引用私人，教職屢換，校長迭更。甚至校長一席，行賄者至三十六人；是固彼輩之無恥，亦可見高氏之污濁也。張垣女師，人數甚少，於此幼稚之女子教育，一般人尙應維護，使其成長；況司教育之柄，握政治之權者乎？而乃縱公務人員誘脅，從之者任其蹂躪，不

遂者或削學籍。察人知之而不敢一言者，一則以名譽攸關，被害人自須維護；一則爲事屬親告，局外人不能爲力也。又高氏對於留學規定，僅限於農教兩科；而留東洋者年金六百，去西歐者不足千元。除去路費，尙餘幾何？况併此數亦不照發乎？是以留日者已歸，去歐者恐亦將返矣！

餘錄

察省政治，壞至如此，國防危急，又復如彼，欲謀善後，應即痛加改革，安內攘外，端賴中央擘畫。縱不念及察民，亦當顧全國家也。在昔張氏攬權，中央無力過問，今中央有轄治河北之機，應圖國防之計；察省惡吏，急待撤職；苛捐雜稅，務必盡去。事雖開罪於少數官僚，實有大造於察省民衆。察省設施，權應操之中央，地方政治，尤宜極力扶植，務使上下聯繫，情無隔閡。凡此二點，應於馬上見諸事實，方能談到抵抗，否則，時不我與，恐將再誤也。察省政務甚簡，機關不必多設，祇要負擔減輕，澄清吏治，努力教育，則地方力量自能充實，內蒙藉此鞏固，外蒙方能發展；此雖事關地方，實亦有裨國家。察省地處塞北，原爲國防要衝，政府應有整個計畫，側重軍政。塞北健兒，平時加以訓練；口外牧畜，務求改良馬種；煤鐵儘先開採，工廠即應設置；庶可形成軍事區域，而作

國防之準備。則北徼萬里，雖不能固若金湯，亦不至再蹈覆轍。若仍因循敷衍，視察省爲耐勞之品，對人民如

虜掠之敵；即日俄不侵，久必自敗，熱河陷落，其殷鑒也。

(完)

答潘菽先生「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汪敬熙

本刊四十六號上潘菽先生有一篇文章「關於心理學的預言」批評我在四十號上所發表的「中國心理學的將來」。潘先生對於我的話大體上是贊成的，但是以爲我的話是欠「公允正確」。我對於潘先生的批評有幾句回答。

我在四十號上曾說中國心理學者現在走了「教育測驗」及「迷津學習」兩條不通之路。潘先生不以爲然。我先再談談「迷津學習」這條路。迷津學習是個極複雜的現象。現在我們幾乎沒有方法去分析他。所以在現在想從這個現象去研究學習的心理和生理是極少希望的。迷津學習所給的學習曲線是可以使我們比較在各種不同的訓練方法之下，學習的快慢如何。但是這一部分的工作已經有許多人做過了，糖水也榨盡了。至於 *Lashley* 近十五六年來研究割去白鼠的大腦皮各部分對於他們的迷津學習的影響，這些研究正足以證明迷津的方法是不能用來研究學習作用的神經生理的。他那些『*Mass Reaction*』『*Figuripotentiality*』

的學說，是不是已經自己漸漸收回去了（參看他最近在今年一月的 *Physiological Reviews* 發表的文章）？現在國內走這條路所得的結果又有什麼呢？這條路是通的嗎？

至於教育測驗，潘先生是懷疑智力測驗的，但是以爲我一筆抹殺教育心理學的測驗爲不對。潘先生並且以爲這些測驗只是技術的方法上的問題。這種技術和方法上，即使有進步，也和心理學本身無大關係。我的意思不以爲然。潘先生是學實驗心理學的，當然是深知在實驗的學問，技術和方法的進步，與事實的發現和假設的創造有同一的重要。測驗的技術如有進步當然也是心理學本身的進步。可惜教育心理學的測驗實少技術的進步。並且可惜潘先生沒有舉出幾種確有進步的教育測驗來討論。國內近年費錢費力做的那些國文英文測驗又有什麼結果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轉個方向走呢？

論到有希望的路，潘先生是完全承認我的話。不過他

說我語氣之間似乎說此外沒有可走之路。這裏我要請潘先生「公允」一點！至於潘先生是否「公允」，最好請讀者去判定。

預言和懸記只是仙人和佛祖可以做的。在科學上要做

神仙佛祖是不可能而且危險的。我前一篇文章的意思只是

看心理學界現在的狀態，不免對於最近的將來生些憂慮罷

了。潘先生稱之為預言，是我所不承認的。並且我也以為這種空談辯論道路是無補實際的。我希望心理學界中的人各個人努力自己的工作，五年十年後再看看自己的工作如何，自己走的路是否得當！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社會調查所出版

吳半農 王子建 合編
韓德章 劉心銓
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
定價大洋一元

吳半農著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之一
鐵煤及石油
定價大洋四角

全套計圖七十六幅，分（一）人口及土地（二）富源及出產（三）工業（四）交通（五）對外貿易（六）財政及金融（七）外人投資，七組。材料翔實方法新穎，為學習地理研究統計及留心中國經濟問題者之極好參考資料。

本書企圖解答三個問題：（一）中國富藏是否足供將來工業遠大發展之用；（二）在目前中國工業初期化的過程中，鑛業方面是帝國主義占着優勢，還是民族資本主義占着優勢呢？（三）這三種礦物的生產與消費，在中國方面，能否指示工業化底程度？如說能够，中國從這一方面表示出來的工業現在到了怎樣一個程度？

發行所 北平文津街三號

獨立評論 第一期至第十五期 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 甲種（布裝） 二元 郵費一角
- 乙種（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 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制憲不如守法

胡適

「憲」與「憲法」

胡道維

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

丁文治譯

清華大學與國恥

衡哲

作何感想（通信）

麻逸敏

馬克斯主義果眞在德國「詐死」麼？

江紹原投稿

第五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獨立評論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一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公司 東亞書局 佩文齋 新月書店 景山書社 文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

天津 立遠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康登教育社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書局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上海 現代書局（德代售代定） 亞東圖書公司 神州國光社 大生書局 華聯書局

南京 書局 神州國光社 德書店（代定） 正中央書局 大中山書局 天一書局 甘肅書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西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中華書局（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廣東 廣州友誼書店 文化書局 廣東 廣州友誼書店 文化書局

漢口 東方書店 現代書局 重慶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雲南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廣東書局 新華書局 汕頭 廣東書局 新華書局 汕頭 廣東書局 新華書局

廈門 廈門書局 新華書局 廈門 廈門書局 新華書局 廈門 廈門書局 新華書局

成都 成都書局 新華書局 成都 成都書局 新華書局 成都 成都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制憲不如守法

胡適

立法院的憲法草案委員會上月通過了「縮短憲法草案起草工作程序」案，其程序如下：

- (一) 研究時期 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 (二) 初稿時期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 (三) 本會討論時期 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
- (四) 公開評論時期 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
- (五) 再稿時期 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 (六) 大會討論時期 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

這回的憲法草案起草工作需時半年之久，並且公開的徵求全國國民的研究與批評，這樣的慎重從事，比前年的約法起草與通過時的潦草，自然大不相同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輿論，總不免感覺得全國人對於這回的制憲事業還是很冷淡的，很不注意的。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現在憲法草案的「原則」十二項已陸續通過發表了。起草的程序已到了「初稿」的時期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的輿論對於這件事還是很冷淡的，還是很不關心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猜想，全國對於這回制憲工作的冷淡，其原因有偶然的，也有根本的。偶然的原因是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大家的注意都在中日的問題，所以制憲事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反成了一種不緊急的點綴了。

除了偶然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這就是人民對於憲法的效能的根本懷疑。我們讀了報上用五號或六號小字登載的憲法草案委員會的新聞，或讀了他們徵求意見的廣告，總不免微微苦笑，自己問道：「有了新憲法，能執行嗎？這還不是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來的許多種憲法同樣的添一大堆廢紙嗎？現今不是已有了一部「訓政時期約法」嗎？有了和沒有，有什麼不同呢？那一部八十九條的約法，究竟行了幾條沒有呢？」

這種對於憲法的根本不信任，是今日大家不注意這回的制憲事業的根本原因。而這種根本不信任，完全是政府自身造成的。我們試分析人民爲什麼這樣不信任國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幾種有益的教訓：

第一，官吏軍人黨部自身不願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

任法律。凡官吏軍人黨部感覺於他們不方便的法律，他們都不願遵守。例如訓政約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中央應以法律限制各種有弊害之課稅，然而在中央權力直轄省分的鴉片

特稅，如皖北的烟畝捐，如江蘇的鴉片公賣，中央可曾有制裁的決心嗎？又如訓政約法的原草案第四十二條本規定「人民除依戒嚴法所規定外，不受軍法審判」，這條文本來很妥善；但後來改成了「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約法第九條），這一改把「除戒嚴法所規定外」改成了「非依法律」，就把種種絕不應該存在的單行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都保留下來了！軍人官吏黨部覺得這種單行法於他們最方便，所以他們不惜犧牲根本法來保留那些於他們有利的單行法。又如約法草案第二十九條本規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現行犯外，限於法院」；但後來的約法刪去了此條，也只爲黨部官吏軍人都感覺這種規定於他們的權威大有妨礙。又如約法第八條明明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草案原作「提交法院審問」）。約法頒布至今，恰恰滿兩年了，試問這一條約法有一次實行過嗎？——官吏軍人黨部自己不願守法，故不但不許那些於他們不便的

條文列入國家的根本法，並且肆無忌憚的違背裏根本法內已有明文的规定！這樣有法等於無法，何怪人民不信任憲法呢？

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沒有打算實行，所以立了許多紙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對法律的信仰。訓政約法中的「國民生計」「國民教育」兩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如第五十條「已達學齡之兒童，應一律受義務教育」；第五十一條「未受義務教育之人民，應一律受成年補習教育。」此種條文，豈不好看好聽？然而政府立法時何嘗打算實行呢？立法至今又何嘗準備實行呢？法律的靈魂在於執行；故商鞅變法之先有移木之令，使人民相信他的法令是要執行的。凡多立不行的法律，必使人民輕視法律本身的效能。約法八十九條之中，不準備實行的空文居其半數，何怪人民對國家根本法沒有信任心呢？

第三，憲法中列舉的條文總是空泛的原則，若沒有附加的詳細施行手續，就都成了無效力的具文，這也是中國的根本法不能得人民信仰的一個根本理由。試舉約法六十二條的課稅限制爲例：空泛的說「妨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課稅應由中央裁制，有何用處？要使這一條生效力，必須有明白禁止鴉片烟的畝捐，吸捐，營業捐等等的詳細手續

法。此外如同一條所載的「複稅」「妨害中央收入來源」

等項，也都必須有詳細執行制裁的手續。宋子文財長近年在中央直轄各省推行捲烟等稅，其所以有實效者，全靠中央一面能擔保各省的收入，一面又嚴格的擔保商家如有被地方政府複征之稅概由中央償還。若無此種詳細執行的手續，雖有憲法的條文也決不會得人民的信任。課稅如此，其他如教育，如人民權利，都是如此。憲法上儘管規定「中央及地方應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但政府若無教育經費的具體辦法，若無切實保障種種教育基金的具體手續，那麼，本來獨立的教育經費，如清華大學基金，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尙且可以隨時受侵害，何況那本來不固定的國家與地方教育經費呢？又如約法第八條規定的「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本人或他人並得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此種「提審」手續，至今沒有規定頒布，不但人民不知道如何運用，法院也從來不曾辦過，誰也不知道此種「提審狀」是什麼樣子。此時即使有人依據約法向法院請求提審，法院就根本沒有「提審令」一類的東西！此種無施行手續的空泛條文，是無法執行的。有法而無法執行，又何怪人民

對法律不生信任心呢？

以上所說，都要指出人民何以對國家根本法絕不生信仰。此種狀態若無法改進，雖有最完美的憲法條文，終不過與天壇憲法訓政約法等同其命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明白這種很明顯的事實。此時未嘗不可制憲，但制憲之先，政府應該要在事實上表示守法的榜樣，養成守法的習慣，間接的養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這才是憲政的預備。憲政的預備不在僱人起草，不在徵求討論，而在實行法律。與其請吳經熊先生們另起新花樣的憲法草案，不如請他們先研究研究現在已有的各種法律（看有多少種法令是應該立刻廢止的（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看看有那些法律是從來沒有執行的；看看有多少種法律是必須編制施行細則方才可以施行的；看看有什麼法子可以教官吏軍人黨部多懂一點法律，多守一點法律。

總而言之，制憲不如守法。守法是制憲事業的真正準備工作。

「憲」與「憲法」

胡道維

現在國民政府立法院正從事於制憲的工作，研究「憲法」的組織與討論「憲法」的文章，到處皆是；同時，國人對於國家根本法的錯誤觀念，也表露出來；大部分的人對於「憲」與「憲法」的區別，似尙未具澈底的瞭解。但這却也不是我們中國人獨具的錯誤；即在歐美一般的學者也是將牠們混亂的應用，不常把牠們的區別劃分清楚的。在這因憲草創的時期，這兩個重要名詞的真諦究竟何在，是我們不能不詳加辨識的。

「憲法」(Constitutional law)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亦稱爲有機法；政治社會要利賴牠(或牠們)才能發生組織，不然就是一盤散沙了。「憲」(Constitution)不過祇是「憲法」的一個種類，一個原素，或一個部分；並且在十八世紀以前，一般人還不認爲是必需的一部分。「憲」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完整的成文的有機法或根本法；就性質言，「憲」即是憲法，憲法即是「憲」，同爲有關國家組織的有機法或根本法；就意義言，則「憲」要比「憲法」範圍狹小多了。據近代先進的憲法學者柏結斯(J. W.

Burgess)說，「憲」的要素有三：曰政府組織法，曰自由保障法，曰主權規定法。所以我們若將這三種法律歸納於一個系統之內而組成一篇先後有序輕重有分的完整法典，這就叫着「憲」——「國憲」「邦憲」「省憲」都是「憲」。例如美國於一七八七年經非列德爾非亞會議所制定的根本法，就是「憲」；現在南京立法院所忙於制定的，也是「憲」。

「憲法」呢？牠的原素，至少可分爲五種：第一就是「憲」，自十八世紀美國成立國憲以後，大抵都認「憲」爲「憲法」的必需的一部分；但在十八世紀以前，却沒有這種觀念；就是在目前二十世紀的時代，還有些國家的「憲法」並不包括有「憲」的部分在裏面：英國與法國就祇有「憲法」而還沒有「憲」，這要算是最重要而顯著的例証了。第二就是尋常國會制定的用以補充或執行「憲」的法律：比如美國國憲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合衆國司法權應執掌於一最高法院與其他國會隨時得以設立和組織的下級法院。……」。至於下級法院的等級數目組織職權等問

題，國憲並未曾絲毫提及；所以美國國會在一七八九年便通過了一種所謂「司法法案」，對一切法院的組織加以詳細的規定，連下級法院也在內；這雖是在國憲以外的普通法律，却是一種補充國憲執行國憲且有關於政治組織的法律，當然是一種憲法。第三便是尋常國會制定的一種單獨的含有憲性的法律；這種法律不但在國憲之外，亦且不是根據國憲而來的，甚或根本就沒有國憲可以作牠的根據；選舉法與文法官考試法，就是很好的實例；選舉與考試實在就是一種官吏委任法，當然是有關於政治制度的，所以也是一種憲法，但是牠們通常都是與國憲沒有關係的，換句話說，牠們不作憲的補充，也不執行憲的任何條文；不過最好的實証，還是要數英法兩國各種憲法，牠們一方面是有關國家政制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又是沒有國憲可據以為根據的普通法律；英法兩國是祇有這種「憲法」而沒有「國憲」的。第四便是法庭解釋國憲的判例；從前英國學者蒲萊斯（Byce）說美國國憲祇要幾分鐘便可誦讀一過，但是現在美國大法院解釋國憲條文的判決案已佔有三百大冊的篇幅了；這是因為國憲無論如何詳盡，總不能將現在與

與解釋法律的機關隨時有以詮釋與訓注；這些解釋國憲的判例，都是可以說是有憲性的法律，換句話說，都是憲法。第五就是有憲性的政治習慣；比如說美國總統候選員必須由各政黨提名，總統任期至多亦祇能蟬聯一次等制度，在國憲與任何普通法律內均無此種規定；完全是一種所謂「政風」；然而上下恪守不逾，其效力與性質正與國憲明定條文不相軒輊。英國的這種習慣更多，差不多整個國體制度都建立在這種「政風」之上。其他各國亦多少有一部分

的憲性習俗，這種習俗也就是憲法。

綜上以論，「憲」是個特殊的名詞，「憲法」都是個概括的名詞；「憲」是狹義的，「憲法」是廣義的；「憲」是「憲法」，「憲法」却不一定就是「憲」，「憲法」雖是根本法，但不必定有比普通法更高的地位與效力，往往也不過只能取得國民較高的重視心罷了；「憲」則有自別於普通法的根本性，其地位與效力視其他任何法律為優越，兩下遇有衝突的時候，普通法的效力就要被「憲」予以打消，一提到「憲」，我們心目中立時有個固定的意象，立即想到一種有系統有組織有邏輯的完整而成文的法典；但是「憲法」的意義却沒有這樣的確定，牠或是指着上述五種原素的一種而說的，或是指着數種而說的，或是指着牠們全體而說

的，或是指着數種而說的，或是指着牠們全體而說

的；各國的憲法彼此不同，其內容的範圍當然也不同，不過大概不能出上述五項的範圍罷了；所以說「憲」固然是「憲法」，「憲法」却不一定是「憲」；十八世紀以後的人，都視「國憲」爲憲政的根本或必需品；其實，有「國憲」的固然都有「憲法」，但是有「憲法」的不一定有「國憲」，英法就是顯著的近例；並且「憲」是不須有的，「憲法」却是必須有的，因爲所謂「憲法」就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國家組織的制度，焉有國家沒有組織沒有政治制度而還能成其爲國家的呢？「國憲」是近代美國人的供獻，「憲法」在上古希臘的時代已經就有了；據說亞里斯多德曾經收集一百五十餘種「憲法」加以分析而著爲一書，可惜此書十九已散失不可復得了；但就其現在尚存的一部分——「論雅典的憲法」——來推論，我們可以斷定亞氏當時所研究的，祇是上古各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真正所謂「國憲」罷了；推之其他任何國家，自古迄今，也未有沒有「憲法」的，不過「憲法」有適宜不適宜與完備不完備的分別罷了；就是我們中國也不能說是例外；漢劉邦初入咸陽，約法三章；唐李淵入關，約法十二條；唐刑書有四種名目，曰律令格式，律令固爲衡罪戾明等威之用，格者即百官有司規定其所常行之事，式者即規定其所常守之法，與西人所謂憲法極相近，特具體而微

罷了；唐李乾祐諫李世民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士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者」；這更可說是憲法的基本觀念了。歷代官制會典刑律（例如宋代則有宋刑統，清則有大清會典大清刑律等）一類的典籍，甚至顯官奏摺的內部，都可以發見一大部分有憲性的法律。書說命有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左傳內也有「今擅作刑器，以爲國法」的話；漢書更曰「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這是說憲法是固定的，應該永遠遵守以爲文物制度的準繩，不應任意增損或刪改的意思。管子內有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據漢書張釋之傳，釋之曾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這又是說憲法有高於普通法的威儀，君民均應共同遵守的。古時中國人不但認識有效力威儀高於普通法的特別法，而且在若干地方還隱約的表示按古時習慣法律君王威權也還是受有嚴緊限制的；不然，國語內襄王就不會說「余一人僅亦守府」，公羊傳亦不會有「君若贅旒然」的話了。足見中國昔日不但有散布各方的憲性法律，而且意識上還備具有近代憲法的基本觀念。歐洲古時羅馬人曾認定「憲法」與「普通法」是有分別的，「制憲權」與「立法權」是有分別的；十四世紀的法國人也認

「國法」(「les 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與「王法」(「les lois du roi」)是有分別的；十六世紀歐洲一般反君權主義者(monarchomachs)更有「根本法」(「lex fundamentalis」)的概念，他們認為這種根本法有高於一切普通法的威權；這便是近代憲法的基本觀念，與上列中國憲法觀念殊無異致。雖說在中國這種觀念因種種關係不會演化具體而成爲近代式的「憲」，但是中國人心理上既藏有這種觀念，顯見得國內也會發生有「憲法」，這是我們可以推想的。

十八世紀以後的立憲運動，有形無形都中了美國人的毒，都孜孜以成立一種「國憲」爲運動的終極的目標，以爲有了一「國憲」便已爲「子孫萬世之業」奠定基礎，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坐享太平」了，其實憲政制度只須有「憲法」，不必定須有「國憲」；「國憲」至多亦只能作「憲法」的中心與憲政的樞紐，絕不能盡「憲法」憲政的能事；我們要是預備制定「國憲」，絕不應將所有的憲性的法律一齊擁擠到「國憲」裏面去而加以固定的規定，很可以劃歸一部分到「憲法」的範圍裏面去，很可以保存一部分留待普通法加以規定。世

界上最大的「憲」，莫過於紐約市的市憲，長至一千數百頁，然而牠在已往被人破壞的史實也就令人不忍卒讀了。歐戰後的新國憲，大抵規定甚詳；但是這些國家的國人遵守國憲的精神，却遠遜於一般有舊式憲法的國家的人民。我們最好的殷鑑，莫過於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至少也經過了七種國憲，每一種都是很完備而且有很嚴密的組織的，在制憲的人們看來都是可以「永矢咸遵，垂之先極」的典型，但是結果總不到幾年就被人束之高閣了；直到一八七五年，國會有鑒於前此之失並且因爲環境的壓迫，才簡簡單單的通過了三種個別的「憲法」：一種是關於參議院的組織的，一種是以總統衆議院及內閣爲對象的，一種是規定政府公務官員彼此的關係的。在制定的時候，誰也不想他們這種掛一漏萬的工作會有長久的壽命；但是結果都遠過了他們的期望，至今已差不多施行有六十年之久了，並且牠們的力量與穩固性還是有加無已的。大抵國憲的規定愈詳確愈精密，則被破壞的機會亦愈多亦愈易；這是歷史上的教訓，希望吾國人有以注意及之。

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

張伯倫原著 丁文治譯

本文載在四月份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作者爲 H. Chamberlain 是一個久駐莫斯科

的美國新聞記者，對於五年計畫的批評，似乎很公道。所以我翻譯出來介紹于我國人。

原定爲五年後來縮短爲四年零三個月的蘇俄五年計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了。現在回顧，我們覺得這種用極大的方案來統治各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教育的活動，實在是俄國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當然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各方對於五年計劃的看法很多！有的認爲是世界經濟的出路，有的認爲是蘇俄對於他國的恫嚇和挑釁，也有人只把牠看爲做不到的夢想。然而各方注意蘇俄的視線全集中於該計劃的成敗。同時五年計劃正和空前之世界經濟恐慌相值，所以更引起各方的注意。

雖然我們尚缺少這計劃的最後幾個月的數字，但我們已經可以將他成功失敗大致作一結算。顯然的，我們不

能歌頌牠是絕對的勝利，但也不能輕視牠爲完全失敗。因爲國外的和國內的環境所限制，這計劃發展的方向與原計劃者所預料大有不同。原來的目的，本想將工業和農業同時發達；想在工業上增加出產量，同時提高一班人的生活程度。但是實際上農業是爲工業而犧牲了。同時那些明顯的大規模的工業建築，是靠着那同樣明顯的生活程度的降低而成功的。五年計劃所最顯著的成功，是在國內分佈了幾個大的新式工廠和動力廠，是吸收了許多農民加入新的公共農場，是避免了已往三年西歐和北美所遭遇的廣大的工人失業和建設事業的不振。這計劃的顯明的失敗，是不能給一個平常蘇俄國民以充分的住食和製造品。蘇俄是逃避了那廣大群眾的失業了；但是蘇俄所遇的難題，是多數工人和農民在國內的流落。他們不是找那儘多的職業；却是找那缺少的糧食和住屋。這足見建築大的新式工廠比較容易；要使這種工廠管理得有效能，却是困難。用消滅富農爲恐嚇來吸收農民加入共合農場比較容易；想充分利用農場勞工的生產力來解決歷年糧食的缺乏是很困難

的。

從籠統的印象說到具體的事實，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的工業出產——特別是煤油農場用車和機械製造，已經超過了原來的估計。但是另一方面，基本工業，如鋼鐵，如煤，却比預定估計落後很多。預定的一九三二的生產為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但無論如何不能做到。按照蘇俄公佈的數字，一九三二年頭十個月只出產鐵五，一〇〇，〇〇〇噸，鋼四，九〇〇，〇〇〇噸，煤五二，四〇〇，〇〇〇噸。有幾種消耗品工業，最著的如紡織工業也是比預定計劃落後。

蘇俄的工業生產率，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但是一九三二年的增加率已經降低為百分之二三，八了。我們雖然可以說蘇俄原有的工業產量微小，這種生產增加的速率，不如在有大量生產的國家之足驚人。但是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實在是很快的速率。縱然這種生產因為品質不好還須折扣計算——這一層近年更為利害，因為新成立了許多工場使有過訓練的管理人工程師和工人更為缺乏——但我們總不能不承認蘇俄在工業化的路上很迅速的邁了一大步。數年之後，等到那幾種現在正在建設，和正準備建設

的大工業完全發生效力的時候，等到那些妨礙蘇俄大工廠的困難減輕的時候（即使不能消滅）蘇俄工業生產的進步一定更加顯明。

五年計劃之結果，農業的進步較工業大為遜色。共產黨首領說到農業上的成績，喜歡指明農民組織上構造上的變更。例如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農家組成二一一，〇〇〇農場；國家農場總面積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華畝）之大；建築了二，〇〇〇個供給鄰近公共農場保藏曳引機的大車站。

但是，國有或是公共農場和曳引機站本身不是，也不應該是，發展農業的最後目的。牠們的功用祇在生產糧食。從這點上看來，蘇俄的農業離希望還是很遠。五年計劃原定的耕地畝數為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華畝，但是現在只有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一九三二預定本年（一九三三）農產收穫為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是照現在計算這項產量無論如何必定較預定的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耕地的差異比較細微，而收穫上的差異如此之大，這正是表明蘇俄農業上的根本困難。因求產量的增加，往往犧牲品質。每年因缺乏牲畜和勞力，耕種的土地比能收穫的土地多。每年有多量的穀類蘿蔔

糖等等遺棄在田地上面。

似這種大規模的損失，在昔日農人單獨耕種土地制度之下是沒有的。除此之外，更有對於土地照顧不良的困難。這都使我們感覺農業上同時要集產化和機械化，實行比理論困難的多。私有土地制下的種種原素是經營農業極重要的獎勵。直至今日，雖然經過許多試驗，還沒有找到牠的替代品。所謂取締富農階級，實際是消滅農民全體的四至五，也產生了慘痛的結果。因為通常富農是最優秀的農民，他們的生產能力遠在他們人數比例之上。

目下蘇俄農業上最嚴重的問題是畜牧農場。一九二九年的冬天，蘇俄的畜牧業曾受過一個嚴重的打擊。農民一部分爲着反抗強制集產，一部分爲着農產品被強制購買，沒有充足的食料飼喂，所以全國牛的四分之一，羊的三分之一，豬的二分之一全被農民宰殺了。這種重大的損失至今還沒有多大的恢復。去年冬天小規模的屠殺耕牛又復發生。特別是烏克蘭地方像是陷入于惡化的循環：耕牛減少，因之耕地面積也減少。耕地面積減少又影響於耕牛的減少。

農業狀況既是如此的不健全，原來計劃所定的城市消費量，豬肉每人增加百分之二七、七，雞蛋增加百分之七

二，牛乳品增加百分之五五、六，絕對沒有實現當然是在意中的。因爲家畜缺乏的結果食品減少本來是不能免的。加之都市發達得太快，尤其是有大工廠的地方；又因國外貿易的需要將所有能够輸出的貨品包含食糧在內，運輸到國外去交換機械和工具，所以蘇俄的食糧問題更形嚴重化了。

五年計劃對於價格成本和工資的計算完全失敗了。計劃的原來目的是求工資逐次的增高，同時生活費減低的結果能使真實收入增加。後來的結果是貨幣工資高出於原計劃所料。但是如果單憑貨幣工資之增加就說生活提高了，那是錯誤的。因爲更重要的是盧布購買力之跌落超過了工資之增加。蘇俄近年的公佈統計，對於生產成本和每人食品消費額大都忽略不提。但有許多無可懷疑的事實。食糧券分配的日見減少，市場上糧食價格的奇昂，就在許多糧食地較便宜的地方，所食的東西也很惡劣並且缺少多種食品的調和。在許多地方最簡單的食品如糖如茶葉完全不能供給。所以就糧食方面說，大多數的蘇俄人民比較五年計劃實行以前困苦的多。共產黨是最不信神怪的，但是一方面家畜減少，一方面人口增加，除非是神仙，纔能够使都市有充分的食糧供給。

在金融方面，却有超過計劃的惡結果。按照原定計劃去年的盧布流通額應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但是現在流通的貨幣却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蘇俄每年編製預算，總把減輕成本看得太容易了。等到預算所估計的成本減輕不能實現，只好求救於印刷機器，來補預算的虧空。因爲紙幣的濫發和糧食製造品的缺乏，物價逐漸的提高了。這當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最利害，但是國家所經營的合作社也不能免。事實完全把生活費減低的計劃打倒了。通常蘇俄人民所有的紙幣遠超過他們所能交換的食糧和製造品。所以有一個笑話說：「蘇俄人民是世界上富有的，因爲他們有錢不知怎樣花。」

因爲蘇俄政府急需外國貨幣的結果，在莫斯科和許多的都市產生了一種雙貨幣的記賬制度。最完備的旅館飯店和商舖只肯受用外國錢幣。這種政策的結果當然更減低了盧布的價值，因爲最好的貨物只有那少數有外國貨幣的人才能享用。一種貨物凡是能用外國錢或是用盧布都能購得的，其價值上總有很大的差異（盧布法定價值約兩盧布合一美金元）。這是很明顯的表示蘇俄官吏所欲定的盧布價值遠超過了盧布的實際購買力。人民用盧布購物，既受種類和數量的兩層限制，民間私下發生一種以物易物的交

換。政府對之雖然禁止，但是無法禁絕。例如製釘工廠有時避免複雜的政府分配機關，把幾箱釘子直接去交換相當的紡織物，麵條，點心，和其他的應用品，因爲釘子是蘇俄很缺乏很寶貴的東西。

現在蘇俄改革幣制的空氣很濃厚。如何可以實現，還不明白。不過因爲盧布的購買力沒有一定的標準，包工制和工資等級差異大部分失却了效力。薪水的多寡工資的大小，現時在蘇俄沒有多大的重要性。決定一個人的生活不是靠他能賺盧布的多少，而是看他能分到多少寶貴的東西；他所能住的房屋，所能購物的店舖，所能吃飯的食堂，和他放假時所能休息的地方。

在五年計劃開始的幾年有些外國人和蘇俄本國人總當她有一種極樂界的希望。他們以爲五年計劃完成之後一切困苦和貧乏都可以免除了。實際情形完全不是如此的。五年計劃不過是蘇俄新經濟史上的開始，將來繼續這計劃的艱難正不亞於已經過去的時期。當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初到一九三七年底）開始進行的時候蘇俄政治家遭遇到三個非常急迫的難題。

第一個難題，最急迫的難題，是如何使農民願意工作。唯有如此，才能解決現時的糧食缺乏。過去的幾年蘇

俄人民的耐苦的能力是共產政府極大的本錢。空前的國家工業建設是用困苦和貧乏交換得來的。但是這種過分的耐苦是有危險的。一個不精通馬克斯唯物主義的人也能了解高的生活程度與高的勞工生產力是不可分離的。精巧的專門技能一定要有高的真實工資。一個俄國工人，吃慣了苦的，再感受共產主義的宣傳，也許甘受這許多尋常的苦痛，如住房的擁擠，食物的惡劣，買東西的挨次等候。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蘇俄工人，能否有和西歐或美國工人同樣的生產能力，很是疑問。

共產黨首領最近想種種的方法來增加糧食供給。向農民徵收的麥子，肉類和其他產物的額數已經減低了；市場的交易也比較的自由。各工廠的糧食也不僅僅限於由中央機關供給，政府常常勸導牠們自己開拓雞場豬場和兔場。牛產方面也特別注重到消費者，尤其是農民的需要。以前在冬天政府總用強迫購買的方法，在一定價格之下買盡了農民的生產剩餘，但是現在漸漸的用一種有定額的徵收來代替前法了。這些方略是否就能變更農民的心理，而使農產量增高，目前還不能斷定。由冬季到春季糧食的供給，總是少的。等到這時期度過以後，我們或者可以知道這盡一點。

第二個難題雖然不如此明顯，然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凡是到蘇俄工廠裏看過的人，都知道蘇俄最缺乏對於管理員，工程師，專門家，和技術工人的教育和訓練。以上種種的缺乏雖然不是消耗和損壞機械的唯一原因，但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種消耗與損失最終還是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程度。蘇俄政府運用五年計劃所建造的大的新式鍊鋼廠，機車廠，汽車廠，和化學工廠，令人想到試騎劣馬。駕駛的人要跌好幾交纜能够把他制服。

第三個問題是蘇俄與其他大規模出產的國家所同有的。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在價格低落市場縮小的環境之下，如何取得合算的交付結算。一九三一年蘇俄貿易的人超爲二九四，二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一九三二年的最初十個月入超更增加了一三五，七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同時期蘇俄的輸出額比一九三一年減低了百分之三一、五；輸入額減低了百分之三五、一。共產黨時常誇口，說世界經濟恐慌到了蘇俄的邊界就停止了。眼看見一年一年的過去，而糧食和製造品的缺乏不稍減輕，這種誇口的話越過越不足信。不錯蘇俄是避免了那失業潮流和工業的停頓。但是蘇俄工人生活的困苦情形，在任何其他的國家都不能比的。國內需要的糧食必須省下來輸出國外，消費者需要

的輸入品必須禁止，這都是蘇俄生活程度降低的原因，都是因為蘇俄輸出品不如兩三年前之多，價目也比兩三年前低，這都是世界經濟恐慌直接的結果。在最近期內蘇俄減輕人口的壓迫和改進生活程度的機會是要靠着資本主義方面商業的轉機。這話聽起來很像矛盾的，而實際上却是真的。因為資本主義商業能有轉機，物價才能增高，金融才能活動。反過來說，如果蘇俄經濟進步，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力增加，於世界經濟當然也有很好的影響。

五年計劃所發生的社會事業也不可忽略的，近幾年來，對於舊的價值標準和習慣全根本推翻了。蘇俄地面上風景的變化就是這事實的結果和表現。五年前曾有一位尖刻的外國觀察者，把蘇俄社會組織的革命和城鄉裏物質設備的很少進步來相反照。現在這種觀察是與事實不符的了。莫斯科的風景差不多天天在那裏改變。金頂的大教堂被拆毀了，新的公共建築完成了，舊的街道也放寬了。差不多無論在那一個大的城市裏，我們不但看見幾個大工廠，並且有成行的磚砌的新式住屋，與革命前平民所住的小屋棚正相反照。

與五年計劃同時發生的是絕大的人口遷移。這也是五年計劃一部分的結果。有的從鄉間移住都市，有的從舊的

區域搬到那幾個大的工業中心。在從前總回遊牧民族所漫遊的草地，建築了偉大的鍊鋼廠，在高加索高原上成立了國立農場。這都一定要影響到舊日生活的習慣和方法的。

我們不可以把五年計劃單認為一組死的設計和方案，或是幾所死的磚瓦洋灰的建築。牠是一齣很緊張的活劇。很少的蘇俄人民生活沒有受這計劃的影響，無論這影響的好壞。這計劃烘動了全國青年的意想，而且把蘇俄聯邦變為青年的出路。（因為出身貴族或是富產階級而受排斥的當然除外）。從少計算，有權力和責任的職務因為這計劃比以前多了兩三倍。新工程師，技術助手，教員，農業專家，工商業管理員的需要因為這計劃而無限量的增加。牠使得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的社會流動性更大，使得一個尋常的人更容易從下級進升上去。專門人材的造就往往因數量而犧牲品質。很少的蘇俄青年工程師能做與美國或是西歐的工程師一樣好的工作。所得的物質報酬也不如他們。可是他們都覺得有他們的機會。蘇俄人民最近數年的生活雖然困苦低下，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可忽略或是輕視。蘇俄人民免除了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中的一幕大悲劇：就是許多受過高深教育或是訓練的青年男女在社會經濟組織變動

之下找不到職業可做。

這計劃並不是沒有牠的黑暗和悲慘的方面。我們不由的想起那些富農從家鄉逐出，單身或是攜帶家眷到很遠很苦的地方去做粗工；那些工程師和教授被控爲不忠實或是怠工潦草了被送到集中罪犯的帳棚裏去；牧師教徒眼看他們的教堂被人拆毀，來建築反對派的偏執的新信仰的住屋。五年計劃正如同俄國革命本身一樣，是一齣極大的社會劇。不容我們用數字來計算牠賬目中的幸福和痛苦。在這種劇變的時期中，幸福和痛苦的帳目都是很長的。

已經完成的五年計劃對於國外有何意義？兩年以前流行一種意見，以爲五年計劃會產生一種大的「紅色貿易恐怖」；蘇俄出產的低廉貨品將傾銷於世界市場。這種預言已經爲事實證明不確了。蘇俄一九三一年的輸出比一九三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二一·七；一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比一九三一年同時期的又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五。照現在所知道的情形，一九三二（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將成爲蘇俄多年來輸出最少的一年。一九三二的輸出價值較一九一三的半數還少（一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額爲四六一，四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輸出價值爲一，五〇六，一〇〇，〇〇〇盧布）所以真的「紅色恐怖」不是

傾銷，而是蘇俄不得不減少牠在國外的購製到最小限度，因此國外的機器製造者喪失了一個好的主顧。

五年計劃除引起上述的恐懼外，還給許多經濟學者一種希望，以爲有組織的經濟計劃可以立刻救濟現時的經濟恐慌，並能防止將來經濟恐慌的再現。但是實際上蘇俄過去數年所成就的工業進步與精確平衡的計劃並沒有多大關係。原計劃的預算和執行其中有不少的很顯明的錯誤。如果蘇俄經濟制度的成敗是要看實行與預算是否完全相符，那麼我們的判斷一定說是失敗的。例如做計劃的人對於交通需要完全計算錯了，所以雖然實際上一九三二年的貨物運輸已經超過原計劃所定的數目而貨物運輸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至今還是一個弱點。按照去年（一九三二）的預算，應該出產八，五〇〇，〇〇〇噸生鐵。但是實在的出產量只有四，九〇〇，〇〇〇噸。觀察今年的情形，鋼鐵出產比計劃要低百分之四〇，煤的出產也要低百分之三〇。有這樣長久性的錯誤的計劃只可以說是猜想或是希望，不能說是計劃。更不能表示蘇聯已經有編製平衡的準確的國家經濟計劃的技術。很可笑的是蘇俄計劃每種物品在一年之後或五年之後要出產多少，往往計算數字到小數點以下很多位，而每個工廠常常胡亂的改牠們工作的計劃。

過去四年零三個月蘇俄對於經濟史的貢獻不是在那精確的計劃，而是在把整個國家生產的工具集中於一獨裁政府之手。工業建設的成功，和同時提高生活程度的失敗都可用這個來說明。對於蘇俄的計劃經濟的試驗，我們可以作無窮盡的研究討論。但是除非有國家整個採取蘇維埃制度時（目下還沒有這種趨勢），計劃經濟足供我們研究的很多而能使我們仿效的很少，因為牠原是共產黨獨裁政治的肢體和作用。一個必須遭遇普通選舉的政府要求人民作如同蘇俄完成五年計劃的犧牲，或是想實行那種農業集產和取締中農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俄國，至少是蘇俄，有一種空氣能使觀察牠的人好用過火的名詞。這是五年計劃往往在國外受過分的稱頌或是過分的攻擊的理由。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的蘇俄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蘇俄並沒有多大差異。蘇俄並沒有因為五年計劃有幾部分的成功，而成爲地球上的樂土。也沒有因為計劃的幾部未完成而致崩潰。將來回顧起來，這

第一次的五年計劃祇是這種進行的起始：——要將蘇俄變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建築得很好的都市，有很密的鐵路，電話，電報網，有高量的糧食，衣服，慰籍品和必需品的消費額，這種進行大概需要本世紀的大部分，方能完成。蘇俄的假定以爲國民的生活可以用大規模的經濟計劃來規定，恐怕要在很遠的將來才能證明是否真實。目前蘇俄經濟行政的難題雖然很多而且很麻煩，他們絲毫不必害怕生產過剩。沒有一種經濟生活不是需要遠超過供給。等到蘇俄所出產的主要食糧和製造品在量和質上都能同美國和西歐比擬，那才是這種計劃真正的試驗。那時候計劃的人纔可以有機會顯出他們的真本事：能令生產和消費相均衡，能把已經發展足了的工業的資本和勞力，立刻運用到缺乏牠們的工業上去，使得工業循序的進步，不發生貨物跌價，建設停滯，工人失業。但是當我們看着許多蘇俄店舖裏面的空架子，我們知道這樣的證明，還在距離很遠很遠的將來。

清華大學與國恥

衡哲

——清華大學二十二週年紀念日演說詞——

今天是同學們回來慶賀母校生辰的日子，我反來說她

與國恥的關係，似乎有點殺風景。不過仔細一想，清華大學與國恥，實在有一個特別的關係，我們愛護她的人，又怎能不說一說？這個關係是，清華大學的存在，乃是三十年前的一個大國恥的紀念與象徵。記得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人問起我是不是賠款學生（Indemnity Student）時，我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慚愧與羞憤。這個感覺，在我的心中，至今還不會消滅。

我的所以慚愧與羞憤，也不一定是由于中國在庚子年打了一個敗仗。世界上儘有光榮的打敗，也有羞辱的戰勝。鴉片戰爭即是一例。我凡遇見英國人時，從來不羞愧的對他說，「是的，那次中國是被你們打敗了，所以我們便不得不買鴉片！」我說的時候，面上覺得光彩，心中覺得驕傲。因為我知道那次中國的打敗仗，是世界歷史上稀有的一個光榮的失敗，而英國的勝利，也是世界歷史上稀有的一個羞辱的勝利。

但庚子年的失敗，却與鴉片戰爭不同了。因為牠暴露了中華民族的三個大潰瘡，把國恥從內心裏顯現了出來，故牠不但是一個失敗，並且是一個羞辱的失敗。這三個潰瘡是什麼呢？

第一是愚。要不是人民那樣的愚，怎能產生那個義和

團，相信靠了符咒的力量，能把天下的洋人都殺盡？要不是政府大臣那樣的愚，怎能相信這些愚民的胡說八道，還要給他們以鼓勵與便利？要不是西太后那樣的昏聩，光緒帝那樣的低能，怎能相信那些胡塗大臣的胡塗說話？一國之中，上自帝后，下至羣衆，愚到這樣的地步，那還有不鬧亂子的嗎？

第二是弱。既然鬧出亂子來了，那麼，就錯到底吧，就學着英國的鴉片戰爭，頑硬到底吧！這樣，在強權世界中，我們倒還可以占到一個地位。不幸我們又是那樣的弱，弱到洋兵一到，便如嬰兒見了狗狼一般。鬧禍的帝后，是抱頭鼠竄的逃走了；鬧禍的王公大臣，也彎着腰爲洋兵洒水掃街道了；愚而弱的老百姓，也忙着掛順民旗，做他們的德國民，法國民，日本民，……去了。

愚了，弱了，鬧了大禍，受了大辱，賠了肥肥的一大筆款子了。要是能像六十年前法國人民那樣踴躍捐輸，把賠給敵國的款子一口氣還清了，也還像個樣子。而我們却又是那樣的窮，窮到要人家可憐我們，把賠款退還我們，——窮到要拿這個紀念國恥的金錢，來辦最高的教育，來送青年學生出洋讀書。即以我個人而論，假若不是靠了那個賠款學額，我便要連那一點求學的梦想也達不到。這是何

等難受的一個境地！

三十三年是輕輕的過去了，現在我們又遇着第二個國難與國恥了。我們且先看看國內，看看那三十三年前的三個大潰瘡。但見愚是依舊如故，而弱與窮則又加甚了幾倍。我們再看看國外，則見三十三年前的那個國際形勢，是已經改變得不認識了。老大的土耳其，既已不再為我們做替死鬼；而國際競爭的焦點，又早已從巴爾幹半島和北非洲移到太平洋的東岸和中國的本土。我們現在是不能再靠着在三十三年前，曾經救過我們的那個國際形勢，來苟延殘喘了。我們看了這兩個情形——國內的與國外的情形——應該發生什麼感想，尤其是我們這一羣受過那個三十三年前的國恥的恩惠的人？

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的。第一，我們的自身既是一個大國恥的象徵，我們便應該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這兩個新舊的國恥掃除廓清。第二，我們努力的目的雖然不止一樣，但我以為人格的修養，却是最為根本的。假使一個人的人格站不住，那麼，無論他有多深的學問，多大的才能，多強的體魄，也不過如老虎添了翅膀，只能加添他的禍國殃民的能力，是講不到洗刷國恥的。在現代的社會中，這樣的有翅老虎是舉眼即有，所以我很可以不必多費時間

來舉例子。

講到人格的修養，我以為沒有比孟老夫子的三句話說得更為切實，更為高明的了。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現在再替他加上一句，「大名不能惑」，因為為了求名的緣故，一個人把他的人格墮落的，也未嘗沒有。我們欲求這四件人格上的大成功，却必須先注意到一個更為根本的條件，那便是，先把自己忘了。一個人所以貪錢，貪名，貪權位，無非是因為先把自己做了人生的中心點。假如我們能把自己的種種享樂，放到一個角落裏去，把國家與人道，移置到我們生命的中心點來，我們便將立刻感到一種恬淡靜寂的味道，覺得身心自由，不為物役了。我生平最佩服兩句話，常把牠們當做個人物質生活的金科玉律。那兩句話是，「鶻鷁集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這真是幫助我們遺忘自己的一個最合理，最近人情的好法子。我們若能做到這一層，我們的人格還有不向上的嗎？我們洗刷國恥的志願，還有不能達到的嗎？

人格修養的問題，當然不是崙對自己一人而言。一個人是不能不與社會發生關係的，而青年又是不能不有他的理想的。但這個理想到了現實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腐敗

社會，不管你十碰十釘子，十個鼻子十個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當取一個怎樣的態度呢？我覺得……

會，是有了解他的義務的。因為我們的目的，既在扎他洗滌，把他提高，那麼，除去了解與同情，我們又怎能幫他的忙呢？但同時，我們又不當輕易與他同化。關於這一點，法國的科學家，居里先生，說得最好。他說，「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之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們對於社會，似乎也應該取這個態度；而我們讓步的多少，却又應該看他對於我們人格的影響，因為那是我們立身處世的唯一的與不變的標準。這樣，即使我們因爲讓步太少而受到壓迫，而至于喪失朋友，而至于喪失生命，我們至

作何感想

(通信)

麻逸敏

「一點開路的工作，使繼我們興起的人，知道那裏真得住腳的，那條路是可以走的，雖然我們不能及身走到目的地。」

我要對同學們說的話，豈止這幾句？不過這一點點的意思，却是我多年的經驗與觀察的結論，也是我所視爲人生的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我現在特別的把他提了出來，用至誠和熱情，奉獻于我們負著兩重國恥的十字架的清華同學之前。希望你們在鍛鍊身體，增集智識，培養才能的種種爲國爲人的努力中，不要忘了這個更爲根本的努力；要不然，我們的一切努力，便將立刻有製造奴隸人才的危險了。

一九三三，四，二十九

編輯先生：

前些日子各報盛傳被日軍槍殺的北寧路某站長不幸未死，同時有封信寄來。我願意同胞明瞭灑東的真象，所以把原信一字不改的寄到獨立評論。不知大家讀了以後作何

感想？

麻逸敏

……津門拜別，兩月於茲。兄在此兩月內所受痛苦，較前在皇姑屯爲尤甚。國軍退却時，公私物品多被搶劫。敵軍退却時亦復如之。車站公款因會同洪警務長送至教會保存，尙未被劫，是亦不幸中之幸也。敵軍號稱「救國軍」，流品至雜，多非善類，既無訓練，焉有紀律？名爲四旅，

每旅不過百人。似此幾百烏合之衆，竟使我軍數師望風潰退，不戰而放棄灤東。敵軍已退却二日，我軍今日始至。旬日間兩易得失，雙方均無死亡。如此作戰，實所罕聞。然而兩翻進退，姦淫搶擄，無所不爲，灤東已無噍類矣。兄目見耳聞，實所痛心。灤東失地雖已恢復，將來如何殊難逆料。離站既格於局令，在站又危險萬分。敵軍司令官因到口時兄未與歡迎，致招不滿，前因無有厭車，曾令兄

親赴秦皇島取借，其淫威概可想見。此次幸保平安，來日憂患方興未艾，尙不知伊於胡底。處茲外患益深、當軸者泄沓如故，毫無整個計畫，戰又不戰，和又不和，熱血青年犧牲寧有代價？飲痛之餘，謹陳積悃，甚望弟等有以教我。

兄□□□

二八，四，二二，

馬克斯主義果真在德國「詐死」麼？

江紹原投稿

——譯電檢閱記之一——

四月二十五日我讀華北日報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疑問：

從我較閱某氏宗教史英德文本的經驗看來，這假裝或伴爲，定是髣髴之誤。把德文原電找來看吧。」

此報所載某譯電，中云德國新總理希特勒氏在門興講演，曾說馬克斯主義雖然正在詐死，它不會因詐死便不滅亡。馬克斯主義詐死！好個古怪的消息啊！

天津德華日報到手之後，我知道我完全猜中了。這一吹毛，罪過無量：毛開屍去，只餘二疵，一華一英，楚囚對泣。

怕又譯錯了呢！我一面想一面攤開英文時事日報來看

（一）四月二十五日華北日報譯文

。然而我這次失望了，國文本並沒譯錯。吹毛不見疵，又見一具臥地詐死的馬克斯主義英裝屍，晦氣啊晦氣！

「慕尼黑二十三日亞細亞電」國社黨地方要人等，今日在此地舉行會議，總理希特勒，與閣員高貝勒與弗尼克

人在上午聞見了假死屍臭，到了下午，頭

特由柏林來此蒞會，希氏出席，會衆加以熱烈歡迎，希發表一贊助和平演講，謂事實言之，德國係需要和

平，故德國必須盡其力之所能，以維持和平，德國尙須堅持一切國際事件，德國與他國受

於內政各事，德揆力言，政府之抵制馬克斯主義，永遠不能減力，雖然馬克斯主義，在今日伴作滅亡，但此種僞詐行爲，終不能保全其不消除，德國國民革命，在德國內政外交未徹底改組之先，決不停止，歷史非由傍觀與中立之人所成立，其建設必爲富有競爭心理之人，國民社會運動，已自任爲德意志二十年歷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並爲德國將來文化之前導，建立新永久的榜樣，使吾德人民之紀錄，仍居世界文明國之先烈，末云，國民運動，非爲謀現時之利益，但希望日後國人予以公道之裁判云云。

(二) 同日英文時事日報英文電譯文

總理希特勒氏，今日於歡呼聲中，出席國家社會黨各區領袖人物之會議時，以毫不遊移之措辭，作一贊助和平之講演。希氏力言德國需要和平，並將盡其所能以維持和平，但同時德國堅持在國際政治中世人須以一平等份子待遇之。希氏復轉向內政，云政府決不緩和其對於馬克斯主義之鬥爭。即使馬克斯主義現正伴作滅亡，此並不能救拔之出於確然的消滅。德國對內對外關係徹底改組前，國民革命決不能停止。「歷史非彼微溫與中立之輩而是決心奮

鬥之人所造成。國民社會運動，已自任爲德國二千年歷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且將爲德國將來文化之傳聲器。此運動將產生永不磨滅的新華表，使我民族在文明國中居於最前列之紀錄，得以保持。」結束時，氏云國民運動所圖謀者，非現時之利益，而是將來世世代代之裁判。

(三) 同日德華日報德文電譯文

上星期日，總理希特勒氏在門興市，對國家社會黨諸底層領袖，講演德國無條件贊助和平之努力。開場歡呼既畢，總理說明德國將盡其所能以維持和平，然德國同時堅持在國際政治中世人應以一平等份子待遇之。關於內政，氏云政府決不緩和其反馬克斯主義之鬭爭。縱使馬克斯主義鬭爭暫已入眠，該主義終被掃除前，此項鬭爭決不告終。全德國「對內和對外」關係通體改組前，國民革命，決不能中止。「歷史非彼微溫與中立之輩，而是始終準備奮鬥之人所造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現已成爲德國二千年歷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且將爲未來的德國之傳聲器。此運動將產生不可磨滅的華表，使我民族能保持其在文明國家中居於最前列之紀錄。」結束時，總理闡明國民運動非爲目前一時的利益而工作，而寧靜候將來世世代代之裁判焉。

「鬭爭」之句，經楊震文董人驥兩教授證明無訛，時在四月三十日下午一時。

獨立評論的一週年

胡適

獨立評論是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原定寒假中或有印刷上的不方便，所以每年只出五十期，現在已出到五十一期了。一週歲的嬰孩本來不值得什麼紀念，可是在這一年之中，我們承許多朋友的幫忙，使這個刊物隨時得着不少的好文字，並且時時得着很有益的指導，我們很想借這個週年號對這些好朋友表示很誠摯的謝意。

獨立評論社的社員只有十一個人，每人除每月捐出所認捐本刊經費之外，還須長期擔任爲本刊作文字。我們都是有職業的人，忙裏偷閑來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會常有好文字做出來。所以我們每天希望社外的朋友來幫助我們。果然，社外的朋友不會叫我們失望。獨立評論出了幾期之後，社外投稿漸漸增加了，直到後來有時候我們差不多可以全靠社外的文字出一期報，我們不過替他們盡一點編輯校對發行的責任，或者加上一兩篇比較有時間性的政論文字。有時候投稿的作者是我們從未誠面的人，我們因這個刊物竟添了不少新朋友。這是我們最感覺快慰的事。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牠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

的刊物，也不希望牠成爲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牠成爲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我們會說過：我們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這一年以來投稿的增多至少可以證明國內有不少的朋友對於我們這種態度表示信任，所以我們感覺很愉快的安慰。現在我把這五十期的文稿的來源，試做成一表如下：

獨立評論期數	社員撰稿篇數	社外投稿篇數
第一至十期	四三	七
第十一至二十期	三三	二六
第二十一至三十期	三〇	二五
第三十一至四十期	二九	二七
第四一至五十期	二二	三二
總計	一五七	一一七

社員的稿子逐漸減少，而社外的投稿逐漸增多，這不但減輕了我們這幾個人的文字負擔，並且顯示了社會上對我們

表同情的人逐漸加多。如果這個趨勢能繼續發展，使這個小刊物真成爲我們所希望的公共刊物，那就是我們發起的人最高興最滿意的了。

○ ○ ○ ○ ○

在這個最嚴重的國難時期，我們只能用筆墨報國，這本來是很無聊的事。但我們也不因此就輕視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自己回頭看看這一年的工作，雖然很感覺不滿意，然而也還有幾點是我們自己至今認爲值得提倡，值得「鏗而不舍」的反復申明的。

第一，我們希望提倡一點「獨立的精神」。我們曾說過：「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我們深深的感覺現時中國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獨立思想，肯獨立說話，敢獨立做事的人。古人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是「獨立」的最好說法。但在今日，還有兩種重要條件是孟子當日不會想到的：第一是「成見不能束縛」，第二是「時髦不能引誘」。現今有許多人都不能獨立，只是因爲不能用思考與事實去打破他們的成見；又有一種人所以不能獨立，只是因爲他們不能抵禦時髦的引誘。「成見」在今日所以難打破，是因爲

有一些成見早已變成很固定的「主義」了。懶惰的人總想用現成的，整套的主義來應付當前的問題，總想拿事實來傳會主義。有時候一種成見成爲時髦的風氣，或成爲時髦的黨綱信條，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們所希望的是一種虛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實的精神。例如「開發西北」是一種時髦的主張，我們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實（本刊第三期及第四期「中國人口公布與土地利用」，然後研究西北應該如何開發（本刊第四十期「如何開發西北」）。又如「建設」是一種最時髦的風氣，我們所希望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設應該根據什麼材料做計畫，計畫應該如何整理，如何推行（本刊第五期「建設與計畫」），並且要研究在現時的實際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設事業可做（本刊第三十期「多言的政府」，第四十九期「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第二十三期「中國鑛業的厄運」）。這種態度是一定不能滿足現時一般少年讀者的期望的，尤其是我們對於中日問題的許多文字。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爲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有一位青年讀者對我們說，「讀獨立評論，總覺得不過癮！」是的，我們不供給青年過癮的東西，我們只妄想至少

有些讀者也許可以因此減少一點每天渴望麻醉的癮。

第二，我們希望提倡一點「反省的態度」。希臘哲人教人：「認得你自己」，中國哲人也教人「自知者明」。

我們最憂慮的是近二十年來中國人的虛驕與誇大狂，是我們不認識自己的弱點與危機。我們認為這真是亡國的現象，所以我們不惜在大家狂熱的虛驕心與誇大狂上面去澆冷水。我們要大家深刻的認識「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本刊第七期「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第十八期「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第四十一期「全國震驚以後」。）我們要大家拿鏡子照照我們自己的罪孽，要大家深刻的反省：「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麵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最高官吏至今還信念經誦咒可以救國的地步（今天報上還載着何鍵送一位法師去替蔣中正醫牙痛，替熊式輝醫脚痛哩！），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於這個現代世界的。我們認這種自責的態度是真正的「心理建設」的基礎。必須自己認錯了，然後肯死心塌地的去努力學上進。

第三，我們希望提倡一種「工作的人生觀」。我們會說：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第七期「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我們曾說：

在這樣苦境中，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更應該拼命做你的工作。世界上只有真正的工作能够造成人類的幸福。（第十期「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我們曾說：

歐美的富強是至少二三十年努力的結果。日本也經過六十年小心翼翼拼命工作，方能够有今日放肆的力量。我們從落伍的國家要趕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還要拼命。蘇俄的建設工作便是拼命趕的榜樣。：：人就是為工作生的，不工作就是辜負此生。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萬一中國亡了，那時候我們要工作人家都不要也不許我們工作了。趁現在中國還是我們的，我們正應該起日暮途遠之感，拼命的工作。雖然我們覺悟已經太晚了，也許神明之胃天不絕人，靠我們今日的努力能造下復興的基礎。說到極點，即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叫世界上知道

我們尚非絕對的下等民族。只要我們真肯努力，便如波蘭捷克也還有復興的日子。（第十五期「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我們會說：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

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

丁文江

共產黨是中國今天最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少看見報紙上有任何的討論。這足見我們思想界的麻木。我雖不是共產黨，但是我自信我頗了解共產主義。現在我先對於共產主義作簡括的批評，然後說我對於中國共產黨員的希望。

共產主義的根本立場是馬克斯的價值論和唯物史觀。

馬克斯說一切物品有兩種價值：一是應用的價值（Use Value）一是交換的價值（exchange value）。前者是物品的用途，後者是物品的售價。用途因物而不同，售價則為物所共有。售價的根據是製造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所以在

，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第七期「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工作！拚命工作！這是我們要向一切中國人宣傳的人生觀。救國做人，無他秘訣，無他捷徑，只有這一句老話。

我們回頭看看我們這一年說的話，不過如此而已。然而我們並不慚愧，因為這都是我們良心上要說的話。

一九三三，五，十五。

某種社會生產現狀之下製造某種物品平均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就是這物品的價值。勞動本身也與其他的物品一樣，牠的價值就是養活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費用。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動者所製造的物品遠過于他的生活費用，他的工資。工資以外的物品價值叫做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剩餘價值原是勞動者所製造的，論公道原是勞動者所應得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却都被資本家取去做利潤了。所以勞動者是失主，資本家是強盜。資本也有兩種：一是有定資本，（Constant Capital）如建築原料機器等等，是不能生產的；生產的是變動資本（Variable Capital）

就是用在有定資本上的勞動。所以凡不勞動的人都不能生產，都是寄生蟲。出錢的資本家和買賣貨物的商人都不能產生利潤（profit），利潤是勞動的剩餘價值。

我們仔細分析起來，馬克斯的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價值是製造物品平均所必需的勞動。我們用甚麼來量這種勞動？馬克斯說用物品的售價。但是售價是根據甚麼的？馬克斯說是平均所必需的勞動。然則我們是鑽在一個太極圈子裏。不但如此。若是生產單靠勞動，所謂「變動資本」，然則幾個工廠有同樣的有定資本，勞動者越多，生產力越大。但是誰都知道事實上不是如此。從事實看起來，現代社會是很複雜的。價值是從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產生的，很難追求每人製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結果使得生產的價值超過每個人生產總數的價值。沒有問題交換——供給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價值。

但是我雖然不相信馬克斯的價值論，我決不否認馬克斯對於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貢獻。他做「資本論」的時候正是十九世紀中葉工業發達的初期。他眼看見社會生產的工具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資本家所得的利潤與勞動者所得的工資，沒有絲毫的公道的比例。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窮人不但是窮，而且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不給資本家做工

，勞動者就要餓死。資本家有資本，縱然有損失，不會餓死。所以勞資間的交涉，絕對不能平等的。因為窮的原因子弟不能受充分的教育，政治不能與聞，法律不能享受，生命完全在富人的手裏。馬克斯又看得很清楚，資本家為牟利起見不得不把工人集中在工廠。因為集中，所以容易團結，工人慢慢的反抗起來。於是資本家利用科學發明來改良機械減少勞動的需要；于是有定資本愈多；「變動資本」愈少。前者使小資本家不能存在，生產的工具更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後者使勞動供過于求，失業的人數永遠增加起來。結果是多數人購買力頓減，生產過多，消費過少，常常發生恐慌。而且因為自由競爭的關係，不能不設法壟斷國外的市場，霸佔原料的來源，建築關稅的壁壘，總有一天要發生戰爭；總有一日勞動階級覺悟了聯合起來把資本階級完全推翻。馬克斯痛恨社會的不平等，所以要鼓動階級戰爭；因為要鼓動階級戰爭，所以造出他的價值論來證明勞動者為失主，資本家是強盜。他的價值論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

我們知道了馬克斯的價值論是政治的口號，然後可以了解他的經濟學說的勢力。因為這種學說是應運而生的，是適合于時代要求的。平等的觀念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深入

于人心；而十九世紀以來的經濟制度是完全不平等的。所以許多人不是馬克斯的信徒而一樣的主張經濟平等，主張國家來統治生產的工具。他們與共產黨主張不同的點是他們不相信馬克斯的價值論，不積極提倡階級戰爭。

共產黨不但主張階級戰爭而且極端的相信這種戰爭的結果勞動階級一定勝利。他們的自信心是從唯物史觀來的。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是很簡單的：凡一切社會中的思想制度，都是從經濟制度產生的。資本家把生產的工具拿在手裏，所以國家的法律警察都是保護資本家的。宗教是麻醉勞動者的鴉片煙。哲學是資本制度的辯護士。這一種歷史觀也不是共產黨所獨有的。共產黨和別人不同的點是從辯証法得到的歷史邏輯(Logic of history)。辯証法是黑格爾所用的哲學方法。黑格爾以為歷史是演進的。指揮演進的是思想。演進有三個程序：正面論(thesis)，反對論(antithesis)綜合論(Synthesis)。思想是時代的產兒。應時而生的思想第一步是正面的。但是當正面論產生的時候已經潛伏了反對論的根子，因為這是論理的天性。凡思想都有反正兩面的：例如說到愛就聯想到恨；愛是正面，恨是反面。況且時代是變動的，演進的。不久正面論漸漸與時代不適宜。反對論起而代之。兩種相反的思想交戰的結

果，綜合論發生。馬克斯採用了他的方法而放棄了他的內容。黑格爾以為歷史演進的原動力是思想，馬克斯以為是經濟制度。資本主義是正面，階級戰爭是反面，戰爭的結果是無階級的社會制度發生。當資本主義初發生的時候，牠已經種了牠滅亡的根子，因為牠一定要壓迫勞動者纔能榨取利息。榨取的結果一定要引起反抗，發生階級戰爭。戰爭的結果勞動階級一定要勝利的，因為照辯証論的論理——共產黨的歷史論理，反面總要推翻正面的。勞動階級得勝以後，無階級的社會制度一定要實現的，因為照辯証論的論理反對論以後是綜合。不過馬克斯知道以階級戰爭到無階級社會制度一定要有一個過渡，這個過渡就是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共產黨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斯的價值論和唯物史觀。從唯物史觀共產黨又得到他們革命的手段。現在的生產工具全在資本家手裏。國家組織不過是保護資本家的武器。平民政治完全是假的，因為經濟不平等，平民政治是不可能的。從歷史上看起來，要使得有政權的階級放棄政權，惟一的辦法是暴動的革命，所以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制度只有階級戰爭。凡有主張和平的，漸進的，憲法的改革的人都

是共產黨的敵人。最後的勝利總是共產黨的，有歷史的羅

轉爲證。在階級戰爭期中爲目的完全不擇手段，要不然戰爭不能勝利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武器，所以第一步是用革命手段來握政權。一旦拿到政權，用資產階級的武器來消滅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必要的過渡。在這過渡期中爲鞏固政權起見，絕對的不擇手段。恐怖政策是必需的手段之一，因爲不如此資產階級不會消滅的。共產黨的殺人與資本階級完全不同。因爲資本階級的殺人，不過使得階級戰爭延長，所以是極不人道的。共產黨的殺人是要使階級戰爭縮短，是以殺人來消滅殺人，是最後一次殺人，因爲資本階級完全消滅了以後，無階級社會產生以後，就永遠沒有殺人的必要了，所以是極人道的。在過渡期中，平民政治完全不能適用，因爲無產階級雖然是多數，因爲受了資本制度的壓迫和麻醉，一時不能使他握政權。只好以少數的共產黨來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因爲共產黨是這階級中最優秀，最有決心、訓練，組織的分子，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無產階級受過共產教育以後，脫離資本制度束縛以後所要做的政治。等到無階級社會實現，各人就各人的能力對社會服務，各人就各人的需要受社會酬報，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資本制度的政治機關都用不着了。但是在這種社會沒有實現以前，共產黨不但不能取消這種機關，而

且要變本加厲，加倍的利用。

簡單講起來，這是共產黨的理論和手段。以我們非共產黨的眼光看起來，理論和手段都不能使我們信服的。我承認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包含一部分的真理。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平等的要求已經變成爲普遍的心理。在任何制度之下，完全違反這種原則，是很難維持社會的安寧的。所以我們對於現行的資本制度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馬克斯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得太單簡了。他以爲世界上只有兩種階級：資本家和勞動者。事實上這兩種階級之間，有許多的過渡階級，很難把他們分類。馬克斯的勞動者的定義是廣義的，包括勞心者在內，因爲他認他自己爲勞動者的一個。然則如近來托洛司基做他的自敘傳，銷路極好，他的收入比普通工廠的經理要高的多。托洛司基是否還是勞動家？許多的英國工人多少不等有點儲蓄，有股票證券之類的財產。他們是否是資本家。資本家坐享利息一點事不做的固然很多，但是同時管理工廠，或是做專門技術的人也是不少。他們究竟要歸在那一個階級？生產工具漸次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但是這往往是權力的集中，不是利潤的集中，因爲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分往往在許多人手裏，決不是如馬克斯講的那樣單純。馬克司說資本主義的結果窮人越過

越窮。但是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于馬克斯做「資本論」的時候，誰也不能否認。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國家的失業津貼還遠高于蘇俄的工資。這又將何說？不錯，有幾點都是細目，但是很重要的細目，足以表示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正如我們批評馬克斯價值論的時候所說的話：在分工合作之下很難追求每人所製造的價值的成分。社會既如此複雜，要改革牠決不是單純的方法所能奏效的。

馬克斯的唯物歷史觀也包含大部分的真理。許多思想制度都是經濟制度的產兒，誰也不能否認。但是經濟制度能產生思想，思想也產生經濟制度。如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人是資本家奧溫（Robert Owen）。馬克斯假定人人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人都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甚麼的。這兩點都不的確的。馬克斯自己是中產階級人家的子弟，爲甚麼他要著書推翻中產階級？蘇俄的共產黨的首領有不少的是貴族。他們爲甚麼要鬧共產革命？不錯這些人都是少數，但是他們影響社會的能力都遠出于多數之上，不可以抹殺的。馬克斯大半生住在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如果階級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英國人爲甚麼准他出版他的「資本論」，爲甚麼他的共產黨的宣言書沒有變爲

禁書？難道英國的資本主義家是癡子？馬克斯說英國人的自由主義是放任經濟（Laissez faire economics）和自由競爭的產兒。這話是不公道的。自由主義和平等主義同是法國大革命的成績。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所以我們雖不敢說不經共產黨式的革命，平等一定可以實現，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某種環境之下和平的革命未必不可以成功。不錯，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統治階級和平的把政權讓出；政權的轉移，總是要經過劇烈的奮鬥，但是這種奮鬥不一定要如蘇俄的形式。十八世紀法國的封建制度經了大革命的恐怖，方始推翻。但是以後歐洲許多國家都和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裏轉移到中產階級手裏。共產黨的革命在蘇俄是極殘酷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說在其他各國一定要如蘇俄一樣的。

我說我們沒有理由，這是假定我們不相信從馬克斯的辯證論能找出不可變易的歷史論理。我個人根本不相信歷史有甚麼論理。羅素說得好：「世界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是由物質環境和人類的情感所決定的」。物質的環境各國不同，已經够複雜的了，何況人的情感是隨時隨地不可捉摸的東西。硬把不可捉摸而且很複雜的東西來做成刻板的規律，而且拿牠來做暴動恐怖殺人的根據，那是多們危險？共

產黨是最反對宗教的，而共產黨的信條和宗教的教旨實際沒有分別。辯證論和歷史論理的無法證明和宗教的上帝天堂一樣。在過去的時期中宗教用上帝天堂的名義來燒殺，現在的共產黨拿歷史論理的名義來槍斃。所不同的是宗教是爲人謀來世的幸福，共產黨是爲人謀後世的幸福。來世固然靠不住，請問後世的幸福又有多大的把握？

托洛斯基有一句最可笑的話。他說，「赤色的恐怖是對付命運註定要消滅而不願意消滅的階級的武器」。（

“Red Terror is a weapon utilised against a Class, doomed to destruction, which does not wish to perish”）

。他不知道照共產黨的歷史論理，資產階級雖然命運註定了要消滅，照別人的歷史論理，或者共產黨也是「命運註定」了要消滅的。你有你的歷史論理，他有他的歷史論理，橫豎誰也不能證明誰是對的。「殺人者人亦殺之」，這一個公例，比辯證論準確的多！

辯證論是一種哲學上的假設。儘管共產黨說牠是科學的，學科學的人不能承認。如果我們不承認辯證論所得的結果，馬克斯的兩種預言都發生問題。第一我們何以能知道階級戰爭的結果一定是共產黨勝利？不錯，在俄國是他們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是有特別原因的。舊俄經過三年

苦戰，兵士厭惡打仗，農民希望分田，貴族糊塗墮落，和平派愚暗無能，所以把政權輕輕讓共產黨搶到手了。在西歐北美的國家中產階級的組織遠不是舊俄可比。他們眼看見蘇俄的慘劇——不但自己本身槍斃或是餓死而且連子孫都降爲怕民，不准享受公權和教育。他們又豈肯束手待斃？近代的戰爭內戰和外戰一樣的殘酷。他們手裏有汽車，坦克，飛機，和毒瓦斯。戰爭起來，沒有武力的勞動階級有幾分機會可以僥倖成功？縱然能成功，工業和文化的設備經過長期的戰爭，大都已经變爲焦土。新政府的資本也不過剩了幾根雞肋了。

第二共產黨訓政以後，我們何以知這平等自由無階級的社會一定可以實現？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的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但是替代牠的是共產黨統治的階級。不錯，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產黨都可以承認的。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統治者住的房子，吃的東西，坐的汽車，那一件是普通人所能夢想的？托洛斯基放逐到中央亞細亞的時候，書籍家具是一列專車裝了去的。足見得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嘗過這種滋味的共產黨誰能保他將來肯拱手而放棄他的權力——權力和金錢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縱

然開國的幾位元勳，志行堅定，不爲毒藥所麻醉，誰敢保他們繼任的人一定能和他們一樣？因爲訓政的時期是馬克斯列寧所沒有規定的，一定是很長的。共產黨受了權力毒藥長期的麻醉，誰能保他們一無變化？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半路上未必不會走錯的。何況恐怖未必真是到自由平等的路呢？

平等我不知道，自由則我極端的懷疑。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很難取得的。訓政的時期久了，人類也忘却這種幸福了。蘇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的。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今天說這是資產階級的餘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寧學說違背。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一樣，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都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的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反過來說，如果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得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產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劇烈的階級戰爭，西歐北美都要共產，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澈底改變，快快的走

上平等的路去。

○ ○ ○

現在我要講到中國的共產黨了。在這個以前，我們先要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一部分。共產黨是相信世界革命的。托洛斯基還相信所謂永遠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他相信如果世界革命不能成功，蘇俄也不能立足。這是他和司太林分裂的一個原因。但是這不是說司太林不相信世界革命。要希望達到這個目的，蘇俄組織了所謂第三國際，把世界的共產黨都包羅在內。凡要加入第三國際的一定要自稱爲共產黨，一定要遵守第三國際所定的黨綱，而且要服從牠的命令。在一國以內只能有一個黨。第三國際的下議院是世界大會，每年開會一次。各國的共產黨看他的實力如何得有若干票數。開會的時候一切可以自由討論，但是投票決定以後，不論各黨原來意見如何，一定要絕對的服從。世界大會能決定黨的大政方針，接受黨的報告，但是當然不能執行任何事務。執行的機關是執行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人數普通是四十五。其中只有五個是蘇俄國人，但是經費是蘇俄出的，蘇俄共產黨完全可以指揮牠。執行委員的權限極其廣大。各國的共產黨不能違背牠的命令。不但如此，執行委員會可以派代表到各

國的共產團體說明，並且執行牠的議案。該國的共產團體雖然與代表意見不同，不能反對。各國的團體或是個人有對於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不滿意的可以向世界大會聲訴，但是執行委員會有權可以禁止團體或是會員出席世界大會。執行委員又選出若干人爲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執行委員的主席。執行委員會之下還有許多機關。最重要的是組織部和秘書廳。組織部是第三國際的參謀部。凡有具體的計畫都是從這個機關產生的。

由此看起來，中國共產黨不過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舉動不能自由的。莫斯科是共產主義的羅馬，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地位很像教皇。中國共產黨就譬如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教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當然不能離開第三國際而對於中國共產黨有任何的希望。我以下的話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員個人說的。

我第一個希望當然是請他們把我對於共產黨的主義和手段的批評平心靜氣的考慮。我對於共產主義表相當的同情，但是對他們的手段絕對的反對。因爲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預言，而共產黨的手段一部分是從馬克斯的預言產生的。馬克斯預言的不可盡信是很容易証明的。我已經說過，馬克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使窮的人越窮，而事實上西歐

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紀中葉增高得很多。我現在再舉一個例：馬克斯說共產革命一定是先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發生，而事實上是在工業最落後的俄國。我很希望中國共產黨員想想馬克斯最重要的兩種預言：（一）共產暴動一定勝利，（二）勝利之後自由平等的無階級社會一定實現，是否可信。至少我們是否應該根據這種預言和辯証論所產生的歷史羅輯來犧牲數十萬百萬人的性命。實行共產主義——求經濟平等——是否還有別的途徑，至少是否要等別的途徑都走不通再從事于暴動。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員仔細想想在第三國際的鐵腕之下，中國共產黨是否能達到牠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國際除去鼓動世界革命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蘇俄並不利用第三國際來謀蘇俄一國的利益。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複雜的，從莫斯科發號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們看第三國際對於英國共產黨的處置就可以知道這種制度的弱點。在一九二六英國總罷工的時候，英國工黨完全謝絕與第三國際合作，因爲共產黨完全不知道英國的國情，處處失却同情。這是因爲莫斯科以馬克斯列寧的遺教爲天經地議，強把不相符的事實來湊合他們的教旨。對於相距比較近，言語容易通的英國尚且是如此，何況中國。不錯，世

界大會的時候你可以發言，但是一年一次的大會，如山的報告和議案，關於中國問題以你的經驗看起來，是否有機會通過你的主張？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把俄國的革命史與中國的國情來做一個詳細的比較。人都說俄國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然而一九一七俄國已經有七萬公里的鐵路，組織極密的警察，與德國作戰三年的軍隊。一旦革命，共產軍沿鐵路走到那一站，共產政府的命令就推行到那一站。秘密警察轉手而變為共產黨的武器。二萬個舊軍官加入蘇俄對外的戰爭。我們以精神文化立國的中國，本來就只有一萬公里的鐵路，而有四千多公里在東三省。假如共產政府在長江成了功，牠的勢力用甚麼方法來達到全國呢？不能建設統一的政府，共產黨能在中國立足嗎？中國的警察組織能奉行蘇俄 G.P.U. 的職務嗎？我們最好的軍隊，共產黨所畏懼的軍隊，對日本作戰，不過三星期就敗退下來。共產黨將來靠甚麼武器來抵抗帝國主義的強隣？一九一七俄國革命的時候，國家銀行的金幣有一，二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有一，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我們中央銀行的現金和儲蓄存款恐怕不到上列數目的十分之一，而且都在租界裏！歐戰以前俄國是出超的國

家，每年的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我們的入超民國二十一年是五萬萬六千萬元。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的田，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於華畝二十五畝。此外還有二萬萬七千九百萬公畝未經試驗。我們可耕的田每人分不到六畝！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我們（除去東三省）差不多一畝全無！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以前每年已經出產到一千萬噸，我們是一噸都沒有！歐戰以前俄國每年出產四百九十萬噸鋼鐵，我們現在的產額不到六七萬噸！所以我們給俄國比，是一個無產可共的國家。照馬克斯的標準，我們不配談共產革命。我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想想，他們有甚麼方法真正使共產革命成功？經濟上財政上的建設從何着手？

因為建設中國共產國當然不是在內地山裏做土皇帝，殺幾個土豪，分幾千幾萬畝田，就算成功的。當然要使中國工業化，使全國生產力增加，生活程度提高的。要達到這種目的，不但要建設強有力的統一政府，而且要能禦外侮，能向外國購買我們必需的工業品和機械。但是從國際情形看起來，這種目的無論如何是達不到的。蘇俄不但有帝國所遺留下來的軍備和軍官可以用來抵禦外兵，而且海

岸線極短，國防比較的很容易。我們中國是靠天吃飯，門戶洞開。九一八以前也許還有人不相信。現在無論何人是不能否認事實的了。日本對於我們的野心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應該知道。目前軍事只限于華北，完全是顧忌其他各國在長江的利益。如果共產軍勝利到了海口，日本佔領中部的機會就來了。我敢預言，共產黨如果到了南京，日本兵一定要到上海。那時候至少英國要贊成牠，也許加入干涉。民國十六年英國兵到上海就是前車。沿江沿海一帶的城市是全國的精華，而敵人的軍艦處處可以開砲轟擊。長江是一條國際共管的水道。江北的共產軍絕對的不能與江南聯絡。豈但沿江沿海，就是華北的八條鐵路也要爲外兵佔領的。這樣封鎖破壞起來請問還有甚麼共產政府可以建設？不錯，從希望世界革命的蘇俄共產黨看起來，帝國主義者佔領封鎖中國，可以增加東方人民的仇恨，是帝國主義者自掘墳墓。無奈這種墳墓是掘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上！我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冷靜的思想，是否值得爲不可捉摸的世界革命，把中華民國送到帝國主義的日本手裏！

總而言之，我不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放棄共產主義，我希望他們從實際政治立場，脫離第三國際，放棄暴動政策，從秘密黨變爲公開黨，要求有公開宣傳主義的自由

。因爲就是要暴動也得等到列寧所說「革命機會成熟」方才可以着手。暴動要成功，也得脫離第三國際的牽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

我還有一點要希望中國共產黨員注意。革命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一件事。暴動成功固然不容易，成功了以後，保持政權，進行改革，更不容易。蘇俄的首領大抵經過很澈底的訓練，對於西歐的經濟，政治，歷史都有深切的研究。凡讀過列寧托洛斯基的文章的人，不管是否共產黨，都能够佩服他們的天才和學識，所以我們知道蘇俄革命的成就不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機會成熟」的時候又過着相當的首領來運用這機會，才能有十五年不倒的政府的。我們回頭看看我們的共產黨首領，他們的知識和天才比列寧托洛斯基何如？別的我們不知道，現在幾個共產黨首領的歷史我們是知道的，宣傳共產的文字我們是看見的。從這幾個首領的歷史看起來，沒有一個在西歐常期住過，沒有一個真正受過近代式的訓練。宣傳品的內容是極膚淺的，刻板式的口頭禪。我至今沒有看見中國共產黨黨員有一個能做列寧托洛斯基或是布哈林那樣的文章。「言者心之聲。」聲這樣不中用，我們不由的對於他們的「心」也發生疑問。要建設中國共產政府不是靠莫斯科所能成功的，還一

定要我們自己有自己的首領。我希望中國共產黨員至少要覺悟他們知識的落伍，要努做中國共產黨的首領，對於西歐的文化一定須有充分的研究，對於近代的統治組織方

知識階級與政治

蔣廷黻

我這裏所講的知識階級是指專靠知識生活的人，那就是說，指一般以求知或傳知為職業者。這個階級包括教育界及輿論界。此外政界及法律界與知識階級最近，且最容易混合。工商醫界距離較遠，但其中亦常有人著書立論，以求影響一時的思潮；這類的人當然也要算為知識階級的。

知識階級與政治的關係固極重要，但不可言之過甚。

在中國，因為以往讀書的目的和出路全在作官，又因為我們平素作文好說偏激和統括的話，於是許多人把救國的責任全推在知識階級身上。自我們略知西洋歷史以後，一談法國革命就想起盧梭；一談蘇俄革命就想起馬克思和列寧。這些偉人不是知識階級的人物麼？他們所作的掀天動地的事業，我們也能作；至少我們這樣講。九一八以後，因為大局的危急，國人對知識階級的期望和責備就更深了

法，一定須有豐富的常識。不然，單靠莫斯科發下來的小冊子，跟着人家喊口號，中國共產黨永遠是不懂我們國情，固守馬克斯列寧教旨的第三國際的犧牲品！

。我們靠知識生活的人也有許多覺得救國的責任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我們不負起這個重擔來，好像就無人願負而又能負了。這樣的看法自然能給我們不少的安慰。

可惜這個看法忽略了幾個基本事實。第一，知識的能力雖大，但是也有限度。利害，感情，習慣，羣衆心理往往抵消知識的能力。歷史家研究革命者並不全歸功或歸罪於某思想家。第二，中國人們受過教育的太少了；思想的號召所能達到的是極有限制的。並且中國人太窮了，對於許多問題全憑個人利害定是非。第三，我們的知識階級，如國內其他階級一樣，也是不健全的。許多忙於為自己找出路就無暇來替國家找出路了。我說這些話不是要為我們開脫責任，不過我覺得政治是全盤生活的反映，救國是各階級同時努力湊合而成的。知識階級當然應負一部份的責任，甚至比其他各階級要負較大一部份的責任。但是一個

階級，如同一個私人，倘不知自己的限制，事事都幹起來，結果一事都無成。或者因為我們要負全責而事事上又不能，就置國事於不聞不問了。有些因此抱悲觀，幾於要自殺。

在未談知識階級究竟對於政治的改良能有什麼貢獻之先，我可指點出來兩個事情是知識階級所不應該作的。

第一，我們文人，知識階級的人，不應該勾結軍人來作政治的活動。幾十年來，文人想利用軍人來作政治改革的不知有了多少，其結果沒有一次不是政治未改革而軍閥反產生了一大堆。康梁想利用軍人來改革，於是聯絡袁世凱。到戊戌變法最緊急的時候，袁世凱只顧了自己陞官的機會，不惜犧牲全盤新政。我們絕不可說康梁是瞎眼的人，因為康梁的眼光並不在一般人之下。甲午以後，中國號稱知兵的人要算袁世凱的思想最新。光緒末年，新知識界的人由袁氏提拔出來的很多，新政由他提倡的或助成的也是不少。如果康梁可靠軍人來改革，那末，無疑的他們應該找袁世凱。康梁以後的政治改革家，雖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則如出一轍。運動軍隊和軍人是清末到現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動的惟一的法門。倘孫中山先生今日尚存在，看見現在中國這種可憐的狀況，他不會懊悔靠軍人

來革命麼？

中國近二十年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武人思想比較簡單，慾望亦比較容易滿足。文人在一處不得志者，往往羣集於他處，造出種種是非，盡他們挑撥離間之能事。久而久之，他們的主人翁就打起仗來了。他們爲主人翁所草的宣言和通電都標榜很高尚的主義，很純粹的意志，好像國之興亡在此一舉。其實這些主義和意志與他們的主人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些宣言和通電，有許多是他們的主人翁看都不看的。主人翁幸而得勝了，他們就作起大官來。不幸而失敗了，他們或隨主人翁退守一隅，以求捲土重來；或避居租界，慢慢的再勾結別的軍人。民國以來的歷史就是這個循環戲的表演。這樣的參加政治——文人參加政治的十之九是這樣的——當然不能使政治上軌道。

第二，知識階級的政治活動不可靠「口頭洋」。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當作學術來研究是很有興趣而且很有價值的，當作實際的政治主張未免太無聊了。愈講這些制度和思想，我們愈離事實遠，而我們的意見愈不能一致。我們現在除中國固有的制度和學說以外，加上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的學生所帶回的美英法德俄日的各時代各

派別的思想和所擬的制度，我們包有中外古今的學說和制度了。難怪這些東西在我們的胃裏打架，使我們有胃病。

我常想假使中國從初派留學生的時候到現在，所有學政治經濟的都集中於某一國的某一個大學，近二三十年的紛亂可以免去大部份。其實這些學說和制度在講者的口裏不過是「口頭洋」，在聽者那方面完全是不可懂的外國話。我們的問題不是任何主義或任何制度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是飯碗問題，安寧問題。這些問題是政治的ABC。字母沒有學會的時候，不必談文法，更不必談修辭學。

談有什麼好處呢？自從回國以後，我所看見的政變已有了許多次。在兩派相爭的時候，雙方的主張，倘能實行去來，我看都不錯。經過所謂政變以後，只有人變而無政變。所以我們的政變簡直是愈變愈一樣。使我最感困難的是兩派中的領袖都有誠心想幹好的；他們發表政治主張的時候，他們也有實在想作到的，並不是完全騙人。無非甲派所遇着的困難——政府沒有錢，同事要掣肘，社會無公論，外人要侵略等等——並不因為乙派的上台就忽然都消滅了。如果我們政治的主張都限於三五年內所能做到的，我們意見的衝突十之八九就沒有了。以往我們不談三五年內所能做，所應做的事，而談四五十年後的理想中國，結

果發生了許多的爭執，以致目前大家公認為應做而能做的，都無法作了。

在政治後進的國家，許多改革的方案免不了抄襲政治先進的國家。在社會狀況和歷史背景相差不遠的國家之間，這種抄襲比較容易，且少危險；相差太遠了，則極難而又危險。俄國與歐西相差不如中國與歐西相差之遠，但在俄國，知識階級這種抄襲已引起了許多的政治困難。蘇俄革命以前的十餘年，俄國政黨之中最有勢力的莫過於立憲民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簡稱Cadets）。當時俄國的知識階級幾全屬於這一黨。他們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即普選，國家主權在國會，責任內閣，及人權與民權。這個方案與俄國百分之八十的人民——農民——全不關痛癢。農民不但想當議員閑員，連選舉權也不想要。至於人權：如言論自由，他們就無言論；出版自由，他們並不要出版。他們所要的是土地，而關於這一點，立憲民治黨確不注意了。這一黨的人才盛極一時：辦報，發宣言，著書，在國會裏辯論這一套是他們的特長。假使生長在英國，他們很可以與英國自由黨的人才比美。生長在俄國，他們總不能生根。他們的宣傳，很像中國學生在學校裏貼標語一樣，是對團體以內的；對於外界就絕無影響了。

在俄國歷史上，這一黨惟一的貢獻是為共產黨開了路。盡了這點義務以後，牠就成了廢物。中國的知識階級大可不必蹈俄國立憲民治黨的覆轍。

知識階級不能單獨負救國的責任，這是在上文已經說過的。但是有兩件事是我們應該努力去作的。第一，中國不統一，內亂永不能免；內亂不免，軍隊永不能裁，而建設無從進行。近幾十年來的內亂，文人要負大部份的責任：我的理由已經說過。但是不勾結軍人來作政治活動還不能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積極的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牠是中央。我以為中國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牠不滿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為政的好，即使這三四個小朝廷好像都是勵精圖治的。我更以為中國要有好政府必須自有一個政府始。許多人說政府不好不能統一；我說政權不統一，政府不能好。

現在政府的缺點大部份不是因為人的問題，是因為事的問題。我們既沒有現代的經濟，現代的社會，現代的人，那能有現代的政治？那末，要建設現代的經濟社會，培養現代的人民，這不是亂世所能幹的事。同時只要有個强有力中央政府能維持國內的安寧，各種的事業——工業

，商業，交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會進步。就是政府採取胡適之先生所謂「無為」的主義，這些事業也會進步。現在國內各界的人士都有前進的計畫和志願。因為時局不定，誰也不敢放手作去。

同時所謂中央政府的缺點，許多因為牠是中央；全國注目所在，一有錯處，容易發現，關於中央的新聞比較多且佔較要的位置；局面較大，因之應付較難。民眾對於內戰和內爭的態度，如同對國際戰爭一樣，總是表同情於小者弱者。實在中央政府大概說來要比地方政府高明；並且中央的缺點，既基於事實，不足換了當局者就能免除的。

第二，我們知識階級的人應該努力作現代人，造現代人。現代人相信知識，計畫，組織。現代人以公益為私益。現代人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現代人以體格與精神是整個而不能分的。中國近幾十年來，女子的近代化的進步較速於男子的近代化。男子，青年的男子，還有許多頭不能抬，背不能直，手不能動，腿不能跑；從體格上說，他們不配稱現在人。從知識上說，我們——男女都在內——還是偏靠書本，不靠實事實物。許多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知識，什麼不是知識；關於什

麼問題；我們配發言論，關於什麼事體，我們不配發言論。曾未學醫的人，忽然大談起藥性來。曾未到過西北去的人，居然擬開發西北的具體計畫。平素絕不注意國際關係的，大膽的要求政府宣戰。一年級的學生能够告訴校長大學應該怎麼辦。從未進過工廠的人大談起勞資問題來。不知一六五〇年是在十七世紀的人硬要說歷史是唯物的。現代人的知識或者不比中古的人多，但真正的現代人知道什

麼是他所知道而可發言的，什麼是他所不知道而不應該發言的。以上所舉的例子足够表示我們離現代化的遠。換句話說，我們這個階級自身是極不健全的。分內的事沒有作好，很難干涉分外的事。自身愈健全，然後可以博得他界的信仰。倘若近數十年中國教界的人和新聞界的人有了上文所舉的現代人的特徵，我們的政治也不得壞到這種田地了。

定縣農村中見到的平教會事業

衡 哲

我到定縣去參觀，一半是因為要踐一個三四年來的長約，一半也是因為覺得像平教會一類的工作，確是目下救濟中國的根本事業之一。我于四月二日的中午，同著一位觀光中國的美國人，諾女士，在車站裏會齊了平教會的總幹事晏陽初先生，一同乘平漢路車，由北平起身。車子走了八小時，誤了兩個鐘頭，到定縣已經是晚上九點半了。那晚我們即住在晏太太的家裏。明天四月三日，我們便由平教會中諸位領袖的引導，去參觀及參聽了他們會所內的種種工作，如社會調查部，平民教育部，藝術部，無線電部等等。第二天四月四日，我們參觀參聽了平校同學會的

工作，及新設的一個醫院，叫做保健院的。下午我一人獨自去看了又聽了農場的種種事業。回來後，便同著晏先生夫婦，諾女士，平教會的英文秘書，美國金女士和農場主任姚先生，一行六人，出定縣的東門，到一個鄉村去參觀。自四日下午六時至五日下午七時，二十五個小時是都消磨在三四個鄉村間的。這經驗在我個人是一個詩情夢境，在平教會給我的印象上，也是一個最有價值的成績，一件最切實，最具體的工作。故我現在特別的要把這一段的見聞與感想寫下來，關於平教會的整部的計畫與事業，只好暫付缺如了。好在本刊的第四期，曾載過一篇濤鳴先生的

『定縣見聞雜錄』，讀者如欲了解這篇記載的背景，不妨把他參考一下。

出發的時候，我和晏太太及諸女士，是乘的洋車，金女士和姚先生，是騎的自行車，晏先生是騎的一匹小驢。

我們大家穿了一件老布褂子，在初夏的斜陽中，向著矮矮的城牆出發。一路但見一塊塊的黃土地，夾着一塊塊的碧綠麥浪，在那四望無際的平原上盪漾着。原來定縣土壤平常，擊井又少，常遇旱災，農產不豐。後來經過華洋義賑會的提倡，方才開了許多水井。水井的數目，據調查部的報告，全縣約有井六萬口，全縣六萬餘家，每一個人家小均可以分到水井一口。這乾枯的統計，靠了這些青苗綠浪的襯托，方把華洋義賑會的那件福利農民的事業，具體的表現了出來。當我正在欣賞這些水井和麥浪的時候，忽然

有一個更爲美麗的現象，把我的視線往上移。啊！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白楊林！他們是那樣的清麗，那樣的秀挺，一眼望去，玲瓏瀟灑，竟是一幅充滿詩意的圖畫。我差不多忘記了這沙壤地不見曲折流水的大缺憾了。

我們這樣的走着，經過了一二個小村落。到了七點一刻，方走近了我們的目的地，西建陽村。將要近村的時候，忽見對面林子旁邊，站立了五六個農村少年，一例

穿著大布褂子。有的身上還帶著一塊黃布做的徽章，問起來，方知道他們都是平民學校卒業同學會的職員。我們跟着他們，走進了一所房子。只有大門上掛着兩個牌子，一個是平校同學會，一個是保健所。此時同學會的人越來越多了，大家把我們歡迎到一間課室裏去。那間屋子約有一丈五尺寬，二丈深。還有一排一排的桌子，却都是用一塊木板架在土磚疊成的架子上做成的。另外還有多張三四寸寬的板凳，我們便在那上面坐了下來。後來我們知道，這些木板，土磚，以及條凳，都是一位村副慨然借給他們的。此時那小室已是擠得水洩不通了，但沒有喧嘩，沒有爭吵。

我們坐下之後，便有幾位同學會的職員，向我們報告他們的活動。原來平教會的社會式教育，差不多都是由同學會助辦的。他們所做的事業，有息訟會，戒賭會，拒毒會，互助會等等，成績都很好，有一位少年對我們說，『咱是這樣的去幫助同學們的。比如有一個人沒有屋子住，又請不起人去幫他做工。咱兄弟們便動手爲他去蓋，到了吃飯的時候，咱便回家自吃了。這樣，一口飯也不吃他的，他的房子可蓋好了。』

我們聽完了許多類似的報告後，便到保健所去參觀。

那時已是晚上，已沒有病人來求診，但我們却聽到了一件裏。

值到深思的事，不可不把他記下來。這是所中的主任，王大夫，向我們說的。他說，有一個小孩子去看眼疾，是眼上生翳的毛病。王大夫叫他天天去，但他却是每三天去兩次。後來經過了一個月的施治，仍是一點效驗也沒有。王大夫看他營養不夠，便問他吃的是什麼。他說，冬天吃椏皮，現在樹上發葉了，吃的是樹葉子。王大夫又問他，那掛號的兩大枚是那裏來的。他說，他家裡有三隻雞，每三天一共下兩個蛋。他把那雞蛋賣了，方能去掛號看病，所以他三天只能去兩次。王大夫聽了這話，便告訴他，以後來看病不必掛號了，但他必須把省下來的雞蛋自己吃了。那孩子豈有不願的道理？『這樣的看了半個月』，王大夫說，『那眼翳已差不多全好了。』我聽了這一個故事，不但深刻的了解到民間疾苦是怎麼一回事，並且還因此明白，常識與同情，是怎樣的比了專門技術還要緊。

晚上九點鐘，是平民晚校上課的時候，我們也去參觀了。因為現在是農忙的時候，故須到此時方能上課。一室中有五六十個少年，却沒有一個不是聚精會神的看著書，聽着講，秩序與精神，都好極了。他們讀到十一點鐘方回去。有的自別的村子來的，還要走好幾里路，才能得到家

裏。

我們今晚參觀的各處——同學會，保健院，平民晚校——都是在一大房子內的。那時月光很好，我們又在月光中去了院旁的一個無線電室，那收音機也是平教會藝術部製的。那時正在放送由南京來的新聞，字字清晰，證明了自製收音器的效能。那室不到一丈見方，牆上滿是泥土，窗紙又黃又破，梁上也掛滿了灰塵與破紙，當我坐在土坑上，聽着日本進兵遼東的新聞時，心中真有無限的感觸。在這樣窮僻的鄉村，不料竟有聽到國家大事消息的機會。

後來我們又被邀請到了一個廣場，看同學會的武術表演。月光照着大地，場的四周站立了數百的男婦老少。我們坐在為我們特別預備的兩條狹板凳上，看兩三位壯健的少年，拿着真刀真矛，往來比賽。我心中不免害怕起來，但環境與情事，又是那樣中古式的引誘人，使我不得不把他看完。

到了十一時，我們才離開了這個村教育的中心點，走到一個村副的家裏去，在他的客廳裏安睡。但是，一個自鳴鐘是那樣驕傲的響着，月光是那樣的皎潔，我個人是萬難睡着了。到了半夜的時候，忽然又聽見了鎗聲，大家便

都醒了，并且不免起了戒心。明天起來，方知道那鎗聲是同學會的職員放來對匪示威的。因為這是村中第一次有女客來住過夜，同學會便派了十多位壯丁，在我們的周圍，通夜巡邏。我們知道了這件事，大家自然更爲感動。

明天是四月五日。我們便在王大夫的院子中，吃了晏太太帶來的早餐，預備出發。數十位的平校同學，率領着村民，站在路的兩旁，向我們一個個鞠躬作別。我們走過了幾個『標準農家』，看到了他們改良的果樹與鷄豬，這自然又是平教會基本成績之一。約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到了高頭村。

高頭村是平教會實驗區域中心點之一，公民教育的主任，陳筑山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及兩位女公子，即是住在此地的。他們所辦的事業，大抵是偏重家庭教育，而非注重讀書的。他們有家長，主婦，青年，閨女，及兒子的五種聚會。他們靠着這些聚會，把做人治家的常識，合作的方法與精神，灌輸到了村民的腦筋中。又幫助他們發展手工藝術，改良紡織技能與機器，引進了從前未有的羊毛織業。他們教本村的閨女去學習教養兒童，使她們一方面能得到合作的意義，一方面能『學養子而後嫁。』

指導這些家庭活動的領袖，有好幾位是女的。一位是

趙夫人，她教的是衛生常識。她是平教會文學部趙水澄先生的夫人，她自己從前是在南開女中教過書的。還有一位丁女士，是教兒童們活動的，附帶着訓練閨女們對於兒童的教育。此外如陳筑山夫人，及陳小姐張夫人，也都在這家庭教育中，盡種種的義務。這諸位女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她們又都是那樣的樸素，那樣的犧牲了都市的繁華，來到窮僻的沙漠中，爲女界放一點光明。我看看她們，又看看都市中的那個婦女們自己所組成的動物園，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我但有對於這一羣住在農村的女士們，以及住在等于農村的定縣城內的晏夫人，遙寄我的敬意，遙祝她們的成功。

我們到高頭村的時候，正當她們開著主婦閨女聯合會，趙夫人正在對她們講衛生常識。我進去之後，也爲她們說了幾句話，隨後我便問，『你們還纏足嗎？』——此次在鄉村二十五小時，不曾看見一個纏足的閨女——一位面孔圓圓，頭髮灰白，很大方的中年婦人，回答說，『不纏了。自己吃够了苦，還讓自己的閨女們吃嗎？』後來才知道，她原來是主婦會的主席。我又問，『你們能寫信嗎？我很願意給你們通信。』那些閨女們聽到我的這句話，立刻面上發出了奇異的光彩，眼睛中閃出了歡樂。即有兩位青年

女子，曾經在平民學校讀過四個月書的，自動的當場給我寫了兩封信。我現在一字不移的抄下一封來。

陳先生 今天陳先生來本村參觀。我們都歡迎之至。並且給我們演講。我們非常榮幸。叫我們常和陳先生通信。也非常的願意。 段桂珍

後來我又知道，這封信的作者，即是本村閨女會的會長。吃過中飯，我們便在村中走走看看，順便又看了平教會所辦的紡織事業。忽見在村的大路上，豎着一塊黑板，上面寫了公佈的新聞，即是昨晚從無線電室中抄下來的。第一項是國內新聞，與我們昨晚在西建陽村所聽到的是一樣的。第二項是本縣新聞。第三項是本村新聞，其中有一條就是我們今晨要到本村來參觀的新聞。

我們回到陳宅之後，又看了看兒童們在空場上的遊戲。下午三時，方與主人及諸位女士作別，大家向西南出發。又走了約有半小時，到了一個村子，叫做西平朱谷的。那裏有一個女子實驗學校，但因為農忙，早已停課了，今天是特別由同學會召集的。我們到了那裏，即由本村女同學會會長張女士致歡迎辭。她年紀不過十六七，而口齒流利，言辭文雅，說話的內容，也顯出思想與常識。後來我同晏先生，也向她們說了幾句話，到了六時半方起身進城

。七時到了晏宅，便匆匆吃飯，檢行李，同着諸女士趕到車站，乘當晚的夜車回北平。

我們到了車上，才發現沒有床位，只得坐到飯車裏去。天氣是很冷，我們便叫來兩杯咖啡，又買了一包香煙，喝着吸着，又談着天。後來沒事可做了，諸女士便無聊地去打着字。我却虯臥在那狹座的上面，靜靜的想着。我把這三天的見聞，都搬到了眼前來，對他們仔細的看。看了一陣子，看出了幾個重要的地方。我現在且把他們寫在下面。

此次第一使我注意的，是平教會諸位領袖的犧牲與合作的精神。這精神招徠了許多志同道合的人才，又把他們團結到了一起。舉一個例吧。無線電的技師李先生，據我看來，確是一位機械的天才。請他的地方也很多，他有機會可以得到比在平教會多到五六倍的薪水，但他却寧願在那設備簡陋的小地方工作。這與其說是犧牲，無寧說是愛樂他的這個特種的工作。但這個愛同志，愛工作而犧牲其他一切的精神，當然不是李先生一人所獨有的。我在那裡住了三天，會見了許多人士，看了不少的地方，而最使我感動的，却莫過於這種精神，盤繞着你的左右，把平教會的幾十位同志融成一體，使他們彼此相視如兄弟骨

肉。

第二使我注意的，是平教會種種事業與組織的合乎科學精神。現在且舉幾個例子。平教會的千字課本，是經過了若干次的客觀與主觀的選擇而採用的，這實是一個科學化的方法。在無線電上的創造，據我看來，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成績。他在藝術部主任鄭先生及技師李先生的指導之下，用簡單的方法與簡陋的設備，竟能自己製成功了一個播音機的全部，以及許多收音機。幾個實驗村中所用的收音機，都是平教會本身所供給的。他的代價不過四十元，除了三個真空管之外，一切都是本地人士製的，而却又

沒有一處不是依據了最精確的科學方法與條件。調查部的種種成績，如人口與職業的調查，疾病的種類及治療方法，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的情形，也都有極精確的統計與比較。衛生方面的事業與成績，也是有系統的，是不但科學化而且人道化的。而所謂四大教育的組織，他們中間的互相輔助的地方，也顯出了中國所缺少的組織和他的效能。

第三使我注意的，是一切事業的腳踏實地。似乎平教會的種種事業，都是由實際的需要而發生的，故他們能與人民的生活接近。舉一個例吧。在沒有無線電放送之前，農民是不知道拿什麼東西進城去賣，才能賺錢的。他們只

能瞎碰，碰到供過于求的時候，花了時間與氣力不算，結果還得賠本。自從每晚有無線電的物價報告之後，每一村的農民都知道明早該拿什麼進城去，而他們對於賺錢的可能，也就較有把握了。這在以血汗換窩窩頭的農民牛計上，是多大的一件實惠呵！這個切合需要的辦事精神，足以使平教會的形體與精神合而為一，使他成爲一個活的制度，一件活的事業。

但我也不能沒有疑問與忠告。不過現在因爲篇幅有限，我不能細說了，且擇一兩點來簡單的說一說，作爲本文的結束吧。

我的疑問有兩點，提出來請平教會諸位先生的指正。其一，平民學校卒業後的天才青年，應該給他們找一個怎樣的出路？據我的觀察，此類的青年——男的與女的——爲數並不甚少，我們對於他們究竟有什麼教育的宗旨？讀書呢，還是辦事？在本村學習呢，還是到都市去？經濟上的問題，又應當怎樣的替他們解決？我以為這並不單單是一個升學的問題，乃是一個消息于未來，化有害爲有用的大問題。這類天稟較高的青年們，決不會平庸一世的。他們不爲省士國士，即爲土豪劣紳。平教會所給人民的一點起碼智識，在庸凡少年的身上，大概是有益而無害的，但在這

一類少年的身上，却不能說是沒有危險性了。我的第二個疑問，是關於生育限制的。這件事似乎也有提倡的必要。不錯，我知道定縣的人口是固定的，（見本刊第四期，濤鳴君的記載）但我們却不知道，這固定是天然的還是人爲的，不過後者似乎更爲可能。現在衛生部已有產婦的訓練了，何不把這個問題也歸納到一起呢？我們似乎不應該再把這個一切貧弱疾苦之本的問題忽視吧。

我的忠告，即是我已再三向晏陽初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平教的事業應該向推廣的路上走去。」試驗是永無完結的時候的，定縣的試驗，若沒有一個大規模的推廣計畫來繼其後，則真不免有以手段爲目的之譏了。區區一小縣，即使建設成爲一個烏托邦，又何補于中國全部的貧弱與

疾苦？此其一。其二，定縣有相當的人才與財力，故不妨精益求精，而中國的其他各縣，却連這一點人才與財力也沒有。飢者易爲食，只求養生已足，何敢更求精美？故我以為，平教會應該立刻把他的一大部分的精神，才力，與金錢，移用到訓練青年人才上面去。中國各省的農村，原來是有集團及自治精神的，何況去幫助他們改良生計，農民更沒有不歡迎的道理。他們所苦的，是在消極方面，不會做到減稅減租的地步；在積極方面，又缺少了同情的指導。減輕負擔的事，不在平教會範圍之內，我們現在不說。但訓練與供給青年人才，以爲他日幫助及指導各省農民之用，却是平教會義不容辭的一件大責任。

要在根本處注意

熊十力

適之先生：前爲不抵抗之論寫一信與先生，計可收到。力之所以向先生一言，誠深切感覺中國民族有爲朝鮮安南等等之續，（只此便算滅種，因統治者從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用種種毒惡手段，完全消滅其民族意志，而使其生產力完全變爲牛馬式，供彼侵略與統治者之服役，

自使之萬劫不復，如此民族不謂之已滅，得乎？）吾民族之所以至今日，原因固複雜，若概括說來，或因其文化發展太早，今已入衰老時期，難得振作。然復須知，人固有老當益壯者，民族又何莫不然？力總有一種感想，以爲民族復興的責任全在領袖的自覺方能擔負。不必深談理論，

簡單舉一個例，如元人被明祖驅除塞外，是時元人努力方在鼎盛，并未衰微，若吾族無明祖其人者能領導吾民，開一太平之局，則元人終必能恢復其在中國之勢力，而漢民族將長期爲彼之臣妾，此可斷言也。明祖固多苛刻處，其晚年失德亦不少，然所謂道德純全之瑛賢，亦只是古人理想中之高尚人格，立此爲的而勉赴之耳。古書中所稱頌之大聖哲，設與吾儕並時同處，無論其如何好，吾人終必有其不滿意於彼之處。蓋雖聖哲與天合德，而總不能離「人」而別爲一個天人也。人則陷於形氣界種種，而總不能絲毫無知處也。況彼創業之帝王，稜恃天資，素少學養的機會，及其他紛憂患，腦力過傷，慮事衡人，益易差失，防微備患，反成大錯，其不能完美甚固然。後人讀史，因留心其短，而不暇究其長，故謂漢唐宋明諸祖都如袁世凱輩以流氓盜賊禽獸混合之身，卑劣奸狡，欺騙殘忍，自私猜忌，種種不可名狀之惡德，而以此得有成功。此真愚妄之見，不可與論古今天下事者也。須知袁世凱一流人，無論在今日不能成功，即與漢唐宋明諸祖易時易地而處，吾敢斷言袁世凱定不能有漢唐宋明諸祖之成功，充其量亦不過爲朱溫，尚不得爲曹瞞也。

此話要說便長，姑止於此，想先生或能贊同斯言。力

所以說此一段話者，則以吾國今日之慘禍，萬不得不課其責於領袖。試平情定氣而思，黨軍統一全國而後，無量會議，無量標語，有一言一字見之施行而不爲欺騙人民者乎？政府之成績表見，只有貪污淫侈黑暗欺騙殘酷等等污風迷漫大宇，除此以外，實找不出甚麼好處。其時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先生乃有「知難行亦不易」之忠告，此則力所最爲心佩者。然而黨政當局猶紛紛責言，實則此亦何背於中山先生之旨？此事久成過去，今勿多談。願今日禍變之嚴重如此，而舉國上下熙熙如遊春臺；各領袖無論乘勢與失勢者，方且互相鉤心鬥角，互相打算，而心目中始終不見敵人。此等情形，樵夫牧豎皆感覺得到，道說得出。各領袖如無自鑒之良知，則亦已耳；如若不然，則應洗心滌慮，改造方向，天下事才好商量。否則只有亡國滅種一途，別無話說也。

今日知識分子，如死心爛肝則已，否則根本應提正氣，主持正論；對當局領袖，宜痛陳其失，絕不容氣。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今日須在大根本處痛切抉發，浮浮汎汎的議論在今日有何用處？今日要喚起有力的輿論，以此有力的輿論形成國民參政實力，再不可任這般領袖胡鬧下去。此則今望知識分子之自覺。先生夙富資望，切

盼能在根本處注意也。如先生近來言論，力所於報紙中偶見者，私懷頗不謂然。力願先生虛懷以審事理。如熱省奉送之後，（用不着說失陷；失陷者，守之不得，須知吾人本無心守之也）先生有一文，首以無科學設備爲言。此適令當局好避咎耳。土耳其有幾多科學設備，而苦戰抗敵矣。十九軍在滬，一月之中，亦令倭人四易主帥，卒以無援而退，非倭人能敗之也。十九軍有幾多科學設備耶？就令說要科學設備，而政府當局果能清白乃心，大官誠廉，小官自然守法，證以十六七年張難先任鄂府長財之事，皎然不誣。又當局誠能不用金錢政策，唯以公道行實政取信於民，則財用自足。財用足矣，而軍事上之科學設備又何難之有耶？先生只說無科學設備，而不究其所以無科學設備之故，如何而可？力決非以不肖之心度君子之腹，謂先生避咎而不敢言。昔者當局嚴威之下，先生猶能直言，況在今日？然而先生乃如此云云者，則以就事論事，而未從根本處着想故也。

又昨見先生談農村與無爲政治一文，一方面極佩苦心卓識，一方面仍覺不中當局之弊。今日必須與民休息，此乃事實上之需要，故曰苦心卓識。而謂不中當局之弊何耶？今日當局只是在都市上修馬路做洋房，種種裝飾，謂之

建設已耳。實則每因作一度裝飾事業，而飽其私囊者無數。夫此裝飾都市之事業，無論其藉此肥私與否，要其所爲，畢竟無關建設，畢竟不得說名有爲，此則有識所共知也。至如千番會議，無非欺騙，不名有爲，又何待談？力所謂不切當局之弊者此也。

又曾於報章見先生在某處講演，其中似有謂因府統一全國以後，漸自尊大云云，不知悖錯否，然似未盡悖錯也。力以爲吾國人那能說到自尊自大耶？真能自尊自大者，必真富於自覺心之人，自不甘暴棄，自能知恥，故乃自強不息，此吾之所謂自尊自大也。吾國有如此領袖，何至有今日之禍？吾國人只是不知恥。猶憶黨軍北伐時，倭人在山東暴行，此是我國人如何痛心之事，幸張作霖自動出關（此在今日似少人做得到），馬馬糊糊，裝點一個統一面。此時當局若有知，應如何抱憾，如何慚愧，而敢自慶北伐成功耶？當局此時到北平，應十分沈痛，拒絕歡迎，才是道理。乃吾當局及各大軍人，無一不志得意滿，自居成功，先后都赴北平去「亮一亮」（湖北土語）。最高領袖不知慚，又何怪其他軍人？力時查得杭州，念魯案之慘，國人之無恥，而料禍至之無日，曾以上述意思，寫數行，投滬上某報，竟莫敢登；人微言輕，故莫之理，夫復何

說！今日引此一事者，明吾國人實不是自尊自大，只是無知無恥之志得意滿而已。先生演講又不切國人疾痛，此又力所不得不言者也。

倭人在魯橫行之慘案，吾當局若能知恥，若能思禍，若能移眼光於外，又何至有今日之事？然禍變之重，今方與日俱深，若今猶不翻然改心易慮，空以「長期抵抗」，「歸政人民」，及「農村建設」種種虛文，欺騙國人，自鳴得意，行見吾國人有勢與無勢不久同歸於盡，此則真可痛心也。力忱心危亡，嘗有滿肚皮話，不能說出，亦知說來無人肯聽，寫出無人肯看，因此欲說說不出。亡國失地，本尋常事，成毀榮枯，乃宇宙自然之理，吾豈不知？獨念萬有本乎一誠，誠者何？所謂生生不息真機是也。王船山先生易傳發明生義，謂人當死之頃，猶拳拳後嗣，囑託百年，以此知雖死而實不死，乃至生人之哭逝者，哀其逝，正所以延生機於不息，於此見生理之至真至誠，而絕不容一息間斷也。故宋元之亡，吾先正激昂慷慨猶存生理於幾希。今之人乃皆行尸走肉，亡國滅種之禍已至，而漠然無所動於心；士子既莫有深思禍本，人民益復昏昏沈沈，而首都之地歌舞淫樂，尤為太平時代所未有。當局誠知恥知懼，又何至有此怪現象哉？宇宙生生之誠，殆乎熄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其時矣。稍有寸心未死者，其如之何不哀耶？亡國失地本尋常，而如此絕不知恥絕不知哀之亡國失地，則確不是尋常事，而是天地間一大變也。

吾欲說而無從說起，亦無多精力向下說，今且略談數事於後：

一者，吾國人應根本自覺自計，不可專存倚賴外人之念。十六年春，吾南下過寧，黨政中人或洋洋語余曰，中國者世界之一員，今無可關門打主意，唯有隨屬世界的關係而與為步趨。余曰，如車輪衆齒，互相關聯，而成其動，必此衆齒各各自能堅實。有一腐敗，即此分子便成缺憾，不得隨他分子而動。若腐敗太多，全輪便壞，無復動理。吾國欲勉為世界之一員，且冀協助世界全體的動展，安得不併全力在本身求堅實耶？而徒妄想依他耶？夫自歐戰結局之後，歐州人對遠東防日本人之侵略中國，此自列強為其自身利害計，所不得不然，吾國人於此時外交上好似得着順利，因此亦甘心永作列強之市場，而深幸東鄰之莫能吞我。故北洋政府既倒，國民黨起而代之，當局純以空言騙人，裝飾都會，滿貼標語，奢侈空前，貪污因之空前。吾十九年過寧，病人中送一盒餅乾，問價為五元。余曰，「乃若是貴耶？」其人曰，「汝真窮措大！他們官廳

中，一盤洋點心，一雙襪子，我若說出價來，你怕要駭得不省人事了！」余曰，「官俸雖大，總有限度，他們如此用錢，錢從何來？」其人曰，「汝真書癡，汝不憶國民政府初定中原，建設廉潔政府的標語，滿地皆是，而今貪污流行，空前絕後，他們嗜欲如此發達，侈奢如此其甚，他如何不貪污？他不貪污，有甚法子？」余曰，「如此貪污下去，如此奢侈下去，而中國又不是有生產力的國家，向來專恃農民生產，今農村又爲匪共破壞，都市一切的東西，都是帝國主義者來行銷於我以榨取我之精血，而我們的奢侈費完全獻給外人，我們的貪污完全替外人作榨取的工具。

如此，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只是替他帝國主義者作榨取的工具，而占其餘惠，以填自己的慾壑。如此，有不亡國滅種者耶？我國當局爲甚忍心如此？

「其人曰，「中國人講甚麼？西人不得用兵來吞我；日本小鬼子牽制於列強，也不得來吞我。前年濟案鬧得雞凶，結果還是退出。他們當局者以爲可苟安無事，便享起樂來。中國人講甚麼？」此一段話，吾聞之謹記，迄今不忘。吾痛痛莫可如何。自前年東北奉送以來，吾國當局只乞憐國聯，知識分子總是言外交，吾固知外交不可不講，且亦不難講，何則，倭人獨佔中國這個大市場，誰則甘心？即

我不外交，列強其願吾奉送倭人歟？外交自不能講，而實亦不難講。所可惜者，自己不自覺不自計，外交也無用處。限期令倭人退兵，議決不承認偽國，國聯都做過，你看有效否？若想列強起來爲我打仗，縱令果有這一天，果然打倒了倭人，中國也要成爲共管，較之倭人獨佔，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哀哉哀哉！何忍思哉！設若不是列強打倒倭人，而別是另一國，則中國成何境象，更不好說。所以今日想倚賴外交，這付賤心腸，應該掃得乾乾淨淨，自覺自計，才是起死回生之道。這才是今日根本問題，何不提倡？

自覺自計，首先要從當局與知識分子以身作則，戒除奢侈貪污，用國貨，莫用洋貨。中山裝可用，奚必洋服？

友人石青先生說，山東府綢，很可做中山裝，應該設法改良，今聞以盡用外貨故此業遂廢，誠可痛也。士大夫常服宜用絲綢，亦最美觀。今國人盡用外貨，而江浙絲業又廢。疇昔財富之邦，今皆貧苦至極，又可痛也。而或者乃謂絲業之衰係外人不買所致，獨不言本國人無肯買者，此一怪事！今日知識分子口口聲聲總是提倡科學，最惡人提到節儉等舊說，殊不知真要提倡科學，先要挽回這個亡國滅種的局面，政治務入軌道，社會恢復次序，人得安全樂

業，如此，才可整頓教育，才可研究科學。否則一切談不上。國種且無，說甚科學？提倡科學的人不要在物質的享樂上提倡，應該根據「先哲」先難後獲」與「即物窮理」的精神去提倡。今人希望開發物質文明，而如此替帝國主義者作榨取工具，弄得亡國滅種，還說甚物質文明？

我最簡單的意思，在物質貧乏時，希望物質文明，必須唯一注重中山先生所謂心理建設。心理建設，細說便煩，扼要而談首在吃苦二字。真吃得苦過，必不損人利己，必不虛浮無實；扣當事業，無論大小，必能做事而信，必能如曾文正所謂「契硬架，打死仗」。張維先生生是一個能吃苦的人，所以在鄂長財，便有可觀。梁漱冥是能吃苦的人，所以能到鄒平，實行他的主義，實踐他的理想。我總覺得能吃苦的人，多是能犧牲的人。然而也有例外，世固有以節儉吃苦稱，而別具野心，他亦要榨取民財，以供其收買之用。此等人真足太愚蠢，自謂詭計絕人，終至亡國及身，有何好處？所以於吃苦一條之外，定要加上「秉公」一條。有野心的人，只是不公，所以竭其聰明才力總向己私處用，這等人仰視天而不知天之高，俯視地而不知地之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何以故？為其除一己以外絕無所知故。孟子說，「安其危，利其倍，樂其所以亡者

」，因其除一己以外，絕無所知，故乃自致其一己於危於菑於亡，而猶安之利之樂之，則以全失其知故也。己私之為害若是其可畏哉！吾人欲不亡失此心，欲不忍陷於無知之慘，則須反觀此心，務必念念去私而秉公。有一念不公，當下克去，莫自寬容。公則明矣。不明只是有己私蔽之，故言公即已兼明，而一切處事自無差錯，自無過分之私欲，自無作亂之種子，自不肯欺騙，自必一切盡誠盡敬，百事莫不畢舉。故吃苦秉公，而心理建設完成，即是物質上的建設完成。若徒慕物質而忘却自心，則心之不存，物即無有。心失御能，即無車馬。心成聾盲，即無聲色。心若貪污，即國失財富，而萬事不成。心若浮散，即萬物之埋不著不察而無物無理。若之何其逐物而不求之心耶？孟子閔戰國之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中山先生閱歷既深，始注重心理建設。此真根本處，萬不可忽略也。

寫至此，精神已來不及，欲更說數條，已不能寫。總之吾望大家在根本處注意，須是挽回風氣，才有生機。莫徒作枝節議論也。

熊十力啓 五月九日

編者附記：熊十力先生現在北京大學講授佛學，著有《新唯識論》等書，是今日國內最能苦學深思的一位學

者。他讀了我的「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之後，曾有長函給我，頗怪我「謹慎太過」，他說，「今日已舉世無生人之氣，何待以不抵抗教之耶？」我因為當時已有董時進先生的答辯了，熊先生的大旨與董先生相同，所以我不會發表此信。

熊先生此次來信，長至五千字，殷殷教督我要在根本處注意，莫徒作枝節議論，他的情意最可感佩，所以我把全文發表在此。他的根本主張，我想另作較詳細的討論。我在此處只想答覆一兩點「枝節議論」。

一者，熊先生說，「土耳其有幾多科學設備？而苦戰抗敵矣。」他前次來信，也有此語。此係熊先生不曾細考土耳其苦戰的歷史。凱末爾將軍所抗之敵已不是一九一八年停戰以前的協約國聯軍了，不過是那貪橫的希臘軍隊。希臘的政治組織本不堅固，軍隊也不是勁敵，故新起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之下的軍隊居然能苦戰退敵。其時意大利與法國都頗同情于土耳其，協約國的巨頭也怕蘇俄在新土耳其太佔優勢，況且

全歐都不願延長那一隅的戰爭了，所以一九二三年的洛山條約放棄了五年前停戰時的條件，容許土耳其保留在歐洲僅存的一線土地。幾個月之後，希臘革命起來，推翻那戰敗的政府，廢去君主政體，改為共和國家。我們應知道新土耳其與希臘的戰爭與今日的中日戰爭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第二，熊先生提及我在燕京大學的一次講演，我在那講演裏並不會說「國府統一全國以後漸自尊大」，恐是筆記者誤記。我說的正是熊先生所謂「無知無恥之志得意滿」。我說，近二十年來的國人心理全忘了自己的百般腐敗，百般不如人，百般亡國滅種的危機，事事歸咎于人，全不知反省，全不知責己，更不知自己努力拯救自己。自甲午至辛亥，尚有一點譴責自己願學他人的大國風度，還可說是有點興國氣象。民國二十一年中，尤其是歐戰以來，正是熊先生說的「無知無恥的志得意滿」，我所以說是「亡國氣象」。

（胡適）

中國的病應該怎麼治

濤 鳴

中國的毛病，實在多極了。隨便舉一個題目，就是一個毛病。所以說起來中國的病應該怎麼治，各人的意見，很少相同。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窮。從近的方面說，整頓軍備，預備長期抗日，是目前的急務。但是新式軍械，我們不會造，就是子彈，我們自己會造也不够用。所以要整頓軍備，我們要化錢到外國去買軍火。現在政府庫空如洗，負債纍纍，月月是年關，那裏籌一筆大款去買軍火呢？從遠的方面說，教育是國家的命脈，現在教育的腐敗，盡人皆知，應該徹底改良。不過教育經費，常常拖欠。這個腐敗的教育，維持現狀，已是千難萬難。那裏談的到改良？軍備教育以外，政府應辦的事，如修路，治河，築港，國營工業，公共衛生等等，都是非有錢不能辦。至於人民方面，因為窮而不能講究衛生；因為窮而不能讀書；因為窮而不能講道德。這是我們所常見的情形。政府因為窮的關係，許多偉大的計劃，始終就是紙上空言。人民因為窮的

關係，體智德三育全不能有適當的培養。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先致富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交通不便。以中國幅員之廣，鐵路不過幾條。比之歐美，十不及一。不但鐵路不够用，就是好的公路也差不多沒有。因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很少往來，家族的觀念深，而國家的觀念淺。所以國家不容易統一。國家不統一，政府那會有力量去建設，去禦侮，去劃一幣制或且去禁鴉片。因為交通不便，內地出產，不容易運到海口，所以工業商業都不容易發達。因為交通不便，西方文明，不容易輸入內地。除了沿江沿海凡十大埠以外，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還是和中古時代一樣。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先修路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農工商業不振。中國固然窮，而窮的原因，就是農工商業不振。在歐美各國，饑荒差不多是沒有聽見的事情。我們幾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國家，不是這裏旱災，就是那裏水災，農民無靠的住的收穫。人

民飯都吃不飽，那裏談的到富國。中國地下寶藏之富，頗引起西人的羨慕。不過我們還沒有把這富源開發起來，所以我們窮。中國出產的原料，如棉花羊毛之類很不少。不過我們自己不會把牠製成日用的物品，而只把原料賣給外人，然後再用幾倍的價錢買回來他們的製造品，所以我們窮。我們的絲和茶從前在世界市場上是很暢銷。不過現在世界絲業市場，已漸漸被日本佔去，而茶業市場，也讓給印度去，所以我們窮。因為工商業不振，所以失業（實在是無業）的人很多。有許多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做，其他更不用說。因為農業破產，許多農民，變為土匪或共黨。社會上種種不安的狀態，政治上種種的困難，直接或間接全是農工商業不振的結果。所以中國要強起來，必須改良農業，建設工業，振興商業。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沒有科學。歐美各國的富強，是近二三十年應用科學的結果。從養雞種樹至於鍊鋼造船以及各種替人作工的機器，沒有一件不是從研究科學出來。反而言之，隨便有什麼物質的問題，他們都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所以他們物產豐富，製造精良。我們農工業的器具，還是古式，當然比不上他們。中國要強起來，固然要振興實業。不過要振興實業，非科學化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人民知識太低。公民應有的常識先沒有，那裏談的到科學？歐美各國人民，個個能寫字能看報。我們中國人一百之中，識字的恐怕不過二十。這二十人之中，有普通知識的有幾個人？有國家思想的更有幾個人？大多數人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法治，什麼叫做國家。所以有許多的兵肯賣命去作無謂的內戰。所以有許多政客，挑撥離間，只管自己有官做，別人的利害完全不管。所以有不學無術的軍閥，不顧人民的怨苦，割據一方，橫征暴斂以自肥，把整個的中國，變成了列國爭雄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之下，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先提高人民知識不可——非先普及教育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道德破產。人民知識固然低。教育固然要普及。其實中國從前清末年起，開辦學校，到現在已經幾十年。為什麼成績這樣少？不但教育成績少。別的新政，那一件不是腐敗或且有名無實？其原因是，很簡單，就是一個私字。存私心去辦公事，一定是不會好的。受過最高教育的留學生，在社會服務的很多。其中潔身自重而確能用其所學的人固然有。而完全同老官僚一樣的實居多數。留學生手握大權的也很有幾位。他們的事績，

可以得我們的信任嗎？他們的財產是不是有的比和紳還多幾倍嗎？他們這些財產，是從那裏來呢？只有知識，沒有道德，是沒有用處，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恢復道德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人民身體不好。我們自古以來知識階級的文人學士，是肩圓胸狹頭垂背曲，走路是像天官賜福那樣一步一步。那裏比得上尋常走路像兵操的西洋人。中國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我們知道中國人比西洋人多病，中國人辦事不如西洋人敏捷勇敢和堅決。中國近幾十年來，仿效歐美富國利民的新政，到也不少，但是沒有一件事辦的好。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先改良中國人的體育不可。而要改良體育，則非提倡衛生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人太多。人太多飯就不够吃。飯不够吃，則人人以飯碗爲主要問題。所以中國人私心太重。衣食不足，那裏談的到道德？那裏談的到衛生？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移民西北或且節制生育不可。

有人說：中國的大毛病是政治不良。中國現在沒有一件事可以說是辦的好，但是所以辦的不好的原因，就是政治不良。譬如工業不振，固然是中國一個毛病。但是中國工業爲什麼不振呢？說沒有資本嗎，有許多富翁，情願把

他們的錢存在外國銀行，取極低的利息，而不敢拿資本出來辦實業。說沒有人才嗎，專門技師，暫時可以僱外國人。普通工匠，可以隨時訓練。說沒有原料嗎，中國出產之富，外國人很羨慕。地下寶藏之富，更不必說。簡單說起來，資本家不敢辦實業，是因爲怕賠本，是因爲看見許多人賠本過，看見別人辦實業失敗過。所以失敗的原因不一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沒有監督，沒有保護。這樣看起來，工業不振，是政治不良的結果。再舉一個例，說教育腐敗，固然是中國一個毛病。但是教育爲什麼腐敗呢？我們教育的制度，大半仿歐美成規，並不是我們創造的。他們教育辦的好，我們爲什麼辦的不好？是不是因爲教授只要鐘點多多益善，對於學生功課不敢認真？是不是因爲校長怕自己地位動搖，對於教職員不敢嚴格選擇？是不是因爲教育部沒有改良教育的決心？不過我們也不要責備教育界人們太重了。假使有一位精明果幹的教育部長，想把教育界的弊端，澈底改革，他能成功嗎？別的不要說，就說把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歸併成一個大學，把兩個大學的設備作一個大學的設備，把兩個大學的經費作一個大學的經費，從兩個大學之中的教職員，擇其優者留之，劣者去之。這樣改組，一定是可以提高這國立大學的地位。不

邁實際上恐怕做不到。不要說北平大學和北京大學教職員要牽他們的學生出來攻擊這位教育部長，就是國民黨後台老板也未必贊成。這位設想的教育部長也只得知難而退了。這樣看起來，教育腐敗，也是政治不良的結果。無論中國什麼壞事，歸宗本始，責任總是在政府身上。所以中國要強起來，非改良政治不可。

以上各人所說的話，都是對的，也都是不對的。中國固然是窮，固然要振興實業。但是要振興實業，須先有能保護實業的政府，須有便利的交通，須有專門技術人才，須有講道德的管理人。這樣看起來，要振興實業，並不是開幾個工廠就可以興的。交通教育道德政治諸問題，也得同時解決，纔有希望。中國教育固然腐敗。但是要改良教育，須有認真辦事的教育家，須有可靠的經費，須有不怕搗亂而令出必行的政府。所以要改良教育，並不是定几條章程或且發几道命令就可以興的。財政道德政治諸問題，也得同時解決，纔有希望。但是人民這樣窮，這樣弱，這樣沒有知識，財政交通道德政治諸問題，又何從而解決呢？反過來說，中國固然人多。但以面積計算，歐洲各國有比我們還多。但是他們還是富強，因為他們工業發達，有製造品抵換食品。所以他們人多並不要緊。我們不怕人多

，只是振興工業，改良農業，使我們產量與人口相稱也就可以了。中國固然沒有科學。如果教育辦好，工業辦好，人民生活問題解決，有餘力去研究科學，自然就有科學。中國道德固然破產。但這就是中國人太窮的結果。如果工業發達，人民生活計充裕，自然就會講道德了。其實中國各種毛病，節節相連，已經成了好些個惡循環。隨便那一件毛病，便是其他毛病的原因，也是其他毛病的結果。

那麼中國這許多的毛病，應該怎麼樣治纔好呢？振興實業，普及教育，改良體育，改良交通，都是應做的事。不過這些事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做成的，也不是可以單獨做成的。可以單獨做成而且可以立刻做成的，就是改良道德——改良心理一件事。現在黨國要人不過幾十人，國家命運就操在他們手裡。其餘四百兆，一部份是不知不覺的，一部份是想有為而沒有路走的，都可以不算。立刻改良四百兆人民的心理是不可能的，立刻改良幾十人的心理是可能的。黨國幾十要人，如肯聚首一堂，共商大計，個個下一決心，不要地盤，不保實力，不要替朋友親戚保飯碗，凡事只以國家為前提，這樣來，中國立刻就統一起來——立刻可以有強有力的政府。我們這個快倒的老舖子，立刻可以重整開張。一切設施，可以下手。春天下種，秋天收成

原书缺页 36-末

保全華北的重要

胡適

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蔣廷黻

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

詠霓

丁玲女士被捕

沈從文

漫游散記（十九）金沙江

丁文江

和與戰（西安通信之一）

旭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定安市場	佩文齋	張記書
王	友公司	民智書局	米良
大	四里	新華書店	代
文	齊志	華英書局	社
店	年	華英書局	社
卿	代	華英書局	社
宣	社	華英書局	社
堂	文	華英書局	社
永	沙	華英書局	社
清	華	華英書局	社
成	府	華英書局	社
天	津	華英書局	社
上	海	華英書局	社
真	京	華英書局	社
鎮	江	華英書局	社

獨立評論

第五十三號合冊
日四月六年二十二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刊第五十二號因稿件與印刷的障礙，未能如期出版，同人十分抱歉。現在第五十二號與五十三號合刊出版，以後仍按期出版。

●胡適啓事

我定於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從本週起，獨立評論的編輯事務由蔣廷黻先生負責担任。一切稿件均請直寄北平清華大學蔣廷黻先生收。

保全華北的重要

胡適

我們的國家現在已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時期，不能不
平心靜氣的考慮我們所處的局勢，然後決定我們應該採取
的步驟。

我們所處的局勢是這樣的：第一，整個的中日問題，
我國政府在這時候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此時的解決，無疑的，就等于放棄東北四省，承認滿洲偽
國，這都是全國民衆所不許的，也都是政府在道義上，在
責任上所不能接受的。第二，現在的戰事已由熱河榆關進
到長城以南，不但北平天津有陷落的危險，連整個的華北
都有被侵吞的可能。喜峯口與古北口兩處我國軍人的奮勇

抵抗，南天門的八日八夜的血戰，都是全國人與世界同聲
贊歎的。但現在長城以南已無險可守了。我們的最精良的
軍隊的血肉犧牲，終不能長久支持敵人的最新式武器的摧
殘，終不能撐持這個無險可守而時時刻刻有腹心之患的大
局：這也是我們都不能否認的。

在這個局勢之下，我們不能不承認兩點：

第一，整個的中日問題此時無法解決。

第二，華北的危機目前必須應付。

怎樣應付這平津與華北的問題，這一點上至少有兩種根本
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準備犧牲平津，準備犧牲華北，

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雖有絕大的糜爛，亦所不恤。還有一種主張是暫時謀局部的華北停戰，先保全華北，減輕國家損失。現在北平的軍分會與華北政務委員會大概是主張這第二種辦法的，所以從五月廿二夜以來，有停戰談判的進行。

我個人是贊成這第二個主張的。此時華北軍政當局所進行的停戰談判，因為沒有正式的記載與報告，我們至今還不知道詳細的內容。但我觀察今日的形勢，深覺得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同時應該監督政府，使他不得逾越局部救濟的範圍，不可因謀局部的保全而放棄整個問題的奮鬥。

我所以主張華北停戰，有幾層理由：

第一，我認為這是為國家減輕損失。我不信失地絕對不能收復，但我深信此時單靠中國的兵力不能收復失地。

這十八個月的經驗是失一地便丟一地，失一城便丟一城，失一省便丟一省。敵人的野心無窮，而我們的疆土有限；即使敵人不能久佔華北，而我們決不應該不顧慮到敵人佔據華北來威脅中央，來做承認東北熱河新局勢的代價。我們看了最近幾十天之中兩次的灤東大奔潰，看了長城南面各縣人民的流離痛苦，我們深感覺政府在此時不能不為國

家人民謀怎樣減低損失的方法。到了華北又成了第二熱河，那就太遲了。所以我們說，如果此時的停戰辦法可以保全平津與華北，這就是為國家減輕了一樁絕大的損失，是我們應該諒解的。

在這一期的本刊裏有徐旭生先生從西安來的信，其中有一段是反對華北任何停戰的協定或默契的，他說：

像上海那樣的停戰協定，我們雖然未見得怎麼樣反對，可是如果現在有人再草那樣的協定，或定同樣性質的默契，那我們一定是堅決反對！因為上海協定，無論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我們雖受鉅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著我們的什麼。至于現在，敵人能將我們的東四省退出來一尺一寸麼？無論協定，無論默契，那

是不是就算承認我們對於我們的東四省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旭生先生這段話的論理，我不大能領會。我看不出上海停戰和華北停戰有多大的不同。如有不同，只是華北的停戰比上海停戰更為迫切，更為需要。旭生先生說：「上海協定，無論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我們雖受鉅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著我們的

什麼。」如果這幾句話可以辯護上海的停戰，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華北停戰的目的，至少應該做到（一）使敵人退出已佔據的河北各縣，（二）使他們不能再在華北「得着我們的什麼」，（三）使國家人民在土地與生命財產上不致受更「鉅大的損失」。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將東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他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佔一尺一寸的土地。這不是放棄我們對我們的東四省說話的餘地：這正是要留我們對東四省說話的地位。倘使整個華北也淪陷了，我們對東四省更沒有說話的地位了！

第二，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拋棄的。

現今許多短見的人，住在東南的都會裏，看着平津華北好像不很關心，有些人至今還相信平津華北是可以糜爛犧牲而決不應該委曲求全的。這種見解是絕對錯誤的。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一）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與動力的主要區域；「冀魯晉豫四省佔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礦儲量，也可算是世界煤礦最富的區域。」（二）中國已成的鐵路的絕大部分都在華北。（三）天津的關稅收入在全國各口佔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個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來，北方的文化所以還能維持着一個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個北京做

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在那裡集中着不少的學者才人，從那裏放射出來不少的文化的影響。近年政治中心雖已經南遷，但北平的文化學術機關則繼續發展，設備格外豐富，人才格外集中，成績也格外進步。北平在教育上的影響，一面遠被西北，一面遠被東北（民國初年至今，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總數中，東北各省佔第一第二的地位），實在是北方的唯一的教育中心。而在北平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則不但影響全中國，並且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與承認。（參觀本期翁詠寬先生的「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如果我們讓北平淪陷于敵人之手，如果我們坐視這個文化學術中心的摧毀，那麼，將來整個北方的文化事業恐怕只有全盤讓給日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事業部來包辦了！

這些話本來都是人人應該知道的；我說這些話也不是說投鼠應該忌器，不是說因為平津與華北的重要就應該犧牲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而謀局部的倖存。我只是要說：華北是應該守而勿失的，如還有可以保全的方法，我們應該盡心力去保全他。如能保全華北而不至於簽東北四省的賣身契，我們應該贊成這種辦法。萬一政府盡心嘗試了這種保全華北的和平努力，而結果終不能不使平津糜爛或華北淪亡，在那種形勢之下，政府才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的

失敗或許可以得華北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諒解。

第三，平津與華北的保全在國際上的意義是避免戰事的擴大而不可收拾。現在還有一些短見的人以為中日衝突越擴大越好，越擴大越有辦法，所以平津的佔領與華北的糜爛都是值得的。他們妄想這樣擴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國際的干涉或制裁。這種見解是錯誤的。現在歐美各國都用力去對付他們最切身的幾個大問題（經濟問題，軍縮問題，歐洲和平問題），在這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決不會有餘力來應付遠東的問題。國聯的小國會員國的心理也許希望中日事件擴大到列強不能不制裁的地步，但我們知道在這時候遠東事件無論擴大到如何程度，幾個有實力的國家決不會因此用武力來干涉日本。世界大戰也許終免不了，但現在決不是世界大戰起來的時機。我們試看蘇俄在北滿受了日本多少的威脅，然而蘇俄應付的方法只是節節避免正面的衝突，甚至于不惜拋棄新復交的中國人民的同情而提議出售中東路！與日本利害衝突最直接的蘇俄，加上日本軍人的種種有意挑釁，還不能不努力避免對日作戰，這不是應該可以使我們深省的教訓嗎？蘇俄之外，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自然要算英國了。稍知英國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國決不會因她在華北的利益

有被日本侵佔的危險而出來向日本作戰。民十四五年，南方的排英運動幾乎毀了香港，而英國堅持鎮靜；民十六年武漢政府奪回漢口的英租界，而英國不報復；河南的軍人黨部直接毀了中原公司，間接毀了英人的福中公司，而英國鎮靜如故。九一八以後，北寧鐵路的西段成了偽國的奉山鐵路，英國人也只有微溫的外交的抗議而已。華北的英國利益，最大的莫如開灤煤礦與天津的英租界；證以最近六七年來的歷史，我們可以預料英國在今日決不會爲了保護此種事業準備向日本作戰。英國如此，別國更不用說了。

我說這番話，並不是說日本可以橫行無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我深信日本的行爲若不悔改，這個世界爲了整個世界的安全，必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決非其時；今日即有世界大戰起來，我們也決不能利用。何況縱觀全世界物質與心理的狀態，我們決不能妄想世界各國爲我們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國報紙曾問：國聯若真執行盟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中國能和日本完全斷絕經濟關係嗎？）我們可以斷言，現時幾個有實力的國家（國聯內的英法，國聯外的美俄）無不希望我們能做到對日問題的一個暫時的段落。上海的停戰是一個段落，今日華北的停戰又是一個段落。軍事做到一個段落即是使

敵人的暴力暫時無用武之地。暴力無用武之地，然後敵人國內的和平勢力可以漸漸抬頭，而國外的正誼制裁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戰事延長，局勢擴大，則軍人的勢力可以無限的伸張，國中輿論決不敢與軍人背馳，而一切國際制裁也決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

以上說我個人贊成保全華北的理由。

最後，我要說一句忠告此間軍政當局的話。此次停戰的談判，有何不可告人？何必這樣秘密？更豈可因登記

實事而封禁報館？當局越秘密，謠言越多，猜疑越多，人心越不安定，姦人越容易施展其鬼域的煽動。所以我們要求當局隨時將談判的實際情形用負責的態度發表出來，使全國的人可以共同討論。政治家在國家吃緊的關頭雖然不必全聽高調的輿論的指使，但輿論到底是政府的後盾，輿論調子之高正可以使政治家的還價不致太吃虧辱國；這是負責的政治家所不可不知的。

一九三三，五，二十九。

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蔣廷黻

現在世界諸大問題的解決都依賴美國的助力。正在進行的裁軍會議，六月中行將舉行的倫敦經濟會議，以及遠東的中日衝突，這些問題得着了美國的輔助，固不一定就能得着圓滿的解決；倘得不着的話，簡直無從下手，更談不到解決。美國的世界地位之重要是無人能否認的。

但是在這幾年內，美國的外交究竟將有什麼演變，是

無人敢預言的。美國成爲世界強權之一不過是二十世紀的事情。在十九世紀，美國孤立一方，對彼時歐洲的縱橫和戰爭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其他世界強權如英俄法成熟較早

。牠們在世界舞臺上出演過多次；其角色如何，我們有相當的認識。至於美國：她只出演了一次——即上次的大戰——而那一次戲尙未唱完，美國就退出了。全世界都以爲美國不上舞臺則已；一上舞臺，必是一個了不得的角色；究竟美國上臺不上臺，如上臺的話，將演什麼角，則無人敢說了。

一國外交的演變常受兩種條件的支配，一種是她的全盤歷史的趨勢，一種是一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狀況。我們且談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美國現在的輿情是極端反對戰爭的。我們可單就遠東問題講。自九一八事件以來，美國輿論領袖最與中國表同情的都明白的說：日本雖是錯了，美國不應以武力對付日本，美國只可期待日本的反省悔禍和內部變化，及世界道德裁制的生効。我們若告訴他們：日本不會反省，道德制裁不會生効，他們不過說：那也只有聽之。上次大戰過去不久，參戰的兵士及死傷兵士的家屬現在正是社會的中堅份子。他們怕戰爭如同怕虎。上次威爾遜總統拿以戰止戰的口號相號召。但大戰以後，世界會無一日不緊張，好像戰絕不能止戰，只能生戰。美國人這個看法的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大部份的看法是這樣，這是毫無疑問的。

同時經濟的復興是美國政府及人民切身的問題。共和黨的致命傷就是經濟的不景氣。民主黨以經濟復興自任而人民覺得民主黨或能給他們一線的希望；所以民主黨得到了政權。自從羅斯福進白宮以後，他對遠東問題至今毫無表示——這不一定是美國現在不顧遠東了！；但從早到晚所忙着幹的，是貨幣的膨脹，農民的救濟，及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美國目前是以全副精神圖謀經濟復興的時候，不是以全副精神對付遠東問題的時候，而這遠東問題不是

三心二意所能對付過去的。這一點美國是看清楚了，共和黨執政的末年已看清楚了；與其三心二意的來對付而對付不過，不如把全問題暫時擱置。在美國外交的程序上，不但經濟復興居首位，遠東問題次之，並且美國絕對不願使遠東問題阻礙倫敦經濟會議的進行。

美國的經濟恐慌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一隅。要圖美國的經濟復興不能不同時謀世界的經濟復興。在恐慌發生的初年，胡佛曾以為以美國土地之廣，人口之多，富力之厚，不難靠自己的力量來挽回經濟的衰落。這個假設，在一九三一年，胡佛已經知道是錯了。現在羅斯福當然不致蹈前人的覆轍。但從美國觀察，中國的經濟重要遠不及西歐。照中國銀行今春所發表的週年報告，中國去年的國際貿易以中美部份為最大。雖然，中美貿易的總額不過是美國與西歐的貿易的十分之一；美國政府及人民在中國的投資亦不過等於在西歐的投資三十分之一。我們平常聽慣了這幾年的宣傳，許多人以為帝國主義者完全靠着榨取我們的財富過日子。其實我們的財富本有限，且被土產的軍閥和官吏榨取盡了。倘帝國主義者靠我們過日子，世界上早已沒有帝國主義者了。中國的市場不過是一種希望，是待將來發展的。倘若中國市場發展的惟一障礙是日本的侵略，那

末美國目前的外交或將集中於遠東。美國人知道中國市場發展的大障礙不在日本而在中國本身——在中國的內亂，中國人的窮和中國人的缺乏現代組織和現代知識。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美國外交所能為力的。同時歐洲的問題雖多且大，美國還覺得有下手的可能。一旦歐洲的問題得着解決，美國的經濟就得着不少的幫助了。所以美國的外交愈注重經濟，牠就愈重視歐洲。

在美國目前的外交上，不但中國的重要不及西歐，就是蘇俄也不及西歐。美國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堅決遠在其他各國人民之上。就是勞工總會的幹事部尙反對美俄復交。同時當作市場看，蘇俄遠不及西歐的重要。美國出口貨的兩大宗——棉花及石油——是蘇俄富有的。如果為對付日本，美國須要聯盟國，蘇俄的重要亦不及英國，因為日美之戰——萬一有戰爭的話——勝負第一靠海軍，次靠空軍；至於陸軍，簡直無用武之地。從九一八事件以來，許多人望着莫斯科，以為日本的帝國主義和反共主義可以引起蘇俄的抵抗。近兩年來，日本對俄國利益的危害何嘗不大，而蘇俄節節後退；此中主要原故就是軍事上，社會經濟上，蘇俄絕不能作戰。蘇俄將來的地位當然不能預測；在目前，完全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大勢。並且蘇俄在遠東的

立場完全不與美國相同。美俄合作，在美國方面，有無窮的顧慮。為經濟復興計，為對付日本計，為遠東的前途計，美國當然以聯西歐為上策，而以聯蘇俄為次策。

就目前美國的國內狀況及國際形勢看，美國關於遠東問題在最近的將來不能有進一步的辦法。羅斯福對於遠東政策的決定至早要在軍縮會議及經濟會議的成敗揭曉以後，而這兩會議的前途是不容樂觀的。直到現在，軍縮會議尚未渡過法德的難關。德國根據條約有要求軍備平等的權利。現狀是德國單獨裁軍，其他各國，尤其是法國，則維持充分的軍備。這種現狀不是維爾塞條約的本意，也不是德國所能忍受的。同時德國尙要求維爾塞條約的修改；德國所最注重的修改是波蘭走廊的取消。這種要求就引起法國的安全問題。法國人在四十五年內——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受過兩次德國的侵略。以法國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德國的。法國安全保障的尋求是戰後法國外交的大前題。她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一）割取德國的土地及限制德國的軍備以圖滅殺德國的力量，（二）創設一個有裁判能力的國聯，（三）由英美兩國的担保，及（四）靠自己的及與國的軍備。第二及第三個方法已經失敗了。美國最近的聲明願加入一個諮詢條約似乎不滿法國的要求，是

以英美雖說明願意維持歐洲的政治現狀——有利於法國的現狀——法國仍舊不願意放棄保障安全的第四個方法。英美的態度是一致的；她們承認德國對於軍備平等的要求是對的，但達到平等的方法不是讓德國擴充軍備，是讓其他各國減少軍備；同時英美兩國不主張修改維爾塞條約。這是個折衷辦法，希特拉已接收了。希特拉的接收當然是不甘心的，但是英美法三國的聯合不是此時的德國所能抵抗的；德國外交的出路在於使法國不能得英美的援助。希特拉明知英美的折衷辦法不是法國所能接收的，他大可以讓法國去作惡人。所以軍縮會議表面上雖得了德國的協調，仍未渡過法德這難關。

假使法德都贊成英美的提案，軍縮會議尚有日本的難關。會議所討論的侵略國的界說及侵略工具完全的廢止斷不能得着日本的同意。但是日本不便明白的反對這兩件事，只好提出海軍平等的要求。日本也明知英美兩國斷不能接收這種要求，不過要借海軍問題來破壞任何軍縮。世界上任何國家有個荒木當權軍縮是不能成立的。終久世界會認清這一點。這是我們一線的希望。因為在世人的眼光裏，破壞軍縮會議的罪比侵略中國的罪還要大。

假使英美在軍縮會議裏壓迫日法太甚，日法大可在經

濟會議裏搗亂。同時經濟會議有其本身的困難。第一，美國願意取消或大減戰債麼？關稅的普減能實現麼？我們倘記得關稅問題的複雜及其利害關係的嚴重，我們就不敢樂觀。就是經濟會議完全成功——事實上的成功絕不能到美國所希望的程度——發生實效也要三四年的功夫。因為世界的經濟恐慌不是任何會議的議決案所能忽然消滅的。會議充其量不過減除復興的障礙；復興的實現尚待各國政府及人民的努力。

所以目前的國際形勢不能容國聯或任何國家對遠東問題定下步的辦法。我們只能觀望。局部的妥協是不能不有的；全部的解決此非其時。我們如因局部的妥協而引起內戰——無論是假何名義，是誰打誰——都是自殺。首發難者是民族千古以來的大罪人。軍人無論了解不了解國際的形勢——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不了解的——對於國家外交問題是不應該發表言論有所主張的。同時在政府方面應於經濟會議以後，斟酌彼時的形勢，定一個全部的辦法。到那時候，國聯會員國，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的簽字國應給我們一個確切的答覆；或進或退，不能再模稜兩可了。我們目前不能不將就；但這只可作為過渡，不能算作辦法。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

詠霓

北平是中國最重要的學術中心，那是全世界共認的事實。我們的美國朋友葛利普教授常說：「南京是政治的中心，上海是經濟的中心，只有北平是中國的學術中心。」其實北平之成爲學術中心也不過是民國以來的事。不過這二十年中北平學術事業真有極快的進步。新設備的增加與舊材料的整理同時並進。不但物質上材料的豐富，在研究工作上也已有若干成績，在世界科學史中可佔相當的地位。有許多青年跟著他們所敬佩的導師，孜孜不倦，努力於他們的工作，逐漸成爲真正的專家，能有真實的貢獻，這便是領導中國踏上現代化路上的最必要的第一步。因爲有了這些學術研究的基礎，所以對於社會上實際問題也可以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因而養成比較成熟的見解。這種景象也許因爲時期太短，一般人還看不見他的効力，但是若干專門研究的成績在世界學術界中是已有定評的。這些學術基礎如能充分利用於教育事業及建設事業都能有很大的幫助也是無可疑的。

自從山海關失守，熱河被奪，北平便陷於危險之中，

時時有被侵入的可能。於是各文化機關的東西紛紛南遷。最爲一般社會所注意的是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其實這種古物保存的作用多，研究的價值少；歷史的意義多，科學的關係少；雖然十分重要，還不是學術中心的唯一基礎。其他學術機關如研究所調查所各大學等正在應用的物品紛紛遷運，方在進行的工作因之停頓，亦甚可惜。真有若干人看著平時習用不釋視同珍寶的圖書儀器裝箱上車，淒然欲泣的。二十年來許多學者銖累寸積辛苦經營的東西一旦紛散。許多難得的標本往往存窮鄉僻壤，經過生死危險採集來的，還有若干珍貴標本原被歐美人採集要帶回本國，經中國學者軟商硬求留下來的，原以爲北平爲中國學術中心，可以永久留存、供後代學者的參攷。今乃兵臨城下，突有被轟炸焚掠的危險，不能不遷地躲避。其實一經移動，錯悞損失在在可虞，與當初保有宗旨已不相符。在此二十世紀號稱文明時代，各國方天天倡導和平；在此六百餘年的中國故都，舉世共認的中國疆土；偏有同文同種向稱親善的鄰邦，毫不聲明理由，從未提出要求，長驅直入，飛

機滿天，來擾亂打破我們的和平工作！從此可見北平的學術中心不是安全；也從此可見我們東亞人種不足與言文明！

但是搬又搬到那裡去呢？南京或其他沿江地方早已門戶洞開，敵艦可以直入，從長江砲打二岸其距離也並不大於長城之於北平。即使到保定開封，我能往寇亦能往，何處真能安全？大家往上海去麼，上海是外國勢力統治的地方，我不信中國已經整個亡了，必須都到外國人治下去生活。遇到外國學者來參觀中國的學術時，一切精華盡在租界，這便是中國最大的國恥。與其如此，那何不將一切東西都送往倫敦巴黎？北平還是日本人可來統治而現向未來的地方，上海租界都是外國人已來統治的地方！除非我們承認西洋人真比日本人更文明些。

我們遷移文物的意義並不是圖生命的安全，亦不是貪暫時的安逸，我們不願把珍貴的學術材料受野蠻人的掠奪與破壞；我們也想借此幫助政府表示抵抗到底的決心。但是二十世紀究竟還是二十世紀，日本人無論如何橫蠻，決不能將北平永久佔領的。北平既然還是中國領土，中國人便不應該自動放棄。東北四省的主權總有一天要恢復的。即使暫時不能，即使北平成了邊疆，邊疆也不是隨時必被

侵略的。愈是邊疆愈要發揚我民族的文化，鞏固我民族文化化的中心。

日本人的政策不是直接併吞，是要間接分化我們中國。一箇傀儡國不啻，還想再立第二個。我們要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必須要鞏固我們文化的統一與思想的統一。華北地方如果沒有文化機關喚起國家思想，振起民族精神；一般舊社會的人士是很容易苟且遷就受人利用的。所以為國家統一的前途計，也仍須維持北平的學術中心。而且北平的地理位置對於東北西北都是居扼要的地位，為研究工作計本是天然的極好的學術中心。外國學者研究亞洲事物的始終以北平做出發點與大本營。近來美國學者還有在北平設立太平洋研究院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的提議。如果中國人將自己的學術基礎拆毀了，將來北平必將成為外國人研究中國的中心，自然日本人也必不甘居人後，他們早有他們的機關在北平了。外國人尚且不肯放棄北平，中國又豈可貪一時之安逸而自甘退讓。

另一方面，中國面積廣大交通遲緩，國人的見聞思想必須分注各方，不可局於一隅。所以文化中心也不宜完全集中於東南一角。近年東北事變固然有許多原因，也有一部分原於中央政府以及足以影響政府的輿論中心都偏處東

南，對於東北邊省情形精神未盡貫注，以致應付過於遲鈍。如北平多年經營的學術中心從此毀棄，使北平突成爲文化的沙漠，則南北必更多隔膜，外侮必更易侵入。在此國勢飄搖的時候，中央政府必須負起全國責任，不可因遠近

而分親疏；全國人民亦須認定唯一的政府，原諒他，擁戴他，不可徒憑意氣空相責難。我們做學術工作的人，即使不直接參加政治，亦有主張公道維持國事之責，更不宜因一時之安危，忘當前之職責。

丁玲女士被捕

沈從文

丁玲女士這個名字，應當是許多人所熟習的名字。近來得到幾個朋友來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幾個政府的便衣偵探，用綁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後就下落不明，凶多吉少。上海地方綁票案件極多，想不到還有政治綁票。

政府對於這類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終皆不承認。

對於捕去的人，常常不由正當法律處置，多用秘密手段解決。如往年胡也頻君，因左翼作家運動失蹤後，至今猶無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傳聞所說，用麻袋裝好沉到黃浦江中心呢？還是活埋地下呢？

政府對於共產黨的處置，幾年來有他一貫的政策，爲黨，爲國，爲民族，不管用什麼名稱去說明，採用非常手段去撲滅，殘酷到任何程度，仿髻皆不足驚異。譬如在

江西方面，我的朋友之一，他就親眼見到過軍隊中用一大桶石灰解決過二百餘名逃兵的事情。朋友說完他那點稀有的經驗時，就告我：「這是戰爭」！因爲他這一句話，我便遇事裝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戰爭」，寫這樣一頁歷史，難道上好的血不用，還去用那由于哀憐而來的眼淚麼？

但我要說的是對於一個年青作家，本身同戰場距離得那麼遠，他的住處又正是司法機關極其完備的大都市中，他的活動也只限于用一枝筆寫一篇兩篇小說，是不是還得政府使用處置土匪處置敵人的方法來教訓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個作家，只爲了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綁票方法捕去，毫無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後審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續，也就不

問可知了。國民黨中近年來對於文藝政策是未常疏忽的，從這種黨治摧殘藝術的政策看來，實在不敢稱讚。像這種方法行爲，不過給國際間有識之士一個幽冷的機會，給國內年青人一個極壞的印象，此外就是爲那政策播一片「愚蠢與不高尙」的種子于一切人記憶中而已。執柄當權的人，若賢明達識，就不會採用這種政策。縱或作了這種事情，也明白如何去捕救。爲政府計，既偷偷悄悄的把人提到了，若這人實在有罪，就應當羅列罪狀，該死的，實諸典刑，人無間言；罪不至于死的，則酌輕重，小牢罰鍰。不問有罪無罪，先決問題，政府既以法繩人，自己一切行爲，就應當從法律入手，事情應由法庭處置，且應給堂下人一個在法庭上辯白的機會。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處，無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據傳說，則其人又有業已爲某方害死的消息。這傳說我希望牠不是事實，但政府也應當用別的方法證明這個不實謠言，且應當即刻公開審訊。人若當真早已死去，活埋也好，縊殺也好，仿照別一處治盜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對於本國有知識青年的殘殺，所用方法，即或如何新奇，我也絕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議。因每個國家使用對知識階級的虐殺手段時

，行爲的後面，就包含得全個的愚蠢。這種愚蠢只是自促滅亡，毫無其他結果。

在極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強不息，知對現狀有所不滿，敢爲未來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無踪，生存的，則只是剩餘下來的一羣庸鄙自慕之徒，當全個民族非振作無以自存的時節，還各裝模作樣，以高雅自居，或寫點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詞造謠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陽充清流，以文學作消遣，于政府官辦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脩短，從所謂黨的文藝政策下會計手中，攫取稿費若干，無事可作便聚處一堂，惟高談希臘羅馬以送長日。即因此二三上海小有產者與小游民興味與觀念，支配國內年青人興味與觀念。政府于積極方面既殺盡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極方面，則由政府支出國庫一部分金錢，培養這種閒漢游民，國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

編者附記：

此文排成後，已校對上版了，今日我得着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

漫遊散記

(十九)

丁文江

金沙江

江的北岸——會理

金沙江從巴塘的西面一直向南入雲南。到了鶴慶的東面，纔轉灣向東；如是灣灣曲曲的走到祿勳的北面普渡河口，又轉而向北，一直到宜賓（叙州府）。所以在雲南四川兩省交界的地方，金沙江是一個極大的馬蹄式的灣子。灣子以南，以東，以西都是雲南。灣子以北除了永北仍屬雲南外，都是四川地方。我過江的地點，金江驛，（又叫做金江龍街）在北緯二十五度五十五分，是金沙江最南的一點。

灣子以北的大支流只有一條鴉龍江，從川邊的河口向南，在會理的西面流入金沙江。鴉龍江的重要支流是安寧河；從冕寧的北面發源，經過西昌（寧遠府），一直向南，到會理龍爪山的西南與鴉龍江會合。安寧河的河身很低，土地很肥美，就是著名的建昌谷。我足跡所經完全在安寧河以東，雲南巧家縣以西，都是會理縣所屬。在這個區域以內地形很有興趣：安寧河以東，會理縣以西，有一條

南北的大山，高度平均在三千公尺。其中最高的峯就是龍爪山，高出海面三千八百公尺。金沙江從巧家縣向南，西面也是一條南北的大山，高度平均也在三千公尺左右。魯南山就是許多高峯的一個。魯南山的南面的最高峯比龍爪山還要高六百公尺——出海面在四千公尺以上。在魯南龍爪這兩道大山之間是會理縣的盆地。盆地中有許多小山，平均出海面不過二千公尺——比東西兩邊的大山平均要低一千公尺。盆地中間只有兩條重要的水道：一是發源于會理城北，經過縣城向南的普降河，一是發源于城東，經過波羅塘向南的姜州河。這兩條河都直接流入金沙江。

對於魯南龍爪這兩道大山而言，會理是一個盆地。對於金沙江而言，牠却是一個高原。因為金沙江在這個盆地裏面冲出了一條很深的峽谷，比會理又要低一千公尺。盆地中的姜州河和普降河，在上游谷身很淺；越向金沙江走，谷身越深。如普降河在離金沙江二十公里的會理城附近，出海面是一千九百公尺。到離金沙江六公里的普降河村子，只有一千二百多公尺。魯南山，龍爪山，會理盆地，

沙江的峽谷是金沙江北岸地理上的天然單位。

我于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一離開金江龍街，渡過金沙江。在江南岸因為直箐平原與金沙江的峽谷是連接的，所以從直箐到金江驛路是很平。一過金沙江向北走，要從峽谷走上會理盆地，所以路比較的陡。從江底上坡，又可分為兩段：第一段從江邊到坡脚村，七公里左右，上高不過二百六十公尺，坡度為百分之三·七，和平綏鐵路從居庸關上八達嶺差不多，比較的還平。第二段從坡脚村經過火焰山到坡頂，路不過二·七公里，却上高七百公尺，坡度為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是一個很陡的大坡。這兩段的坡度如此的不同，在地文上有絕大的意義。坡脚村是在金沙江岸邊的一個平台上。在不遠的時代，金沙江的水面曾經與平台一樣高，現在的金沙江是一個兩重的峽谷。從坡頂到坡脚是一重，從坡脚到江面又是一重。一過坡頂路忽然的變平坦了。向北走二四·公里到江驛，上高不過十六公尺，又四·五公里到界牌，上高不過一五二公尺。所以從金江驛向北走一到坡頂，已經上到高原上了。高原與峽谷的關係看了下列的表更容易明白：

地名 距江邊公里數 出海面公尺數 坡度(百分率)

金沙江 ○ 一，一四三

坡脚	七·〇〇	一，四〇五	三·七
坡頂	九·七〇	二，一〇四	二五·九
江驛	一二·七〇	二，一一九	〇·六
界牌	一七·二〇	二，二七一	三·三

江北的地方雖然大部分屬四川，而川滇兩省的界線却不在金沙江，而在界牌。前清時代江驛有個巡檢衙門。巡檢仍是由雲南派的。

峽谷與高原地形既然不同，氣候也完全兩樣。從金江起身過江，早上六點鐘溫度已經到了二十八度；上坡的時候，汗流如雨。從江邊到坡脚，幸虧坡還不陡，但是七公里，走了兩點半鐘方才到着。九點鐘以前溫度已經過了三十二度。坡脚以上的兩公里多，是一個絕大的陡坡。牲口與人都走得極其疲乏，從坡脚到坡頂半路上有個村子，叫做火焰山，就是表示在溫度很高的峽谷裏面上陡坡的困苦。然而一過火焰山，溫度漸漸的降低下去。到了坡頂，十點多鐘，溫度只有二十七度——比在金江六點鐘的時候溫度還低。走路的人猶如從地獄到了天堂！

對於金沙江峽谷而言江驛雖然在一個高原上，但是向西是一道南北的山脈，對於牠而言，江驛却在盆地。我從江驛離開了向北的大路，直向西走，不過一公里多點，就

均了山根；再走一·八公里就到了山頂。山頂不過高出江四百二十公尺，但是望得很遠；山的本身是一條南北（相偏東西）的梁子，有二十多公里長。最北的一段，比較更高。大路上的松坪關就在牠的東南。山的東坡新發見了銅礦。最旺的銅苗在松坪關西的野豬窩。山的東面，是一片低地，其中只有小的邱陵起伏。西南的兩面都被金沙江環繞。江從北向南。一直到了金江驛的西面，纔轉了向東。江外望得見著名的左佐山。從山頂下望，看得清清楚楚。金沙江在平的盆地上面沖出了一條一千五百公尺的深溝。

從山上下來，經過綠水河，繞道去調查了野豬窩的銅礦，方纔到松坪關。從雲南到會理州的大路從此一直向北，我因為要先到通安州去看銅，就從松坪關向東北七·六公里到錢馬溝，再轉向東下到普隆河。由松坪關到錢馬溝路是很平。從錢馬溝向東走了一·八公里，路又向下。第一段從坡頂到涼水井的西面三·九公里，共下一五五公尺，坡度不過百分之四。再經涼水井，半坡下到普隆河，五公里有零，共下六百六十公尺，坡度為百分之十三。從普隆河向東北上坡，也是五公里方到坡頂。坡頂與普隆河的高度相差六百八十公尺，所以兩岸的坡度完全相同。從

錢馬溝東面的小山上向東望普隆河正與從江驛西山望金沙江一樣——也是一個平平的高原忽然沖開了一條峽谷，不過普隆河的谷只有八百多公尺深，抵不上金沙江的偉大而已。

從普隆河從通安三十公里，路完全在盆地裏面。通安南到金沙江不過十公里，所以向南流的水河身很深。在通安將軍石銅礦北面的乍車河，離通安不過五公里，河身已經在一，六〇〇公尺以下。我于五月二十九日由通安到鹿廠，又從鹿廠經鳳山營到力馬河的青鑛山看鑛，然後回到鹿廠，再向北到會理縣城。會理盆地北到白果樹，西北到龍爪山脚，東到波羅塘，南到江驛。東岸到通安，東西平均三十六公里，南北一百公里，面積三千六百平方公里。除了鳳山營以北的鴻川河，鹿廠以南的代石溝，和波羅塘的大河以外，深谷沒有在一千八百公尺以下的，高山沒有到二千五百公尺以上的。氣候很溫和，土地很肥美，是川南萬山中的樂土。

從鹿廠到力馬河的一段，還有特別敘述的價值。嚴格從地質上講起來，會理地盆，到鹿廠以西已經盡頭了。從鹿廠經鳳山營西南到青鑛山，地形上好像仍然是會理盆地一部分，其實地質上已經發生複雜的變化。最奇怪的鳳

山營北的鴻川河距金沙江很遠，而河身特別的低——出海面只有一千七百多公尺。不但比普隆河的上游在會理城附近的一段要低一百五六十公尺，而且比普隆河中段也還低六十公尺，而鴻川河的水源很短，現時的水量也不大，不應該有這樣的深谷。我的意見以爲鴻川河現在雖然變爲普隆河的支流，以前却是安寧河的一部分。安寧河發源于冕寧的北面，完全是一條南北的水。到了龍爪山西面，撒連村以南，忽然改向西流，與鴉隴江會合，是很不自然的。在安寧河改向西流的地點，有一條自南而北的支谷，叫做烏梭溝，流入安寧河。牠的南面的源頭與鴻川河的發源地相隔不過一個二千多公尺的分水嶺。以前安寧河，烏梭溝，鴻川河，普隆河原是一條自北向南的大水。以後因爲鴉隴江的水大谷深，安寧河的水被鴉隴江的一條東西支流向東推進搶了去了，所以烏梭溝改向北流，變爲安寧河的支流，而鴻川河變爲普隆河的支流，正如我以前所講的鴉隴，金沙和紅河三條水的關係一樣。

鴻川河在鳳山營的北面有一座鐵索橋。橋是九根鐵練子所造成的。練子兩頭扣在安入石頭裏的鐵柱子上。練子上面鋪得有木板，兩邊有欄桿。人和牲口都可以安然的通行，不過走得急的時候，橋身全體搖動起來，頗有點可

怕。

在鳳山營西南十一公里的青鑛山，是中國惟一的鎳鑛。誰都知道漢口出白銅器。所有的白銅水煙筒，煙頭，煙嘴，以及痰桶，面盆之類的器皿都是在漢口造的。從前做這種物件的原料是「雲白銅」。現在早已改用德國來的洋白銅了。所謂「雲」者是指雲南。白銅是鎳和銅的合金品。其實雲南只出紅銅而不出白銅。以前的白銅完全是從會理的青鑛山產生的。因爲從會理運到漢口是利用雲南的東川昭通運銅的大道，所以漢口人都以爲是從雲南來的。青鑛山的鑛石平均含鎳百分之二，是一種富于基性的火成岩。但是以前中國人並不知道有鎳，只知道用紅銅來提煉就得到白銅和青銅。提煉的方法極其複雜。據一個老工人對我說，提煉的手續如左：

(一)坐窩 用的爐子與西南普通煉銅的爐子一樣。但是爐子的底部有一個五寸深，一尺徑的「窩」。窩的上面塗得有木炭灰。然後把一千斤鑛，加上五百斤從小關河來的白石頭放在爐裏。用礁炭生火。費時一晝夜，礁炭五百斤，第一步完成。除去流掉的渣子外，可以得到二百到二百五十斤的硫化金屬兩種。在下部的叫做「海底」，在上部的叫做坐窩。

(二)頭火 用磨碎了的「坐窩」一百二十斤，加上六十斤木炭，放在一個用木炭生火的小爐子裏面。六個鐘頭以後得到所謂「頭火」七八十斤。

(三)毳火 用的爐子是一個淺坑。坑前面生得有火。再用風箱把火焰吹到坑上。坑底用木炭灰塗過，然後放上十斤「頭火」，蓋上木炭。兩點鐘以後，除去渣子少許以外，得有六斤「毳火」。

(四)過火(又名溜火或是化火) 爐子與毳火一樣，但是還要小點——只有三寸深，六寸徑。放入十二斤毳火，用十斤到十五斤木炭燒三刻鐘，可以得到六斤「過火」。

(五)老銅 用三斤半毳火，一斤半過火，六斤半紅銅，鎔成所謂「老銅」。

(六)青板 用五十斤未經煉過的鉛砂，加二十五斤次色紅銅，三十斤石灰石放在和「坐窩」一樣的爐子裏面。三十六至五十小時以後得到所謂「青板」。

(七)金銅 把「坐窩」所得的「海底」放在「毳火」爐裏提煉。五六次以後，原來的「海底」只剩有百分之一的重量。這叫做金銅。

(八)青銅 用金銅半斤，青板三斤半，紅銅三斤半

，老銅○·七斤，鉛○·○二斤混合放在五寸深，五寸徑的泥罐子裏面。罐子是白雲山來的黃泥做的。罐子中間是一個空心柱子。各種物品放在柱子的四圍。再蓋上木炭。三十分鐘以後，合金品如開水一樣的滾了。然後把蓋的木炭去了，加上爐灰，放在涼水裏。

(九)白銅 完全與製青銅一樣，但是不加金銅。

青銅白銅都是最後的出品，可以直接到漢口出賣。以前每一百斤成本在銀四十兩左右。加上運費至少要賣到七十兩一百斤方纔合算。自從前清光緒初年，因為洋白銅進口，漢口的青白銅逐漸的跌價，煉青白銅的人都虧了本。到了光緒十三年就完全湮沒了。當我到青鐵山的時候，所有老井已經完全湮沒。只見還有極多的貧礦堆在井的旁邊。鑽東一公里的元貞爐村和村北的街子已經成了瓦礫。只有一個極大西嶽廟還沒有完全倒塌。村子是在力馬河的邊上。河兩邊有竹子，芭蕉，是會理盆地裏不常見的植物。

青白銅以外，會理南的鹿廠和東南的通安都出紅銅。兩個地方的銅礦性質很不一樣：通安的是很富的脈礦，但礦量大小不易決定；鹿廠的是成層的貧礦，礦量較有把握。

。比起最有名的東川銅鑛來，只有希望好點。因為交通不右東川方便，開採年數較少，霞頭和潛水以上的鑛還有相的存在。可惜從會理到成都是三十二站的山路。到昆明

雖只有十五站，而要經過金沙江，上下一千多公尺，沒有法子可以改良運道。不過銅（尤其是鎳）是貴重的金屬。在較遠的將來或者還有發達的希望。

和 與 戰（西安通信之一）

旭 生

聖之先生如握：

我于熱河陷落以後，那幾天若醉若夢，心裏難過極了，所以給孟真先生的信，亂七八糟，寫了一大起。發出去以後，我就有點後悔了，以為這裏面不少的夢話，恐怕要

四十七兩期，趕緊一看，還好！亂七八糟的話，大部分已經刪去了，脫下的部分，還算有點意識。這樣的筆削，不曉得是孟真先生的，是你的，是別位先生的。不管是那一位，我對於他，全異常的感謝。

老朋友如先生者，大得罪而特得罪了！我當時就想給孟寫信，叫他不要發表，或不給先生看。以後想着說孟！就是醉話夢話，自己也不得不負責任。這樣亂七八糟的話，孟真心中也一定明白，不會去發表。至于先生，我常曉得你的雅量，以為我雖得罪而先生或可不至見罪，所以也沒有寫另外的信。可是心中總是志志忡忡的。近來期的獨立評論，我沒有接到。可是前幾天我接到北平朋的信，提到這一封信，並且說在獨立評論發表，我大驚：「這可糟了！這樣亂七八糟的話，怎麼樣能够發表呢？」我今天有工夫：就跑到西安派報社，買到第四十六，

讀到先生的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知道是正針對當時

進先生的議論及孔那封信說的。就是詠霓先生的我們還有別的路麼？雖然沒有提到我們的話，似乎也不免有點關係。今天下午又接到第四十八期，叔永先生的我們是右派麼？是專對我的「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那句話說的。我隨便不小心的說了一句話，竟引起叔永先生這樣的生氣，就誤了他不少的時間，專寫一篇東西來駁我，我非常的抱歉。這樣却使我不能再說幾句話。並且我的教育罪言，據我所看見的，就有吳景超和陳序經兩先生的大文來討論，——如果還有其他，或在他種刊物上討論這

箇問題的文字，希望你告訴我，我預先謝謝你。——我心中很高興。我本意想專作一篇文章，同他們討論，不過近來我的工夫不多，所以僅就這一次通信，簡單的陳述我的一點意見。

我對於和戰的意見，不過如以下所說：

我個人對於此次國難是一個徹始徹終的主戰派，我自己覺如是，近來也有不少人知道我如是。可是字的歧義，能到什麼步田地呢！我這個主戰派，同先生的不戰派，在事實上，所爭並沒有很多。但是，先生總是一個不戰派，我總是一個主戰派！就是最近我對於戰爭主張，有點動搖，可是，這是主戰派的主張動搖，却毫無意對於不戰派投降！爲什麼我們在事實上所爭並沒有很多呢？我還記得國難起來不久的時候，大約是二十年一個冬天的夜間吧，我在先生的客廳裏面，我們談這個問題，我們意見相同的很多；戰必敗；戰敗的犧牲必異常的鉅大，並且比任何一次的犧牲全要鉅大；那是我們兩個完全同意的。歐美各國不能參加，你覺得是絕對的；我雖然沒有覺得那樣絕對，可是儘少最近他們萬不能參加；所以這一點我們的意見也沒有大的差異。歸結，先生問我：「然而先生主戰，

試問將何以戰？我答言：「我所主張，只有三句話：第一，正式軍隊用十九年馮將軍在河南與中央軍隊打仗時所用的戰略：步步爲營，步步堅守。能守則守，不能守則退。守第一道戰綫時，第二三四五六道的戰綫完全預備妥帖。敵人不怕犧牲，可以得到一道兩道以至于若干道的戰綫，可是每一次他們總得出相當的代價，每一次他們所得的，不過十里二十里的土地。第二，他們此次兵力最大的限度，是拏了我們的東四省，拏了我們北方的大平原，拏了我們沿海各大城。——除了廣東的——我們步步爲營，退到這個限度以後，我們就改變方略，採用共產黨抵抗中央軍隊的辦法，繼續同他們作戰。你可以繼續着殺戮我們的人民，侵略我們的土地，我們却不能任你安生生的布置和享受你所得的戰利品。第三，在這個時候，人民方面，就採取東三省馬賊——因爲我們說話的時候，義勇軍的名字，還沒有用開——採取馬賊的辦法，同他作游擊戰，擾亂他後路。我于無辦法中所想出的辦法就是如此。這種辦法，先生不願主張，然而也承認有相當的理由，想先生總也還記得。至于全國總動員，就可以打勝仗，就可以恢復失地，我却從來沒有那樣的幻覺。不惟如此。我很反對從前「打倒帝國主義」的空嚷嚷。我以爲政府在九一八以前，對

于東三省的各懸案，應該有相當的整理，應該有相當的讓步，不應該迎合全國民浮誇的心理，作繭自縛。國難突起以後，蔣介石先生慷慨激昂的言論，即爲失態。我想這些意見，恐怕同先生也相差不遠。就是幣原所提的原則，我雖然明知無益，我覺得政府同他談談，也未始不可。所以我說：我們在事實上所爭並沒有很多。我又爲什麼說：先生總是一個不戰派，我總是只一個主戰派呢？因爲我覺得這樣的犧牲，才有意義；這樣的犧牲才有希望；先生或以爲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高調，廢話！我以爲日本現在世界人的心目中，已經成了臭蟲一個，沒有人不厭惡牠。不過他帶了一身炸彈，逢人就拚，大家全有點怕牠。歐美人所缺的不是錢，不是軍火。不過談起拚命，大家全避之未恐不遠！人家的躲避，人家太有理由了！大戰的瘡痍，現在還沒有恢復，現在事不干了，人家不是喪心病狂，爲什麼又爭著來拚命！中國自己的事情，中國還沒有表示出來全國拚命的意志，人家又爲什麼來拚命！中國國民現在最要的急務，就是要極堅決的表示出來，命是應該由我們自己拚，我們就一點不辭讓的，不畏懼的去拚，一點不牽掣別人的去拚。這樣的拚，犧牲一定異常的鉅大，全國優秀的青年，大約死傷到一多半，那自然無庸諱言。可是犧牲愈

壯烈，所得的同情愈深摯。我們的目的並不爲得他人的幫助，而歸結却不患無人來幫助。並且這樣的大擾亂，一定將世界各國在中國的商場毀壞無餘；他們在利害上，也不能不出來說話。幫助日本，壓迫我國，那是不會有的事。那樣世界的戰爭，由我們的堅決抵抗而促成；日本的瘋狂軍閥，由我們的堅決抵抗而促倒。我們一國，固無奈日本何，可是打倒破壞世界和平的日本，我們扮演主要的角色。此戰以後，我國雖創極鉅，痛極深，而世界各國從此知道我國民族還不是那樣甘心受欺侮的民族；數十年受壓搾的局面，或將一掃而空。這樣的希望，難道還不值得一犧牲！這樣的希望，大約先生總以爲是徐旭生的妄想吧！國難一起，我們就看出來這是日本軍閥對於其政黨極堅決的掙扎。他們雖不見得「中乾」却一定是「外疆」的。他們無論怎麼樣，絕不能把已經吞到肚裏的東西吐出來。就是把名義吐出來也不能。同幣原談判的機會，先生及先生的同志很惋惜把牠失掉，實在又何必惋惜？犬養毅老頭子爲什麼白晝被誅于相府，先生一定很曉得。我並且聽說日本軍閥預定的發難時期，是九月二十，並不是九月十八。因爲聽說中國政府預備在外交上屈服，所以特別提前兩天。他們所特造的「證據」，很有些不接頭，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像這樣深思積慮，一往直前的軍閥，先生却希望能同幣原交涉成功，姑無論那樣名存實亡的條件，我們是否應該接受，即使應該接受，交涉順利，幣原喜三郎也不過先大養毅而受誅于軍閥，有何益處？我們所主張的辦法，雖不敢說是上策，中策，下策，然而聊勝于無策，先生所主張的什麼辦法，我們雖談過幾次，我却捉摸不清。我只覺得每次先生對於一切，全異常悲觀。國家大事，豈可以一悲觀了之？以「無可救藥之樂觀派」自負並著名的胡適之先生，竟陷于徹底悲觀，豈不是很可痛哭流涕的事情？自國難起來以後，我們大家全在希望。不過我總覺得先生所希望者多在他人，比方說，很希望日本政客之能裁制政府。我個人所希望者，雖是否能實現，尙有問題，而所希望的，總還算在自己。我所主張的，與其說是戰，毋寧說是堅決抵抗，專精一志的堅決抵抗，與不抵抗者——如在瀋陽，如在錦州——極端反對。我也知道先生還不至于主張不抵抗，但是先生的悲觀和曖昧的態度，却很容易爲苟安偷活者藉口。此吾所以不能不對於素所欽仰之胡適之先生大致其惋惜者也！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武力是中國惟一的出路」，我們對於詠霓先生所說「我們抵抗的決心必須從抵抗的準備上

來證明，大可不必發十八次不接見日本代表的宣言來掩飾」的話完全同意。但是，像上海那樣的停戰協定，我們雖然未見得怎麼樣反對，可是如果現在有人再草那樣的協定，或定同類性質的默契，那我們一定是堅決反對！因爲上海協定，無論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我們雖受鉅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著我們的什麼？至于現在，敵人能將我們的東四省退出來一尺一寸麼？無論協定，無論默契，那是不是就算承認我們對於我們的東四省沒有說話的餘地了？同日本現在萬無法交涉，先生及先生的同志也完全承認；戰事正在緊急；敵人奪了我多倫，又覬覦我沽源！在這箇時候，先生却不願談戰，並且對於主戰的朋友大加申斥！在先生及先生的同志，或有蓋謨嘉猷，未可告人，但吾儕小人，識見卑淺，却有一點莫測高深呢！

先生引郭筠仙的話來教訓我們，我個人異常的感謝。先生問我們「今日讀這種忠告，應該作什麼感想」，我個人的感想如下所說：郭筠仙是我最佩服人中的一個，他對於明末「持兵事之短長尤急」之徒，異常痛恨，我個人也很表同情——要記清楚，他並不是對於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痛恨——但是先生萬不要忘了他的一句話：是「可以理

屈」。當崇厚簽過喪權的條約，經曾劄剛的力爭，還可以挽救一部分，而我國對於戰事，並無充分預備而冒然主戰，真是有點荒謬！今日之事又何如乎？果「可以理屈」乎？伊犁條約的挽救，固然靠著曾劄剛的手段敏捷，然而左文襄公老頭子，一定要與俄國一拚，也同此事大有關係。這些情形，先生也會注意到麼？先生或者說：現在也還「可以理屈」，不過不要性急。那我就答道：也許！但是即使還「可以理屈」，那一定還是「力爭」的結果！如果「可以理屈」，還有一線的希望，其就要問先生：那是十九路軍，二十九軍，與商，孫及其部下英雄拚命鏖戰的結果呢？還是張學良，湯玉麟全帥而退的結果呢？再試問羅鈞任顏駿人顧少川郭泰祺諸先生：如果不是這一班民族的英雄，還在那裏不顧粉身碎骨的同強虜血拚，他們是否還能有一點辦法？如果沒有岳飛韓世忠吳玠天錡劉麟諸人的浴血抵抗，那就是想作秦檜，也不可能！這是天經地義，毫不容有疑義的道理！所以今日惟有言戰，惟有專精一志的言戰！

要之，先生及先生的同志，如果主張不戰，就應該拿出不戰的辦法來！如果自己沒有辦法，却禁止我們的言戰，那就要原諒我們不能屈從，並且也無法屈從！

我對於先生問董先生「亡國又是什麼」那一段話，無法隱藏我的憤怒。但是那已經由董先生回答，我可以不必再說話。不過荒木貞夫因為要達到侵略的目的，正在勸國人效法二木謙三博士喫一頓飯，而我國先知先覺之士如先生者，却是慈悲忍耐，憐憫人民的苦痛，憤怒的問：亡國又是什麼！那我們作亡國奴，豈不是活該麼？

然則我又爲什麼最近對於戰爭主張有點動搖呢？那說起來很痛心！我最近想到：庚子一役，最對得起國家者，是「拳匪」，是紅燈照的女子！最應萬死不赦的，就是我們這一班穿長袍短褂的士大夫：他們在槍林彈雨之中，奮血肉之軀，大呼突進，以與強虜爭死生，以圖爲國家雪積憤！他們有什麼對付不起國家的地方！Pierre Loti 說和燈照的女子是未成功的 Jeanne d' Arc (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也實在是無可疑的判斷。他們所最可憐的，是知識愚昧。但是，負知識責任的是什麼人？平日喫的比老百姓好，穿的比老百姓好，享用一切均比老百姓無限好，視然負「民之首」的榮譽的是什麼人？這樣說起，不惟當日主戰的人罪該萬死，就是不主戰的人，反對戰的人，在平常的時候，何嘗盡了他們的職責！時間過了三十多年，士大夫還是照樣的士大夫！吾忠勇的將領士卒，冒冰

雪，歷險阻，喋血爭死，以爲我全民族爭已喪失的人格，其忠誠之氣，真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可是素日養尊處優，享受比平民高數十倍之士大夫又作了什麼事！平時不能善盡自己的職務，臨時又不能認清自己的責任。下者酣歌恒舞，高者清談誤事，似乎國家的事情並不是他們的事情？所以今日的人民並不是亡國的人民，而士大夫却一定是亡國的士大夫！在這樣的社會而高談抵抗——抵抗！抵抗！無論任何民族應有的最低權利！而在我們中國談起，竟成高談！——庸有何益？所以近日對於主戰頗有動搖！雖然，無論任何民族，均有生活的權利。在今日的狀況之下，不談戰，不談抵抗，又談什麼？炳昶不敏，願以質之高明！

再進一步說：今日談和談戰，均落下乘。宋人和戰紛然而金兵已渡河，這是一件什麼樣慘苦的紀念！我們今日豈可再蹈他們的覆轍！今日所缺乏的是作，不是談！如果我們對於國難有所見解，就努力去作，那談戰可也，就是談和也無不可。如偷安苟活，而清談誤事，無論和戰，國家何賴有此清談哉？所以今日我希望這樣爭論，早日停止，不要再對於這樣萬不能得到結論的議論耽誤時間——對於這樣的爭辯，需要的材料，不曉得有多少，萬無法搜集完備。即使搜集完備，仍無用處。因爲這裏面所用的實在

的判斷，不過一少半，而大部分却一定是價值的判斷。雖不敢說，價值的判斷毫無客觀的標準，而主觀的東西一定要混進去，這是世界上無論任何人全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希望這種爭辯得著結論，那是萬不可能的。——大家擇定自己所認爲有益于國家的事情努力去作。大家有事情可商酌則商酌，可談則談，但是千萬不要就誤了去作。可是今天還有兩件事想談，所以借住這箇機會，同先生談談：

第一，今日中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不靖內憂，外患沒有辦法，那是一定的道理。蔣廷黻先生所說「土地問題不是什麼法律問題，學理問題，是個迫不及待的政治問題」，真是一針見血的話。如果這個問題不趕緊解決，那共產黨就不必說剿，也萬無法剿。蔣先生所引歐洲各國的辦法，均可供吾人的參考，但是我國人應該怎麼樣辦，蔣先生却沒有說。我個人對於社會科學毫無研究，所以本不應該插嘴。不過略有所見，似乎也不妨借獨立評論的方面向大家說一說。

我個人是一個半新不舊的人——可見我說「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毫不含有一點鄙薄的意思——所以主張的辦法，也是一種半新不舊的辦法。我的主張頗爲

簡單：立法院應該毅然決然宣布從今日起，惟耕者始能有其田。地主買賣權利當然完全取消。可是地主其他的權利雖然不算正當，但這是由于社會制度演成的，並不是他們個人的罪惡。現在改革制度，却全讓地主餓死，那不是國家應當作的事情。救濟地主的辦法，就是田雖屬於耕者，而對於地主，最近還不能完全斷絕關係。如果爲十年內所置之地產，即責其于二年內用原價賣與自耕農；如不肯賣，在二年後，即完全歸耕者，與地主斷絕關係。如係祖業，則依累進法大減田租。比方說：地土有五百畝田以下者，減百分之十，以上者減百分之十五，一千畝以上者減百分之二十，依此類推。以後每年遞減，務須于十年內減到一箇最低的限度，比方說：贍原地租百分之十。以後仍每年遞減，但減數較遲，再遲十五年後，完全減盡。這換句話說，就是給地主十年的期限，使他們改業。十年以後，還贖一箇最小的數目，不要立時斷絕關係者，就是因爲五十歲以下的人改業容易；五十歲以上的老人，改業不易，只好養活他們到老死便了。再斟酌各地方的情形，制定農人置田產的最大限度。達到限度，即不得再置產業。城市工人亦將其分紅之法詳細規定。大約工資不宜過高，而分紅之額須少厚。以後遞年增加，務使資本方面獲利

漸漸減少；三十年後工場完全歸工人自行管理爲標準。如此則勞資打成一氣，爭競自少。法制定後，令剿共軍停止攻擊一月，由政府制定懇切的解明書，由飛機散布于共產各區域，如一月內來歸者，卽同平民。以後如有共產信仰，卽可出席國民議會，用法律手段，爭此權利。如仍執迷不復者再行進剿。此後森嚴吏治，務須使法律完全有靈。如此則國民經濟的分配，得有解決的希望，共產宣傳完全失效，始有肅清的可能性。要之，田制方面的改革，工人分紅辦法的制定，在細目上或與我以上所說有出入，而原則上，必須向耕者完全有其田，工作者完全有其工場的方向走，大約並無疑義。此一點與整頓吏治，如鳥之兩翼，如車之兩輪，未可廢一。此二點辦通，共產黨也無須要怎麼樣剿，自能平定；否則無論怎麼樣剿，也萬不會平定。希望全國朝野上下，趕緊討論這件事情，實行這件事情，則內憂既息，外患始易爲力矣。

第二，現在大家全推測日本既得熱河，暫止于長城外，暫時不進攻平津，如果進攻，大約是西攻察哈爾。這種推測大致不差。雖然，日本軍閥之行動，未易測也。並且即使暫時不進攻平津，而平津人民又復苟活偷安，則不久又將爲人魚肉，蓋可斷言。國難突起以來，朝野上下仍在

偷安旦夕，以至于鬧到這步田地——熱河失陷以後，先生與大公報記者，世界日報記者對於失敗原因，講的已極詳明。但是有一件極重要的原因，比那箇原因全重要，而大家全沒有看出者，就是朝野上下，完全是偷安旦夕也！——如果再繼續下去，那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然則怎麼樣作，你是否主張就出兵收復失地呢？否否。我們所主張的，步步爲營，步步退守，却步步緊持，不使敵人間暇，從容布置我們的東四省。至于漫無準備，冒然出兵——然而準備豈易言哉！即令今日開始積極準備，半年內也萬不得完成，而況今日尙未能開始準備耶？——那是有意把我們忠勇將士送于毫無代價的死地，非有特別作用的人，萬不能作那樣的主張。然則既不能出兵，又何必言戰？應之曰：今日居領導羣衆地位的士大夫，一種無論如何，只會苟安求活的士大夫也！戰事緊急，苟安求活的心理，未敢昌言之于口，且日蘊之于心！一旦少緩，他們又嬉樂昇平，國難二字，亦將黯淡而無色！微論「五十年」，即百年亦長此已耳！且強敵壓境，既不容有停戰的協定，又不容有停戰的默契；如尙不欲再繼續張學良湯玉麟之覆轍，則不言戰，又將何言？不預備戰，將何所預備？此時言戰，約有三誼：傾全力以守察哈爾，使勿繼熱河の後塵，一也。義

勇軍辦法本不錯，止因素無籌備，以致無組織，無聯絡，以致未能得預期的效果，殊堪痛惋。現在政府應注全力去積極整頓，以後朝野共同負責，去幫助他發展。至于正式軍隊，雖未能積極進攻，亦未可完全坐守。應定一種乘虛搗取的全體計畫，彼出則歸，彼歸則出。要之，必使義勇軍得優良正式軍隊的訓練與紀律，使正式軍隊利用從前義勇軍擾敵的策略。同他持久抗爭，或可得志，二也。此第二點，苟安偷活的人，或者要反對，以爲敵人已止于關外，爲何擦之使進關內？我們對這些人並無話說！僅可說者，我們是談戰，不談別的！諸君子如果想在小朝廷苟安求活，或爲亡國奴而苟安求活，那我們也無話可說！我們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可也！我們談戰，我們相信敵人可以占據北方的大平原，那我們就不能不有所準備。準備什麼？準備民間的義勇軍。義勇軍的準備，談何容易？且需款甚多，取之民間乎？取之政府乎？應之曰：我們很窮，就得作一種窮打算，窮預備。就上海十九路軍及最近長城各役的經驗看起，我兵利于肉搏，不利于遠戰；利于夜間奇襲，不利于白晝正戰。況義勇軍非正式軍隊，止可作游擊戰；那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由政府，或由民間自行提倡，均無不可。農民本多暇，宜利用其暇時。每

天不必多時，操練時間，一兩點鐘即足。止訓練以拳脚和用大刀。此外天黑後，宜由教師帥領，畫定路綫，出外奔走，以訓練其耳目與腿脚。以六點鐘能走百餘里不大感疲乏者即為成功。這一段的練習，大約半年可望完畢。將需用時，選其極精悍者百分之五為手提機關槍隊，餘演手榴彈。此段訓練，二三月必可完畢。此等義勇軍由正式軍官帶領，却絕不編入正式軍隊中作戰。第一段的練習，儘少在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察哈爾綏遠十省，必須刻期完成。款項所需無多。至第二段的訓練，練習較易，需款甚多，可臨時再議。款項完全由政府擔任。此十省儘少可得大刀手榴彈隊一千五百萬，大刀手提機關槍隊八十萬。以之衝鋒打倒日本自然不足，以之為鐵蒺藜拒

馬木儘有餘了。到那時候，正式軍隊，準備完全，可以專心攻戰。至于守禦，留一部分的軍隊，與民團聯合，即可敷用，三也。我們自信：如果政府諸公，全國人士尙未願意偷安旦夕，苟且求活者，這三件事一定不難辦到。這三件事如果辦到，日虜也並不足深慮。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應該堅確毫無動搖的認定：今日被逼，除戰無他法！戰必敗！敗必犧牲奇大！犧牲雖大，而仍應苦戰，力戰，久戰！久戰必勝！勝則一世紀被壓榨的局面必可完全衝破！全國認定此一定的目標，勇敢進行，止求諸己，勿望諸人。在這時候，又何必怕言戰？又何必怕言和？又何必和戰爭論之紛紜哉。

我個人對子和戰的意見，大致不過如此。（未完）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報價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新聞」每月一元
 「體育界」每月一元
 「學園」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社會新聞」每月一元
 「外埠通訊」每月一元
 「經濟界」每月一元
 「教育界」每月一元

社會研究叢刊

之十

國際勞工組織

曾炳鈞著

定價八角

國際勞工組織不特為戰後的國際勞工立法機關，且為戰後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研究機關，對於這個機關，凡欲了解國際大勢者絕不容忽畧過去。本書以純粹客觀態度，根據原始材料，分析十數年來此項機關之內部構造，活動概況，工作成績，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申敘國際勞工組織成立的歷史背景，第二篇分析國際勞工組織的內部組織情形，並就該組織十年來保工立法的成績，作一個概括的檢察，第三篇餘論。全文長十萬言。為留心勞工問題及研究國際勞工立法者不可不備之參考書。

總發行處：社會調查所

(北平天津街三號)

代售處：各大都市各大書

店均有代售。

書目：本所出版品詳細書目

函索付郵票一分即寄。

從反省中求出路

詠寬

中國到了今日，大家皆感覺無路可走了。因感覺毫無出路所以大家沉悶灰心，進而至於麻木苟且。盲動還有一些勇氣，徬徨還有一些希望，等到大家感覺反正什麼都弄不好，那便只有暫圖個人的一時享樂，坐等着做人奴隸了。

其實這是極錯誤的心理。即使失地暫時收不回來，我們還有二百餘萬方哩的土地，那至少是各國公認爲中國本部毫無疑問的。雖然稍少有些不公平條約束縛，究竟不是致命之傷，總有法子可以掙脫的。世界上有許多土地人口地勢物產以及政治地位還不及我們的國家，例如歐洲的小國，南美洲的拉丁諸國，甚至於澳洲南洋各殖民地，他們都還在努力上進可以自立，爲什麼中國便一定無救？除非說是中國人全是天生劣種不配生存；這又是我們所萬不能承認的。只要看中國與外國人在同等工作上中國人並不是不能與他們競爭。例如歐美各大學的考試，中國留學生很有出人頭地的。南洋各處的工商業，中國僑民至今還有很大的勢力。在近十年來初興起的科學研究中，中國人雖是

初進，也已有若干光彩的貢獻。何以對於國家大事一定弄不好，竟弄得全國感覺沒有出路，這真值得子細想一想的。我們須想今日之走頭無路，是否因爲從前走錯了路，我們須除了從前舊路之外是否還有他路可走。

中國前幾年對外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其結果是中國幾乎被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今日我們已經覺悟要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沒有能力只有決心是不够的。現在對口抵抗只是等他們攻進來了，我們抵抗他幾時，結果還是他進我退抵抗不住。所以如此抵抗下去，究竟不是出路。聞北高峯口南天門諸戰事，我們將士壯烈犧牲，真足以動世界之觀聽，振民族之精神，但是物質力量真是相差太遠了。我聽見從前敵回來的軍人說：「我們想奮勇殺敵，但我們何曾看見敵人，我們只見飛機的炸彈與大礮的彈子不斷的飛來，打得我們安不得身。」所以大刀制勝只是偶然的事，靠大刀救國是斷斷無望的。現在有人怪中央沒有整個作戰計畫，沒有用全國力量來抵抗，是的，這幾次作戰並沒有用盡全力這是的確的。但試想即使我們用盡全力來抵

抗，最後結果如何？第一等弱國便真能抵得過第一等強國麼。如果只要決心抵抗便能取勝，我想歐洲大戰時德國決不會簽凡爾塞和約，威廉皇帝也不至於退位了。

大家最所希望的又一條大路是經濟建設。但是五六年來的宣傳只落得舊的日見破壞，新的不見成功。不但事業的實現愈弄愈遠，而且紙片的計畫都感覺種種爲難。例如講基本工業，中國最大的鐵礦便在察哈爾東部近熱河的邊上，他們一伸手便可拿去，我們又如何敢投鉅大資本去開採與製鍊呢。長江流域想辦的鋼鐵廠至今還在遲疑瞻顧，不敢設在江邊，恐怕被敵人兵船上的大砲所破壞。所以國事不安定實業也辦不了。現在的建設只有幾條公路還算實在，但是沒有出產，公路也沒有大用。向來有一個希望是得國際的資本與專門人才的協助來開發中國的富源，孫中山先生整個的實業計畫便是爲此而作。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趨向這一方面。但是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要得某一國或二國的單獨協助是很難的。國際的投資必先得國際的諒解，從前的幾國銀行團已是如此，現在的形勢更不得不如此。即使形式上出以國際聯盟的名義，實際上還是需要各大國間的協調。如果在經濟建設上也特表示出專爲抵制某國對付某國的意義，對方也不免要用種種方法來對抗與

阻撓。所以國際形勢不穩定，不但兵事上時感威脅，經濟上亦必日陷困窮，無法救濟。

在這種形勢之下，教育學術事業亦生空虛之感。因經濟建設如果一些不能進行，則學校學生畢業之後當然都無事可做，教學循環無從打破。學術研究也無從應用，引不起社會的重視。於是青年學生更看不見求學的目的，大家更感消沉，更加灰心。這種情形不是空言勸告所能挽救的，也不是政治改革所能變換。憲政黨治，翻來倒去，不過如此，即使熟讀了什麼主義，也不見得有何效果。所以文化固然是主國要素，但震撼危險到中國今日的程度專在文化上也決找不到出路的。

從上面幾點討論並不是證明中國絕對沒有出路，却是可以指出找出路的方向。從前所走的方向是一方面要打破外國的侵略，一方面又希望外國對我們建設的幫助。但是國內沒有安靖，國際缺少信用。所以建設的幫助一些沒有得到，而外交上事先不明形勢臨時又不善應付，所以弄到今日的焦頭爛額。這個方向既然不易走通，只有改換轉來另尋出路。現在我們應該覺悟弱國自處之道，應有的權利不能輕易放棄，但對於外國也不可輕易有挑釁的舉動。遇有交涉必須盡情盡理的討論，充分利用國際和平的工具，

務將國際關係納之軌道之中。對於爭論問題，須盡力求出解決的方法方見外交家的本領，不要只屢次複述呆板的官話以愈陷國交於僵局。對於各國的關係，過於瞻甲敵乙不見得一定有益，往往不如提倡國際和平合作的協調，以消泯那不必要的猜忌。總而言之，我們要將國際形勢安定下來，親仁善鄰（只要是友善的鄰），不卑不亢，在這安定的環境之下方能講得到建設。這樣辦法在九一八以前是很容易的，以後便不容易了，但還是要努力。

對於經濟建設也不必立刻希望外國的太大規模的幫助。我們第一要用古來所傳的勤政愛民的精神，做出幾種實惠及民的事業。中國現在政府之缺少力量不盡由於反對黨的跋扈，最大的原因是不能取得多數國民的信任。國民之所以不信任，又因為的確沒有得到政府的好處。所以現在必須趕緊做出一些一般國民所能感受的政績。這種政績決不是幾所大洋樓，也不盡是幾條公路（當然需要各處不同），最要緊的還是澄清吏治，安靖地方，減輕捐稅，禁止苛擾。這也是復興農村的第一步方法。形式不妨淺陋，利益要能實在。小規模的整頓與建設雖然平淡一點，但在大亂之後却為一般社會所最易感覺的。第二是要積極整理幾種重要的政府事業，例如國營鐵道，無論如何是說不出

不能賺錢的道理的，必須完全置之營業基礎。舊債有法償還，新債方能募集。舊路能夠有利，新路自易擴充。這種事業的整理，對內對外均可表示政府的能力。內外的信用鞏固，所希望的幫助便容易得了。這二件起初都用不著等待外來的幫助的，只要有安定的環境及努力進行的決心。現在還來得及，不要等來不及了再後悔。

「饑者易為食」，在這樣的亂世要得到國民相當滿意的政績是不辨的。同時也要希望所謂智識階級的人反省覺悟。學生們臥軌請願，罷課遊行，現在看來有什麼用？我們萬不可專以大言壯語責望政府，我們對於政府批評的標準，第一要看他們能否負責。什麼叫負責呢，就是一切言論行動都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不博一時的虛聲，不謀一身的利益。第二要看他們的政策是否合乎時勢的要求與國家的真正利益，因為政治形勢隨時變化，政治家即使誠心為國也能有見解錯誤的時候。為政須求好人，但好人也有不合時宜的時候。在中國政治領袖之中，亦誠為國真正不乏其人，但如果有不合上述標準的時候也就不可一概而論。我們對於政治的理想不妨甚高，但對於實行的困難亦不可完全忘却。譬如在目前形勢之中要求中國政府立刻派兵收復一切失地，或是希望把中國立刻改成俄國的共產經濟或

是赶上美國的工業程度，這都是事實上所做不到的。如果大多數人不問事實一味妄想，也會迫得政府盲動胡攪，把國家的命脈都斷送了。

所以社會輿論的明白也是政治安定的一個要素。中國輿論向來因為缺乏事實的認識，所以對於現狀總是不滿，常想換一箇新鮮局面看看。失意的軍人政客便利用此種弱點，假借幾個空虛無當的好聽名詞，時時做軌外行動，反對政府，要取而代之。等到地位取得了，也是一樣做法，乃曰「彼一時，此一時也。」結果是時時擾亂，落得個「無組織」「非國家」的惡名。現在我們應要求全國都謹守秩序，勿作軌外行動。

以上所說似乎都是比較消極的。積極的方面是要在最短的期間，大家努力，提高我們國家的程度。茲請拿我們研究生物學的經驗，作一個比例。在第一個時期我們只有現成拿外國書來教來譯。譬如講博物的口口口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早年出了好幾本教科書，也居然饒有規模，但他不過傳來幾個名詞，以及幾個空洞原理，他對於所說的動植物自己都從未認識，由他教出來的人如何能與世界動植物學家相見。這是第一時期。後來有了幾位動植物學家了，他們在外國大學做過了專門論文，學會了分門別類的方

法，能够用他們學會的方法來做中國標本的研究，這當然不愧為專門學者了。但一種科學的真正進步固然少不了那班按步就班如法泡製的專家，却還需要有提綱挈領高瞻遠矚的人材，從繁複的現象中尋出規律，從陳舊的知識中尋出問題，從無可進行的環境中自己開闢途徑。如果只有前者沒有後者只好算是第二時期。從第二時期進到第三時期並非全靠不可必得的天才，最要緊的還在乎有相當人數對於他的本行不以一得自滿，不以淺嘗輒止，孜孜不倦，悉心研究，則孰能生巧自然有超入上乘的日子。習其器更通其神，不但因襲還要創造，須要達到如此景象，纔可算是足夠程度。

中國舊文明既然落後了破壞了，新的方面無論何事絕少有超過第二時期的程度，多數還在第一時期。譬如軍事方面，雖然因頻年內戰略有作戰經驗，但兵工廠所造的槍炮還是前清時代的舊式，買了高射炮還不知怎麼用法，向外國定造了軍艦聽說還一時不會駕駛，關於弱國防最要緊的要塞建築似乎還從未有人研究，如此說來，至少有許多部份還祇有第一期的程度。說到外交，似乎已進步一些，但是至少與第三期的程度相去猶遠。中國的外交至今沒有自動的找出一條途徑來。例如蘇俄外交，初則做革命的

侵略，取近交遠攻及聯弱抗強的政策。後來因努力建設而冀求安定，陸續的向鄰國提議及訂立不侵犯協定，希望從外交上造成一條長城。又如美國立意要用和平的方法避免戰爭，從協調的途徑解決問題，所以他一方面派出各種公平的或原則要求他國承認，一方面自己減少軍備以為提倡。雖然這種方法遇着了蟹不講理的日本軍閥狠有失敗的可能，但在美國的立場究不失為他們獨具的精神。中國的外交至少沒有創造的能力，所以活的問題往往弄得，却沒見死的問題能够弄活。講到政治的組織，民國初年所爭的只是美國制還是法國制，國民革命以後又是硬學蘇俄制，其實是和不會研究動植礦物而硬寫博物教科書一樣，所以他們的程度似乎不容易說是超過第一期。

如此一樣一樣的審查過去，大約中國各種事業，十類之中只有二三類勉強進入第二期，其餘七八類還在第一期。快到第三期的真如鳳毛麟角。程度如此之低，當然左走也不成，右轉也不成。無論你要向那方面走，都得先來提

高自己程度。所以我以為我們目前必先要安定環境，穩健建設，騰出力量來奮勉進行提高我們一切事業的水平程度。在這種奮勉向上的過程中當然是人人有責的。農工商士都有他的應盡之責。一部份的不好定要牽累到別的部位，反之大部份的特別健全其他部份多少也能受到一些影響。我們第一要深深承認凡事都不能僥倖成功，有一份耕耘，有一份收穫。第二我們要知道國事已到了最危險的時代，再錯一步萬劫不復。我們須要兢兢業業步步小心來渡過這個難關。第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以貢獻於國事者並不祇在幾位院長部長或總司令。近代國家事業甚繁，各行各業的工作都得要有人負起責任盡心去幹。中國程度低到如此，沒有一人能够卸責。同時我們也深信天下沒有自用的力量，形勢雖然危險，從此押頭努力也總有轉機而且極快。最可愛的是有了教訓而不能領受，頑冥不覺，那便不可救藥了。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 (一)

吳景超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各國都有多少轟轟烈烈的勞工運

動。這種運動的目標，簡單說來，只有一個，便是求工人

生活的安全。工人在近代社會裏，謀生的方法，只有一途，便是出售他們的勞力。他們要靠自己不斷的工作，不斷的努力，才可以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維持他們家庭的生計。但是不斷的工作，雖然是工人所希望的，可是很難達到。第一，假如市面不住，工廠的貨物銷售不出去，工廠因而停工，工人便要失業。失業的意義，便是沒有進款，這時工人的生活，便要發生恐慌了。第二，假如工人有事可做，工廠也需要他，可是工人不能自己保險終年不生病。等到病魔纏身，工人只好躺在床上休養。睡在床上生病，在工人是最不幸的事情，因為在這個時候，不但是沒有進款了，還得要出錢請醫生，出錢買藥。此外，他的妻子并不能因為他生病便不過日子，但是過日子的費用，從何而來？這時工人的生活，又要發生恐慌了。第三，假定工人終年有事做，終年不生病，但現在工廠的環境，多少總帶有一點危險性，稍一不慎，機器便會切斷工人的手，折斷工人的腿，甚至斷送了工人的生命。這種不幸的災難，輕則使工人變成殘廢，重則使工人不能終其天年。這時，工人或者他的孤兒寡婦的生活，一定要發生恐慌了。第四，假使工人的一生，僥倖得很，總有事做，很少生病，避免了災難，但工作到六十歲或六十五歲的時候，大約沒有人

再肯僱他了。這時假如他有積蓄，自然不成問題，但很多工人，到了這個時候，身邊還是不名一文。這時工作的能力已經喪失了，沒有資本家再肯用他了，但這位老工人，還保存他的殘喘，這時教他如何渡此殘生？

以上所舉的幾種狀況，是使工人感覺生活不安的重要原素。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各國都是靠慈善事業，去應付這些困難。因為工人在以上的幾種情形之下，生活不能維持，便由工人變為窮人，窮人只好靠慈善機關來救濟。近來各國的政府與社會，從他們的經驗中，覺得那種應付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他們都覺得應當從預防方面着手，應當制定一些法律，來保障工人，使工人雖然遇到上述的幾種不幸境遇，生活也不會發生恐慌，不必便去請慈善機關救濟。這種保障工人生活的方法，乃是這篇文章所要簡單介紹的。先從失業的保障說起。

(一) 失業保險

近來實行失業保險的國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國家強迫保險的，一種是由工人自動保險，國家加以援助的。今根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將此兩種國家之被保險工人數目，列表如下：

強迫保險的國家

被保險工人數目

澳大利亞

一三七, 〇〇〇

總計

二, 八四一, 〇〇〇

奧大利

一, 二〇〇, 〇〇〇

保加利亞

二八七, 〇〇〇

德國

一六, 七三八, 〇〇〇

英國

一二, 一〇〇, 〇〇〇

愛爾蘭自由邦

二八四, 〇〇〇

意大利

二, 六〇〇, 〇〇〇

波蘭

一, 〇三三, 〇〇〇

瑞士(九州)

一五〇, 〇〇〇

蘇俄

一〇, 〇〇〇, 〇〇〇

總計

四四, 五二九, 〇〇〇

自動保險的國家

被保險工人數目

比利時

六二八, 〇〇〇

捷克

一, 一二九, 〇〇〇

丹麥

二八八, 〇〇〇

芬蘭

未詳

法國

二〇〇, 〇〇〇

荷蘭

三八八, 〇〇〇

挪威

四三, 〇〇〇

瑞士(十四州)

一六五, 〇〇〇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制度之中，強迫失業保險制較為盛行，在被保險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三，是在這種制度之下的。但從歷史方面看來，自動保險制度，較為長遠。最初行這種制度的，是比利時的琴特市，所以現在研究失業保險的人，都稱這種制度為琴特制度。(Ghent System) 我們現在可以很簡單的把這種制度說一下。一八九八年，琴特的市政府，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包括工人，資本家及經濟學者。他的職務，是要研究出一個辦法，來救濟市中失業的人。討論的結果，他們提議由市政府出資補助有失業保險的工會，及那些未入工會但失業而動用儲金的工人。補助金的多少，視兩種情形而定：(一) 市政府的財政，(二) 失業人數的多寡。琴特原有一些工會，加入工會的工人平時便有自動的失業保險，失業之後，便可向工會領取保險金。市政府的補助，每每等于工會給與工人保險金數目的百分之幾，但最多不能超過每日一佛郎以上，且補助的時間，不能超過六十日。未入工會的工人，雖然照章也可向市政府領取補助金，但實行時頗多困難，所以實際獲得利益的人，都是已經加入工會的。琴特制度初行時，只有市政府的補助，後來省政府及中央

政府也都加入這種事業。到了現在工人在失業時所領取的保險金，可以說一半是由他們自己平日捐助，一半是由各級政府津貼的。這個制度，起初只行于琴特，後來比利時別處也模仿這種辦法，最後別的國家也有採用的。雖然現在各國的施行細則，并不一致，但大體是相仿的。這種制度的缺點，至少有二。第一是不普及，有許多工人應該保險的，沒有包括進去。第二，這是政府與工人的合作事業，資本家沒有盡他應盡的義務。這兩種缺點，在強迫保險制之下，都已矯正了。

強迫失業保險的實施，可以拿英國來做一個例子。英國的失業保險法，是一九一一年通過的，起初所包括的工人，只有二百萬左右，經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七的法律修正後，可以說是把英國應當保險的工人，都包括進去了。他的要點，可以分述如下。第一，英國的勞工，（農工及僕人除外）年在十六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以及那些非賣力的僱員，年俸在二百五十磅以下的，都要保險。第二，這些被保險的人，在平日有事可做的時候，都要納相當的

保險費，同時資本家及政府，也要為每一個工人納相當的保險費。這種保險費，每星期交納一次。交納的手續，頗為簡單，每一工人，都有一本失業保險簿，此簿存于僱主處，在每星期發工資的時候，僱主將工人應納之保險費扣下，易為印花，貼于保險簿中，同時僱主亦將其應納之保險印花，貼于每個工人的保險簿上。此種保險費，在兩年之內，如交納過三十次，那麼在失業時，便可取得保險金。第三，工人在失業時，便將失業保險簿，由僱主處取出，轉存于國立工人介紹所，這便等于失業的登記。工人介紹所，在一星期之內，應為此失業的工人，謀一相當職業。假如這件事成功了，自然無話可說。假如不能，那麼自第七天起，工人便可領取失業保險金，直至有業時為止。第四，保險金的數目，視被保險工人的年齡，性別，及其子女的多少而不同。今將工人有業時每星期所納的保險費，及其失業時每星期所得的保險金，照一九二七年的法律，列表如下：

工人種類	單位	男子	女子	青年男子	青年女子	少年	少女	成年 賴者	未成年 的子女
僱主每星期 所納保險費	便士	8	7	7	6	4	3½		
工人每星期 所納保險費	便士	7	6	6	5	3'	3		
政府每星期 所納保險費	便士	6	4½	5½	3½	3	2½		
每星期保 險費總額	便士	21	17½	18½	14½	10½	8½		
失業工人每星 期所得保險金	先令	17	15	14 12 10	12 10 8	6	5	7*	2

* 一九三〇年，改爲九先令。

照上面所說的法律，工人在取保險金之前，須在兩年內付過三十次保險費，近來因爲有一部份的工人，不能滿足這個條件，所以定有一種通融辦法，便是在兩年內，付過八次保險費的，在失業時也可領取保險金。在保險法實行的前十餘年，領取保險金的期限是有一定的，如每年不能超過若干星期。一九二四年工黨執政的時候，把這一條法律取消，後來保守黨捲土重來，又把時限加入法律中，到一九二七年，又恢復一九二四年的辦法，便是失業的人，可以領取保險金直至有業時爲止。近來英國遭遇空前的失業問題，政府因付失業保險金而負債，一九三一年五月，已達八千二百八十一萬餘磅。因爲如此，所以又有人提議工人得失業保險金，須有固定的期限，過期便不再給。

這種辦法，從財政方面看來，當然是一種節流的舉動。但從大多數的失業工人方面看來，失業保險金停付，同時如再找不到相當工作，便有饑寒的危險。所以爲社會福利着想，原來的法律，還是以不改爲妙。至于因此而引起政府負債，可以用他種方法解決，在資本家甚多的英國，這并非一件困難的事。

這種失業保險在英國社會中所發生的善果，是很顯然的。一個失業的工人，假如沒有這種制度，便無金錢的收入，生活上便要發生恐慌。現在，他便找不到職業，也有每星期十七先令的固定收入。假如他有一個妻子或一個老母親，他還可多拿九先令。假如有子女，每個子女還可多

那賢明的青年

Gertrude M. P. Cook 著 劉學濬譯

拿二先令。所以一個失業的工人，如一家有五口，（本人，妻子，及三個未成年的子女）每星期便可拿三十二先令。三十二先令一星期，在倫敦過日子誠然是困難的，但如自己節省一點，再加上自己平日的些微儲蓄，也就可以在貧窮線以上生活，沒有凍餒之憂了。

一九三一年的三月，英國窮人靠公家救濟過日子的，有一百萬以上，其中只有三萬餘人，是被保險的工人。他們拿了保險費，還要公家救濟的主要原因，便是家庭太大。但三萬餘人，在英國工人的總數中，足一個極小的數目。失業保險的成績，由此可見了。

二二，六，一。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號牛津大學聯合會開了一個

辯論會。辯題是『無論遇了任何情況決不爲王爲國

去打仗』（WILLYN NO CIRCUMSTANCES FI

GHFOR KING AND COUNTRY）。經過多

人熱烈爭辯之後，結果以二七五票對一五三票通

過提案。

二月十六號夜又是會期，正要宣讀上次議事記錄之際，忽有學生二三十人列隊入堂在全場肅靜毫無抵抗之下將記錄冊內上次開會記錄各頁強行撕毀，然後於人聲訕笑之中昂然退出。

三月十號夜再行開會討論銷毀記錄之事。此次竟以七五〇票對一三八票通過反對銷毀前案之建議。於

是牛津非戰行動更顯明起來，引起英國及外國衆多人士之注目及批評。至於跟隨牛津行動的英國大學爲數甚多如劍橋大學，曼徹斯特大學李斯特大學，烈斯大學等聯合會，均通過與牛津相同的提案。此外因學校當局勸告未能開會討論此項提案的大學亦不在少數。

本文譯自英國國聯同志會出版 *Headway* 雜誌之四月號。 譯者識

牛津大學聯合會二百七十五個青年的舉動惹出了多大的事故，鬧出了多少的麻煩！『每日郵報』(DAILY MAIL)因爲他們而作了一篇憤激的社論，『每夜正報』(EVENING STANDARD)大聲叫喊了牛津大學的衰落，並插了一幅牛津大學圖，拿這個『堪人崇拜的夢者牛津』還未因這班青年人的決議而坍塌來安慰人心。該報覺著這班人大半準是些外國人及些『無依附者』。那『泰晤士報』(THE TIMES) 則打着一位受了欺負似的大學教員的神氣從從容容來開導這班青年，使之知道自己身分的所在。

『每日郵報』說我們不可對這班青年人太認真了。其實，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會不會算是不够認真呢？

咳！今日的世界真叫怪！本來我們絕不吝惜雄詞壯語以發揚和平的需要，並且認國聯似乎是世界的生路，即使

此路不能說是一條坦途，然而也祇有這一條路而已。可是等到一遇見了一個小團體青年把他們對於戰爭所抱的眞見地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之時，我們就判斷他們是一班無脊骨，無定見之徒；同時報館先牛們便來搖起國旗更如中了瘋魔似的焦急起來。(中略一小段)

這班青年人許是感覺到生存在國內爲祖國作事，較比被炸得粉碎，被毒氣毒死，或者以別法殞命更爲開通些。我們也可以相信他們深覺生存在國內的要義是作苦工，作建設的工作。一切的經濟上，國家事業上，國際上，的難題，祇有活著的人可以解決。死了的人已無解決此項塵世難題的可能。上述各種難題的繁複，顯然是由大戰而來的。在前幾件事上，戰與死把我們打得了體無完膚，我們至今還未復原呢。以上所述的，雖然中年人都視爲當然不易的真理，可是不必因此就對於剛剛自己察出利害的這班青年子弟用冷水去澆頭或是用冒火的文字去攻擊。

現今男女青年已經發覺了『愛國是不够』。(註一)他們用這個詞句的時候兒，並不像許多人心中充滿混亂且帶着感情作用漫無意識的思想。『愛國是不够』這個意思會到達他們的心坎與到達卡維爾 (EDITH CAVELL) 的心坎是同樣的透澈深刻。他們也打算着一生一世抱定這

個宗旨作去，就算卡維爾復活來監視着，她對於他們所抱的希望也一定不過如此罷了。報界有謂已往英雄和殉難者的表率到今天人都全忘掉了。不，正因為還沒有忘掉所以現代青年輩選定了爲國從事建設而不從事破壞。

牛津大學聯合會此次鬧出的事情其中特別困難是在於用了這一句話「無論遇了任何情況，決不爲王爲國去打仗」，這句話的措辭固然是重得很，可是因爲青年抱定志向使一切足以啓戰端的情況成爲不可能，所以這並不是一句沒有意識的話。如此，若照着這班青年人的主張進行，那末，他們必須爲王爲國去打仗的情況是決不會有的了。

去年秋天在艾柏脫禮堂開的討論裁軍大會席上，那四個少年發言者給與那人山人海的聽衆的震動有如觸電之劇。這四個少年有三個是任過了牛津大學聯合會主席的，個個都是健全的少年，且各有可觀的成績。

當少年在此席上揮明少年心中所抱的戰爭觀時，那幾及萬人的聽衆表示贊成的情形實爲迫人。各報登載了約克大主教 (ARCHBISHOP OF YORK)，莫來教授，(PROF. GILBERT MORKAY) 及西爵士 (LORD CHEIL) 三位的演說詞，我們也知道這三位都是素來爲和平作琴掘工夫的，在將來也一定繼續去作的。可是他們要

是不想東西生長，作那琴掘工夫又有何用呢？他們倒是真想東西生長起來的。那開會的晚上，這三位領袖雖然對於這樣熱情的少年在態度上有點兒顧忌，而心中却暗說「這東西已經長根兒了，下代的園丁已經開工了」。

目前有位二十歲的女郎說「英國有太多的人考慮着我們解除了軍備之後怎麼樣，而太少的人考慮着要是不解除軍備可又怎麼樣」。不解除軍備所必遭遇的是與青年人大有切身關係，所以青年人雖欲守默也不可能。牛津此次會議的表決祇是個細微的先聲，後面還有。

果然有了。議事記錄被人給強行撕毀後就有七百五十人的多數通過反對該記錄的取消，並且這班賢明青年所反對取消的不祇是那幾頁記錄。他們在會議上提案字句間因爲或有發生誤會之處曾表示了憾意，而報界得到了這一層，就咬定了又大爲鋪張起來。少年英國則將其所發表的旨趣更深描了些。後面可不是還有。

這班青年子弟並不缺乏勇敢。由某幾方面看來，他們還是不理閒事的好，隨他有戰爭去，隨他戰事大機器般運轉，隨他由他們自己捲入大機器鉅大的工作去自作自受豈不省事。但是想要制止戰事大機器的運轉就非有勇敢不成。

愛國心背後有那真關重要的事項藏着。青年們已經看見了這些事項了。有思想的青年知道他們的王與國所希望於他們的是要他們將來為祖國而生活，以大戰四年間驅使青年人到死亡裏去的那種不餒的犧牲精神來作建設工作。

『每夜正報』對於在歐戰喪命的英國精華人物掬了一把淚。這種哀音，似乎早也有人發過。該報又將這些精華人物列舉出來：布拉克（RUBERT BROOKE）格蘭費爾哥兒倆（GREENFELLS），李斯塔（LISTER），及愛瑞門（RAYMOND ASSQUITH）。這是英國於歐戰所出的代價中最苦的一部分。要說是這種青年犧牲為國的襲傳已不存在，我們當然否認，更進一步否認沒有像這五人一樣的烈士在未來的懷中蘊藏着。說起來，我們可以假想那五位先烈正在從長計較今日的情勢說：『咱們犧牲了性命來阻止的那件事情，他們是要讓它再發生了。將來一定就要轉到那一樣的結局。等到他們知道了除已經犧牲了建築

匠工之外，連建築物也都喪失了的時候兒就太晚了。到了那個時候兒，他們準說，啊！我們最好的，最光耀的都完了！』

現代人們的兒女必感覺到要作賢明的不容易而進行建設則更難。因為現在是彷彿有些中年人在那裏假意主張和平，一面又悄沒聲兒的說『和平自然是不行的，可是也不要緊，反正總有那少年們可以照老法子去清理岔兒。我們現在真不可讓他們說那末些關於和平的話。將來我們還得能够依靠他們去打仗，因為到了兒我們反正除了打仗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其實那打仗死了的千萬人是說過了有別的出路。這條路青年人今日已經發見了，正準備毅然向前邁進。我們非讓青年人談論和平之路不可，而他們意欲使我們瞭解和平之路則更是國人的多數所引為最大的幸事。

註『愛國是不夠』是卡維爾臨刑前向牧師所說的話。

跋「那賢明的青年」

（英人）俊臣

獨立評論允登「那賢明的青年」一文是我非常贊成的

，因為這文所陳述的事情實在值得中國人的注意。這並不

是說中國人應該一定仿效牛大的態度，而說「無論情況若何決不武力抵抗日本」；是否應該取這樣極端的立場當然是須中國自己慎慎重重的去考慮而後才定主意。但是在其國運前途較悲觀之今日，設使中國人往清楚裡悟會，世界的國際思想真有個和平化的將來，則其掃興之中也許還能在這處窺見出路，藉以勉勵目下的耐心。

這件事，據我看，有兩種特別不可忽視的情形。第一，這回非戰思潮是發起于素稱最固執舊見，保守黨勢力最牢，而擁戴皇室的貴族空氣最盛之牛津。此在英人眼目中國本來是奇事之尤奇。日前我見着一位來華只有幾天的英國商人。他的買賣是專供給倫敦西部的闊人們所需，自己之為人也是純粹舊式的穩健商家老先生。我問了他「牛大那回的決議豈不是怪事？」他說「怪，是怪，可是現在我們

英國的商界大概都可以贊成他們」。可知英國非戰運動並不是只靠着一些不負責任的少年學子爲後盾。

第二。英國人素來特重肉體的勇敢。中國素來雖也有勇敢之士，然而文人每視肉體的勇敢爲較野蠻的一種德性，甚至于有之便有點嫌爲可怕。中國人所最羨慕的是孝順和斯文，勇敢總在其次。可是英國女子的通心，是寧和一個目無天理，混不識丁的傻子發生戀愛，不願與缺乏相當勇敢的人爲偶。牛大聯合會前一次通過了不打仗決議之後，果然有兩個女子學院各以大批白羽毛送致會長，即是默罵那贊成議案者爲胆小之輩。這足表示牛大的青年有日冒異性非議的志氣，而這樣志氣，若不是他們覺着他們的道理是又準確又切要的，則絕難發生。真是，如 COCKEN 女士說，『後面還有』了。

教育與其他 (西安通信之二)

旭生

我對於教育的意見，略如以下所說：

吳景超先生的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本刊第四十期），同我很誠懇的商榷，舉了很多的統計，使我對於從前認識模糊的東西得到比較清楚的觀念，我非常的感謝。

在實行上，據我看，我們兩個所主張，似乎不至于有大差異，或者竟至于完全無差異，亦未可知。可是，在理論上，我們兩個的觀察點，差別很大。乘機討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現在將我的意見略陳如下：

爲什麼在實行上我們兩個所主張，無大差異呢？主要的就是我這箇方案，太偏重農業，對於工業沒有把牠應得的重要位置給牠，我自己也很覺得。我雖然也主張在國民學校中，于兒童十二歲後，授之以與本地相宜之簡單工藝的知識，但這仍是爲農家提倡副業的設法，並不是爲都會工人子弟教育特立的制度。我當時那樣主張，是否將工人完全忽略忘掉？不是的。我根本有一種偏重農業的意見，理由頗長，論理原文中應該述及。但是當時我因爲急著整理來西安的行裝，寫的已筋疲力盡；並且，我覺得這樣的方案，雖實行的時候，中間不曉得應該經過多少次的討論和修正。這樣鉅大的漏洞，萬不會沒有人指出來。然則這樣的指摘，寧可以說是我預先料到的。現在，這樣的漏洞，果然引出來吳先生的大文，並且使我得了不少的新知識，因懶惰而得了利益，私人之喜可知也。吳先生主張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附設工廠，我個人也是很贊成的。至于中國的農人多，不管牠是希望的現象與否，但這是一種事實。吳先生以爲設法令他早日脫離才好，不管這種脫離應該與否，可能與否，在這脫離與未脫離的中間一定需要頗長的時期。在這箇時期當中，是「遷就他」也罷，不是遷就他也罷，總應該給大多數的人民平等受教育的

機會，我想吳先生也不會不承認。至于吳先生所說，與其使法官醫生耕田，不如使他們利用這些時間，研究與他們職務有關的東西，那正是我的意思。我雖然堅決主張牧員耕地，却不主張法官與醫生耕地。因爲什麼呢？因爲農忙是有一定時期的，受課推到農閒的時候，毫無損害。可是人害病和犯罪是沒有一定時期的，也許農忙人易生病，醫生也要跟著忙，他們怎麼樣能夠耕地？但是我一定要專門學校，除工商業外，全習農業者，我已說過：「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所以我覺得我同吳先生，雖然在理論上立腳點完全不同，而實行上或不致有很大的差異。

吳先生在理論上根據，是說「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七十以上的」。「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這些現象，我雖然知道的不詳細，可是也有點模糊的知道。但是這裏面就沒有問題了麼？近代的文化是一種工業的文化，是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近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制度，政治系統是一種帝國主義的系統，也是一件無從否認的事實。工業文化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有極密切幾乎很難分離的關係，大約也是不容否

認的。帝國主義者必須要有商場，要有殖民地，要有受他們壓榨的民族，大約也很難否認吧。這一種一方面壓榨，一方面受壓榨的現象，我希望不是永久的吧。蘇俄一方面使自己的農業工業化，一方面竭力發展自己的輕重工業以抵制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一件很好的先例。如果世界各民族全跟著蘇俄這些點走，資本制度，帝國制度，大約要崩潰，恐怕吳先生也不能不承認吧。英國不必說；就是法國，如果使他完全離了他的殖民地，並設想其他的民族的工商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我雖然不敢說，他的文化完全無法繼續，然而大約也要變了形貌吧。農業進步，少數人耕種，就够多數人的食用，是必然的現象；但是，工業進步，用很精巧的機器，用較少的工人，就够全世界的享用，恐怕也是一定的現象吧。機器工業不會轉回去變成手工業，我想吳先生對於這一點，也不會有疑惑吧。農事工業化，固然可以利用不少的機器，但是農田散漫，所能利用的機器，比較有限制；至于工業，比較集中，其所能利用的機器，要比較多的多；恐怕也是很有理由的吧。我理想中的社會，不像現在在什么地方所見的社會。那箇時候，任何地方的交通，異常便利。工業不是聚集于幾箇大城市，却是散處于無限的小城的。工業城市頗受農村化，均有

林園之勝。圖書館，實驗室，每城均比較完備，人人可以進去工作。工作每日五六小時即足，餘暇即入圖書館實驗室，探求新知識。至于農村則受工業化，比較現在聚居。一切享受與最富裕的城市完全相等。每年忙四五箇月，餘爲暇時，可自由旅行或研究學問。忙時工作也許過八點鐘至十點鐘。農村裏面，也是圖書館，實驗室，娛樂場，應有盡有。這時候並沒有什麼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等等的特別職業。這些全與官吏一樣，爲一種公務人員。社會大約只有三種的大別：農人，工人，公務人員。三種人的享受和權利，完全相仿，無大差異。我想到這箇時候，叫人自己選擇職業，大家未見得多數舍去終天忙，半年閒的農業，去選擇半天閒，終年忙的工業或公務人員吧。衣食住行，固然全很重要，但是建築一所房子，可用之數十年或數百年，造一件飛機輪船或火車，可用之數年或數十年，總不像喫了幾點鐘就餓，衣裳幾箇月就破。問題固然很複雜，並不如是簡單，但是由此也少微可以看出：到那時候，所需要的工人和公務人員的總數，未見得就超出于農人的總數吧。所以，工業文化，雖然在近世紀籠罩了全世界，可是說牠在將來還爲世界全體文化的總標幟，恐怕也很有問題吧。從前因工商業發達而農民減少，

以後又因爲農民生活的增高改善，而農民又加多；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情。不寧惟是，還有一點，我不敢斷定，我却有點模糊感覺，就是：中國的文化發展的比較近，不像古代希臘人和近代歐美人的一日千里。但是牠却有綿延性。他同時的文化國家，一箇一箇的淪沒了，絕滅了，而牠却總在那裏或盛或衰的綿延著。就是現在，國難緊急，我個人對於現時的教育，也有很多的危言，但是我却不相信中國的文化不久就會斬絕。這種文化的綿延性是否與中國的農業社會有相當的關係，也是一件極有興趣的問題。凡治歷史的，不能有一件詭爲偶然的結果。如果吳先生或他治歷史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先生們，能對於這箇問題，細加研究，把牠解決了一部分或全體，那對於人類全體的貢獻，或不算很渺小呢！

最後要申說的：我沿用梁漱溟先生都市教育，鄉村教育兩名詞，是要表示實在怎麼樣的問題，並不是要表示應該怎麼樣的問題。我根本覺得現在我們所抄襲外國的制度，是工商業社會裏面的附產品，與農業社會不合。無論怎麼模辦，也辦不好。即使承認中國應該盡全力發展工商業，而過渡時代，這樣的教育制度也萬不能用。言盡于此，還希望吳先生詳細的見教。

○ ○ ○ ○ ○ ○ ○ ○

至于陳序經先生的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本刊第四十三期），我覺得同我的主張毫無關係。他說看見我那篇教育罪言的結論很失望，不曉得他失望什麼。我覺得我的主張，對不對自然很成問題，但是復古嫌疑，却似乎萬不會有的。我推論中國教育從孔子起就開始走到錯路上，而陳先生却疑惑我提倡數千年已有的農村化，豈不是咄咄怪事！並且我覺得陳先生的話頗浮淺，我疑惑他對於陶因及我的文字是否會仔細看過，是否把意思看清楚。我個人並沒有用中國化這一箇詞，並且也毫沒有復古的意思。至于陶因因國聯教育考察團，是否用中國化的名詞，我不記得。即使他們用這一箇名詞，我覺得他們的意思，也不過如翁咏寬先生某一次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的礦自有中國的特別情形，拏西洋的辦法照樣搬來，不見得能合用，必須就中國的礦詳細研究出來辦法，才能合用。在民國九年十年，我看見有二梁先生所領導的復古運動，至于近兩年，我却沒有看見。至于把攻擊抄襲辦法的全當作主張復古的人，我想那樣的定義恐怕未見得恰當吧！陳先生疑惑我主張復古，或者因爲兩點：第一，我特別重農。那詳細看我的改革計畫和上面答吳先生的話就可以明白，不必再贅

。第二，我沿用梁漱溟先生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名詞，而梁先生却是主張中國文化的。我覺得梁先生所主張的鄉村教育同他所主張的中國文化，兩件事情並沒有不能分離的關係。我個人現在對於他那中國文化的主張，尙未能表示贊否。我反對都市教育，完全由于民衆經濟的觀點，同梁先生的觀點，也稍有不同。所以我覺得陳先生反對中國化的議論，如果是對我而發，那却是無的放矢。

○ ○ ○ ○ ○

我隨便說了一句「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好像激動了叔永先生的大氣，又或者生氣的人不止叔永先生，還有他位。這使我誠惶誠恐；却也使我詫異不止。我個人素常就沒有看起左右的分派。我自己覺得有些意見頗左，有些意見頗右，然而我覺得這毫無關弘旨。我在師大常因為聘教員的問題告訴學生說：現在要問的是他是求知識的或是宣傳的。如果是前者，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如果是後者，左派必不行，右派尤不可。要言之，左派並無足怕，右派亦無足厭也。至于罵右派爲落伍，我個人夢想也沒有想到！如果那樣，我知道諸先生是右派並不自今日始，何故自己從非社員鬧成準社員？如果那樣，我就是那樣想，即有天膽，也不敢當面來搶白了！然而我爲什麼那

樣說？這很簡單，用的意思也是極普通的，用不著像叔永先生那樣來推敲。我說先生是右派，因爲先生是 Bourgeois。呀！我嘗告訴人說：胡適之先生爲人極好，學問我也很佩服，但是 Bourgeoisie 的臭味十足。不惟先生如是，獨立評論一切社員無不如是。我個人的臭味雖不足，却也是個 Bourgeois。至于 Proletariat，不敢冒充，亦不配當也。寄語叔永先生，我們現在還站在一條綫上——雖然不是一條戰線——又有何嫌何疑呢？

我這裏附帶說一句話：先生所主張帝國主義者的利害與我國的利害並無衝突的話，我認爲是 Bourgeoisie 臭味十足的話。我對於此主張至今一點不懂。然而這箇問題，不必談，也無須談。

○ ○ ○ ○ ○

適之先生，我本來因爲事忙，想隨便寫三兩千字答復一切，乃拉拉雜雜，寫了一萬多字，現在就此打住吧。我對於和戰意見的一部分，筆鋒或有不謹慎的地方，總要請你原諒。好在是老朋友，要對吵就吵一起，要對罵就罵一起，又有什麼相干呢！即問
你的身體康健。

徐炳昶五月五日寫起，七日寫畢。

這一星期

五千萬美金的借款——政府與輿

論——教育的合理化

好爾廳的基本工作

我對於停戰協定的感想

國難當中領袖人物應有的態度

組織的重要

湖北教育現狀

寄售及代定處

衡哲 濤鳴 區少幹 黃子通 向心葵

獨立評論

第五十五號

日八十月六年二十二國民

每期刊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計。

鎮江	南京	上海	天津	平四	北平	東安	保定	石家	濟南	青島	濟南	徐州	漢口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太原	開封	鄭州	梧州	廣州	汕頭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西貢	香港	澳門	汕頭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西貢	香港	澳門				
鎮江書局	中央書局	新華書局	國華書局	現報社	天津書局	成府書局	永華書局	沙文書局	堂文書局	廠內書局	宜內書局	書局	文齋書局	友公書局	王公書局	社公書局	定公書局	東安書局	保定書局	石家書局	濟南書局	青島書局	濟南書局	徐州書局	漢口書局	重慶書局	成都書局	西安書局	蘭州書局	太原書局	開封書局	鄭州書局	梧州書局	廣州書局	汕頭書局	梧州書局	柳州書局	貴陽書局	昆明書局	西貢書局	香港書局	澳門書局

●本社啓事一

本刊編輯事務現由蔣廷黻先生負責担任，一切稿件請直寄北平清華大學蔣先生收。

這一星期

五千萬美金 的借款

宋子文氏從美國借到的大外債和西南所提出的抗議自然而然的使我們想及民國二年的善後借款。現在如彼時，借債者爲財政困難所迫，不得不借外債，且事先未規定大公無私的用途，使國人無從反對。在我個人看來，這次五千萬美金借款的成立並不足怪；足怪者，是政府事先對內毫無準備，致借款消息傳出以後，行政院長始告訴國人：「借款的用途須待精密考慮」。先借債，後考慮用途：這是我們政府所特創的辦法。

在反對者方面，現在如彼時，注重的理由，不是借款條件的不公，反是借款對於內爭的影響。自民國以來，國內黨派的領袖，對一切外交問題，總是從黨派的立場着想，總不能超黨派而就國家的利害着想。這種毛病，在野的領袖犯的更多：國民黨在野的時代也不是例外。因爲國民

●本社啓事二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務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

黨在野的時代久，所以黨內領袖反對政府的技藝遠精於執政的技藝。世界的大國尙竭力避免拿外交作內爭的工具，誠以不能避免的話，外交就難辦。中國更不必說了。專就外債一事講，因爲每次都引起嚴重風潮，所以在放債者方面倘對我們民族懷抱善意，且不想拿放債來謀政治的收穫，一見中國國內的反對，就躊躇不前；倘放債者對我們有政治野心就不顧中國國內的反對，源源接濟我們的政府。其結果政治借款成立者多，建設借款成立者幾絕無僅有。我們愈以政黨的立場來反對外債，我們所借到的外債愈會成爲政治的。民國以來外債史就是這麼一回事。

借外債本身不應成爲問題。資本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家都借外債。國內現在無論那黨那派，只要有借債的機會，無不利用之。成爲問題的是借款的條件和借款的

用途。

這次宋子文氏的借款，從條件方面着想，就報上已發表的消息觀察，大致是不應該反對的。年利是百分之五；利率不能算高。大部份是拿來買棉花。中國歷年所輸入的棉花並不少；去年到八千萬海關金單位之多。由政府大批購買總比各紗廠零買要便宜。國人尤應注意者，中國輸入貿易（輸出貿易亦然）大部份在外人之手。拿中國商人現有的資本和組織來與外商爭輸入貿易之利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在短期內，我們若想收回這種利權非政府直接辦理不可。宋子文氏這次借款的辦法就是政府經營輸入貿易的一個大試驗。其中經濟的影響是極大的。海關問題及提倡國貨問題因之變更了性質。這個試驗是值得我們作的。棉花輸入商一定反對這個辦法；我們大可不必為彼輩所利用。

借款的小部份——五分之一——是拿作買麥子用的。年來這以農立國的中國輸入糧食也不少。借款發表以後，上海的麵粉廠也表示歡迎政府購買美麥。雖然，中國近年的國際貿易政策偏重工業的保護。中國農人的知識很低；玩政治這一套絕不知曉。工業界的人士集中上海，易與政府通聲氣，易與輿論界勾結。麵粉廠商的歡迎未必足以代表農人。在農民的利益及廠商的利益之間，我們如須選擇，

那無疑的，我們寧可犧牲廠商來維持農民。

中國政府有錢不愁沒有用途。問題當然是在支配。關於這個問題，在政府未決定以前，我們不願作空泛的討論。我們不過希望政府顧到兩點。第一，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拿這批外債來添設機關或維持機關。第二，我們希望政府不要拿這款來收買各地的軍閥。機關的分贓和軍閥的分贓同是我們所反對的。

廷敏

政府與輿論

政府近來指定地方長官負責指導各地的輿論。此事似奇而不奇。

政府與輿論的關係，在理論上，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中國一般士大夫的看法，也是歐美自由主義的國家的理論。輿論應該監督政府，鞭撻政府；政府應該順從輿論。政府是被動的，輿論是主動的。政府是僕人；輿論是主人翁——國民——的命令。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政府不應干涉國民的言論自由；言論界應該有責任心。另一種看法是極古而又極新的。我們舊日的理想是所謂「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現在的蘇俄，義大利，和黨治的中國，根本的理論，也不過是這個舊話的刷新。

各國的事實是介乎二者之間。輿論支配政府，政府亦

製造輿論。在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加在出版物的限制雖然較少，牠們所靠的不是消極的干涉，是積極的指導。美國的總統和英國的內閣總理就可以說是輿論界之王。至少我們可以說，有作爲的總統和總理是輿論界之王，惟獨庸碌無能的才是輿論界之僕。在「政教不分」的國家和君主專制的舊中國，黨或君有時亦不能不敷衍輿論。

無論政體是怎樣，政治理論是怎樣，只要人繼續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動物，政治家大部份的工作就是輿論的製造。定了一個大政——假使我們說這大政完全是對的——而不能得輿論的擁護就是政治家的失敗。年前錦州中立區不能成立是輿論的錯誤，也就是顧維鈞氏的政治失敗。政府現在要指導輿論，表現政府認清了牠職責所在，同時也是政府對輿論的鞠躬。

不過指導輿論不是檢查新聞。指導輿論是政治家的事業；檢查新聞是衙署小吏的工作。以往政府的毛病就是想小吏的工作能替代政治家的事業。新聞檢查的結果十之八九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政府愈檢查新聞，新聞界愈討厭政府，社會愈疑心政府。

政府對輿論所處的地位是優越的。第一，政府的宣傳費是比反政府的充足。現在黨的機關報遍天下。如果這些

報的新聞是充實的，別的報就無造謠的機會了。政府何苦費事來檢查新聞？何不努力整理牠的機關報和機關通信社？第二，政府要人的言論易引起社會的注意，在報上總佔較好的地位。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紀念週本可以作爲政策的闡明，事實的報告，如西歐各國內閣總理出席國會的演詞。我們反把這個紀念週作爲一種宣道之用：既不引起國人的注意，又使參加者得着頭痛。

中國近年輿論的勢力確有長進，尤其關於外交。而輿論對於外交最易錯誤：各國都是如此的。所以不但戰敗國的外交家不討好，就是戰勝國的外交家都難得國人的好感。這個困難，除非在無事之時多下教育的工夫，一到緊急的時候，政府就是要指導，也就無從下手了。

廷 敬

教育的
合理化

合理化是無人反對的，只要合理化不帶編遣的意味，或是帶着編遣的意味而不淘汰，我及我的朋友。如果教育的合理化必須有淘汰，有合併，那末，教育部長是摧殘教育，是懷抱陰謀，是我們關心教育者所誓死抵抗的。

現在的教育部長大概是個書生。人情世故，他一點都

不懂。他怎不計算計算他的幾道命令要得罪多人少呢？他不知道日內瓦的裁軍會議萬不能成功嗎？裁軍在原則上是人人所贊成的，只要所裁的軍是他國的軍，不是我國的軍。他忘記了我們貴國數年前的編遣會議嗎？編遣的惟一結果是內戰，是軍隊的加多。他沒有讀過戊戌變政的故事嗎？我可以告訴他。康梁那班書生，拿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段，竟於戊戌年七月大膽的幹起來了：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爲言，雖未必盡可准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朕維授事命官，不外核名實。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以致碍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卽行裁撤。……所有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著一併裁撤。……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監

場僅管疏餉之鹽道，亦均著裁缺。……此外如各

省同通佐貳等官……均屬閒冗，卽著查明裁汰。……

……內外諸臣卽行遵照辦理，不准藉口體制攸關多方阻格，並不得以無可再減敷衍了事。……當此國計艱難，朕宵旰焦勞，孜孜求治……爾在廷諸臣及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尙仰體朕懷共濟時艱。若竟各挾私意，非自便身圖，卽見好僚屬，推諉因循，空言搪塞，定當予以重懲，決不寬貸。

這一道詔旨實想「動以至誠」。無非上面雖「孜孜求治」，下面則「多方阻格」。全天下竟因此反對新政，成了康梁的敵人。

殷鑒不遠：這是中國的舊套。王部長先生何不一思？何況編遣教育非裁軍裁官可比？教育是神聖的，那能侵犯？一個破廟，一個舊王府，掛上某某大學或某某學院的招牌，不問其內容何如，就成了聖地！教育部倘不小心，北平公安局就會生麻煩，鐵道部長也會感到應付不暇。交通部因風潮所得的郵電費是得不償失的！

廷 轍

好爾廳的基本工作

衡 哲

——亞丹女士的成績之一——

在本刊的第四十七期中，我曾經寫了一篇短文，敘述亞丹女士的幾件不朽事業。其中的一件，即是她同她的同志們在芝加哥所辦的好爾廳。好爾廳在世界文化上的影響，雖不及國際和平運動的遠大，但牠的切實與深刻却又過之，并且牠又是亞丹女士一生事業的基本。因此我現在再寫此文，以補上次寥寥數百字的不足。

好爾廳的建立，是在一八九一年，牠是美國最初設立的社會服務區的一個。當十九世紀末年，工業革命的流弊已經大顯之後，歐美各國的深思之士，便有主張在貧民的區域中設立社會服務區，以爲富人們服務社會事業的機關的。最初設立的社會服務區，是一八八四年成立於英京的通培廳（Taybbee Hall），牠是紀念這個運動的創始人，通培先生（Arnold Taybbee）的。亞丹女士在漫遊歐洲的時候，也曾兩度的到通培廳去住過。後來她的決心到芝加哥去設立服務區，也是受的這個影響。

好爾廳的工作方法，是十九世紀末年，歐美社會事業

中最流行的一個，那便是，利用同志們的智識與財力，以改進貧民的種種生活情形。上面所說的通培廳，即是利用康橋及牛津兩個大學的學生對於倫敦貧民窟的同情與服務的志願而設立的。好爾廳若沒有美國的許多受過教育和有關之人的同情與幫助，也是萬難成立的。當牠開辦方始的時候，便有一位老太太，志願的來爲貧民們誦讀五次的小說。她的同情與興趣，竟能使聽者們高興到廢寢忘食。她又說，她的所以加入這個工作，完全是因爲想到一個『理想跑得很高』的空氣中，重新去生活一下！因此，我們更加明白，這類工作的受益者，並不僅僅在貧民的一方面。一般所謂幸福的人們，除非是完全缺乏同情心的，他們又何嘗不時的感到內心的饑餓與空虛？而此類的工作，恰又正適合了他們的需要。譬如喂乳的工作，牠不但能使嬰兒得到滋養，並且還能減少慈母兩乳的澎漲。故好爾廳及其他社會服務區所採用的方法，確是一種化兩損爲兩益的聰明辦法。

好爾廳活動的範圍，乃是整個的人生，故很不容易在

一篇短文之中，把牠的工作說得詳盡。我以下所說的，不過是牠的工作中最爲基本的幾個。讀者們如嫌不足，不妨去看着亞丹女士自己所著關於好爾廳的兩本書，「二十年的好爾廳」，及「又二十年的好爾廳」。這兩書合計約有二十餘萬字，是在紐約的The Mac Millan Co. 出版的，各大學的圖書館中，大概也不會沒有。

好爾廳的第一件基本工作，即是與當地紳士及市政府合作，去改良貧民的生活。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業，因爲無論你所改良的是什麼，牠決不能不妨害某一階級的現成利益。因此之故，好爾廳便常不免要與社會上的腐敗勢力發生衝突，而因此受到誤解與恨忌，受到工作上的種種阻力，也是常見的事。不但如此，那些身受不衛生，不合人道之害的貧民，似乎是一定歡迎這類的工作了，但實際上却又不然。他們不但很少合作，並且有時還是反對改良事業的一個有力份子。現在且舉一個例。在芝加哥的移民區域中，各家拋棄的爛果皮，敗菜葉，以及其他腐朽的廢物，都是丟在所謂公共的垃圾桶裏的。但這些垃圾桶却是一切公開，絕對放任！他們一任兒童們的攀爬遊戲，有時還把牠們容納的腐臭物品，讓飢餓的兒童們取去果腹。好爾廳爲了這個情形，一方面與市政府交涉，要求改良垃圾的消

毀方法，一方面又對移民的婦女們講演勸導，告訴牠們隨便拋棄腐臭物品的危險。但這樣努力了三年，成績差不多是等于零。因爲貧民們既不能懂得這個無謂的麻煩，地主們也不願枉費他們的金錢，來給那一羣不分香臭與好惡的移民，去改良衛生的情形。到了第四年，芝加哥的市長蔡不起亞丹女士和她的同志們的堅持，方允許採取一個積極辦法。結果是他任命了亞丹女士爲好爾廳隣近的一個區裏的垃圾檢查員。但這個位置却有千元一年的薪水，是許多人視爲乾薪一類的事業。于是亞丹女士在男的驚訝吃醋，女的誹謗譏刺的環境之下，開始了她的檢查垃圾的工作。她的工作的結果，是在芝加哥的各區中，她那一區的死亡率，立刻自第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而身受其惠的貧民，到此也不能不恍然覺悟到垃圾與傳染病及兒童死亡的關係了。

關於改良市政的事業，當然不止拉圾的一事。比如對於防疫的工作，對於賭博與酗酒的消弭，對於產婆的改良與訓練，對於售買毒品與青年的禁止，以及其他種種不衛生，不合人道的情形，好爾廳或促市政府的注意，或督察市政府已立之法的實行。但這些事業是在在要遇著腐化勢力的誤解或反對的。舉一個例吧。有一次，好爾廳去干涉

一個藥店售賣可因，尤其是對於青年的顧客，藥店主人便立刻來對亞丹女士行賄賂，以爲那當然是她們的根本目的！

此類改良市政的努力，亦並不以芝加哥一城爲限。亞丹女士在一九一一年的加入羅斯福新組的進步黨，也無非爲的有見于此類事業的國家性，想把各市各省的單獨努力，聯合爲一個有中心的全國努力罷了。

好爾廳的第二件基本工作，便是對於移民的教育與訓導。芝加哥的貧民差不多都是從歐洲來美求生活的移民，故好爾廳的工作雖然並不以移民爲目標，但結果，牠的努力却完全是用在他們的身上。因此，移民的教育與訓導，便成爲好爾廳基本工作的基本了。牠所用的方法，大致有以下的三種，一是注入，二是感化與改進，三是引出。注入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比如爲幼童所設的幼稚園，爲少女們所設的縫紉訓練班，爲主婦們所設的食品與烹調對於營養的關係的講演與表演，以及其他類似的活動，大抵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但感化與改良，却是應用最廣的一個方法。移民大抵是不但貧苦而且是很愚闇的，尤其是他們中間的中年婦女與老太婆。她們不懂得什麼叫做衛生，她們也不懂得英語。她們雖自歐洲的農村環境中，忽然跑到了

新大陸的工業中心，使一切生活的情形變得那樣天翻地覆，但她們生活的工具却仍是那一套。好爾廳在此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勸說，指導，開會，以及類似的方法，去幫助她們改良生活的工具，以求適應她們的新環境，而種種俱樂部却又是這個活動的中心點。在俱樂部中間，婦女們的合羣天性是得到了滿足，痛苦是得到了同情，而疑難的問題，也有人來幫助她們去解決。不但如此，俱樂部也是好爾廳實行牠的引出方法的一個理想工具。在類似愚陋的移民中，有許多是有藝術修養或天才的。他們靠了唱歌，跳舞，繪畫，奏音樂，演劇，以及其他的藝術動作，常能把那久受壓迫的藝術衝動發洩出來，把他們所思慕的故鄉音容，重新召到面前來。這樣，他們不但得到了一種創作的安慰，并且還能加增他們的自信力，相信自己所習知的文化，原來也有牠的價值。不但如此，大多數移民到美國後，常常不知道美國也有玫瑰花，也有水果，也有圖畫；以及其他他們所視爲文化品的。但他們雖不愛重美國，却又沒有自信力。他們不敢穿自己從鄉下帶來的服裝出現于街市，有時甚至不敢同他們那些能說英語的子女同在街上走路，怕的是羞辱了這些後起之秀！結果是他們自己造成了一個牢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把自己關在裏面，去度

那無聊，孤僻，與羞愧的生活。好爾廳的工作，乃是去把這個牢獄打開了，使內中的志願囚犯，一個個的抬起頭來。她不但要他們恢復自信力與對於故鄉文化的尊敬，並且還能去加增他們對於美國的了解與愛慕，因為，看呵，美國也自有牠的玫瑰花與圖畫，也自有牠的橘子與葡萄呵！這是一個精神上的大恩惠，而得益的當然也不盡在移民的一方面，因為一個成熟文化的輸入，對於新大陸的少年文化也不能說是沒有益處的。

好爾廳的第三件工作，是對於青年的指導與保護。牠靠了種種的俱樂部，把青年的衝動引入了創造的途徑。又把各種生活的技能教給他們，使他們在讀書之外，還能得到一點勞動的習慣，與對於工作的尊敬。牠又保護他們，使他們能遠離一切耗損身體與人格的物品，如酒與毒品之類。但好爾廳也決不是拉長了面孔的。牠獎勵正當的娛樂，提倡有保護人的跳舞，養成青年男女們對於彼此的溫和而清潔的態度，務使人人不但能生活，而且還能享樂他的生活。牠在人格，智識，藝術，以及實際生活的各方面，都竭力的去幫助青年們，使他們能找到一個最優良的途

徑。

好爾廳的事業，是亞丹女士和牠的同志們的人格與人生觀的反映，尤其是亞丹女士自己的。在牠們的人生觀中，有兩個態度是最根本的，是最與好爾廳的工作有關係的。其一，是他們對於一切弱者和不幸人們的同情，故好爾廳四十年的努力，也就特別的在婦女，兒童，青年，老年，以及精神和形體上受過摧殘者的身上。故小自炒一碟子的菜，大至婦女工作的立法問題，都在她們的注意與指導之中。其二，是她們的容忍與試驗的態度，這使她們隨時改進，隨時採擇反對的意見，隨時使供給與需要符合。換句話說，好爾廳所以經過了四十年的生命，而仍能保持牠的青春活動力，不會變為一個行尸走肉者，也不過全靠了這一點點的容忍與試驗的精神。

好爾廳一類的社會事業，完全是屬於鋤強扶弱的，這在尼采一輩人的眼光中，自然很有可譏的地方。但我們是不贊成老鷹抓小雞的，故對於亞丹女士們的這件事業，這件不但保護而且改善小雞生命的事業，却覺得不能不深深的致我們的敬意與欽羨了。

我對於停戰協定的感想

濤鳴

中日停戰協定，已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字了。以後中日全部問題，將如何改決，我們不忍揣測。什麼「長期抵抗」，現在總算不談了。若使我們承認當局現在措施得當，我們就不能不責當局既往之措施失當。

現在中國軍撤退由延慶至蘆台之線，此線之北，不得駐兵。即此停戰條件，比之以長城南北爲中立區何如？比之錦州爲中立區更何如？北平城下之盟，比之遼寧城下之盟，有何好處？現在還有人說停戰不是屈服！其實屈服並不一定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不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中可能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項。

一，東北問題發生之初，當局以爲中國有抵抗暴日之力量。迨熱河失守，長城一帶，相繼淪陷，方悟長期抵抗之不可能。

二，當局明知中國不能單獨對日作有效之抵抗。但希望國聯或國聯以外友邦之幫助，故姑先抵抗，以待外援。迨日軍逼平津，而列強置若罔聞，乃悟外援之不可恃。

三，當局明知中國無抵抗暴日之力，亦明知國際援助之不可恃。但因國內輿論表面上皆主抵抗，當局若不抵抗，則反對政府的將有所藉口，故不得不稍爲抵抗。

第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稍有智識的人，都知道中國不能抵抗，而況黨國明達諸公？第二理由，大概有幾分是實，尤其在國聯報告書及建議案未宣布以前。不過國聯報告建議案宣布以後，明明白白指出日本破壞盟約的責任，而仍無絲毫實際上可以制止日本侵略的動作，那時國際的援助，誰也知道是沒有希望了。但是當局還是唱，「準備長期抵抗」的高調，所以第二理由，是不能完全解釋已往的事實。比較重要的理由，還是第三項。政府當局爲保存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作抵抗的模樣，以塞反對者之口。

現在東北四省總算是喪失了。反對派能否諒政府的苦衷，而不借題發揮，以塘沽協定爲推翻政府的工具，現在言之還是太早。假定政府可以安安的渡過國內的難關，當局對於中日問題前後的措施，是有害於國或且是有益于國

呢？設使二十年冬天中國允許劃錦州爲中立區，以免武力衝突，一面開始交涉，那時滿州國還沒有成立，無論交涉結果如何，中國的損失，不至有現在損失這麼大。不過也許那時政府就因爲這交涉而被反對者推翻了。我們可以說：東北四省的喪失，是保持現在政府的代價。

假使當局確有把握，以後能把中國真真統一起來，建設起來，把第三等的國，變爲第一等的國，然後再同日本算賬；假使當局確能統治中國，比任何別人組織的政府都治的好，那麼以東北四省暫時的淪亡，交換了中國復興機

會的保證，我們也是願意的。若使當局沒有這種把握，竟以東北四省永久的喪失，交換了政府暫時的維持，那麼這算盤就打得大錯了！

我們當然不能專責中央政府。假使沒有反對派，中央政府便可以憑良心去做，而不要顧慮及政府本身的安全。所以東北的淪亡，反對份子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已往的事實沒有法子改了。我們只希望政府以後不要以國家的損失，作保存政府本身的代價。我們更希望反對派不要以國家的難關，作爲一派伸張勢力的機會。

國難當中領袖人物應有的態度

區少幹

——我對於蔣介石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輿情憤激，衆論紛紛；有人主

解，保全國力，先把政治弄上軌道，然後圖謀報復。這大概是兩派的主張了。

張正式向日本宣戰：把沿海七省放棄了（中國命脈就在這七省），把戰線極度延長，分散敵人的兵力。只靠民團一項，已足制敵人的死命了。有的主張：就利用『非現代和

我以為戰固可以，和也可以，甚至於割地賠款城下之盟也可以。總要國內主持大計的人物，有開明的主張，有具體的辦法！

無組織與敵人一拚』。有的主張：暗中招集全國的飛機，飛到東京去，把東京全行炸燬，甚麼都完了。

拿鐵打的大刀去戰鐵甲車，拿地道的飛雷去戰飛機，拿血和肉去對抗高度的爆炸，拿苦力駱駝去供後方的運輸

但有些偏重理智的人，却主張在某種程度下與敵人和

，拿沒有統系沒有供應的義軍去戰受過科學洗禮的現代化

的軍隊。希望去取勝，希望去收復失地，我們着實有百分之二十的愛國熱忱，但我們決不敢有這封神榜上的幻想。義和團的五龍法寶，我們認為世界上是沒有這麼一回事的。

然而做全國軍事政治領袖的人，一味不聲不響，當軍事最危急的時候，借故跑到後方，讓國中之人，歡喜作戰的，各自為戰，歡喜逃走的，各自逃走。這種沒辦法的辦法，豈只是貽誤國家，就是於他自身的地位亦會不保的。最好的榜樣，便是張學良。起初，我們對於張學良最低限度還希望他的不抵抗是個「主義」，原來他只是沒辦法，所以他終於沒辦法了。蔣介石將軍謀略過人斷不是張學良之比。但我們十分渴望他能把他的「謀略」公開給我們知道，免得舉國遑遑不知所從。

老實說罷，為政者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他對於國家政治的主張和應付特殊時勢的策略。我們知到美國總統羅斯福，不久以前曾環遊全國宣佈他的政策。德國的法西斯希特勒，不久以前曾環遊全國宣佈他的政策。意國的首相墨索里尼，更常常對着十幾萬民衆公開演說他的政策。不能或者不敢把他的政見對民衆宣佈的，不配做一國的領袖。

中國現在一般人擁戴蔣介石的，我敢相信是佔絕大多數，然而自從九一八以後，已漸由擁戴轉到懷疑，由懷疑轉到恐懼了。

怕人家反對不敢說話，却暗地裏摸索着畏首畏尾的去幹，易若公然對國人指陳和戰的利害，我們軍備經濟交通的狀況，國際的形勢，作個開明的主張，給民衆去選擇呢！大凡真正的民意，是最審慎最平穩的，如果你真的有好的政策，——對於國計民生有益的政策——必定得到民衆的擁護的。具有民意做基礎的政策，無論對內對外都會得到最後的勝利的。

其實何只對付國難要有開明的主張，開明的主張簡直就是對付內爭的最重要的武器！現在黨內各派的鬥爭，人民只當是他們家裏的事，除了厭倦憎恨之外，斷沒有人同情的。你如果真能提出一個切中時弊的政治主張，讓民衆去選擇，這便是最高無上的實施訓政！這便是對於內爭必勝的力量！

中國今日的大患就在人人口喊着救國建國，實際上却沒有一個口喊得起手做得起的人。再明白點說，就是三十年來有主張的人沒有實力，有實力的人沒有主張。所以弄到今日這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殭死的

局面。我們眼看着，名震天下的將軍們一個一個倒下去了

還有一個莫大的機會，予今日為政者以莫大的便利的，便是現在全國人民苟安望治的心理。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一號蔣廷黻先生南京的機會一篇文章裏他有一段這樣說：

一般民情以為南京所代表的統一，是無數代價換來的，絕不可使之搖動。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就是極不滿意南京的人——這種人并不少——也不願，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的來破壞南京的基礎。這種

組織的重要

這樣一個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大的民族，不到一個星期，失去了熱河，不到一年工夫，失去了四省。現在長城也不能守，直至兵臨故都，方始乞憐求和。并且還要用自己的火車去裝載敵兵進北平。這可謂歷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恥大辱。一個民族被人家欺侮到如此田地，決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也不是這個人與那個人的緣故。但是有許多討論政治的人，總不肯責備自己，以為中國的衰弱，只是這

思想是中國當前政潮的一個大潛伏力。

我相信若果在日本或者歐美的國家遇着這麼一回的國難，不知要有多少個政府才够場台。現在我們國家雖然崩敗到這個樣子，人民還是希望政府能夠結束和收拾這殘破的局面。如果放着這樣一個機會還不會利用，還不能有為，那真是不可為的了。

中國現在沒有領袖！中國實際上需要領袖！誰配造中國的領袖！誰能做中國的領袖！我們是準備着擁護他的。

二十二，五，二三。

黃子通

個人與那個人的不好，這個政府與那個政府的不好。他們總不會想到，假若有了一個奉公守法的民族，怎麼能產生一個貪贓打法的政府？偶然有一壞政府，即使可能，亦斷不能使二十年來的民國，個個政府都是壞的。假若說，這是某一黨某一派的緣故，但是這二十年來，除了共產黨以外，可以說，無論何派都已上過台，握過政權，何以沒有把中國弄好？這可見中國到此地步，是整個民族的破產，

決不是一人一派的優劣問題。況且這種國格人格的破產不是從今日開始的，自從五胡亂華，以及遼金元的統治中國，我民族的被征服已不止一次。今日的日本還可以說他們受了歐美文化的影響，但是歷來戰勝我們的民族，文化均不如我，何以我們不能抵抗他們呢？其中必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值得研究的。印度的受外族侵略，有一極明顯的證據，這就是印度人沒有歷史的觀念。但是中國人的歷史觀念極深，何以國家觀念如此薄弱呢？

我以為中國的大病是道德的墮落與組織的缺乏。爲少數的領袖與創造者說，道德是極其重要；但爲大多數的人說法，組織的精密尤爲重要。無創造力的人是隨着社會走的，隨着制度而改變的。譬如燕京大學的創辦人，一切捐款是他獨力募得的，他的地位迥與他種校長不同，他要學校關門是馬上可以做到的。但是他對於校務都讓各委員去決定，絕不專擅。他並不是不敢或是不肯專擅，他是不肯專擅。這種精神是可佩服的，這就是組織中所需要的道德。凡是創造者都應有作繭自縛，作法自斃的犧牲。但是大多數的人，非得先有極嚴峻的法律，極精密的組織去管束他們不行。燕大有一個美國學生，沒有請假，缺課了兩天，他以爲中國人是馬馬虎虎的，逃課兩天是不算什麼一回

事，一直到註冊部查出，他纔不敢做。這可見沒有嚴密的組織，歐美人也要作弊的。我舉這個例，不過是證明組織與規則的重要，並不是說歐美人的道德程度與我們的羣衆一樣。不躲懶，不徇私，肯負責任，忠于職務，當然不單是管束與法律的問題，不過因爲我國人數千年來重情而不重理，好談空洞的道德，不講實際的管束，所以我注重組織。

肯管束人，也要肯被人管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庭本是一個極有規律的組織，本應當管束人，而且也有權力可以管束人，但是在中國的法庭上，假若兩造是極體面的人，法官必先請他們調解。這不是不肯管束人嗎？并且這兩個體面的人，的確也不願意受人管束。所以司法的獨立，雖粗具形式，而精神上始終沒有實行。吾們的身體，財產，言論，著作，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也就是這個緣故。一般人都不願意人家管束他，何況處于高位的人呢！吾以為中國而欲粗具國家的雛形，首先要有願管束人，願被人管束的決心；并且要用此決心，趕快去組織能管束人之機關。假若每一個團體，每一種機關，都是能管束人的組織，那末，團體之結合自然堅固，國家的觀念自然養成。即如俄國何嘗不以世界主義相號召，但是因爲他們

的組織密，管束嚴，自然形成了一個與各國不同的團體，信仰與人不同，組織與人不同，牢不可破，決不肯舍己而徇人。不講管束，不講組織，雖日夕倡狹義的國家主義，而四萬萬人終似一盤散沙，國家的雛形終不可得。不講習慣的訓練，不講團體的軌範，雖日日提倡合作，合羣的實效終究不能發生。中國人向來不喜歡組織的，政治上講王道，看輕法治，讀書的人，講記誦，不答索引。印度人因爲沒有歷史觀念亡了國，中國人對於組織沒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到了亡國的時候，還是意見紛歧，不能團結。其實，「王道不外乎人情」，是一句騙人的話。假若順着情感去走，不去管束它，不去引導他，情感的無規則，也可以出亂子，也可以阻礙社會的結合。中國人的不能結合，正是因爲情感太重的緣故。

如果要發大願，創造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有統系的國家，有兩樣毛病是我們的大敵，一樣是驕，一樣是吝。驕傲的人必定要包辦一切，壓迫人家。吝嗇的人，必定要嫉妬人家，傾陷人家。這兩種毛病，真是團結的障碍物。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假若一羣之中，有一個驕且吝的人，已經可以使全體不安，何況一羣的人都是如此呢！把中國人與英美人比，吾

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免不了驕吝的態度。所以要結團體，求合作，是狠困難的。其實這種態度，這種品性，並不是天生的，也是社會所養成的。假若我是一個魯濱遜在孤島上獨住了幾十年，忽然搬到一個熱鬧的城市裏去，試問，我對於這個新環境有何反應？大概我總覺得處處不能隨便，處處覺得人家討厭。中國人驕吝的發生，也就是個緣故。

中國人的家庭，簡直是一個孤島。自己的兒女，總是不錯的，別人的兒女，總是錯的。假若兄弟幾房住在一起，兒女間起了衝突，長房的父母必定庇護長房的兒女，次房的父母，必定幫助次房的兒女，無所謂是非曲直，無所謂公道。並且在自己一房以內，也沒有平等公道的訓練。沒有成年的時候，子女視父如嚴君，父之視子女如奴僕，呵譴之，鞭責之。若兩人以友誼的態度去對待子女，在舊式的父母是夢想不到的。等到長子成年以後，父親已死，母親即將家事付與長子，聽其支配。到了那時候，兒子又從奴僕的地位，躍入主人的地位。至于夫婦，更沒有什麼平等可以說。惟有兄弟一倫，似乎平等，其實，兄與父爲一倫，弟與子爲一倫，所以弟兄又不是平等的。就是到了現在，大家總以爲哥哥責備弟弟是應當的，弟弟責備哥哥是

無禮的。在這種不平等的階級制度之下，在這種龐然自大的孤島之中，那裡還有什麼平等的觀念，推與的習慣！平時所有的謙讓都是假面具。五倫之中，朋友雖也是一倫，但實際上是極不重要的，因為在西方文化沒有侵入中國以前，終年的酬酢，大都只限于親戚及本家，現代式的社交是沒有的。

這樣一個社會造就出來的人，當然個個都是大皇帝。

許多皇帝聚在一起，焉得不衝突？焉得不打架？所謂驕妄，所謂量小，簡直是應有的事。所以現在雖然有了許多委員會，實則仍舊是階級統治，委員會的真精神是沒有學到的。要許多大皇帝開委員會本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經加入過一個委員會，這位主席是一個新式的老先生。照例，主席是維持秩序，不說話的，但是這位主席，到了開會，便是說話，發議論的時候，別人的說話是不大聽的。假若有個一委員發言，主席必先看這委員的資格如何。假若這個委員是有資格的，那末，他的話沒有不對的。假若這個委員是沒有資格的，那末，他的意見雖好，也不接收。一切議案只要主席答應，並無所謂議決。這簡直是階級式的統治，並非平等式的集議。恐怕現在政府裡有許多委員會，也免不了這樣的毛病。這種階級式心理，養成了兩種

人材：凡是勤能的人都變成包辦的人材，有話非得他說不可，有主見非得他發表不可。凡是狃者怡者都變成推諉的人材，一切都不管，也不贊成，也不反對。所以開會的結果，總是少數人的意見。假若真能使大家發表意見，還是不行，因為沒有人發表意見以後，願再修改的。假若修改了，發意見的人，就不甚高興，不是放棄不管，便是搗亂破壞。在開會的時候，驕與各的態度是常常發見的。只有常常開會，常常集議，使他們常常碰釘子，或者每一個大皇帝口脾氣可以改好。

這種家族主義，孤島生活，養成了這兩株惡根性，永遠使我們不能合作，不能有團體生活。同時，這種獨人生活又產生了一種惡習慣。這就是專他私囊，不惜公帑的怪現象。這種貪部的特性也不是天生的，是家族主義養成的。因為我國的人生哲學，個人之外，就是家族。家族以外，有所謂國，但亦是皇帝的家產。皇帝可以飽他的私囊，做百姓的爲什麼不可以使他的家族富有？所以家族主義不打破，愛惜公帑的觀念不會發生的。要打破家族主義，消極的破壞是無用的。積極的方法，只有使團體生活逐漸增加，團體的需要益加明顯，團體的組織益加完備，使人人覺得非有團體不可。假若國家與各團體的錄用人材，不以

團體之保障，而靠個人的喜怒爲進退，那末，團體的觀念

，永遠不會產生的。

湖北教育現狀

向心葵

I 湖北教育之病象：

湖北教育之腐敗，國人皆略知之；但其腐敗至如何程度，恐非局外人所能深悉者也。茲暫舉一二例言之，即可知其梗概：十九年武漢大學招生，湖北省立中學畢業學生，竟無一人被錄取者；去歲中央政治學校招生，湖北學生，亦無一人被錄。最近中學畢業會考，初中學生四五百人，英文算學滿六十分者，不過數十人而已；迨後及格標準逐漸降低至於以三十分爲及格，然英文算學不及三十分者，尙有二百餘人之多。此種教育，豈非賊夫人之子，豈非亡國滅種之根苗耶？

教育學說，至爲繁曠；但對於每一兒童（一）品性道德，（二）知識技能，（三）身體健康三方面，無論如何，必使之平衡發展，方爲美備。然湖北教育，除使學生略得些須膚淺知識（技能尙不在內），而方法尙極欠合理外；至於對學生之品性道德身體健康等項，漫不經心，無人過問；馴致學風日壞，士習日非，各種怪狀，言之至爲痛

心！茲姑就上述三方面，分別述之。

就品性道德言：前人謂：「古有爲善而必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今者各校對於學生除按時挾書本上課外，所有學生一切日常生活及其如何作人之大節，無皆置之不聞不問。平日在校，可以遲睡晏起，任意請假曠課；甘室不潔，衣履不整；（一律着制服者，絕無僅有。在街市行走，如見着制服之學生，十之八九，不但領口風紀扣不扣，即胸前之鈕扣，亦多有留一二個不扣者。且口含一紙烟，徜徉市上，真令人刺目。暑天不着長衫，不着制服上課者，數見不鮮；甚有上身僅着汗衫褂，而至於只着汗衫領褂，下身僅着短褲，並赤其足而上課者；睨視失其體統，風紀蕩然無存，於此可見一斑矣）。出入大半自由，見人絕無禮貌。其甚者：飯堂會食，一不如意，立碎盤碗；一月數見，或一日一見，亦不以爲怪。倘教職員偶不合意，多不以正當方法請求，動輒直接行動，不惟行兇毆辱師長，更且殃及校具或所恨師長私人之物

品書籍。（如去年省師與高中兩校風潮，學生均將師長之器物撕毀無遺）。此種學生，已覺失其常態。竊恐其未入學校之先，未受此種教育之前，尚不至如此狂妄；一入學校，浸潤有日，反使其獸性勃發，人性汨沒；嗟！伊誰之咎？此非辦教育者賊夫人之子而何？此種教育，不普及則已；一普及，則是使天下子弟日趨於爲惡之途；實不啻教猱升木，爲虎添翼也。無怪本黨先進有言：「吾國每年多一些大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添一些高等流氓；每年多一些中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添一些中等流氓；每年多一些小學畢業生，社會上，即多添一些小流氓」；信不誣也。

現在湖北各教員之教學，稍參以啓發形式，或令自學而加以輔導者，不可多見。尤以中學教師，事前絕不使學生預習，臨時則打開書本，一直講授而下。學生用耳，教師用口，是之謂填鴨式之教法，亦即所謂記問之學也。其結果，教師不斷懸諸口頭講演者，有時而不新穎，甚或因此被驅逐；學生則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純粹以耳接受講授，是其耳鼓不覺聒噪麻醉，而聽講程度亦自隨其年齡，繼長而增高矣。但耳高而手低，從不經自己努力，精研苦求，即令稍有所得，亦不過膚淺而又膚淺，似是而非，不

成片段之零碎知識耳。本來現行之一種教學制度，即大有變更之餘地：假定學生每日八小時工作，而六小時或七小時，均消耗於教師教課之中；餘二小時自習，若減去遲到早退之時間，則是受教時間，佔十之八九，自習時間，尚不及十之一二也。姑勿論普通學科由教師在教室講授；即農工商各種職業科目，因設備不完，人才欠缺之故，亦係聽講時間多，實習機會少；則致畢業以後，普通學識既欠缺，專門技能又生疏，升學不能，謀生不得，既無正當出路，不惜鋌而走險；是則貽誤學生自身者尙小，而流毒於國家社會者實大也。湖北各中學校中，更有一事令人心痛者：即各種作業練習之疏忽，與夫各種考試之爛污也。作者前在某一高中學校，查得一國文教員，一學期之內，只令某一班學生作國文一次，當時爲之歎息者久之；及至視查各校，一學期內作文三五次者固多，而只作一二次者，亦非僅見之事。其他英文算學，亦皆潦草從事，或竟一學期內，不收學生練習本一次。至於考試嚴格者，自不能謂無；然大抵掩耳盜鈴，敷衍了事。平日考試則學生公開看書者有之，期考則指示範圍者有之。各校自行畢業考試，無論中小學，先出題目給學生預爲作好者，已成慣例。（亦有少數例外）。即前湖北單獨舉行畢業會考之時，各

校教職員，深恐各該校學生不能畢業者太多，殊無顏面，難於是咸皆紛紛入場，各就本校學生而予以槍遞指點：此種行爲，無以名之，名之曰：「穿窬之盜也歟！」

湖北體育，更有不少之怪現象：體育教員，多半係不學無術之流；平日與學生相處，師生地位幾盡拋棄；學生入其室，索酒食，則立置酒食；比賽偶獲勝，索犒賞則私人宴請。學生中如係各種選手，則上課與否，均可自由。至於體育教學，莫不以球類爲必修之科；點名既畢，紛習各種球類，不多時不好運動者即望望然去矣。

II 湖北教育之病源：

談湖北教育所以腐敗者，莫不歸咎於經費困難之一端；以作者之意論之，經費困難，固不能謂非湖北教育腐敗之一種原因，但絕不能謂之爲一重要原因也。蓋教育經費，係近年來始感覺困難，試問經費不困難之時，湖北教育是否真不腐敗耶？

(一) 湖北教育界，素有武高，北高，北大，一師等派系。始而暗鬥，繼而明爭，今則短兵相接而至於互相肉搏矣。爭之既烈，則其流弊遂有如下之諸大端：(1) 無論教廳與各校，此疆彼界畛畷森嚴。一學校之內，多半造成純一色之系統；是同學，即不稱職與不盡職者，亦盡量

援引與盡量包庇；非同學，雖有賢者能者，亦拒之於千里之外也。苟有破例以人才爲標準之校長，如欲延聘非同學之良好教職員；而被聘者，以己非其同學，恐不能澈底合作，大有避之若浼之勢；即令有一二就之者，而校長之同學輩，公然有種種壓迫，而必使該校長將一二非同學之流去職然後快。(2) 界劃十分顯明以後，倘彼此均以成績之優劣相競爭，亦未始非教界之幸；但各方認真辦學校者，不能謂絕對無之；然大抵均係諱疾忌醫，只求其不出事變爲已足。於是辦學校者，一味因循敷衍，多不敢開罪於學生，蓋意以爲一校之外，敵人環伺，一旦有事，勢將乘隙而入；儘聽其癰疽內潰，而濃血不流至皮膚以外，尙可自矜自誇，粉飾太平也。(3) 派系之鬥爭不已，手段更日見卑劣；如遇某一校偶發生風潮，則不同派系者，竟有喪心病狂之職員，勾結學生，從事搗亂；在此種情況之下，雖間有一二良心未死認真作事之人，身當其間，亦無如之何也。

(二) 頭重腳輕之現象，除前數年，全國一時改專爲大之狂熱外，恐只於湖北此時見之。按新學制高中之設：意以爲開辦大學，非各省財力所能及；僅辦舊制中學，各省又無受較高等教育之機會。於是大學停止預科招生，中

學一階段變爲三二制或四二制。各省所辦之高中，無異舊制大學之預科，是則各省教育，自較舊制中學，提高幾許矣。孰意湖北辦理高中以來，成績特別不良；其原因有二：（1）財力人力，均有不足。在省會尚有省立公共科學實驗館，省立圖書館，可供實驗與閱覽，省外則無也。至於高中教職員待遇，不過較初中教職員遞多十元；大學以上畢業富有研究之教員，無法聘到；所有担任高中之教師，無非大學專門或高師畢業學生；論其在學之日，不過比高中畢業學生，多二三年而已。是以每一高中學校之內，數十教職員，比較稱職者，至多三五人耳。教職員本身既弱，則其所教之對象，自不易引起信仰，而學校因之多事矣。（2）高中多於初中（此之謂頭重腳輕）。現在湖北省立有武漢之高中，有一中（普通科，內有初中），二中（商科，內有初中），三中（工科，內有初中），一女中（兼有高初中），女高中（原爲二女中，內有初中），男高中（純粹高中），男師範（純粹高中），女師範（純粹高中），第一鄉村師範，（純粹高中），男職業（內有高中班），十校；純粹初中，只有第九中學，第十二中學及女職業三校，加上列十校內有初中之六校，亦只九校而已。是初中畢業之學生，完全升學，而

高中招生，猶不能足額也。因此之故，高中招生，一次不足額，又續招一次，續招不足額，更續招一次。招生之時，既不能精加選擇；入校之後，教職員又不能取得學生信仰；如之何高中而不腐敗，如之何高中而不時起風潮也？

湖北現在小學之需要，大於初中；（小學一班，有多至七八十名者；每招一班初級小學生四五十名，竟有數百人報名投考；非有情面，不易入學。）初中之需要，大於高中；（招一班初中學生四十人，投考者，三五百人不等；招一班高中學生三十名，則投考者，爲數恒寥寥也。）先是黃前廳長，以湖北高中學生，成績不良，不易考取大學，遂欲集中力量，在省會辦一榜範高中；並令各校高中，一律停止招生。不意該新辦高中校長，爲北大出身，而非北大之中學校，竭力反對，非同時兼收高中學生不可。廳中不與堅持，原定計劃，即被打破。目下省會之高中，尙嫌財力人力兩有不足，而省外各中學，又紛紛要求添招或續招高中學生，而廳中公然先後批准，真不知用心何居也。更有一事，亦於是連帶述之：在劉前廳長時期，曾召集各縣教育局長縣督學，各省立中小學校校長，合開一教育行政會議，當時決議中，有一項要求：謂湖北教育經費

，係全省擔任，而學校則集中在武漢，未免失其平衡；於是以後各任廳長；逐漸以省款開辦各縣區初級小學。後又規定武昌武穴沙市宜昌襄樊各地為義務教育實驗區，將各縣省立初小，集中在上數區辦理。去年實行裁減合併，上數區六十餘初小，適被裁去；其所省經費，僅六千餘元；而中學或師範畢業生，失業者百餘人；兒童失學者，以數千計。乃省立教育學院，縮減之後，每月尚有六千元之預算；以鄉村小學，每校教員一人，每人三十元計之，六千元之數，可辦二百初級小學；小學裁而大學留，此又一頭重脚輕之現象也。不獨此也；湖北製造師範生之場所，有

男師範，女師範，第一二三箇鄉村師範，再加以教育學院，及私立中華大學之高中師範科，師範專修科，教育系，私立藝術專科學校之藝術師範科，私立華中大學教育系武漢大學教育系。試問學校不日漸擴充，且大事縮減，然則如彼之多師範畢業生，其將如何安插耶？作者之意，以為苟至各鄉村咸能安居樂業，廣設學校之時，再臨時開辦簡易師範學校，或在大學或在高中附設師範專業訓練之短期班均非緩不濟急與不可能之事；又何必盲目辦理師範教育至於如是其極耶？

二十二，二，五， 武昌

平明雜誌

第九期 第十期

四強公約華府會議與遠東問題
過去四年中美關係
夫銳化的英日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需要的海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航空戰略
世界經濟會議的展望
中後復交後的貿易觀
戰後失業問題的發展
波蘭走廊問題

凌雲論宣傳
許孝炎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
孟平世界論壇三則
兆靜大事述評
雨止戈夜市春光(短篇小說)
健伯衝鋒(短篇小說)
達式選錄：唯生論的宇宙觀

唐克
赤野
青征
臨蘭
兆者
編者
余冰
成方
陳立夫

價目：本期每冊特價三毛；預定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北平沙灘七號楊本賢廣告部

學風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中國圖書事業的暗礁
蔣元德 養士制度下的學風
胡芸非 廬江風土誌
汪吟甫 當冷出七晉代遺物考
金正方 宿松縣著述人物考
高正方 讀書之理論與目的

陳東原 編印兼發行：安慶
李黎非 編印兼發行：安慶
徐中舒 定安：安徽省立圖書館
蔣元卿 定價：每冊一角全
陳東原 年十冊連郵一元

國際譯報

第四十四期目錄
印度獨立運動... Bannerga 作
德謨克拉克在蘇俄... Sidney wall 作
現代教育之基礎的謬誤... 牛莊耳 宗作
蘇聯的體育生活... 鄭杜泉 譯
麥克唐納登龍傳... 英華 譯
關於帝國主義的文献解題... 何雙壁 編
大塚金之助 譯

定價：每冊一角二分
全卷十二冊一元二角全年五十二冊四元五角

編譯者：國際譯報社編譯所
發行者：南京成賢街七號國際譯報發行所

這一星期

亞洲的門羅主義

中國的出路

論復興農村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

史汀遜主義與世界大勢

附更正一則

橫田喜三郎著

永修譯

叔永

董時進

吳景超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張記書
天津	成文書局	天津分社	文元齋
上海	現報書局	總代售	亞東圖
南京	新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亞東圖
蘇州	蘇州書局	蘇州書局	蘇州書局
鎮江	鎮江書局	鎮江書局	鎮江書局

獨立評論

第五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廿五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為限）代洋九五折計。

徐州	徐州書局	徐州書局	徐州書局
濟南	濟南書局	濟南書局	濟南書局
青島	青島書局	青島書局	青島書局
濰縣	濰縣書局	濰縣書局	濰縣書局
煙台	煙台書局	煙台書局	煙台書局
威海衛	威海衛書局	威海衛書局	威海衛書局
龍口	龍口書局	龍口書局	龍口書局
周村	周村書局	周村書局	周村書局
博山	博山書局	博山書局	博山書局
濟寧	濟寧書局	濟寧書局	濟寧書局
臨沂	臨沂書局	臨沂書局	臨沂書局
德縣	德縣書局	德縣書局	德縣書局
滄州	滄州書局	滄州書局	滄州書局
保定	保定書局	保定書局	保定書局
石家莊	石家莊書局	石家莊書局	石家莊書局
張家口	張家口書局	張家口書局	張家口書局
歸綏	歸綏書局	歸綏書局	歸綏書局
包頭	包頭書局	包頭書局	包頭書局
西安	西安書局	西安書局	西安書局
蘭州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西寧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成都	成都書局	成都書局	成都書局
重慶	重慶書局	重慶書局	重慶書局
昆明	昆明書局	昆明書局	昆明書局
貴陽	貴陽書局	貴陽書局	貴陽書局
蘭州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西寧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蘭州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西寧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蘭州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西寧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地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這一星期

亞洲的門羅主義

我國首席代表宋子文氏近在倫敦經濟會議席上大談中西經濟合作，同時絕對的排斥亞洲的門羅主義。日本人讀了這演說詞以後必以為中國人是執迷不悟，喪心病狂的。中國人受了兩年的「教訓」尚不提倡中日合作，反要到倫敦及華盛頓去提倡中西合作；這足表現中國人是不可救藥的！

自哥倫布在十五世紀末年發現美洲到現在，世界的歷史幾可一言以蔽之：就是白人霸佔世界史。日本人也嘗過白人壓迫的味道。中國近百年所受的痛苦，用不着日本人的提醒，我們是不會忽略的。現在的世界幾全是白人的世界。所餘者僅有爲的日本及半生半死的中國。中日既同文同族，且從近代史的趨勢上看，又似乎同利害，那末，中國何不接收產自東京的亞洲的門羅主義？我們若能合作以驅逐白人的勢力於遠東之外，這豈不是中日兩國之福嗎？難道中國人願意作印度第二，菲律賓第二，甘心作白人的奴僕嗎？

日本近六七十年的進步是我們十分羨佩的。日俄之役

，日本有功於黃種；這也是我們所承認的。我在日本所看見的民衆的勤儉守法及士大夫階級對於中國經典書畫的愛惜和表揚；這些尤其使我覺得中日真是兄弟之邦。日本人——從電車的收票者到大學的教授和政府的官吏——曾無一次對我有絲毫不客氣的舉動和言詞。我們到過西洋的人尤其感激日本這種平等待遇。所以從個人感情上說起來，中日合作似乎應該容易實現。

但是中日親善，在九一八以前，就很少實際；九一八以後，簡直無從談起了。

無論日本人怎樣解釋這種現象，有一個誤會是應早就消滅的。日本人絕不可以爲中國排日的運動是英美留學生所造的；因爲英美留學生在南京得勢，所以南京政府是反日的。據我所知，中國留日的學生很少是親日的。他們有些反日的態度反過於自歐美歸國的學生。反過來說，曾在歐美留學的人既未爲西洋文化所麻醉，也沒有忘記西洋的帝國主義。一旦中美或中英發生衝突，我敢担保曾在美國或英國留學的人無不努力來反對美國或英國。

日本人也不要誤會中國的反日運動全是國民黨造的。在國民黨執政以前，中國已有過反日運動。從國民黨本身的歷史講，反日主義並不在牠的黨綱之中，更不在牠的傳統之內。牠的領袖大多數素與日本接近，知道日本的情形比別國的也更清楚。從民國十五年北伐之初，直到濟南案件，國民黨的宣傳和政策無絲毫反日的色彩。牠對日態度的變更全起自濟案。國民黨是否能代表中國；牠的好壞和成敗；這些都有討論的餘地，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牠所提倡的民族運動是代表全中華民族的。國民黨倘要喪失中國人心的話，不必是因為牠提倡了民族主義，必是因為牠不能貫徹民族主義。所以繼國民黨而操政權的必更努力於此主義的貫徹。

亞洲的門羅主義，在遠東現在這種形勢之下，絕不能成立。這中的原故是很顯明的。第一，我們雖不願作印度第二或菲律賓第二，我們也不願作高麗第二。日本人處置東北四省的辦法就是他們處置高麗的辦法的重演。這個事實不是「滿洲國」三字所能掩飾的。

第二，日本近二十年對華的政策，除很短時期外，根本似乎是不願意中華民族有復興之日。西洋人對中國的侵略，帝俄除外，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兩個大不同。中

國近代的國際關係史，從中國方面講，可分為三個時期。

在道咸兩朝，中國人所爭的是攘夷與撫夷，閉關與開口（日本人稱開港）。彼時中國內部的爭執很與日本維新以前廿年的情形相同。現在的中國人對於那時期中西關係的看法很與現在的日本人對於美英法各國強迫日本訂通商條約的看法相同；我們雖圖取消不平等條約，我們承認這些條約的成立大部份由於我們的祖先應付世界時潮的不當，並且這些條約的成立對於我們雖有其害，也有其利。所以我們對那時期的西洋壓迫，不懷好感，也不抱仇恨。第二時期是從同治初元到甲午。這個時期可說是中國自強及其失敗的時期。創這時期的新局面者是曾左李及奕訢及文祥諸人，其中人物是李鴻章。這個時期的損失是法佔安南，日本佔台灣和高麗。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對於這時期的損失雖較第一期的損失看的重要，然國內並沒有光復的企圖，因為這些區域內的漢人較少。較多的要算台灣，日本人當然知道台灣的割讓已引起帶民族意義的反抗。第三時期是從乙未馬關條約到現在。這可說是瓜分及中國民族覺悟的時期。在這個將近四十年的時期之內，所謂戊戌變政，庚子之亂，國民黨革命，雖方式不同，變化亦多，其最後的意義就是民族的圖存。在此時期的外來侵略，不管是來自

東洋或西洋，都深入中華民族的心意。前此我們所能忽略的，忘記的，原諒的，此時期的中國就不能了。西洋的侵略，在此時期內，步步減少，而日本的侵略反在此時期內步步加重。這是日本和西洋對中國的侵略第一個不同點。

其次，日本在此時期內的侵略較其他時期其他國家的侵略為更嚴重，更與我們的民族主義針鋒相對。近二十年來的內亂沒有一次沒有日本政府或個人從中慫恿，一若統一的中國是日本絕不能讓她產生的。出師濟南，橫斷北伐軍隊的前進那一次尤明顯的表現日本阻撓我們的統一。現在這個「滿洲國」的成立一面是分化中國，一面是淪三千萬中國人於外人的統治之下。這種待遇是異文異族的國家會

未給與我們的。

總之，亞洲的門羅主義之所以不能得我們的贊助，就是在此主義之下沒有中華民族立足之地。這個主義不是亞洲人的主義，是日本人的主義。

中日親善曾經實現過。日本人一旦停止與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為敵的時候，親善又能重來。親善之有益於兩國，這是我們所深信的。

最後，兩國人士還要看清楚，中日親善與中日合作以排西洋是兩個不同的事情。我們兩國親善，在上面所舉的條件之下，固然是可以的，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兩國親善的時候，不應，也不能與其他各國為敵。

廷黻

中國的出路

叔永

無論甚麼時候，一件事物總有各種方面的看法，國家大事也并不是例外。一個國家到了危急存亡之際，要決定一個應急的政策，自然需用多項的事實與各方面的考慮來作他們決策的根據。不過政治家個人觀點的不同，也狠足以影響他們的政策。老實說來，一個國家忽然遭逢到狂風暴雨生死存亡的關頭，唯有平時留心有素，臨時有定見，

有魄力的政治家，可以拿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臨機應變，毅然處置。設若不然，一經猶豫之後，事情便愈演愈混亂，利害關係便愈弄愈複雜，到了這個時候，要拿前途的利害來做決策的標準，幾乎不可能，結果還是個人的觀點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們討論政治問題的人，似乎不能忽略過這一點。

目下中國的大問題，不用說是強隣入寇，威脅我們國家生存的一件事了。這個威脅的程度，到了本年五月中旬日軍進兵長城各口，迫近平津的時候，可謂達於極點。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政府當局和國民，顯然只有兩個絕對不同的主張可以適用。

其一，是「打」——我不說「抵抗」，因為抵抗已經不是要「打」的最終目的。只有繼續的「打」，是中國的出路。這一般要「打」的主張是這樣的——

「你說中國現在已經吃够了苦頭嗎？我看還早得狠呢。「九一八」的事變，喪失了幾千萬方的土地，不會驚醒我們偷安苟活的迷夢，不久就來了「一二八」的慘劇。這一次，我們損失了幾萬萬元的財產，犧牲了上萬數的忠勇戰士，結果換來的是一個上海協定。這個上海協定簽字之後，設如我們的當局能够成立一個抗日的計畫，臥薪嘗膽的實行起來，還也罷了，不幸上海協定簽字的結果，只便宜了大人先生們每星期多往上海跑兩趟，何嘗看見過甚麼禦侮却敵的計畫來！照此推去，設如我們再和敵人來幾個甚麼協定，結果也不過平空白送幾張賣身文約，於我們國家的前途究竟有甚麼好處？不但如

此，恐怕外患稍為停息，內憂要立刻發生，那還不如與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留得我們的鎗口常常向外。所以說甚麼「殷憂啓聖，多難興邦」，都是過於早計的話。我們現在唯有繼續的「打」，繼續的利用敵人的壓迫，可以鍛鍊出我們團結自救的精神來。我們此刻不能放鬆敵人，正如敵人不能放鬆我們一樣，只有我們能吃到十年二十年的痛苦，方纔有最後勝利的希望」。

以上是主張要打的普通呼聲。自然主張打仗的重要理由，還有「引動世界列強的干涉和期待日本的經濟崩潰」等等，但我們曉得這些靠天過活的希望，是不能救我們當前之急的了。我們現在只有靠着自己，打算我們前途的出路；可是除了打仗之外，好像前途的光明是很少的。這是去戰論者的看法。我們沒有理由說他的看法不對，我們只能說他們這種看法是悲觀的。

其二，是主張在敵人不願意把事情再次擴大的時候，我們可以暫時罷手，而從他方面來急謀恢復我們的國力，做收復失地的準備。我們且看這一班人的主張是甚麼：

「我們不信失地絕對不能收復，但相信此時單靠中國的兵力不能收復失地。這十八個月的經驗，是失

一地便丟一地，失一城便丟一城，失一省便丟一省。敵人的野心無窮，而我們的疆土有限。……我們看了最近幾十天之中兩次的灤東大奔潰，看了長城南面各縣人民的流離痛苦，我們深感覺政府在此時不能不為國家人民謀怎樣減低損失的方法，到了華北又成了第二熱河，那就太遲了』。

保全領土，減低損失，究竟有甚麼好處？他們的主張

說：

『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

這個話要細細的加以解釋，那便是說：

『我們雖然失掉幾千萬方哩的土地，一時收不回來，但還有二百餘萬方哩的本部，可以作我們發憤自強的基礎。世界上有許多土地人口地勢物產以及政治地位無一樣能及我們的國家，他們都還在努力上進，可以自立，爲甚麼中國便一定無救；不過要靠自力來得救，我們第一必須要保全我們的領土，使牠的損失越少越好，第二必須要安定環境，穩健建設，騰出力量來奮勉進行，提高我們一切事業的水平程度，纔能增進國力而達到最後收復失地的目的』。

這後一派的想法，比前一派不同的地方，似乎他們對於我們的前途還沒有十分絕望。他們不覺得一與敵人停戰，我們內部的戰爭便要立時發生。他們覺得我們的政府當局得到一點舒息的機會，還可以做一點穩健建設的事體，而未必就在上海多跑兩趟來消息那國家生命所關係的一刻千金的時光。這樣一個看法，是積極的，是樂觀的。設如我們不一定是不可救藥的悲觀派，似乎以上的看法，也沒有甚麼非反對不可的理由。

不過我們要曉得，悲觀與樂觀，雖然同是對於黑暗未來的一種推測，悲觀的結果可能性較多，樂觀的結果可能性較少，這是我們不可不特別注意的。一個人事業失敗了，他要痛痛快快的投下黃浦江或是服一瓶安眠藥水以了結他痛苦的生命，這是十有九分做得到的。可是設如在他事業失敗之後，要想重振旗鼓，轉敗爲勝，那便非忍苦含辛，步步掙扎，戰勝一切困苦艱難不可。這中間也許有的是做得到的，有的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既然走上了這一條路，除了堅苦卓絕的求達到我們的目的，還有甚麼辦法？不然，這樂觀派只等於敷衍目前的苟安派，他最後的失敗，是要加重他最初的痛苦與羞辱的啊！

以上所說，是關於現時一般政論上大體的檢查，政府

當局的政策是屬於那一派，我們不敢斷定，不過在敵人的軍隊一隻腳已踏進了平津大門的時候，忽然成立了一個停戰協定，使勢如迅雷的戰事，暫時得以戛然中止，似乎政府當局的態度已經沒有懷疑的餘地了。照上面的觀察，我們把激昂慷慨的感情暫置不提，對於政府當局這種積極負責而又不偏於悲觀的態度，也未嘗不可表示我們的贊許與同情。可是政府若真有積極的政策而不是以城下之盟來換目前的苟安；我們以為至少以下的幾件事必須立刻辦到。

(一)一切內爭的釁端必須消弭。照目前的情形言，全國人民感覺到國難的嚴重，除了頑固不化的共產黨外，幾乎沒有一人一派不願與政府同舟共濟的。可是近來報紙喧傳，似乎反對政府的勢力，反在國民黨大本營的西南半壁或西北某方，大有躍躍欲試之概。設如此時再有內戰起來，勢非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不可。我們以為無論是政策之爭或政權之爭，此時只有和平解決的一個方法，萬不能再蹈前幾年的覆轍，為自己掘墳墓，為敵人造機會。

(二)剿共的工作，須從速得到一個相當的結束。從前政府的口號是剿共與抗日同時并行，目下的口號似乎是

先剿共而後抗日。(因為華北的停戰協定簽字以後，除非日本自己找上門來，我們似乎無處去抗他。)那末，剿共的工作早完一日，即抗日的工作可以早開始一日。

(三)一切無意義的軍閥私鬥，須用實力嚴行制止。貴州的猶王，四川的劉鄧，在國難嚴重的今日猶私鬥未已。此在彼等素無國家觀念的軍閥誠不足責，但政府若聽其自然不求解決，於將來的抗日計劃必多障礙，固不待言。

(四)罷免一切不急之務，集中力量向增加國力一方面切實工作。我所謂不急之務，是就種種方面說而非專指某一件事。如機關組織，有專為鋪張場面或安置私人而於行政管理不發生效率者皆應裁撤。如土木工程，有專為居處之安或敷衍死者而於國計民生不發生影響者皆應停止。如教育設施，凡成績不良或重複腐敗與原來目的不相吻合者，皆當澈底改造。經如此一番反省檢查之後，不唯可以發現新的力量供我們指揮，亦且可以造成一種新的氣象為復興中國的基礎。夏康的一成旅，衛文公的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皆可以做我們的模範，只怕我們沒有決心罷了。

論復興農村

董時進

近數年來，國內朝野一致高唱救濟農民，復興農村，然而救濟之聲浪愈高，農民之破產者愈夥，復興之高潮愈盛，農村之崩潰愈速，可見非復興之不得其法，必救濟之未切實努力。作者從旁靜觀，神智比較清晰，茲將感觸所及，略陳數點，或不無小補於農村復興運動歟。

作者第一欲表明之見解，即救濟農村根本不在機關之添設，而在其運用。若運用得其人與財，則已有之關係部廳局所或社會團體，儘可負其使命，否則機關愈多，愈足分散力量，增加重複，甚至足以惹起權責上之爭執或推諉。作者往歲曾痛言之：「我們最怕的是添設機關來辦救濟的事情，因為往往救濟不成，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時代公論三十六期）舊話重提，實感必要。即使謂原有機關之組織簡狹，不克充分發揮救濟復興之功能，而又不便擴大或改組，然與其疊床架屋，添設地位職權不確定之胼股機關，亦毋寧集中農業行政，設立農務獨立部廳，以專責成焉。

欲復興農村，首須問農村何以衰敝。吾人皆知中國農

村之衰敝，由於純粹的經濟原因者少，由於軍事政治之原因者多。譬如人之不起，並非生病，乃係被人毆打，體無完膚。欲救此人，首須停止毆打，否則而鶴再生，亦將束手。昔段打者既變木加厲，而又遍覓醫生求藥方，如不勝其關懷者然，豈非自欺欺人耶。作者去年在獨立評論第三十期鄉居雜記一文中，曾論及此點云：「許多地方的當局，現在頗似在想法救濟人民，其實他們不必想別的方法，祇能維持治安，自己不去擾民就夠了。不然，即使施一點兒小惠，又何異乎將一個人緊緊綑綁，剝去衣服，再餒他一點兒米湯。」近來全國輿論對於農村破產之原因，多能指明其攻結之所在，然而包羅萬象，窮古極西之政府救濟方策，獨未嘗顧及此點，斯誠不能不引為遺恨者。

救濟農民，必須有真為農民謀利益及為農民而犧牲之誠意，苟以壓榨為目的，以救濟為手段，則視農民最多不過一泌乳之牛，產卵之雞耳。近來許多軍政當局感覺農村有救濟之必要，大致不假，蓋農村破產與軍隊官廳有己之利害關係，軍隊官廳為其本身之利益計，亦必希望農村

復興也。然若軍隊及官廳祇顧本身之利益，不肯稍事犧牲，施一分之救濟，添兩分之括削，則救濟只管救濟，復興終屬無日。故當局縱以羊豕視農民，亦必須能暫時忍餓，以待羊豕長肥。假使一時之饑餓亦不能忍，是惟有同歸於盡耳。

無救濟農民之誠意，以及絲毫不肯犧牲者無論已，即真心欲為農民謀利益者，亦大抵不肯從根本上用切實工夫，而惟知尋捷徑，求速效。江湖方士之流，乃爭以偏方迎合，獵取權位，結果得救濟者非農民，而為辦救濟之人員。夫恢復農村興盛之道，正與維持人體健康之道，原理相同。人欲保持健康，必須在飲食起居運動清潔各方面留意，固不在乎吃補藥，服仙丹，習妖術。復興農村亦自有其正當途徑，苟惟偏方捷徑是務，何異養身而惟補藥仙丹是求。中國無論何事，每易為偏方邪道所悞，即如近年各省提倡國術，實效未著，而仙人狹客怪誕不經之事，竟層出不窮，又如最近講防空禦侮，飛機大礮未備，而飛箭飛雷之發明，已數見不鮮。凡此現象，皆由於國人好新奇而不務實際之心理所致。當局倡導農村復興，苟不去偏方捷徑之迷信，未有不開同樣之笑話者。

解決農業問題，固須有專門人材，近來各處延聘專家

之風極盛，足見復興農村之心甚切。如實部農業顧問洛夫氏者，各省爭欲擢去，直類拉夫。洛夫之學識經驗固為吾人所欽佩，然須知其非神仙非萬能。其所擅長者為作物育種，而優良品種之育成及推廣，決非短時日所能成功。若以為光臨一次，即可使一畝作物之收穫等於兩畝，撰一計劃，即可使一切問題解決，全體農村向榮，是直夢想耳。吾深恐大家之重視專家者適足以戕賊專家，使不克常居一處，以慎密的照料其工作之進行，故吾願為延請專家者進一忠告。即第一，須知農事之範圍甚廣，農村問題極多，究竟專家居於何門，所欲解決之問題為何種，必須打聽清楚，考慮確實，不可漫然請一專家，以治漫然不知之病症。第二，人材設備及經費必須有準備，有後繼，否則專家亦無用武之地，且縱能制一完美之計劃，亦惟有置諸高閣耳。

關於救濟農村方案，時人所提出者甚多，不必再事增添，亦幾不能再事增添。惟有一點——且係一極重要之點——尚為一般人所忽略者，即救濟農村不必專門在農村上謀救濟是也。吾人當考慮農村救濟問題時，往往專注意於農村，其弊則陷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蓋社會經濟組織為整個的，其興衰為關連的，欲繁榮都市固不必單在都市

上想法。欲繁榮農村，亦不必單在農村上想法。關於前者，一般人多能明瞭，現時都市之許多銀行家及工商業家之亟欲復興農村者，與其謂係圖農村本身之利益，毋寧謂係欲間接謀都市之利益。此層固未可厚非。然一般人對於發展工商，繁榮都市，以助農村之興盛一層，則多不注意，即使能認清其關係，亦不願聲張。蓋時人對於農民離村，都市膨脹，大抵表示深惡痛絕，故一談及繁榮都市，遂諱莫如深，而不知工商業興盛，都市發達，固與農村之繁榮，有極密切之關係。

近世各國農村物質文明之進步，農民生活程度之提高，雖尚未可以與都市比，然以與古代農村情形或工商業落後國家之現代農村情形相較，則有天淵之別。此中之原因雖不止一端，然而工商業發達，都市勃興，實為最大之要素。近年吾國少數都市之膨脹，乃係一種病態，然若工商業正當發展，工商業中心崛起，則其反映於農村社會者，必為顯著之利益。夫挽救吾國農村經濟破產之辦法，除停止一切榨取外，當以增加農民之收入為最重要。增加農民收入之方法有技術的與經濟的兩種。技術的方法為增加農

業生產量，此層人人能道及之，不用贅述。惟一般談增加生產者，往往忽視其必需之條件與環境之限制耳。經濟的方法在使農民之勞力能充分使用，且獲得較高之代價。吾國農民之最大的經濟的痛苦，要為其勞力之浪費，及其效果與代價之細微（不停由於農具簡陋及時間虛耗，即如從事報酬極微之檢柴拾糞等工作，耕種瘠薄之土地等，均屬浪費勞力；又農產物之價格賤，亦即農民勞動之代價低）。欲補救此層困弊，所賴於工商業之發展者最多。蓋工商業發展對於農民至少有兩重利益：一為農產品之價格可以提高，諸如現時一般人視為奢侈品之水果，蔬菜，牛乳，雞卵，等物品之需要，亦可加多，此類物品最能吸收多量之人工，其對於土地不足勞力有餘之農民，極為有利。二為創造工作機會，消納過剩人口，其影響不但使農村之失業及浪費之勞力減少，且可以增加勞動者之購買能力。此兩種利益，言之雖屬平常，然而切中吾國農村之需要，為農業現代化之主要前提，其重要不能過於形容，故不厭申述，以促國人之注意。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 (二)

吳景超

(二) 疾病保險

德國是有疾病統計最早的國家，根據他們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幾點重要的事實。

第一，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二八年，每年工人中生病的，常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間。

第二，工人因病而不能作工的時間，戰前與戰後略有不同。一九一三年，工人因病而不能作工的時間，平均是八·六五日。一九二五年，平均便增至一二·五三日。戰後的狀況所以稍不同的原因有三，一因大戰中青年死亡很多，所以戰後的工人階級中，老者的成分，比較多些。因為老年人比較容易生病，所以戰後工人的平均生病日期，也就比較長些。二因大戰期間，男子死亡較多，所以戰後的工人階級中，女子的成分，也比較多些。女子的死亡率，雖然比男子低，但生病的次數，並不較男子為少，而且每次生病的時日，平均比較男子為長，此點也可影響德國戰後的統計。三因歐洲大戰之後，德國的經濟狀況，甚為衰頹，一般人的健康，受他的影響，遠不能與戰前相比。有

此三因，所以德國的工人，戰後便較戰前為多病。

第三，上面的統計，說工人因病而不能作工的時間，是把生病的工人，與不生病的工人，放在一起，平均計算的。現在我們可以把那些不生病的工人除開，只看那些生病的工人，平均每年要損失若干時間。就男子說，一八八五年，生病的工人，平均每年損失十四日，一九一三年，增至十九日，一九二八年，便加至二二·五日了。女工的成績，比男子還要壞。一八八五年，生病的女工，平均每年也是損失十四日。一九一三年，增至二十四日，一九二八年，便加至二七·一日了。

美國也有一些疾病統計，可以拿來比較。不過美國的統計，只限于少數工廠，并不包括勞工的全體。譬如俄海 (Ohio) 有一個橡皮工廠，僱有工人一萬六千。根據這個工廠三年的統計，女工因病而不能作工的時間，平均每年有一二·八日；男工平均每年計有八日。又據波士頓 愛迪生電廠十年的統計，女工因病而不能作工的時間，平均每年為一二·九日，男子平均每年為六·九日。這種情

形，與德國戰前相彷彿。美國的統計，也是把生病與不生病的工人放在一起算的，如單算生病的工人，那麼每年不能作工的時間，一定比上面所述的長些。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這些數目字背後所表現的事實是怎樣。

一個做工的人，靠他的勞力，來養活他自己并他的妻子，忽然一天病倒了，而且病勢不輕，不是幾天就可以好的，在這個時候，這個工人應該怎麼辦，他又能夠怎麼辦？他這時有三個大問題，在他的腦中。第一，他自己的醫藥費，從何而來？第二，工資沒有了，他將如何維持自己的生活。第三，工資沒有了，他又何能維持妻子的生活？

美國是一個沒有疾病保險的國家，工人生病，先得自己想法，社會是不來幫助他的。也們怎樣想法，有許多社會學者都去調查過。我們可以拿一位湯先生的故事來為例，因為他生病後的過程，很可以代表一般美國工人的命運。這位湯先生做工若干年之後，忽然得了一樣重病。在這種病況之下，為解決上面所述的三個問題起見，他便動用銀行中的存款。這點存款，是經過若干年的刻苦才積起來的，一共不過七百元，不久便用光了。第二步，便是借款

。他先以人壽保險單為抵押到銀行去借款，後來只好以自己的信用，向親友去借款。各方面都借過了，而病狀還無起色。第三步，只好請妻子到外面去做工。最後還逃不了一般窮人的命運，到慈善機關去請求救濟。美國的慈善機關，有錢的很多，這位湯先生在四年之內，得到救濟金約二千元。四年的病，終於把他磨死了，遺下來的妻子，還要靠慈善機關，才能維持生計。

這是在美國。假如中國都市中的工人，遇到湯先生所生的病，結果又將如何？他有七百元存款嗎？他有人壽保險單可以押款嗎？中國有那種富有的慈善機關來救濟他嗎？這些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他的出路，我們也不難猜想了。他本人一定是不久便脫離這個苦海，而他的妻子，因為失却依靠，恐怕遲早是要走上下流之路的。

在先進的國家裏，生病的工人，原先生活毫無保障，與中國今日的工人一樣。但是自從一八八三年，德國提倡疾病保險以來，很多的國家都來仿效，至今已有一二十餘國，是有疾病保險的了。這些國家，大多數在歐洲。歐洲以外的國家，有這種辦法的很少。例外大約只有兩個，一是日本，一九二二年，也通過工人疾病保險法；另一國便是南美的智利，在一九二四年，也有同樣的制度了。

疾病保險的辦法，我們可以英國爲例來說明，同時并以他國不同的情形來補充他。

英國的疾病保險法，是一九一一年通過的，以後時有修改。現在，凡是十六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的工人，以及那些每年入款不到二百五十鎊的，都要保險。保險費的交納，由僱主，工人及政府三方面負責。根據一九一一年法律，假如工人是男子，每星期須納保險費四辨士，僱主替他納三辨士，國家替他納二辨士。假如工人是女子，每星期須納三辨士，僱主與國家替他納的，與男子相同。關於納保險費的多少及負責的方面，各國的情形不同。譬如德國的法律，納保險費一事，只由僱主及工人二方面負責，國家不過給予行政上的幫助。而且所納的數目，并不是一切的工人都是一律的，工資高的便多納些，將來生病時所得的好處也多些。這種辦法，似乎合理，但管理非常麻煩，不如英國制的簡便。

在英國，工人與僱主所納的保險費，由僱主徵收，交給當地的郵政局，再由郵政局轉到中央的保險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收到這些款項以後，把他分作兩部份。一部份交給各地工人自己組織的會社，這種會社，受國家的委託，把工人于生病時所應得的補助金，付給工人。另一部份的

錢，交給各地方的醫藥委員會，以爲買藥請醫生之用。各地的醫藥委員會，看當地工人的多少，請定若干醫生，工人可以在這些醫生之中，隨便挑定一個醫生，替他醫病。一九二四年，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三處，共有醫生三八，四八六人，其中有一四，六四五人，是受醫藥委員會的付託，爲被保險的工人醫病的。各地的藥房，也有許多與醫藥委員會有聯絡，工人拿了藥單到這些藥房去取藥，可以不必自己花錢。

在這種組織之下，英國的工人假如生了病，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第一，他請醫生看病以及吃藥，可以不花錢。他的健康，可以因此而恢復得很快，他的憂慮，也可減少了許多。第二，假如他的病到了第四天還不好，那麼從第四天起，每星期他可以拿點疾病補助金。補助金的數目，看保險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假如他保險的時間，還不到二十六星期，那麼他得不到這種權利。假如他已保險二十六星期，那麼男工每星期可得疾病補助金九先令，女工可得七先令六便士。假如他已保險一百〇四個星期，那麼每星期男工可得十五先令，女工可得十二先令。這種補助金，最多只給二十六個星期。如工人的病，過了二十六個星期還沒

有好，同時他保險的期限，不到一百〇四個星期，那麼他也就得不到別的好處了。假如他已付過一百〇四個星期的保險費，那麼從第二十六個星期起，他還可以得到一種補助金，名爲「無能」補助金，表示得這種補助金的人，是無能力做工的。這種補助金的數額，不分男女，都是七先令六便士一星期。生病的工人，假如健康沒有恢復，便可繼續領取這種補助金，一直到六十五歲爲止。

除了以上這些好處之外，一個工人，假如保險過四十二星期，那麼他的妻子生產時，還可以領四十個先令的產母補助金。假如他的妻子也是個工人，也是保險過的，那麼在生產的時候，便可拿八十個先令。一個沒有結婚的母親，假如他是保險過的工人，也可拿四十個先令。

英國的疾病保險法，如與他國相較，還有幾種缺點。

第一，保險的工人，雖然可以不必花錢而得醫藥，但是病重的人，除却生肺病的以外，得不到醫院的治療。別國的保險法中，常給病人以一種選擇。他可以在院外治療，同時拿疾病補助金，他也可以不拿疾病補助金，而到醫院中去養病，如德國，波蘭及捷克等的法律中，都有這種規定。在保加利亞，入醫院療養的人，對於疾病補助金，便少拿四之一。在日本，入醫院的病人，只能拿補助金常額三

分之一。還有好些國家，對於入院的病人，其給補助金與否，要看他有無家庭的負擔而定。如奧大利，匈牙利等國，對於入院而有家庭負擔的病人，每給以補助金常額二分之一。這種條例，對於有重病的工人，當然是有利益的。

第二，英國保險法中的最大缺點，是對於工人的家庭，并無照顧的辦法。英國保過險的工人，自己生病了，當然可以得到上面所述的種種便利，但是家中的妻子生病了，還是得自己花錢的。別的國家，有好些在保險法中不但顧到工人本身的健康，也顧到他的家庭的健康。第一個通過這種法律的國家，是匈牙利，時期是在一九〇七年。以後歐洲別的國家，也有仿行的。在這種法律之下，工人的家庭中，如有人生病了，也可以不必花錢，便可得到醫藥。德國的法律，近來也與匈牙利一樣顧到工人的家庭。所以在德國的人口之中，現在已有五分之三，其醫藥問題，已由工人與社會合作，而得到解決的方法了。其餘的五分之二的人，大部份是中產以上的階級，醫藥本是不成問題的。

第三，英國的保險法，還缺少一種規定，便是病故工人的喪葬補助金。德國在最早的疾病保險法中，便有這種規定。喪葬補助金的數目，要等于粗工每日工資二十倍，

但無論如何，不能少于五十個馬克。盧森堡的辦法，是喪葬補助金，須等于工人每年工資十五分之一，但至多不能超過四百佛郎，至少也不能低于二十佛郎。

第四，英國的疾病補助金，數目似乎嫌少一點，在有家庭負擔的工人，一定感覺不夠。這種缺點，各國的法律都不能免除。最好的辦法，在德國的工人保險團體中，有少數已自動的實行，便是于法定的常額（德國工人所得的疾病補助金，等于標準工資的二分之一。）之外，家庭中如多一個依賴者，便再多給百分之十。但補助金的總額，

不能超過標準工資的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在這種規定之下，工人在生病時，對於養家一問題，便可完全解決了。

最理想的疾病保險法，可以英國現行的辦法為綱，再把別國保險法中的優點加上便行。有這種法律為保障，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病人三問題，便都雲消霧散，不復存在了。他一生病，可以不必憂慮，可以不必乞憐于親友，可以不必低心下氣于慈善機關之前，只須安靜的休養，等健康恢復後，再來繼續他的工作。

二二·六，十五。

史汀遜主義與世界大勢

橫田喜三郎著

永修譯

（原文見日本雜誌中央公論五月號）

一·

史汀遜主義的前途怎樣？牠會像電光石火一樣，灼然一現，就形消影滅嗎？抑或如大樹一樣，將盤根錯節於大地上，而發揚光大嗎？試將世界的大勢，來觀察所謂史汀遜主義的將來，這便是本文的課題。

事情已將近一年半了，這是去年一月七日的事。起初

由小小一件鐵道破壞（？）問題，忽而占領滿鐵全線（吉奉），忽而轟炸錦州，忽而進攻嫩江，占據齊齊哈爾，又忽而總攻錦州。當他覺得日本的軍事行動，將無止境，而這樣滿洲的事態，並不僅是單純的一時的軍事的占領，而是漸現永久的政治組織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史汀遜氏，突然向日本提出重大的抗議的警告說：「凡以違背非戰公約之協定與義務之方法，而惹起之一切事態，條約，及協定等，美國概不承認之」。這便是所謂的史汀遜主義。

但這裏要聲明一下，就是：他這箇通牒，並不是明白斷定日本的軍事行動，是違背非戰公約的協定和義務的；乃是說，假如有違背的時候，那麼，美國是不承認的。雖然他的心中，未嘗不想日本這種行動，是違背條約的，尤其這種心理，既不僅史汀遜是這樣，也不僅美國是這樣，世界除了日本以外，自聯盟各國，以迄全世界各國，沒有一箇不是這樣。即其後黎頓委員會，經過了半年多的調查報告，也還是這樣。不寧羅是，這時候的世界各國，對於日本的行動，已經明白斷為違背條約了，就是根據這報告書作基礎而成立的本年二月的聯盟總會勸告案，也已經下了同樣的斷定了。不過，當那時候的史汀遜通牒，還只是宣言假如違背非戰公約的話，美國便不承認罷了。

然則這宣言後來怎樣？世界對這史汀遜主義，給了牠怎樣一個看取？牠的將來怎樣？這事雖然和滿洲問題有連帶的關係，但就主義本身，確也有研究的必要。

二。

現在先把牠的經過說一下，就是：由去年一月七日這宣言發出起，到現在止，所謂史汀遜主義是怎樣被看取來的？

離史汀遜的宣言發出，約一箇半月，去年二月十六日

，國際聯盟，除了中國和日本以外的十二聯盟理事國，給日本一箇大意和史汀遜主義相同的通牒說：「凡違犯國聯盟約第十條，因而惹起之一切領土保全的侵害，及一切政治獨立的變化，概不得認為有效」。所謂盟約第十條，乃是規定聯盟國應互相尊重各該領土的保全，政治的獨立，而相與抵制外來的侵略云云。這種因違犯第十條而起向領土保全的侵害，與政治獨立的變化，既都由外來的侵略所惹起，而這類的侵略，又明明為非戰公約所禁止，所以理事會以通牒內所稱的違犯第十條云云，與史汀遜主義所稱的違背非戰公約云云，其結果確是一樣。這樣一來，史汀遜主義，可說已經受了十二理事國的承認及支持了，而這種主張，也已經不是美國單獨的政策，而是具有較強固的基礎的了。

其後二月二十四日，史汀遜氏更在他寄給上院外交委員會長波拉的信裏，一則說：「美國不承認一切由違背和美國的權利有關的諸種條約，因而構成的一切事態，條約與協定」，再則說：「由這樣不承認，得進而阻止一切由壓迫或違約所獲得的各種名義與權利」。總之，他是在把一月七日的通牒內容，反覆說明的。這種說明，雖然不是對國際間發出，沒有什麼國際的特別效力，不過由此很可以

明白美國是在繼續支持着史汀遜主義，而具有固守的決心。這樣，史汀遜主義，已不是一月七日的一時的宣言，而是美國永久的政策了。

越半月，到三月十一日，國際聯盟總會遂正式議決採用史汀遜主義宣言道：「不承認以違背國聯盟約，或非戰公約之方法，因而惹成之一切事態條約與協定，此乃聯盟國之義務」云云。這宣言的內容，大致和一月七日的史汀遜通牒並無兩樣，所不同的，不過一箇單提非戰公約，一箇把國聯盟約加進去罷了。所謂國聯盟約，雖然很多，但這裏無疑的是指第十條領土保全，和政治獨立的尊重；及第十二條以下，對於紛爭的和平解決的義務。這樣的規約，非戰公約中，也早已有了的。所以總會這種決議，不啻即採用史汀遜主義，而尤不止採用他的主義，並且加入「違背國聯盟約」一語，於是牠「史汀遜主義」的意義，更強硬化了。不但這樣，從前的不承認聲明，不過是單純的一種任意政策罷了；現在却變成「不承認乃聯盟國之義務」，這便在「不承認」上，加了一層「法律的義務」。又以前美國和十二理事會國，不過聲明不承認的意思罷了，但現在既儼然負了「不許承認」的義務，那麼就使後來，

了。這次總會的議決，贊成此案的加盟國家，計四十四國，中國後來也加入贊成了，合計共四十五國之多，可以說是全世界國家，都贊成了這箇決議，而於是史汀遜主義，也就可說已經成了全世界國家所共同採用的主義，而且不僅是單純的一種任意政策，乃是負有法律的義務的了。

更越五箇月，到八月三日，南美十九國，對波，巴兩國關於查哥主權的爭議，送了一箇通牒說：「凡非依和平的手段而獲得之一切領土的設定，以及用兵力佔領或征服所得之土地，悉認爲無效」。這通牒口吻雖異，實質上亦即是採用了史汀遜主義，又雖然牠所說的，不是滿洲事件，對滿洲問題，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不過由這主義本身上看，可知牠現在決不僅限於滿洲事件之地方的特殊的範圍，而是適用於世界上一切的類似事件。這樣一來，牠的意義，豈不更覺重大，而間接地仍足以影響滿洲問題嗎？總之，史汀遜主義，在既成爲全世界的原則的今日，較之出現當時，牠對於滿洲問題的壓力增重多了。現在世界，幾於隨時隨事，都在相機應用這箇主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最後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所採用的聯盟總會報告，亦是

確認了史汀遜主義，並根據這箇作成了不承認滿洲現政權的勸告案。他們第一，在敘述解決滿洲問題的基本原則的時候，引用了去年二月十六日十二理事會國的通牒，和三月十一日聯盟總會的決議案，而加以確定。這表示各國依然支持史汀遜主義，而主張滿洲問題，非依照這主義來解決不可。第二，他們把這主義具體的適用在滿洲事件說：『承認或維持滿洲之現政權，實與現存國際義務之根本原則不相容』。又說：『聯盟國不問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均應繼續不承認之』。這個勸告案，由史汀遜主義本身說，雖然不能算有什麼新的發展，但對於滿洲問題前途的重要性，則增重多了，因為從前僅是假定的，現在却確定了。從前說日本在滿洲的行動，如有違背非戰公約，或國聯盟約時，則不承認之，現在却斷定日本的行動，是違約的了。並且決定不問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繼續不能承認了。贊成這件議決案的國家，共四十二國，不贊成的，只有日本一國。雖然日本因聲明反對這議案，對她不能發生拘束力，但以幾乎是全世界的國家——四十二國——來維持這史汀遜主義，並表示準此進行的決心，那她的前途，也就够可注目的了。

以上是由去年一月七日宣言發出起，到現在止，史汀

遜主義，怎樣在被全世界看取，以及支持發展來的情形。現在再總括一下，就是：牠起初只是美國一國的主張，現在已幾乎成爲全世界的共同主張了；牠起初只是單純的一種任意政策，現在是具有法律的義務的了；並且這種主張，已不是單純的理論，而是現實的實踐了，不是一國所應踐，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行動了。由此可知，史汀遜主義，至少到現在止，並不是電光石火，一現即滅，而是盤根錯節於大地上，而以漸發揚光大的了。

三。

然則將來怎樣呢？史汀遜主義的運命，仍舊能够支持繼續，並發展於將來嗎？關於這一層，不能不究明這主義的根本精神，而同時也不可不一察世界的大勢。假如史汀遜主義的根本精神，是合乎世界大勢的，那麼牠的將來，當然是可以繼續支持與發展的。

現在，我們先把史汀遜主義的根本精神研究一下，上面已經說過，史汀遜主義，乃是不承認由使用違背非戰公約或國聯盟約的方法，因而發生的一切事態，條約，與協定。他的意思，是要用這否認一切由違背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而生的結果，因以確保對於該兩項公約的遵守性，這便是史汀遜主義的根本精神。

但是所謂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究竟是以何爲目的，規定了些什麼呢？這不用說都是些保障和平的條文。第一，非戰公約是以確保和平爲根本目的，所以規定了些關於放棄戰爭，及對於紛糾爭議的和平解決法。牠的開首第一條，便是規定締約國應該放棄國家的政策手段之戰爭。

第二條，規定一切爭議都應該用和平手段去求解決。第二，國聯盟約，雖然有許多規定，但牠的第一目的，亦是在訂定國際的安全保障，及爭議的和平解決法，所以牠一面在第十條規定了「聯盟國應互相尊重各該領土的保全，與政治的獨立，對於被侵略國家，應共同擁護」，他方面自第十二條以下，即詳細設定許多紛爭的和平解決條規。如：一、「凡聯盟國間，發生爭議，至於有斷絕國交之危險時，應將其紛爭事件，提交國際裁判所或理事國，或聯盟總會裁決之。」（第十二條）二，「對於一定的爭議事件，以提交國際裁判所爲原則，（第十三條）惟遇有不能交付裁判時，則其一切紛糾，必須付託理事會，或總會，爲之調解。」（第十五條）三，「凡違背上列規定，而訴之戰爭者，各國得用經濟封鎖制裁之。」（第十六條）

這樣，非戰公約與國聯盟約，都是以確保和平爲根本目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前者規定「放棄戰爭」，

後者約定「保障安全」，而都以和平方法，作解決糾紛的惟一手段。所謂「放棄戰爭」，其實即是「保障安全」的一

面，而非戰公約中所規定的「放棄戰爭」即「放棄國家的政策手段之戰爭」，乃是指國家因積極地圖謀增進本國利益，與伸張本國勢力因而引起的戰爭，至於因受他國侵略或攻擊，爲自衛起見而發動的，却不在此限；換句話說，就是規定締約國，應放棄侵略的戰爭，也就是規定締約國不許侵略他國，應該尊重他國的領土和獨立。這種規定，與「保障安全」四字，似二而實一，所以結果，非戰公約與國聯盟約，對於確保和平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這樣看來，史汀遜主義的根本精神，益發明白了。現在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他這箇主義是以促進遵守非戰公約與國聯盟約爲根本目的，而主張勵行紛爭的和平解決方法。

四。
其次，再看一看世界的大勢。假如這主義的根本精神，是合乎世界大勢的，那麼牠的將來，自然會得保有永續的生命，和不斷的維持與發展性。

世界自歐洲大戰以後，她的形勢，已一變而爲以保障和平爲最大的課題，與惟一的目的了。戰爭的慘痛和弊害

，各國由歐戰一役，已得到極度的經驗了；她們知道，戰爭不惟要犧牲重大的人命與費用，並且知道，戰爭是毫無利處的，不但戰敗者這樣，就是戰勝者，亦是得不償失。這種例子，可以用戰後的英法兩國的經濟和財政上的困苦，來作證明。因為知道戰爭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戰後「防止戰爭」四個字，乃成爲全人類的最大呼籲，而自彼以來的全世界大勢，也悉被支配在這「和平」的基準之下而活動。

然則世界要怎樣纔能確保和平呢？這裏面有三箇根本要件：第一，要縮少軍備。軍備過大，不但增重國民的負擔，並且容易誘發戰爭。因爲具有優勢軍備的國家，是常常會想使用她的軍力，來壓服他人的。第二，要有安全的保障，即：一面既約定各國不互相攻擊，互相侵略，及互相戰爭，他面，又約定假如有一國被侵略或攻戰，則各國共起而援助之。第三，是爭議的和平解決方法，即：一旦發生爭議時，雙方應該用國際裁判，或調停，或其他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三件不但在防止戰爭，確保和平上，是

不可缺的要件，並且也是相互具有有機的連帶關係，要充份地縮少軍備，自然要有國家的安全保障，無保障則各國不能安心縮減，若保障確定，則各國自然不需要很大的軍備了。但保障雖有，戰爭雖已互約不爲，而國際間爭議的發生，是不能免的，要使這種爭議，不至惡化而成爲戰爭，又自然不可不講求並訂定和平的解決方法。解決既有方法，安全自然可保，安全既有保障，戰爭自然不需，戰爭既然不要，軍備自可縮減。這樣，縮少軍備，保障安全，與爭議的和平解決三者，實是防止戰爭與確保和平的三個根本要素，而又是互有着密切的有機關係。

（未完）

更正

本刊第五十四號所登俊臣先生之「跋」那賢明的青年」一文內有一句「中國素來雖也有勇敢之士」（十五頁下半第三行）係編者所修改。其原文是：「中國素來雖有勇敢之士頗多」。茲因俊臣先生以修改之詞句不達其意，特此補正。

編者

這一星期

蔣廷黻

暗殺與政治

暗殺不是政治，也不是黨爭，是殺人，卑鄙的殺人，野蠻的殺人。

那一黨，那一派拿暗殺的手段來打倒敵黨敵派僅暴露自己的弱點，僅宣告全世界：「我靠我的主義，我的政策，我的成績，我的組織，不能維持我的地位，所以我必須行暗殺」。

那一黨，那一派拿暗殺來維持黨內的團體和綱紀也僅暴露自己的弱點，僅宣告全世界：「我除暗殺之外，無法維持了」。

所以暗殺的黨派總不能得社會的信任，因為暗殺只能示弱示暴。弱而暴的黨還能站得住嗎？

暗殺流行的國家不是國家。個人在一國之內連生命都無國法的保障，那還要國家幹嗎？國家本身不信國法，不用國法，那還成國家嗎？

暗殺之風不可長，因為暗殺與文明政治是勢不兩立的。

派遣留學生

教育部近又命令清華繼續派遣留學生。留學生之須繼續派遣，這是毫無疑問，用不着辯論的。

同時全國須要兩三個比較完善的大學，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靠外國的大學來替我們造人才不是個經常的辦法。且是很不經濟的。教育部要清華在三年之內每年公開考試，錄取二十五名；三年共計七十五名。每一名每年學費須一千二百元美金，三年須三千六百元；來往路費須千元；共計每一名須四千六百元美金，七十五名共須三十四萬五千元美金，合國幣一百二十萬元。這是最低限度的預算。拿這個一百二十萬來聘德國專門學者，每人每年薪金以一萬二千元計算，我們能聘到十位專家在清華服務十年。我指出德國，因為希特勒現正排斥猶太人，許多猶太學者在德國的大學裡不是被迫辭職，就是自動辭職。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國的大學有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平時西方頭等學者不願意到中國來長期講學，其主要原因是他們想到中國來等於知識的充軍。現在希特勒的政策就是要放逐所

有的猶太學者。我們何不利用機會來發展清華？

這七十五名的留學生恐怕於國事不能有大補。當作爲青年找出路看，也不過是杯水車薪。

所以找覺得教育部這一道命令爲國家，爲青年的打算實不足以濟事，爲阻礙清華的發展則有餘。

北平的前途及古物的保存

六月二十一日，北平故宮博物院的事務長江瀚氏向新聞界發表了書面談

話。他所報告的有三件事情：第一是故宮暫時局部的開放辦法；第二是南遷古物的現狀；第三是這些古物的將來處置。關於最後一點，他說過：「俟時局大定，並須請求根據原案，陸續遷回，恢復原狀。社會人士，或當一致贊同也」。

提及古物的遷回問題，社會人士就要問：究竟北平有無保存的必要？所以在未討論古物以前，我們應該討論北平的前途。

有許多人現在討厭北平，以爲北平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障礙物。他們說，上次塘沽停戰協定竟得着了少數士大夫的贊同，其故不外乎士大夫愛惜北平。倘若我們下了決心要犧牲北平，那末就無人贊成停戰協定了。因此反對停戰協定者就反對北平的愛惜，就以爲北平不足愛惜，不應愛

惜；愛惜北平者是妥協份子，屈服份子，貪圖苟安者，民族的罪人。還有些人以爲北平是腐化中心，暮氣太重，足以予我們精神文化不好的影響。他們說，北平生活太舒服了，在此地居住的人決不能奮發有爲。本來遷都給了北平莫大的打擊；日人的侵略和古物的南遷，停戰協定所引起的反感，及一般人對北平空氣的不滿意幾乎不待日人來滅北平就自動的把她消滅了。

我是個愛惜北平者。我覺得北平事事可愛，處處可愛；宮殿廟宇圖書館諸大建築固可愛，小胡同，破市場亦可愛。我還記得我初次觀北平的印像。我當時對我自己說：現在我才知道我們民族的偉大，爲什麼我們的文化是東亞文化的正宗；這樣的京都配作一個大帝國的京都；我們的祖宗能有這麼偉大的建設，那我們及我們的子孫也能够。北平是我民族的至寶偉業，同時也是我民族的希望和鼓勵。北平以外，我們當然還有別的舊都，如西安，洛陽，開封，舊南京。我觀了這些地方以後，我總是想我們是敗家子弟，覺得民族是絕望的。看看北平，我還覺得有希望，有掙扎的可能。老實說，中國現在所有的城市那一個配作我們民族潛勢力的代表？是上海，天津，漢口麼？到這些地方去的人那一個不是贊嘆外人創作力的大而可憐中

國人的無用？我們若要給世界的人一個證據，證明我們不是劣種，是個偉大的民族，還有什麼證據比北平更好呢？

我最痛快的經驗是陪着一個外國人去觀北平。我用不着說話，我只須陪他看看三殿，遊一次北海，進一次孔廟和國子監，登一次景山；他就不想中國人都是些不識字的，拉洋車的，洗衣服的，作買辦的，販賣西洋貨物和文化。他無形之中對中國人的尊敬也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和對民族的信心也就無形之中提高了。

倘若北平是我民族復興的障礙，那末毀了她也就算了。不過上次的停戰協定何嘗是因爲愛惜北平而成立的？並且毀一個北平我們就能轉敗爲勝或引起外援麼？倘若停戰協定不成立而北平就整個的白白的送給日人又有什麼好處呢？至於北平的腐化恐怕不在新都之上。中國人要腐化什麼地方都可以腐化；不要腐化什麼地方都可以不腐化；與北平何關？

民族復興要個新的地域中心，所以我們不能不建設新都。這個看法是我們贊成的。但是舊都不是新都的障礙。在未建設新都之前，何必毀舊都？不但都城如此，一切事業都是如此的。「先破壞，後建設」是革命黨的口頭禪。

這個口頭禪，如同其他的口頭禪，只有一部份是對的。實行的時候還須斟酌。我們要記得有許多事情沒有舊的就不能建設新的。真的進步是超舊的之上而有所發明。最澈底的革命家如列寧也不主張人類應先回到古石器時代然後能建設共產的社會。

北平現在竟變爲邊疆的守禦者。她的地位比以前更加要緊。以後我們應該更加努力於北平的維持。文化事業的推進是維持的方法之一。一切建築的修理和市政的改良也是維持的好方法。最要緊的，莫過於故宮博物院的恢復。因爲北平各種事業之中，最有世界價值的莫過於故宮博物院。

同時我也承認故宮裏面的東西不是北平一個地方的財產，是全民族的公有物。這些東西的分配應該顧到全民族的利益。好在故宮的物品重複的不少；有許多也只有金錢的價值，沒有文化的價值。我現在提出一個合理化的辦法：

一。政府應於北平，南京，廣州三處各辦一個國立博物院。

二。故宮物品重複者，應於三院各置一件。分派的時候，北平應有優先權，南京次之，廣州又次之。

三。物品無重複者，應概歸北平保存，但運輸如不致有損害，可輪流在三處展覽，並且此類無重複的物品，倘若北平其他文化機關已收藏了，應劃歸南京或廣州。

四。只有金錢價值，無文化價值的物品一概出賣。其進款可作為建築或修理博物院之用。

五。政府組織一個全國博物院委員會，來執行這個合

理化的計畫，內教育文化界佔多數，工商界佔少數，而黨國軍三方面的要人一個也不加入。

最後我要說一句話：如我們要全世界知道北平與中華民族關係的重要，最好的法子是我們自己首先相信北平的重要而愛惜之。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農林教育？

布 口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農林教育？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幾個小小的主張：

一，我們現在不要再添設四年學程的農林學院。

二，我們要添辦農林研究所，一方面招收受過極好的基本科學訓練的大學畢業生，造成真能解決中國農林事業上各問題的人才，一方面實地的去研究試驗，來解決中國農林事業上的各問題。

三，我們要培植農林推廣人才將農林研究所所得的結果普散到民間去。

我對於第一個主張有兩個重大的理由：第一我們現在

有四年大學的教材。這句話也許說得過火。有許多學農林的先生們要罵我是門外漢，信口胡說。假使我們把自從民初到現在農林學校所用的課本來審查一審查，我可以大膽的說最初是直譯的日本式講義，民七八時留美學生回來漸漸的多了，一例改用道地原版美國教科書。在下就是這道地原版美國教科書中的出產品。近來留學法國學農林的也回來教書了。他們又變一套把戲。他們究竟變什麼把戲，作者不深知，不敢亂說。再說農場的設備吧，也不問有用無用，只要有錢，教書的就把從留學時代所看到的一套照樣搬過來。前幾個月我帶了幾個學生去平西某大學的農場參觀。看見一個一丈多高的圓筒式的東西，上邊還有尖頂

。他們覺得很奇怪，就問我那是什麼東西？我告訴他們這叫沙羅（Silo），是收藏牲口食料的。美國人喂牲口是用玉蜀黍的莖葉。長成時割下切碎收藏在這裏邊。他們狼懷疑的說，我們喂牲口不是用穀草麼？要這個幹麼？我只好回答他們說：他們養的是美國牛，也許是要用美國法子來喂吧？

試問這種農業教育有什麼用。就拿我自己說，讀了四年道地原版美國教科書並沒有把我造成一個農林人才。說起來狠自愧，畢業後除了美國農林還知道一點，中國農林簡直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更談不到怎麼樣去建設改良中國農林。

第二個理由是在這樣的農林學校畢業出來的人沒有出路。我現在想起全我在一起讀原版課本的朋友們的職業，實在教我好笑。有的做過實業廳長，有的做過什麼部的司長，農林局長，還有什麼學院的院長，大學教書匠，中學校校長，中學教書匠，駐外領事，圖書館館員，商品檢驗局的技士，英美烟公司的經理，五光十色等等不一，而真正在農林業上做點建設工作的只有一位，現在綏遠開墾。就拿我個人說，靠了幾本原版教科書居然混到一個官費鍍金的機會，在美國繼續的讀了二年農林。後來想想如此

繼續的下去，回國後除去拿幾本最新版本的美國課本來和用舊版本的朋友們搶冷板凳坐，睜着眼去誤人子弟，或者把頭頂尖去做個「專門」（鑽門）人才外實無事可做。所以轉到純粹科學方面去。走這條路的不只我一個。現在北平某非農事調查所的所長，北大清華師大生物系的主任，已前全會學過農林的。現在北平各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大半是由農林轉來的。即如胡適大博士一到美國也是在康奈耳大學學農。胡大博士究竟眼光遠大，一看不對，馬上改行，現在果然做到了新文化運動上羣英的領袖。過去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如不改變方針恐怕將來永遠如此。讀者如不信可將中央大學北平大學和金陵大學農林學院畢業生的職業調查一調查，就知道我不是胡說，就知道要添設四年的農林學院是一件勞而無功的事情。

我為什麼主張要辦農林研究所？我的理由狠簡單。現在我們談起中國農林大學來，多數人是不是否認金陵大學辦得最好。照我看起來金陵的好並不在他四年大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是在他們研究結果的中美棉混交的「百萬棉」和改良的蠶種。每年所造出來的改良蠶子供不應求，蠶戶覺得合算，花大價錢爭先購買。

中國農業是有幾千年的歷史。其中方式有的是狠合于

科學的，有的是亟于應當改良的。就拿肥料說，在美國教科書中常說到土壤頹廢，但是中國農人保持土壤肥度到幾千年沒有發生這問題，因為用的是最適當的肥料。中國農田也有肥瘠，但這不是肥料問題，實在是一個經濟問題。若在貧農手中沒有資本購買充份肥料，所以變成瘠土。若此種瘠田轉到富農手上多加肥料，幾年後就變成沃壤。所以我主張辦農林研究所，一方面調查農林業上各種問題，何者應當保存，何者應當改良。關於應當改良的起始研究試驗，求一最經濟最合宜于中國農村情形的一種改善方法。一方面招收研究生，半工半讀，給以三方面之訓練：第一要他們明瞭當地農林業的情形，第二給以原理上之訓練使之能明瞭何者應當保存何者應當改良，第三給與技術上之訓練如何能解決此等問題。三年卒業後再給以二年之實地工作，作為實習。

入學資格應當定得嚴，須有極良好的農林學的基本科學知識，如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氣象學，經濟學等。招生應抱寬缺無濫之態度，名額不可過多，多則導師顧照不了，全時恐怕也沒有大量需要。我們在煮飯前應當點一點人數，不要煮出一大鍋香噴的飯，只吃一碗，其餘的讓他發霉。

研究所研究之區域不能太廣，至多不得出一省之範圍。現在我們固然不能在每省辦一個農林研究所。經濟人才全有限制。現在可以先選幾個中心地點辦起來，後來再慢慢向外推廣。區域所以不能太廣，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各處氣候，土地，風俗人情，農村經濟等種種狀況都不相同。所以各處有各處的特殊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的特殊方法。在河北省研究得的結果不一定能拿到陝西去應用。外國——無論是美國，法國，日本或任何外國——的農林教材不能造就中國實用的農林人才，就是這個道理。

農林研究所研究的結果不是寫幾篇報告，出幾本小冊子就算完事；我們還應當把他散佈到鄉村讓農民利用這種結果。推廣的方法在美國是寫成簡單的小冊子送給農民。在中國這法子可不行。一層因為中國農民狠守舊，不會來相信你這小冊子上所說的去改了他們幾千年來傳統的方法。並且農民不識字的多，看不懂你的小冊子。在中國要做給他們看。他們如果看出你的新法子比他的舊法子好，他們立時會改的。所以我第三個主張是培植推廣人員。這種人可以到鄉村去，把改良的新法實地演習給農民看。

這種下層工作的人的選擇是最難。第一個條件是能過農民一樣的生活。農民的生活江浙比較的好，可是在北方

就狠苦。現在當局諸公，或者想北方農人吃的是麥粉洋麵，所以大買其美麥。事實上北方農民吃得起麥麵的一百個當中難找到一兩個。在冀魯兩省農民所吃的是小米和棒子麵；窮一點的連棒子麵都吃不起，小米內還要加上一點糠。前十五年我在山東一個農村內住了一個夏天，到廁所內看見農民所排泄的糞，因為和糠的緣故，渣滓太多，全不能粘合在一處。這個印象我一身總忘不了。所以我們要選吃得苦的青年。不必一定要學琵琶記上蔡伯喈太太一樣的去吃糠，至少可以能吃小米粥和棒子麵。這樣纔可以得到農民的全情，你說的話他們纔能聽得進，不然他們以為你是洋學堂派出來鬧鬼的。

關於技術上不必教他們高深的學理，只要他們能夠將改良的新法按部就班的演習出來，全時可以源源本本告訴農民如何照樣的做。

最終我要切實申明原則上我並不反對辦四年的農林大學。不過因為能真真認識中國農林情形的人太少，所以沒有教材。教的人不得不拿外國貨來充數。學生學了外國農

林業不能應用，因之沒有出路。全時我們已經有不少的農林學院。即以河北省而論，北平有國立北平大學的農學院，保定有河北省立農學院。所以我主張現時不必添辦農林學院，把這筆經費省下來辦有實用的農林研究所。

讀者看完一定要問我，你說現在辦的農林學院要找教中國農林的都找不着，難道中國反有農林研究所的研究導師麼？研究所到反有人能辦理麼？這句話似乎有理，實在是只看見一面。在中國國內够得做導師的資格的人確沒有，不過能在農林上做研究的，雖然不很多，也有幾位。我們要辦不妨請一二位富有經驗的外國專家來做導師，在國內物色幾位能做研究的來做副手。過了幾年後，副手能做導師，學生能做副手。我們從這幾個中心向外省發展時，就不必再請客卿了。北平地質調查所就是這樣辦的。農林研究所不妨也照樣試一試。不過我們請外國專家，一定要省慎，否則像前清京師大學堂請上許多洋飯桶，那可更糟，還不如請中國飯桶，至少可算是提倡「國貨」。

答覆青年朋友的幾段通信

詠 寬

——學什麼？做什麼？享什麼？——

近來偶接幾位素未謀面的學生朋友來信，其中有幾點也許可以代表多數青年的思想的，既承下問，只得直抒所見，貢獻一得。

其一：有一封來信內有這麼一段：『我想學政治經濟。在這點先生一定感覺失望，但我對於自然科學簡直就不來，所以我不得不向社會科學方面求我的出路』。其實，你學政治經濟我何必一定失望，你學自然科學我又何必一定高興呢。我自己是做自然科學工作的，但我向來不想也不說自然科學之外沒有更重要的工作。誠然，有若干人自己做什麼便說什麼可以救國，此外皆是要不得的。但這正像香烟牌子取名『馬占山』的一樣，當然是不必過于認真的。我更不相信學政治經濟有什麼可以慚愧的地方。假使從國家社會直接關係上講，只可以說政治經濟的影響也許比自然科學還要大些，中國自然科學人才固然不多，但是在政治學經濟學真正有貢獻有成績的人也正是太少。你莫想政治經濟容易學，容易騙人，其實學自然科學毫無

所得而說空話出風頭也正多著哩。自欺欺人是一種罪惡，你學政治經濟尤其不可先存此心。

但是，一個青年中學畢業之後，擇業或選定學科的確是極困難問題。問人則導師難得，自決又知識不夠，真不容易。據我愚見，姑且可看三個標準：（一）要看是不是有實在工作可做。你要打聽清楚那一行那一業是需要什麼工作，現在有誰做得成功，他還需要什麼幫助或還缺少什麼。（二）要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學成。有好的教師否，學了之後能做否。（三）不要單就時髦的學科的學，不必一定跟著社會上風尚走。

學問要有實在根柢，事業要有真實工作。國家的興盛及人羣的進步都靠著許多人知識及能力上的努力及進益。只有中國科舉時代學問（其實何嘗配叫學問）是有風氣的。一忽兒做八股，一忽兒做策論了。有時崇尚駢麗，又忽而提倡散文。因為反正都是空文，所以不妨隨時顛倒。幾位名流一時高興，許多學生拚命追隨。真正的工作是不必管那一套的。只要有實在的工夫，有真正的貢獻，並且

做出切實的工作，無論什麼學科都是好的。我們在我們的學科或職業上努力去做，決沒有對人不起的地方。

其二：有一位大學新畢業的朋友寫信對我說：「想不到國家培養我們了這許多年，畢業後却不要我們了。……學校生活是文明的，社會是野蠻的。由光明的學校生活投入黑暗的社會裏。」青年就業的困難，失業的煩悶，確是深可同情的。我想自謀救濟的方法只有尋求實在的工作與節制生活的欲望二條路。其實，就業的困難不但中國，外國青年畢業生也是往往有的。一方面人要找事業去做，一方面事業也要等人去創造與維持。似乎有太多的人只想做現成事吃現成飯，現成的地位當然有限，所以取得更不易了。有志的青年應該努力在現成事業之外自己去找出途徑來。這不是說汪麻子之外另開王麻子店，與人家做無謂的競爭。這是說我們應該看現成事業中有什麼缺點有什麼需要，便努力去彌補他與貢獻於他。我們先想我們如何能有益於人家，然後纔可望人家如何來幫助我們。一個人只要真正能夠有益於人的，大概終不至沒有得用的時候。

中國有許多封建時代的舊觀念，真正要不得的。什麼「衣錦還鄉」哪，什麼「同學少年多不賤」哪，什麼「得

意」哪，「得志」哪，這都是極卑鄙的思想。做一個無事可做徒糜公帑的大督辦或大委員是很可恥的。做一個有實在工作可做能做而盡心去做的小職員，却是有益於國無愧於心的好事。中國從古以來是一個窮國，無論從資源上看或是從經濟上看，中國都是窮國。救窮的方法只有勤與儉。所以中國向來提倡儉德。我們如果得到自己能夠盡力的工作，便應該安心工作，並不必因名義不高薪水不豐而自加鄙視，也不可因此而鄙視他人。

至於社會與學校也決沒有完全相反的對象。坐出水馬桶不一定便文明，穿舊式茅廁不一定是野蠻。穿洋服的不一定是文明，穿青布短褂的不一定是野蠻。如果學生有此感想，便是他的大錯。社會情形複雜却是有的，有黑暗也有光明，有壞人也有好人。一個新入世的青年，只要秉著良心直道而行，是斷不會吃虧的，我可以我的二十餘年做人的經驗，替你担保。你如果過認社會是黑暗的，也想學乖取巧，却保不定要弄巧成拙，石頭倒下來壓自己的腳背。我們說老實話：好人不幸失敗，壞人僥倖成功，的確是偶而有的。但是萬不能因此便說好人一定失敗，壞人一定成功。如果真有社會統計，我深信大多數自然淘汰還極有公道。

其三：還有一位來信已久了，沒有工夫早覆。他說：

「我現在離校已三年了。在這三年中我曾不連續的到過江蘇，到過湖南，到過熱河，但都不久的仍回北平了。……

」可見他是頗有經驗的。但他的經驗似乎叫他傷心了，所以他又說：「第一，人人是有自私心的……第二，地球上一切都是變的，所以求存也是不須要的。……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是錯的。……我的人生觀是得享樂時且享樂，到願意時便死去。（原信用不通的英文，譯意如此）……先生，我的人生觀對不對，地上有絕對的真理麼。」人心自私，誰說不是呢？但也有許多自私的方法。享樂當然是人得要的，但也有種種不同的享樂法。只看人的程度罷了

煩悶與大學教育

叔永

——在南開大學第十一次畢業式演說詞——

我常常聽見說，一個學年終了的時候，是學生們感覺

煩悶的時候。煩悶的原因不只一個。大約說來，有屬於季節的，如春天到了，有所謂春病（Spring fever）。有

關於學業的，如年終大考到了，有考試的麻煩。有關於出身的，如學校畢業以後升學或謀事的困難。有關於時局的

。好名的學生以連夜讀書考得一百分為享樂，好賭的學生以不上課不應考躲在公廨裏連日連夜打麻將為享樂。也正有人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享樂。人的程度愈低，他的享樂的目的愈淺近。人的程度愈高，他的享樂目的愈遠大。君子小人之分便在此，人類與獸類之分亦在此。

說到真理的有無也許可以談到玄學裡去。但且看看事實罷。太陽是東邊起來西邊裡下去的，你想你明天起來會看見他從西邊來向東邊去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想你種下麥子明年會長成老鴉飛起來麼？你只要養成你的知識去認識事實，事實是不會欺騙人的。真理是這樣的顯明，不怕你不相信，只怕你沒有法子懷疑。

，如五月間紀念的日子特別的多，可以看出這個時期在我們的心中是怎樣的難過！那末，煩悶是和大學教育分不開的嗎？大學教育可以有解決煩悶的可能嗎？照上面的說來，煩悶的原因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時季的，如所謂春病考試等是。一類是非時季的，如關於職業及時局等等是。在學校以內，未畢業的時候，感到時季的煩悶多些，既畢業

的時候，感到非時季的煩悶多些。所以大概說來，解決第一類的煩悶，是學校以內的事體，而解決第二類的煩悶，却是學校以外的責任——那便是說，每人都負有責任，連感覺煩悶的本人也包括在內。

解決煩悶有甚麼方法，這大約今天到會的人所急要知道的。我不敢說自己有甚麼巧妙的方法可以解決煩悶，但我可以單簡地把我個人對於煩悶的見解說出來請大家指教。

我以為煩悶是生物生長過程中必不能免的一個現象。一顆樹木，春夏發榮滋長，秋冬葉落枝枯，這秋冬的生氣悶藏，就是樹木的煩悶時期。不過樹木的生長，却不因其葉落枝枯而有間斷。我們若把一顆大樹的切斷面拿來看，可以看出牠的一年一年的生長輪。在牠的生長期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某年因天氣的特變，牠的生長受了防礙，這也可以說是牠生命中的煩悶。但只要生長力充足的話，牠一定還可以繼續生長，絕不因爲一點煩悶損傷了牠的未來的遠大。因爲樹木不會說話，我們不會聽見牠們發出甚麼嘆息，鬧些甚麼解除壓迫的運動，可是我們相信生理的原則是一樣的。人與國家同是有機體的生物，在他的生長過程中，必定有一些煩悶的時期，這些，寧可說是當然的現象

。不過人與國家與其他的動植物不同的所在，就是動植物的煩悶，完全聽命於天然，而人與國家的煩悶，却有幾分是由自己的力量造成的。因此，解決煩悶的方法，也有幾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這可以說是人與國家超出一切動植物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人與國家不幸的地方。

拿這個眼光來看當前的國難，我們似乎用不着甚麼特別的驚惶。因爲我們只要檢查一下六百年來的歷史，便曉得我們受過比眼前所受還要厲害的外患，已經不只一次了。至於中國歷史的局面，可以拿孟子的兩句話來包括，說：「天下之牛久矣，一治一亂」。最近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李四光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戰國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子民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在這篇文章中，他得到了一些很有趣味的事實與結論。他的方法，是把歷史的年代作橫軸，歷史上每五年內戰的次數作立軸，把兩軸中所得的各點連結成各種曲線。結果他找出每隔八九百年，歷史上便有一個治亂的循環。例如，由秦至隋共八百二十年爲第一個循環，由隋至明初共七百八十年爲第二個循環，由明至現今共約六百年爲正在進行的第三個循環。在這三個循環之中，凡內戰最少的時期，便是隆盛時期，如西

漢、初唐，北宋，明清的初年是。反之，內戰最多的時期，便是衰敗的時期，如漢以後的東晉六朝，唐以後的五代，宋以後的元和明清末直到現在是。我們若承認這個歷史的循環實際的存在，並且還在進行，那末，我們可以看出眼前的歷史，正在衰敗的時期中；太平天國時代和近二三十年來繼續不斷的內亂，便是造成這個衰敗的大原因。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眼前的歷史和宋明兩朝的末年，有一個不同的所在，那便是現今世界大通，各種造成歷史的新勢力，在三百年以前或六百年以前所沒有的，現在都在那裏很有力的活動。我們處于這個時代，應當是一則以懼，一則以喜。懼的是『屛漏偏遭連夜雨』，我們正在自顧不暇的時候，偏遭了無垠的隣人來和我們大搗其亂。喜的是眼前有不少新勢力的發見，即使治亂的循環果然存在，我們此刻也有打破的可能。而這些新勢力之一，就是現在的大學教育。

這一句看似重要說來仍甚平凡的話，我曉得諸位聽了必定不免失望，說區區大學教育，那裏能影響我們目前嚴重的時局或改變歷史的方向。我想這個看法，不免有自暴自棄的嫌疑。我們不見最近國聯教育調查團的報告，不是把近年中國的一切新局面都歸功於我們的大學教育嗎？（

The Universities have Made What China is to-day) 自然，這句話應當加以相當的修正，纔能合乎實際。譬如說吧，我們的大學教育，並不含有軍事教育在內。如其現在的軍人都受有大學教育，我敢說，中國的局面大約不是目前的樣子！

大學教育何以能有打破歷史循環的力量？我們曾經說過，凡所有的煩悶，都是生長史中的一個過程，那末，只要求能够培養生長的力量，煩悶便可不解而自解。換一句話說，煩悶只好如樹木之於冬天，用生活的力量來把牠長過，不能用他種方法來把牠避免。要培養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個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學教育還有牠的目的與意義的話，培養社會上健全與有用的分子，就是牠的最高的目的與意義。你在大學畢業之後，可以做一個醫生，一個律師，一個工程師，但你是不是是一個社會的健全分子，還得待考。我曾經認識一個外國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回國之後，便在北京（從前的）城南最熱鬧的地方僑居居住。我問他何以如是，他回答說，因為於應酬上便利些。這樣的心理是不是健全分子應該有的，希望大家評判一下。我又曉得一個留學生，在外國之時頗有一些電學上的發明，的確是一個有希望的人才。可是回國之後，稍稍任了一點有財錢

關係的職務，他便捲款而逃。這個人固然從此毀了，社會事業也不消說受了很大的損失。這可以證明一個人的性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學問，於社會也不見得有甚麼益處。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我們現在教育的口號，應該是：先人格而後技能。第二，各個分子要能對於一個目的而合作。一個生物的發展，健全分子固然重要，各分子間的合作尤為重要。設如一個人的身體，手不司動，脚不司步，胃不司消化，血脈不司營養，那末這些機官儘管良好，這個人的身體必定不能一天活着。人們與社會的關係也是一樣。我們常常聽見人說，我們的東鄰日本人，就個人說來，似乎都趕不上中國人的聰明伶俐，可是就團體說來，他們處處都比我們強得多了。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分子能合作而我們的分子不能合作的原故。這大約也就是我們偌大的中國要受我們小小的鄰人欺凌的一個最大原因吧！設如幾年的大學教育，不能養成一個合羣，克己，向一個較大的目的而通力合作的習慣，我們可以說他的大學教育是一個完全的失敗！

我們上面曾經說過，人與國家的煩悶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因此，解決煩悶的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我們希望社會上健全分子的增加，

即是造成煩悶力量的減少。同時這些健全分子能够通力合作，向着完成一個較大的較高的組織進行，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進。有了強大的生活力量，我們還怕有甚麼煩悶不能解除！

在此，我還要就便向今年畢業的同學說幾句話。大凡一個生物的生長是要繼續的。不長則死，不能中立。這句話在身體方面是真的，在智識方面也是真的。諸位在校幾年，智識能力一天比一天不同，一年比一年長進，這是諸位的先生都知道的，也是諸位自己知道的。離開學校以後，諸位的身體當然還是一天一天的生長，這是無可致疑的。但諸位智識人格方面的生長如何，便大有問題了。職業的忙碌，（如其你得到職業的話），娛樂的引誘與社會一般風氣的趨向，都可以使你漸漸離開學問的空氣而趨向於平常庸俗的道路去。換一句話說，就是你的智識有停止生長的可能。這在普通的人倒也罷了，若是大學畢業的朋友，而讓你的智識生命半途夭折，那就等於宣告你的平生事業停止上進。這不是一件最嚴重而值得我們的注意的事嗎？要免去這個危險，我奉勸諸位畢業同學，不要因為離開了學校而離開你的兩個朋友：一個是你心愛的書籍，一個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須知道書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會上

得到實際的証驗，方纔覺得明瞭親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廳中比在課堂中更能幫助你。最要緊的是怎樣利用你的閒暇時間。西方哲人說：「一個人的成功失敗，不在怎樣的利用他的正經時間，而在怎樣的利用他的閒暇時間。」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們常常放在心上。

史汀遜主義與世界大勢（續）

橫田喜三郎著

永修譯

總結起來，我要再引一句古人的成語，說，「譬如行遠必自邇」，我們要救人必先自救。我現在很恭敬的祝畢業諸君今後事業智識繼續的長進，那也就是解除我們國家煩悶的一個方法。

（本文前半已見本刊第五十六號 編者記）

五

大戰後的世界，把上述情形看到了，所以十數年來，孜孜屹屹，為確保和平故，在向着上述三大要件盡非常的力量，以求牠的實現和確立。每遇機會，必定千方百計，以達到這目的為依歸。這種努力，實是十年如一日的，現在且簡單地，把她們的努力過程略述一下：

第一個出發點，乃是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最大目的，自然不用說是為保障和平的。為達到這個目的故，我們看見牠的規約，在第八條，規定軍備應以保護本國安全為極限而縮減，在第十條，規定安全保障，在第十二條以下，規定關於爭議的和平解決方法。這些都是上面已經說過

的，因此可知聯盟對於保障和平的三大要件，不但已經明白認識，而且是以此為聯盟的基本原則，與根本主義了。

第二是一九二〇年，常設國際司法裁判所的設立。對於爭議，既需用和平解決，而和平解決，又不可不有國際公斷的制度，執行這種制度，自然不能不設立一個國際裁判機關，所以國際聯盟成立後，開手第一件事，便是設立國際裁判所。這種國際法廷的設立，本是數十年來的懸案，屢經試驗，而屢屢失敗的，到這一次，纔儼然成功了。這便是現在所謂的「常設國際司法裁判所」。關於這裁判所，還有一個應該注意的地方，即對於一定的爭議，該裁判所的管轄權，乃屬義務的；就是說：關於某種紛爭事件

，關係國一定要委託該裁判所裁判。這種義務，在始本是一種任意條項，僅限於任意受諾的國家，並非所有加入裁判所國家，都應當擔負，不過，現在受諾這義務的國家，已次第加增，而達到幾乎全世界的四十餘國之多了。

第三，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這是英，美，法，日，意，五大海軍國間，締結縮減主力艦及航空母艦條約的海軍軍縮會議，實在是有史以來最初的軍備縮減條約，亦是由大戰後和平的輿論趨向促成的。

第四，是一九二四年的日內瓦議定書。這是由促進軍備縮減的動機，而締結關於安全保障，及爭議的和平解決方法的澈底的訂定。但因爲過於澈底了，以致關係各國，一時都未敢批准，結果遂不見成立。不過，由此亦可想見戰後各國，如何在熱望和平的確保，以及如何在盡心竭力，以期完成這保障和平的三大要件了。

第五，是一九二五年的諾加娜條約。這條約是英，法，德，意，比，五國間互訂的，即德法及德比間，互約保障安全，而以英意兩國作保證人。約定德法比三國，不互相攻戰，或侵略，無論何事，決不訴之戰爭，假如一方違背這條約時，則英意兩國，聯合以援助其他方。這條約並約定關於爭議的和平解決法：對於一定事件的爭議，決

定交付國際裁判，其餘則決定委託聯盟理事會，或調停委員會替她議處。自從這條約成立後，多年挾阿爾薩斯羅蘭問題，爭戰不斷的德法兩國的和平，纔算得了一個保障，所以當時有大戰的真講和，乃在諾加娜條約成立以後的批評。

第六，是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這公約在前面已經說過，牠是以保障安全——放棄戰爭——及紛爭的和平解決爲二大原則了。

第七，是同年關於國際爭議的共同議定書。這議定書規定某某一定的爭議，應該提交國際裁判，其餘應該委託調停，調停失敗時，仍要交付裁判。總之，一切國際間的爭議，都以國際裁判爲解決方法。這是一種對於紛爭的和平解決的最善條約。假如一切國家，都能遵守並實行這條約，那麼和平自然無問題了。

第八，是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制限條約。這是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之後，而締結的英美日三國間，關於限制補助艦——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艦——的協定。

第九，是同年的財政援助條約。規定凡有違背國聯盟約，或其他條約，而以戰爭侵犯他國的，則聯盟各國，合

力對被害國加以財政的援助。這亦是一種保障安全的協定。

第十，是一九三一年的防止戰爭條約。這條約雖不會成立為確定的條約，但他的規定是：遇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時，為防止起見，凡一國之以兵力侵入他國領土的，聯盟得派遣委員會蒞場，監視該國的撤兵，並阻止事態的擴大。這仍是一種安全保障。

以上是歐洲大戰後，世界各國，為確保和平而進行的比較重要的努力與結果，亦即是戰後各國，在如何熱望和平，與期求確立縮少軍備，保障安全，及爭議的和平解決法等三大要件的世界大勢。

六

於是，我們對於史汀遜主義的將來，可明瞭了。我們已知道史汀遜主義，是以維持和平為根本目的，而欲藉此以確立，並勵行安全的保障，與爭議的和平解決；現在又知道大戰後的世界大勢，亦是以維持和平為最大課題，她們認識了縮少軍備，保障安全，及爭議的和平解決法等，為和平的三大要件，而孜孜謀求牠的實現與確立，十數年來，在不斷地竭智盡力，繼續猛進。於是我們的結論明白了，即：史汀遜主義，是合乎世界大勢的，是乘着世界潮

流的，牠不是美國的恣意的政策所生，也不是聯盟的一時的決議的結果，牠是世界大勢的產物。所以，當然地，必然地，牠會繼續維持其生命，而愈益發展於將來！

不但這樣，史汀遜主義，還有一個長處，即這主義對於各國，並不課以甚大的負擔。例如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對於違約者，或科以兵力的制裁，或科以經濟的斷絕，這些都是負擔重大，而不容易實行的。聯盟條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封鎖，至今不能實現，就為這個緣故。反之，史汀遜主義，則只要不承認違約所生的結果。一方面，在各國既不要什麼負擔，他方面，在違約國既受着全世界的承認，自然會感到種種的不便，其結果，必至緩和牠的態度，而謀用某種妥協形式，以求打破難關。這樣一來，史汀遜主義，對於確保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的遵守方法，可謂勞少而功大了。這亦是這主義可以繼續維持的另一個理由。

又，史汀遜主義，不會有引起戰爭的危險，這一點是美國所特別重視的。去年五月五日，美國國務次官葛色氏，把這主義在國際正義協會總會上演說的時候，也特別申明了這點。若是照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規定，對違約者加以兵力的制裁，或科以經濟的封鎖，事勢推移，自然難免

有許多會發生戰爭的危險，惟史汀遜主義，僅僅是一箇不承認違約的結果，當然沒有什麼危險性。在這竭力避戰的世界大勢裏，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性的制裁方法，大家無力圖趨避，至於毫無危險，而又不須費力的方法，則各國何樂而不從。這又是史汀遜主義，可以能够維持久遠的又一箇理由。

綜上以觀，可知史汀遜主義的根本精神，的確是合乎世界大勢的，是乘着世界潮流的，是宜於實際的適用，而沒有負擔沒有危險性的……。這些客觀的條件，都齊備了。所以牠的發生，以及引用，決非偶然，而牠的成長，以及維持，亦決不是電光石火般，那樣一明即滅的。

七

最後再把史汀遜主義和滿洲問題的關係說一下。以上是關於史汀遜主義本身的考察，和牠在世界大勢的位置，及其將來的運命。但牠無疑地是以滿洲事變爲動機而發生成立的，所以當然現實地適用於滿洲問題，不過牠將來的結局如何，這是不可不一究的。

現在先把日本對於這主義的態度說一下：去年三月十一日聯盟總會，依着這主義作成議決案的時候，日本聲明：「日本政府，完全同意於該議決案所揭根本原則」。所

謂「該議決案的根本原則」內，明明顯示着史汀遜主義，而日本政府，既然「完全同意」，那麼日本，也就並不反對所謂「史汀遜主義」了。

不過，日本是反對把這主義適用在滿洲問題上的，她反對把她在滿洲的行動，作爲違背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而依史汀遜主義不承認其所生結果。日本的見解，以爲她的行動，並不違背條約，因之不受史汀遜主義的適用，但是不幸，她這種見解，並不爲世界任何國家所同情，所以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總會報告，有上述：「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政權，實與現存國際義務之根本原則不相容」的堅決的決定，並成立：「聯盟國不問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均應繼續不承認之」的勸告案，於是史汀遜主義，現實地被適用了。

然則這問題的結局怎樣呢？尤其關係特別重大的，是「滿洲國」的將來，假如長久是除日本外，全世界都拒絕承認，那却怎樣？一方面，在事實上儼然成立了一箇國家，而各國却老不肯承認，長是這樣堅持下去，能不發生種種困難嗎？但史汀遜主義已如上述，牠是比較不費事，不用負擔，而可以久持的。他面，被拒絕承認的滿洲國或日本，却要因此受重大的困難和不便了。所以早晚，總會設

法迫到走上國際協定的一條路。要走上這條路，自然日本不能不稍爲緩和她目前的非妥協態度，同時關於史汀遜主義的適用，屆時也自然可以變成；不是全然不承認違背非戰公約及國聯盟國所生的結果，而是不承認在「國際的協定」未成立以前的結果了。這樣一來，豈不霧雲頓開嗎？所以，只要有了國際的協定，那麼，史汀遜主義，是不至於膠執的。而國際間的問題的最終解決法，亦常是由雙方

的妥協——國際的協定——成立的。

滿洲問題，要達到這箇最終解決法——國際的協定——恐怕還需時日，也難免要經過若干的波瀾和變幻，史汀遜主義的適用，是會同牠連帶着經若干的變化的，不過這個當然不是史汀遜主義的本身問題，而是對於一特殊事件的適用問題。史汀遜主義本身，牠是乘着世界大勢，而盤根錯節於大地上，在發揚光大的。

從小孩說到大人

濤鳴

我的鄰居，多半是外國人。我們公共的大院子，天氣好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子在那裏玩。有的爬樹上去，有的爬牆上去，有的爬到屋頂上去。他們雖然有老媽看着，總是不十分聽話。我聽見某某的七歲姑娘，有一天從牆上跳下來，腿骨摔斷。以後雖然醫好，兩足長短就不齊了。我看見某某的八歲男孩子，從樹上摔下來，手腕骨摔壞了。以後送到醫院去，過了好幾星期纔回來。這個孩子，我知道他因爲爬牆爬樹，受過不曉得多少回重傷。但是他還是一樣的勇敢。外國小孩子，當然不是個個爬牆爬樹像這個小孩子。不過據我所見，他們是活潑的很。

我最大的孩子是女的，已經八歲了。她不但爬到牆

上去，就是爬樹枝上稍爲高一點，就得大人站在傍邊安慰她，說不要緊。有時外國的孩子們爬到很高的樹枝上，她在地下看着，很有羨慕他們地位的樣子，但是她總是不敢輕於嘗試。她是女孩子，比男孩子也許本來膽小一點。但是她 and 外國的女孩子，也是比不上了。

我相信我大女孩子那麼膽小，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管束太嚴的結果。她兩三歲的時候，我就起始管她。飯一定要她吃完，牛奶一定要她喝完，我書棹上的東西不許她動，牆壁不許她用鉛筆畫，院裏花木不許她折，地下土不許

她。她不聽話的時候，我就不惜打她。有時因為我自己心裏不高興，她稍為不聽話，我就把她打得一頓。她不怕母親而怕我，因為她實在被我管服了。照老家庭的眼光看來，我這個女孩子真真乖的很。可惜她創造的精神，受了我的挫折。現在膽量這麼小，將來長大以後，很難有英雄氣魄。我現在想起來當初管這女孩子的嚴厲，就非常懊悔了。

我的別個孩子，膽量比她大的多，因為我有了經驗之後，管他們並不嚴。所以我相信我大女孩子那麼膽小，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管束太嚴的結果。其實我們中國人管孩子的老法子，多半都是不對的。

我看外國人管孩子的法子，通我們大不相同。他們愛孩子，通我們一樣。他們怕孩子受傷，通我們一樣。但是他們對於沒有大危險的運動，並不禁止。就是有大危險的運動，他們也是好言好語，勸小孩子不要做，並且用極外交的手段，叫小孩子去做更有興趣而無危險的遊戲。總之外國人管小孩子的法子，不是專制式的禁止，而是共和式的開導。小孩子愛畫，就給他們一塊黑板。小孩子愛鑿土，就給他們一堆乾淨的沙。小孩愛搬動椅桌，就給他們好些小塊可以搭起架子的木頭。所以外國人家裏，專為小孩

預備一遊戲房間，裏頭有許多的設備，讓他們去盡量的自由動作。

小孩子本來是活潑的，總是要動手動腳。若使我們大人只下禁令，這事不准他們做，那事不准他們做，而沒有替他們開一運用能力的途徑，那麼他們創造的能力，沒有出路，久而久之，便漸漸減少了。大人的癖氣，大半是做小孩子的時候構成的。中國人的勇氣和創造精神，不及外國人至少可以說通管小孩的方法有一部份的關係。

有人說：我情願小孩子膽量小一點，我不要他摔壞。這種觀念，從個人方面着想，是好是壞，姑且不說。若是從團體方面着想，那是絕對不好的。小孩子作有危險的運動，雖然個個都有摔壞的可能，實際上不會個個摔壞。一百個人之中，也許有幾個人。從這幾個人方面着想，冒險運動算是失敗。但是從一百人全體着想，還是勝利。因為一百人之中，有九十幾個人，長大以後，是勇敢有為的。我們老法子管小孩的結果，一百小孩之中，沒有一個摔壞，但是也許沒有一個是勇敢有為的。

無論什麼事，總得做纔有成功的希望。不做決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只曉得哥倫布發現美洲。但是尋覓新大陸的人，不曉得淹死多少，纔有哥倫布一人成功。我們知道

飛機的便利。我們應該想起當初試驗飛機的人，不曉得摔死了多少。若使歐洲人也像我們這樣個個怕死，一定沒有人因為想渡大西洋淹死，沒有人從天空摔死，但是美洲一定也沒有發現，飛機也沒有成功。我們想起世界上重要的發明，有幾件是中國人的成績，我們就知道我們民族的缺點是在那裏了。

中國人民，現在所處的地位，在外國是絕對不可能的。軍閥的橫征暴斂，蹂躪人權，實在達於極點。但是人民

還是敢怒而不敢言，積極的奮鬥，更談不到了。這就是人民沒有勇氣的結果，就是專制式的禁令式的家庭教育的結果。歐美人民今日所享受的自由權，是他們祖宗奮鬥而來的。他們祖宗，因為奮鬥而死者，不曉有多少，纔有今日的結果。不肯奮鬥，不能有自由權。我們管小孩的老法子，幾千年來，養成了肯忍痛而不肯奮鬥的習慣，在專制君主時代，確有維持社會安寧的貢獻，不過當現在這世界，則大不相宜而非改良不可了。

本刊前數

期的要目

第五十一期

週年號

獨立評論週一週年

評論共產黨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

胡適

知識階級與政治

定縣農村中見到的半教會事業

丁文江

要在根本處注意

中國的病應該怎麼治

蔣廷黻

第五十五期

詠寬這一星期

五千萬美金的借款——政府與輿論！

好爾廳的基本工作

我對於停戰協定的感想

國難當中領袖人物應有的態度

組織的重要

衡哲

湖北教育現狀

區少幹

第五十二號

保全華北的重要

美國外交目前的困難

胡適

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

丁玲女士被捕

詠寬

漫遊散記（十九）金沙江

和與戰（西安通信之一）

沈從文

第五十六期

這一星期

亞洲的門羅主義

中國的出路

論復興農村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

史汀遜主義與世界大勢

叔永

附更正一則

橫田喜三郎著

吳景超

第五十四期

從反省中求出路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一）

那賢明的青年

跋「那賢明的青年」

教育與其他（西安通信之二）

吳景超

G.M.P. Cook

劉學濬譯

（英人）俊臣

旭生

這一星期

蘇俄出售中東路

國際經濟與中國

(一)貨幣安定與美法立場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吾國現行財政監督制度之運用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三)

蔣廷黻

守愚

君衡

淬廉

吳景超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青島	天津	平	上海	南京	蘇州	無錫	鎮江
東安市場	侯景華	民權書局	新華書局	華北書局	北平書局	天津書局	上海書局	南京書局	蘇州書局	無錫書局	鎮江書局
...

獨立評論

第五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九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計。

●本社啓事一

本刊編輯事務現由蔣廷黻先生負責担任，一切稿件請直寄北平清華大學蔣先生收。

這一星期

蔣廷黻

●本社啓事二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務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

蘇俄出售中東路

中東路在蘇俄手裏和在日本手裏都是在外人手裏，都不是在我們自己手裏。但

是蘇俄出售中東路等於蘇俄放棄在北滿一切的權利，等於日本併吞東北四省的完成和其大陸帝國的確立。無疑的，這一舉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打擊。無疑的，這一舉不能算是蘇俄對我們一種友誼的表示。提倡中俄復交的人因此又加增了一次的失望。何況中東路是中俄兩國共有共營的；根據條約，兩國都不能各自單獨處置的。現蘇俄置我們的抗議於不理，置我們的條約權利和政治希望於不顧，決然在東京交涉中東路的出售；這怎能算得友誼的表示？

雖然，爲蘇俄計，出售中東路未嘗不是一個辦法。這條路的建築當初費了俄國人民四萬萬的金盧布。現在這路的維持還須每年賠補。從經濟上看，這路是一種負擔。並且日本把東北交通統一以後，日本可以利用齊克路，齊昂

路，洮昂路使中東路的營業日就衰落。將來吉會路完成，吉藩路再向東北延長以後，這條中東路竟將成爲廢物。所以這路的經濟價值是繼續低減的。

在九一八以前，中俄的合辦已引起了無數的枝節和衝突，甚至兩國以兵戎相見。通常兩國合辦一條鐵路，就是感情甚洽，能够避免衝突，也是極不經濟，極無效率的。在張學良主持東北的時候，遇有中俄的衝突，蘇俄尙能以武力逼着我們屈服。現在日人當權，形勢就不同了。就是蘇俄竭力避免衝突，在這日人氣焰正高的當兒，衝突還是不能避免的。那末，在最近的將來，戰爭是絕不利於蘇俄的。目前蘇俄在遠東的軍備，雖甚積極，不足以敵日本。倘戰爭發生，蘇俄不但不能保中東路，連濱海省，阿穆爾省都不能保。換句話說，拜喀湖以東都將成爲日人的天下。爲蘇俄計，不如放棄中東路以保西比利亞的全東部。我

們不能說，蘇俄這種利害輕重的權衡是錯的。蘇俄的算盤並沒有打錯。無論那一國的外交企圖超過他的軍備程度沒有不出亂子，不吃大虧的。蘇俄現在在遠東的軍備節節前進而其外交則步步後退；這是個萬全之策。

蘇俄出售中東路，爲蘇俄目前計，雖然是對的，爲永久計，又怎樣？蘇俄有中東路的時候不能保遠東，放棄中東路以後，豈不是更不能保遠東？日本得了中東路以後，蘇俄在遠東的國防豈不更加困難麼？其實自洮昂路完成以後，中東路的軍事價值就沒有了。自日本軍隊過嫩江橋而達昂昂溪及齊齊哈爾以後，日本就可由四平街，過洮南，達昂昂溪，轉而西向，到海拉爾，滿洲里，直入俄國境，橫截西比利亞鐵路。這舉一成功，日本就能海陸封鎖蘇俄的遠東。蘇俄如要抵抗日本的話，應該在馬占山守嫩江橋的時候竭力援助馬占山。蘇俄既計未出此，等到日本已得到了哈爾濱和昂昂溪，機會已經過去了。

蘇俄雖出售中東路，他對於遠東仍可不必絕望。蘇俄覺得共產主義的前途全在乎他的計畫經濟的成敗。蘇俄的工業農業如能够按照計畫進展，他真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了。不但日俄關係的關鍵在此，就是蘇俄與一切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的關係的關鍵也在此。一個民富國強的蘇俄是共產

主義最好的宣傳，也是共產主義進攻的必須的條件。反過來看，在現今的世界大勢之下，如共產主義的國家轉入戰爭的旋渦，計畫的經濟就無從進行；如資本主義的國家之間發生大戰，資本主義就會崩潰。蘇俄出售中東路不但可爲共產主義保留充分的試驗和發展的機會，且可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衝突更加緊急化，尖銳化。這真是可謂一舉兩得。

蘇俄出售中東路並不奇異，所可奇異者是他還肯費工夫去與日本交涉，講價。蘇俄何不乾脆的把中東路送給日本？他的外交還是革命不徹底的外交。因爲日本所出的價必是很低，恐怕不過是建築費的十分之一。不但日本出價會很低，且償還的年期必甚久，而所還的必是貨物，不是錢。日本人買到中東路以後，還要向蘇俄索討被扣的車輛。我若是蘇俄的外交家，我就把中東路送給日本，祇要日本不問我要車輪。

想起當年俄國財政大臣威特經營遠東毅力和野心之大；想起俄國人民爲東三省及高麗所犧牲性命和財產之多；又看報上連日所登的日蘇交涉的消息；我們不禁的感覺帝國主義的無聊。想起日俄戰前中日感情的親密，又看看現在所謂「滿洲國」：我們那能不嘆在國際間靠人的危險？

國際經濟與中國

守愚

(一) 貨幣安定與美法立場

最近一個星期內經濟會議的歷程中，最足令人注意的，就是貨幣安定問題與法，美兩國相反的立場。這個問題不解決，影響其他問題，如戰債關稅等。然而貨幣安定問題，又非單獨可以解決；就是所謂解決，亦不過一種做作，為其他問題討論的張本。加以法美兩國國內政情不同，所以除了純粹的經濟問題外，還夾雜些政治手腕。並且表面上，似乎美法兩方，鬧得很起勁，其實與美國有戰債和國際貿易關係的，都在急急求一變通途徑。因而問題燕雜異常，所以值得我們先把他提出討論。

貨幣不能當飯吃，祇是代表一種最普遍的購買力。所以安定貨幣，亦就是安定購買力。購買力的來源為生產。由生產而工人得工資，資本家得潤利，地主得租金。這些都是價格，又叫做成本。倘使每單位貨物的成本，超過貨物的市價，將使生產縮減。結果便是工人失業，資本投閒。於是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的購買力，隨之減小。此項購買力之縮減乃是絕對的。倘使某種貨物的生產如故，生產者

(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的收入如故，而其他一切的貨物市價，比較抬高，那末生產者的購買力，遭遇相對的縮減。因為現在的收入，不能購買以前同量的貨物了。購買力又有對內對外的區別。拿本國的收入，買本國的貨物，叫做對內購買力。要是買國外的貨物，叫做對外購買力。因為對外購買力，在發生效力以前，必須換成國外貨幣，所以國外購買力的安定，亦就是國際匯兌的安定。

國際匯兌如何可以安定，其原素和程序，必須是：

- 一) 國際間貨物流通，無高深壁壘的關稅，或其他障礙，
- (二) 國際借貸平衡，無長期繼續數目鉅大單面流動的債款，如戰債賠款短期信用借款等，
- (三) 無大量或繼續單面的黃金流動。使兩國間物價，得其平衡，祇要最前二項中，有一項違背，黃金繼續外流終必禁金出口，放棄金本位，如一九三一年九月後的英國。所以要安定貨幣，尤其是國際匯兌的安定，解除關稅壁壘，以及其他阻礙國際貿易的法令和手續，和研求怎樣調處戰債賠款等，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還應注意的，是國外匯兌的安定，並非必須回

復金本位時代金輸出入點的限制，而在匯兌率的安定，不使其漲落過烈。

現在我們把安定幣制的理論撇開，再拿當前的問題來比較。美國的藏金，較任何國家都多。（約四十萬萬美金）又是向來出超的國家；歐戰以後，一躍而為最大的債權國。每年如果拿得到的話，可以接受三萬萬多的金元戰債。他要維持金本位，實在綽有餘裕。（聯邦準備銀行準備金與發鈔及存款相比，總在五六成之譜）。何以必須澎漲通貨，抬高物價，使黃金有大量流出的危險，更何以使歐洲大陸上，仍在維持金本位的國家，如法荷瑞士等，惴惴不安呢？原來四月間美國國會賦與總統的澎漲通貨三大特權，（即（一）准改金元的金含量和成分，（二）准發三十萬萬無十足準備的鈔幣，（三）准以生銀充作償還歐洲戰債的收款，或作準備銀行發行單圓鈔幣或輔幣的準備金，）非為應付國庫支缺，實為救濟農田議案內的湯麥斯修正案，而通過參眾兩院者。何以美總統對於農民若是其關切？一則美國農民，在政治上的組織，極為堅固，勢不可侮。再則物價雖一般的慘落，而農產品的續落，較工業品及其他均為勢較烈。農民受苦不堪，咄有煩言。（若以數字說明，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工業品跌落百

分之三十四，而農產品則跌落百分之五十四）。三則抬高物價，不獨農民認為正當解救方法，即一般實業家，亦以為物價抬高，可以興奮人心，鼓勵企業，較比坐視物價年復一年，任其降落，而莫展一籌者，實為勝算？有此種種政治壓力，加以經濟的觀點：言藏金，美國居第一位，言銀行準備比率，則與法國頡頏，言國外借貸，則二十年來，向居債權國地位，實所往而無不利。至言物價澎漲，將來貽害本國生計，則通貨政策，政府與聯邦準備，銀行，通力合作，六轡在手，非盲目直衝，所以在美國本身觀察，國際匯兌之安定與否，與抬高物價，鼓勵人心，然後謀國內購買力的安定來相比較，實為次要。

那末法國以及荷蘭瑞士等，又何必惴惴不安，非牽制大國，共同安定匯兌不可呢？先言法國。法國是一個小農戶小工業的國家。人民財富的分配，極為散漫，其中大多數且為政府債戶，每年法政府預算支出中，償還公債年金，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三。此等公民的收入，既係年金，當然不能變更數目。如物價抬高，受年命者，即吃大虧。而美國的通貨澎漲政策，故使美命跌落，其結果必如二三月間，大批美金，源源流入，尤以法國最多，不久法國物價，亦必隨之而漲。此在政治方面，法國政府，必受領年金

者的困難。其次如物價繼續抬高，則法國藏金，亦有流出的危險。結果將至被逼而放棄金本位。如成爲事實，一方面法國賠款，未必能按期償付，而對美國的戰債，却始終不能賴過。國際借貸，即有超出的危險，藏金流出，將至一瀉不止。其餘如瑞士荷蘭等國，雖在他們的國內，一切穩健，但是在國際間的經濟勢力，都甚微小，勢必隨同抬高物價，非放棄金本位不可。

可是英國又怎樣，英國已經禁金出口，放棄金本位，對美匯兌，自四元八六六跌至三元四至三元三元間。並且英國對美，亦是債務國，但是英國是國際貿易最重要並最鉅額的國家，不像法國。他一方面固須還美國戰債，他方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君 衡

(一)

中國自從清季倡辦新政，廢科舉，設學堂，數十年已來，「整頓教育」好像成了政府的一貫政策。辛亥已後差不多經一次的政變，便有一次的整頓教育。國民政府成立了不過數年，教育制度已經變更了幾次。甚至每一位教育部長上台，就有一個整頓教育的計畫。中國政府對於整頓

面因國外投資及役務運費等，在國際借貸上，還有抵消的辦法。假使法國能照常繳納賠款，問題更易解決。所以我們在國外消息中，祇看見英國袖手旁觀，靜待事變。

總括說來，解決幣制安定，恢復經濟繁榮，勢非戰債關稅生產等問題，一一先行解決不可。若徒爲維持金本位，而有保護金本位同盟的組織，甚至發一篇宣言，同時最大的債權國，如美國，最大的商業國如英國，拒絕參加，結果，匯兌決不能安定，法荷瑞士等國的金本位，亦必難以維持。

七，一，清華園

教育如此努力，教育的進步似乎應當超過世界任何國家了。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中國整頓教育愈熱心，更顯出教育的腐敗。雖然每次整頓的結果不能說是每況愈下，至少我們要承認進步是很慢，成效並不大。

教育失敗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例如社會不安，政治上不上軌道，都是間接的重要原因。教育固然可以改造社會

，刷新政治。但是教育的進步和社會的進步，總是互爲因果。教育並非仙方魔術，可以於一轉眼間化腐朽爲神奇。因爲這個原因，我們對於歷來執掌教育大權的大人，先生們，不應當過於苛責。

但是教育失敗尚有較直接的原因。其中最顯然的一個是：教育當局雖有整頓的決心與毅力，但對於教育的性質和功用似乎未能確然認清。因爲國內談教育者大半注意高等教育，所以我也專就大學教育發言（雖然這是不很妥當的）。

近代中國教育的改革當以清季廢科舉爲最重要。我們贊成廢科舉，因爲我們承認科舉時代的教育是錯誤的。但是現代教育是否完全脫離了科舉時代的精神，尙是一疑問。我們不可不平心靜氣的反省一下。中國傳統教育的原則，最重要的是「學以致用」。換句話說，教育的目的不是學問的本身而是本身以外的「用」。什麼是「用」呢？在科舉時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揚名聲，顯父母」；是「出將入相」，「經邦治國」；——總而言之讀書不是求知，不足爲學問而學問。就是理學家大談格物致知，歸根到底還是要拉到治國平天下上面去。至於子張祿干之輩把學問認做了名利的捷徑，更不足深論。因爲中國人信奉

如此粗淺的一個實用主義，所以中國雖有長期的教育史，而無科學的產生。中國人能夠發明指南針，地震器，火藥，紙張，木版書籍等物，而不能夠發見宇宙引力的定律，生物演化的理論。我們只注意應付眼前的現狀而不願意去求進步，尋真理。這種非科學的實用態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或者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個弱點；而這個特點或弱點已在歷來的教育精神上十足的表現出來。

「學以致用」不但是科舉時代的教育原則，也是當今教育的主旨。黨國要人提創工程實業教育，無非是因爲工程實業教育具有「救國」的實用。教育部限制文法學院學生的名額，其理由之一也是理工的人材較爲需要。其他一切人的態度都明顯地表示學以致用的主張。假如提倡實用，果然能够一洗從前空泛浮虛的學風，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事實上實用教育未曾實現，而「不切實用」的純粹學術亦因此受了打擊，不易前進。悲觀的人或者要說現在學風的虛浮，比科舉時代還要變本加厲。士八股雖然打倒了，洋八股代之而興。文學是革命了，黨義是頒行了；但是新文學在什麼地方比舊文學更有補於國事民生，黨義在什麼地方比經義更能實際救國，頗令人難於置答。因爲洋八股，白話文，比土八股更容易做，所以出版的書籍刊物，風起

雲湧，晉日本瑞典諸國推銷了不少的紙張。還有一層：在從前科舉時代政府提倡學以致用，同時爲讀書人定一條出路。衝要人員大批科舉出身；而進士翰林出身的「詞臣」亦不乏才智出羣之士，效忠君國。現在一面標榜實用教育，一面又不爲受教育的人謀實用之機會。四年畢業，一紙文憑，高等教育的責任就算完成。粗製濫造，年復一年，畢業生應考文官，未必能取；各處奔走謀事未必有成。政治既然不安定，具有專門學識而無與援的人，更感應用所學的困難。現在一般人滿口講培植工程人才。其實政府如果能已經造就的工程人才分配到工程建設事業上去服務，不使他們作用非所學的事，便是一場功德。我們人的朋友或同學專習工程各科的人，其中不少因爲不能謀得（或不願謀得？）實際工程的職務而去當官，教書，經商的。有了實用的人才，反而不用；沒有任用實用人才的辦法，偏要高唱實用教育。結果抱學以致用宗旨的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名利薰心的知道出身不在真正的學識，於是把教育看成一種取巧倖進的工具。誠心向學的人更因不能得社會的同情而徬徨歧路。無怪乎辦教育的人天天高呼實用，而造就的人才實不能用了！

(一)

這種失敗不是由於提倡實用教育的錯誤，也不是辦大學教育的錯誤。其根本原因之一，照我個人看來，是被學以致用一句話所誤，把全部的大學教育認爲僅是實用教育，把高等普通教育與專門或職業教育混爲一談。我以爲大學教育和高等專門教育的性質並不相同。後者的功用是訓練技術人材，而前者是養成「通人」或「學者」。兩者本當分頭兼重，並行不悖。中國的教育家把二者的界限不會看清，對於西洋求知純粹科學（廣義的）精神似又未了解，於是拿科舉時代學以致用的眼光來辦以高等普通教育爲主體的大學，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以爲整頓大學教育應當承認下列三個原則：

(一) 大學教育的功用是培養治學人材，與專門教育分途並進，兩不相妨。

(二) 確定治學人材的出路。

(三) 養成學以求知的科學精神，放棄學以致用的科學觀念。

現在分別說明我提出這三點的理由如下。

(一) 在上文中我曾批評迷信實用教育的錯誤，同時又指摘大學教育的空泛不切實際，似乎自相矛盾。其實我既不反對實用教育，更不擁護空泛教育。我的意思以爲辦

教育的人應當把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的途徑分開，不可張冠李戴，在不應該講實用的地方講實用。前清廢科舉，辦學堂的時候注重實用的空氣頗為濃厚。嚴幾道曾主張「治學」與「治事」的教育宜分，以矯正其弊。當時的人往往提倡「以專門之學，任專門之事」，「以坐言起行，合爲一事」。殊不知「治學」與「治事」是兩件不同的事，不可得兼。他說：

嘗有親理極深，慮事極當，宏通淵粹，貫通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勝任而快愉。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萊，乘時設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於學。使強奈端以帶兵，未必能及拿破侖也。使畢士馬以治學，未必即達爾文也。

嚴氏的區分是否全是，姑且不論；但他的主張大體是合理的。大學中雖或可出治事之材（歐美不乏先例），但大學的功能却在訓練治學之才。所謂治學之才，當然不必限於埋首書案的純粹學者。高等普通教育的結果也可以出產通達世務，胸襟開曠，眼光遠大的通人，也可以出產天才卓越的文人，詩人，藝術家。但是這幾種人材，嚴格地說，都不是學以致用的人材。

我們如果把大學中所設各系的性質略爲分析一下，此

理更爲明顯。假如大學是訓練治事之才的地方，文學，哲學，歷史，等系有何用處？物理系的畢業生，如遇家裏的電話壞了未必能有電氣匠的能耐，把牠修好。更進一步說，假如他能做邁克生，康卜登，安因斯坦，那是大學教育絕大的成功；假如他不能做袁迪生，也不能算是失敗。法學院各系的性質，略爲不同。牠們雖較文理各系較近實用的治事一途，但亦與尋常人心中所想的實用不同。經濟學系的主旨並不在教人如何發財。政治學系也不教人如何陞官。在政治系或經濟系治學的好處是明瞭政治經濟生活的原理，了解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組織的情況。參加實際工作的時候，能够高瞻遠矚，勝人一籌，不做無謂的事情。這還是僅就應用方面說。其實政治經濟等類的學問自有牠們本身學術的價值。研究政治學或經濟學的學者，和物理學家，歷史學家一樣在大學中佔一相當的地位。

大學是培養治學人材的學府。造就實用的專門人材，可另設高等專門學校，如德國的 *Hochschule*，美國的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可照現在中國的辦法在大學中設立專門學院。但最重的一點是要認清二者性質不同，不可因爲現在大學中有實用教育的一部分即以爲大學教育的全部是實用教育。假如我們認爲中國現在國難未已，民生

凋弊，無力「治學」，而停辦大學——非實用的高等教育——也未嘗不是一種適應國情的政策，不可厚非。但既辦大學，揭出最高學府的招牌，而又掛羊頭，賣狗肉，大辦其變相的職業學校——却是不可。我以為寧可不辦大學，不可辦非驢非馬的大學。（未完）

吾國現行財政監督制度之運用

淬廉

最近衛挺生氏在立法院紀念週演講「超然主計與聯綜組織」，對於二者之意義及重要，發揮盡致。處吏治不良之中國，此種制度上之防閑，實為迫切之要求，故就拙見所及，再申述之。

財政監督制度，在現代法治國家，規定極為周密，通常分為行政立法及審計三種監督。行政監督，注重收支之核實及效能與經濟之增進；立法監督，注重歲出入預算之議決及財政法規之制定；審計監督，注重在事前依法定預算及現行法令審核國家之收支，事後又舉其審核之結果，作為報告，以供立法機關之參考。試舉英國之制以為例：英制任行政監督者為財政部；立法監督者為國會；任審計監督者為會計審計統監。此三種監督機關之職權，在英非處於對峙地位，蓋因行使立法監督之國會，不僅對於預算，有議決之權；即決算及帳目，亦須由國會審定與查核。

所謂會計審計總監之職務，不過係替代國會任事前之監督及事後之審查，其監督與審查之結果，最後尚須向國會報告也。吾國現採行五權分立之制，立法與監察，獨立對峙，相輔而行。立法院對於財政之監督，其職權僅限於財政立法及議決預算；關於預算實行時之監督，及決算之審核，則由監察院獨立行使，不須向立法院報告。就制度言，吾國審計機關之職權，比較擴大，而其嶄新立異之處亦在此。

在五權分立之制下，編製預算與實行行政監督之職權，應屬一超然之主計機關，此為事實上之需要。蓋因編製預算及實行行政監督之機關，如為行政院內之財政部，則是行政一院有藉錢囊之控制以監督其他四院之權，此與五院各自獨立之精神，顯呈不符。吾國各院之組織，既甚龐雜，且時有變更，其所有之概算，有時非予以削減不

可。使此種削減之權，出自行政院之財政部，則易於發生爭執。故根據事實上之理由，主計機關應處於超然地位，直隸國民政府，而不宜屬於任何一院。

主計機關既處於超然地位，則聯綜組織之制度，自可推行。稽諸現行之制，國民政府主計處，設有歲計，會計，統計三局。歲計局之職掌，主要為編造預決算，指揮監督各機關辦理歲計事務人員，及關於籌劃預算所需事實之調查事項。會計局及統計局之職掌，主要為關於各機關會計統計人員之任免選調訓練與考績，及關於各機關會計統計事務之指導監督事項。自上述主計處各局之職掌觀之，聯綜制度之運用，即可窺見一斑，而其所產生之效果有三：（一）會計制度之統一。各機關辦理會計之人員，均由主計處會計局任免與監督，如英國財政部之指定各機關會計官。此種制度，可以收就地監督之效，且可使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之機關之會計制度，趨於統一。（二）統計方法之統一。國民政府各院所屬機關之統計，編製時彼此不相為讓，則易致重複參差，系統紛歧。採用各機關統計人員由主計處統計局任免與監督之法，則一方可杜各機關捏造統計之弊，一方又可收編製方法統一之效。（三）歲計制度之統一。按諸現行預算法之規定，各機關概算之擬編

，由主計處駐在該機關主辦歲計事務人員先依據其主管長官所主張之數額及理由編就，再逐項依據其自己主張修正之數額及理由簽註之。此種制度，可使國民政府各院部會之歲計制度，趨於統一。同時預算法又規定主辦歲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支出收入契約或營業，應向所在機關主管長官以書面聲明異議；并報告於該管主辦審計事務人員，及該機關之上級機關。假使不為此項異議，則應連帶負責。夫主辦歲計事務人員，既處於超然地位，而又予以責任，使苟虛偽掩飾，則將代人受過。規定如此，串同舞弊之事，似又可少戕也。自上述所述，主計處對於財政監督方面之工作，實兼事前與事後二者，如能就規定者完全實行，亦不能不謂之已達於嚴密之境。

雖然，舉預算實行時之財政監督權，盡由主計處片面負責，則雖其組織嚴密，其所處之地位為超然，要亦不能無弊。蓋因主計處所編製之預算，雖須由立法院審議通過，但預算執行之時，立法院則無權過問，故欲期其無弊，實有賴於監察院之審計監督。吾國監察權獨立之制，本諸昔時之御史制度，明清以來之都察院，其權力不僅限於彈劾，實際包括甚廣。例如都察院有建議政事之權，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皆得盡量陳奏。有監察行政

之權，凡中央及地方官廳所管事務之施行與成績，皆須向督察院各科道報告，各科道得隨時檢查之。有彈劾官吏之權，凡官吏違反法令及妨害公益之行為，皆得加以彈劾。有檢查會計之權，凡中央或地方官廳經費之出納，均須受都察院之監察；各官廳所有之會計報告，均須受都察院之檢查。此外尚有封駁詔書，會讞重案，及註銷案卷等權力。都察院之職權，既若是之繁鉅，其組織上自必採分科職掌之制。按諸清代都察院之組織，分六科十五道，就大概言之，六科分掌京內各部，十五道分掌各行省。在專制政治之下，此種行使監察權之御史制度，亦實澄清吏治之一法也。

吾國現制，審計監督之職權，由監察院內之審計部行使。審計部對於財政監督之工作有二：一為審核，一為稽察。所謂審核，即依照預算案，審查全國之歲入歲出，核定各機關之收支命令。為實行事前監督及簡省手續計，審計部派審計員常駐各支出機關，以便就地執行審核，此法係仿美會計院派遣審計員分駐各部之制。假使機關長官之支付命令，與預算不符，審計員得拒絕簽字；出納人員無審計員之簽字，得拒絕支付。此種就地監督之法，不第可遏止機關長官不合法之支出，且可監視主計處派駐之歲計

會計統計人員，使其不易依阿瀆職，串通舞弊。至於稽察方面，則審計部有派駐各機關之稽察人員，在書據以外做事實上之調查。處此犬牙相錯互相牽制之情形下，官吏貪婪之弊，足以少抑，固無待言。惟欲使此種制度，行之有效，有特別應注意之點二：第一，須力求金庫統一，蓋金庫不統一，則審計員之拒絕簽字，不易發生效力。故欲使審計員有實際控制支付之權，必須先有受其監督之統一金庫。第二，宜速做清都察院科道分掌之制，依審計部組織法之規定，先在全國各重要市鎮，設立審計處，就地實行事前之監督，免致審計部有鞭長莫及之虞。

綜括言之，吾國現有之財政監督制度，就行政監督及審計監督言，規定已極周密。慮各機關長官之虛造捏報也，則有直隸國民政府處於超然地位之主計處，直接控制各院部會及其所屬機關主辦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人員。慮主計處直轄人員之將殉情瀆職也，則有監察院審計部派駐各機關之辦理審計人員及稽察事務人員，為之就地監督。聚辦理事務之人及負責監督之人於同一機關，而各保持其獨立性，各向其上級機關負責，此不僅在監督上可望周密；即辦事手續上，亦可期其敏捷而有效。聯綜組織之功能，即在於此，而揀治官吏貪婪之病，尤非此制不為功。

以上所論，專就制度方面而言。第財務行政之問題，不僅在組織方面；用人方面，亦須予以深切之注意。吾國固有之制度，各機關長官，得自位置私人，關於出納報銷，均由其私人秉承意旨辦理。此種制度上之缺陷，實足以引誘助成官吏之貪污。蓋人性多好自利，苟有罅隙可乘，自非廉潔公正者，必將藉之而謀所自肥。且國家爲無形之物，不可以見，故人對於國家之關係，在意識上往往不若對於其他自然人之高。耿介自持之人，平時不肯以詐僞欺人者，一行作吏，對於錢糧出入，即不惜溢額虛報，以自漁利。欲阻抑其藉公肥私之心於未萌，制度方面之防閑，自不可忽。然僅注意於制度，而不顧及用人問題，則立法，不久即將弊生；弊生又立一抹弊之法以防之，展轉加增，日趨繁縟。結果法制愈密，防閑愈周，而舞弊之技倆，愈將層出而不窮。

用人方面，應注意之問題有二：（一）用人之標準。實行財政監督制度時，其負責行使職權之人選，宜特別注意。關於行政監督方面，如派赴各機關之主辦歲計統計人

員，關於審計監督方面，如派赴各機關之辦理審計及稽察人員，均宜以材能功績爲標準。此項人員，必具有專門知識，而不可以請託夤緣之人濫側其間。蓋因任用之人，苟具有政治之背景而非以其材能，則不第不能盡職，且足以損其他勤勞任事者之精神。（二）任用之條件。任用條件，包括薪金之多寡，升遷之機會，養老金之設置，及任期之有無一定等。任財政監督之官吏，舞弊之機會甚多，薪金不優裕，任期無一定，則人懷五日京兆之心，孰肯破顏面以盡摘發之職？不第不能破面摘發，且將依阿見好，預爲他日請託之地步。故欲期其盡職，須報酬甚優，使其不致見異思遷；須任期有定，使其知可以久於其位；尤須有升遷之機會，使有志者不致因無上進而自沮。如此，始可安其心意，而其獨立任事之精神。否則制度方面雖周，運用時終不能免於弊竇叢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吾國今後欲實施財政監督有效，制度方面，固宜倣歐西之成法，求其完密；同時任人方面，亦不可不借鏡於歐西各國之功績制度也。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三）

吳景超

（三）災傷撫卹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每年因工作而受傷的人是很多的，其中有一部份且因此而喪失生命。根據美國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工人因傷死亡的，數目在一萬六千以上。受傷而暫時不能工作或永遠不能工作的人，但不致有性命之憂的，總數有二百六十餘萬。

這些不幸的工人，重的喪失生命，輕的斷了胳膊，瞎了眼睛，或傷了指頭，假如生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其命運是很悲慘的。在那個時候，假如廠主是仁慈的，他們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撫卹，維持目前的生計。以後的生活，如何辦法，只有付之命運。假如廠主是苛刻的，他們一個錢也得不到。即使訴之法律，也不見得能够勝利，因為當時的法律，多為廠主的利益着想。可是自從一八八三年以後，情形便大不同了。德國首先通過工人賠償法，以後別的國家，都繼續倣效，到了今日，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文明的國家，沒有這類的法律了。就是我們中國，對於工人別種權利，雖然沒有顧到，但在近年通過的工廠法中，對於工人

的災傷撫卹，也有明文規定的。

工人因工作受傷的結果，不外三種，一是死亡，二是殘廢，三是減少了工作的能力。近來的法律，對於工人的賠償，當然看結果的不同而有分別。

我們先看工人因受傷而死亡，在各國所得的賠償是怎樣。

美國各州的辦法是不一致的。在本薛維尼亞，工人的家屬，可以從廠主那兒領三百個星期的卹金，卹金的數目，等于已故工人的工資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六五，但最多不得過十五元一星期。所以工人的家屬，最多可以得卹金四千五百元，但是三百個星期之後，卹金已經用完，假如工人遺下來有幾個未成年的子女，他們的生活將如何維持？這是本薛維尼亞的法律所沒有解決的問題。紐約的法律，比較要高明些。在那兒，假如工人受傷而死，遺下來一個寡婦，那麼他可以終身去領卹金，或者到他再嫁時為止。卹金的數目，等于已故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三十。假如工人遺下有未成年的子女，那麼每一個未成年的子女，可以

多領工資百分之十。但郵金的總數，不能超過已故工人工資的三分之二。而且已故工人的工資，如每月在一百五十元以上，也照一百五十元計算。紐約的法律，從工人的眼光中看來，比較是滿意的，因為他有伸縮性，而且真正解決了孤兒寡婦的生活問題。

英國的法律，與美國略有不同，其令人滿意的程度，似乎不如美國。他的辦法，可以分作三層來說。第一，假如死者沒有家屬，那麼廠主應付醫藥費及喪葬費若干，但至多不得超過十五磅。第二，假如死者只遺下一位寡婦，那麼他可以領郵金二百磅，或者已故工人三年的薪資，但總數不得超過三百磅。第三，假如死者所遺下的，不只寡婦，還有未成年的子女，那麼家屬所得的郵金，應分作兩部計算，第一部為寡婦郵金，第二部為子女郵金。寡婦郵金的算法，已如上述。子女郵金的算法，可分三步。第一步係查考已故工人每星期的平均工資，如在一磅以下，以一磅計，如在兩磅以上，以兩磅計。第二步係查考死者的未成年子女，離十五歲尚有若干星期。第三步係以死者每星期的平均工資，乘其子女離十五歲尚有若干星期的數目，其得數再以百分之十五乘之，即等于每個子女所應得的郵金。但寡婦郵金與子女郵金的總數，不得超過六百磅。

我們現在可以舉一個例，來表示英國法律的應用。譬如有一個工人，生前所得的工資是每星期四十五先令，死時遺有一妻一子，子年三歲。寡婦的郵金，等于死者三年的工資。所以我們便以一五六星期乘四十五先令，等于七，〇二〇先令。化之為磅，便有三五一磅。這個數目，應當減去五十一磅，以合法律所定，寡婦郵金，不得超過三百磅的條文。他的兒子，離十五歲還有十二年，換句話說，還有六百二十四個星期。以六二四乘二磅，等于一，二四八磅，再以百分之十五乘之，便是一百八十七磅四先令。這是孤兒應得的郵金。在這個家庭中，寡婦郵金與子女郵金的總數，是四百八十七磅四先令，并未超過六百磅。

德國的法律，規定廠主對於因傷喪命的工人，除給喪葬費外，還要付給郵金。喪葬費等于已故工人年薪十五分之一，但至少須在五十馬克以上。郵金視死者家屬的大小而定，至多不得超過死者生前工資百分之六十。

以上所說的各種郵金，無論在那一國，都是由廠主付給，表示廠主對於工人的安全，要負完全的責任。

對待殘廢工人的辦法，各國亦不一致。這種殘廢工人，生命雖然保存，但已失却工作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殘廢工人的本身以及依他為生的家屬，其生活便發生問題

。美國麻省的法律，規定廠主對於這種工人，應給以三分之二的工資，但付給此種工資的時間，不得超過五百個星期。假如一個年方三十的工人，每星期收入工資四十元，一旦變成殘廢了，他在這種法律之下，所得的待遇如何？他應當得三分之二的工資，便是二十六元六角七分，但實際他只能得十八元，因為法律另有一條，規定殘廢工人，每星期所得的津貼，不得超過十八元。現在假定他每星期得洋十八元，五百個星期之後，他是否能得津貼總數九千元呢？不然，因為法律還有一條，規定殘廢工人，所得的津貼總數，不得超過四千五百元。所以在名目上，他能取五百個星期的津貼，實際他只能取二百五十個星期的津貼。到了三十五歲，他便毫無進款了。此後他將何以爲生？所以麻省的法律，并不足取。這個工人，假如生在紐約，每星期便可得二十五元的津貼，因為那是紐約法定的最高數目。但他可以終身領取此種津貼，這是極正當的。英國的法律，規定廠主對於殘廢工人的津貼，視工人平日所得的工資多少而不同。假如工人平日的工資，每星期是五十先令或五十先令以上，那麼殘廢津貼，須等于工資的三分之一，但最多不得超過三十先令。如工人平日的工資，每星期在五十先令以下，那麼殘廢津貼的數目，比二分之

一的工資，還要略爲多些，其算法極複雜，茲不贅。德國的辦法，大約比較對於工人最爲有益。因為殘廢工人所領的津貼，等于工資三分之二。假如他的殘廢程度極深，處需他人的照料，那麼他所得的津貼，可以加到與工資相等。

這兒所說的殘廢工人，是指那些因受傷而完全損失其工作能力的。另外還有一種工人，便是我上面所說因受傷而減少工作能力的。譬如斷了一隻胳膊的人，雖然是減少了工作的能力，但並沒有完全損失其工作能力。他休養了若干星期之後，也許還可以找到工作，不過所賺的錢，不如以前那樣多就是了。這種人應當怎樣對付呢？美國的倭海倭省，規定工人因受傷而減少工作能力的，可以領取卹金。卹金的數目，不得超過工資的三分之二，也不得超過每星期十八元七角五分之數。至于領取卹金的時期，視受傷的所在而有長短之不同。譬如斷了一條胳膊，便可領取卹金二百個星期，瞎了一隻眼睛，只能領取卹金一百個星期，切去一隻大姆指，可以領取卹金六十個星期。卹金領完之後，廠主便不負責任了。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僱員因工受傷的賠償，比倭海倭省的法律，比較周到。受傷的人，在調養時期內，可以領取原薪三分之二，但總數不得超

過每月一百十六元六角六分。身體恢復之後，假如他還可以回到原來的工作，領取原來的薪資，自然無話可說。假如他因為受傷的緣故，不能回到原來的工作，但是找到了別種工作，其報酬較原職為差，那麼政府要賠償他的損失三分之二。譬如有一位郵差，月薪一百元，受傷後，不能再當郵差，另外找到一種工作，月薪只有七十元。所以他因傷所受的損失，是月薪三十元。政府要賠償他的損失三分之二，所以每月須付這個郵差二十元。郵差本人的損失，因為有這種賠償的法律，便由三十元減為十元了。這種賠償的原則，現在已有許多國家採用。

歐戰之後，漸漸有人覺得，假如這些受傷因而減少工作能力的工人，能夠得到相當的訓練，還可以恢復受傷前的經濟能力。福特曾研究過八千種工作，發現其中有六百七十種，是兩條腿都沒有的人可以做的，二千六百三十七種，是一條腿的人可以做的，兩種是沒有胳膊的人可以做的，七百十五種是只有一條胳膊的人可以做的，還有十種，是瞎了眼睛的人可以做的。所以我們遇到一個局部殘廢的人，可以看他還適宜于何種工作，再給以相當的訓練，結果有時不但不減少經濟能力，還可以加增經濟能力。譬如一個煤礦中的粗工，受傷之後，一條腿沒有用了，開鑛

的事，當然不能担任。但他的腦經還是靈敏的，他的兩手也還活潑，此時如政府給他一種修理鐘表的訓練，那麼他以後當鐘表匠，所得的工資，也許比受傷前當粗工的時候還多。所以受傷工人的重行訓練問題，乃是研究災傷撫卹的人，近來所最注意的。

(四)老年卹金

老年問題，在近代的工業社會中，比較以前嚴重多了。這種情形，是好幾種原因造成的。第一，近代衛生事業發達，醫藥的技術進步，所以老人的數目，近代較以前為多。就拿美國來說，一八九〇年，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只佔全體人口百分之三·九，一九三〇年，便加至百分之五·四了。英國的老人，也有同樣的加增。在一八九四年，倫敦有一個調查，發現每一千人口之中，有四十個在六十五歲以上。一九三一年，老人的數目，從每千人四十，加至每千人七十三了。老人的數目，雖然加增，但是工業社會中的組織，却漸漸地小家庭化。子女到了成人的時期，便脫離了父母的約束，自己到社會中去成家立業。他在經濟上只顧自己，只顧妻子，只顧未成年的兒女，至于父母，他是不管的。實際許多工人，在生活艱難的狀況下奮鬥，也無餘力來侍養他的父母。所以歐美的工業社會中，便

發生了一種老年問題，是農業的社會中所少遇到的。

一個人到了六十五歲，工作的能力損失了許多，所以到了這樣大的年紀，還繼續工作，維持自己生活的，實佔少數。根據倫敦近來的調查，六十五歲到七十歲的工人，四個之中，只有一個還做工的。七十歲以上的工人，十個之中，只有一個做工的。這種老年的工人，大多數不能自己謀生，假如他的妻子身體也很好的，此時還繼續伴他活着，這一對老夫妻，將如何過他們的日子呢？子女的不大可靠，已如上述。假如他們平日已有積蓄，早為未雨綢繆之計，此時生活也可不成問題。但是很多的工人，是不與銀行發生關係的。這些人到了年事已高，不能工作的時候，就要靠國家來幫助他們了。

德國在一八八九年，便有老年郵金的辦法。現在有這種辦法的國家，數目在三十以上。這種郵金，在有些國家裏是白給的，但也有些國家，規定工人要保老險。保了老險的工人，到了六十五歲或七十歲，才可領取郵金。也有好些國家，兼採兩種辦法的，下面我們可以舉例說明。

美國的倭海倭省，對於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如每年收入，不到三百五十元，可以領取郵金，每星期不得超過五元。在尼法答省，過了七十歲的老人，假如自己不能維

持生活，才可領取郵金，每日不得過一元。英國的老年郵金律，是一九〇八年通過的；以後常有修改。最近規定，凡領取老年郵金的人，年齡須達七十，做英國的國民，至少在十年以上。如此老者是生長在英國的，那麼他在五十歲以後，至少有十二年住在英國，假如他是外國人入英籍的，至少須有二十年住在英國。同時他每年的入款，不得超過四十九磅十七先令六辨士。進款超過這個數目的老人，沒有領取郵金的權利。進款不及這個數目的人，看他進款的多少，定郵金的多寡。進款不到二十六磅五先令的人，可以領取每星期十先令的郵金。這是最高的郵金。進款超過四十七磅五先令，但不到四十九磅十七先令六辨士的，可以領取每星期一先令的郵金。這是最低的郵金。

上面所說的郵金，是白給的。英國除了這種郵金以外，在一九二五年，還通過一種法律，是強迫工人保老險的。凡在疾病保險法之下，應當保險的人，都要保老險。男子每星期須納保險費四個半辨士，女子每星期須納保險費兩個半辨士。凡在六十五歲以前，曾繼續保險五年，而且付過保險費一百〇四次的，那麼在六十五歲至七十歲之間，每星期可得郵金十先令。假如他的妻子，也有六十五歲了，他還可以另外領取郵金十先令。保了老險的人，年

齡到了七十歲，不問他是否合于領取老年卹金的條例，還可以繼續領取老年卹金，每星期十先令。

也許有人要問，老險既是個個工人要保的，但工人不一定能個個活到六十五歲，那些不到六十五歲，便離開塵世的，不是什麼好處都得不到麼？實際不然。那些保了老險的工人，不到六十五歲便死亡的，他的孤兒寡婦，便可得到一些利益。先說寡婦所得的利益。假如他的丈夫，生前曾保老險，而且付過一百〇四次保險費，那麼在他逝世時，寡婦每星期便可領取卹金十先令。假如他還有十四歲以下的子女，那麼最大的每星期可得五先令卹金，以下的子女，每星期可得三先令卹金。假如這些子女過了十四歲還在學校中讀書，可以領取卹金至十六歲爲止。假如死者沒有遺下寡婦，只遺下孤兒，那麼負責教養這位孤兒的人，便可領取七先令六便士一星期的卹金，直至孤兒已達十四歲爲止。如繼續入學，卹金的領取，可以延長到十六歲。德國的老險，是與殘疾險合併舉行的。保了這種險的人，到七十歲便可領取卹金。七十歲以前，如患了痼疾，過了二十六個星期還未痊愈，（德國對於有疾病保險的工人，于疾病時付補助金，只以二十六星期爲限。）也因爲保了這種老險與殘疾險的緣故，可以有卹金的收入。

以上所說的兩種應付老年問題的方法爲聯合舉行，那麼老者的生活問題，總算得到一條解決的途徑了。還有可以批評的，就是各國對於卹金的數目，定得似乎低了一點。即以英國來說，一對老年夫妻，每星期有二十先令的進款，生活還可以勉強維持。假如一個單身的老者，靠十先令來維持生活，一定是不够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夠的數目有限，子女便樂意出來幫助了。假如沒有子女的幫助，自己又無他項收入，那麼遠得靠慈善機關的救濟，才可延此殘生。所以卹金的數目，應當略爲加高，使毫無進款的老年工人，依此卹金，便可維持生活，在貧窮線之上。

○ ○ ○

總結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點感想。

第一，近代先進國家中的工人，其生活中最大的危險，現在都已得到保障。他們的生活程度，因爲有這種保障，所以比較十九世紀的初葉，要提高得多。

第二，中國現在剛踏進了工業革命的初期，所以工人生活的艱苦，與英美各國一百年前相彷彿，如與英美的近代的近代工人相比，真是望塵莫及，這是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人所應注意的。

第三，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勞動者的生活，也可日見進步，這也許是信仰馬克思學說的人所沒有十分注意的。這種情形之所以能夠實現，乃是因為歐美的國家裏，不但有資本主義，也還有民主政治。資本主義所發生的缺點，可以利用民主政治來補救。上面所說的那許多法律，便是民主政治，補救資本主義的成績。有人說是今日的資本主義，如與一八四八年的資本主義相比，其差異的程度，正

不下于美國制度之異于蘇俄。這句話也許說得過分，但頗能表示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而是時常變動的。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還能繼續存在，不如一般呢咄他的人，所預料那樣易于崩潰。也許因為歐美各國有民主政治，他們的資本主義，可以逐漸轉變為一種社會主義，不必經過革命的過程，亦未可知，我們等着看罷。(完)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丙種業已售完，甲(連郵費二元一角)乙(連郵費一元九角)二種亦所存無多，欲購從速。而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已裝訂成冊，分為三種，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定縣秧歌選

精裝實價三元八角
平裝實價三元二角
郵費另加二角三分
精裝實價二元五角
平裝實價二元二角
郵費另加一角六分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發售處：1. 河北定縣考棚街本會
2. 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本會
3. 代售處：北平神州國光社

第十六期 國聞週報

第二十六期

本期刊要目

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	張蔭麟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郵費五角五分▲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美國海權的部析	成盛昌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赤區土地問題(續)	記者	
世界經濟會議(三)	傅增湘	
藏園書題記	吳經熊	
憲法初稿	中	
傷兵	中	

北農叢書

日本法西斯運動

日本法西斯運動，邇年來殆呈舉國若狂之狀態。此書共分五章，首為概觀，次述歷代，次陣營展望，次各黨政策，最後詳論中心活躍之各人物。讀此一冊，於日本政情，瞭如指掌，而暴日何以強佔我東北，亦思過半矣。全書二百餘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

北平晨報：每日三張
大張每月一元
市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三角

每冊七角。外埠加寄費七分，郵票代洋八十一分。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